

# HUANG HUA GANG

2004 年 第 1 期

總第 8 期

# 黃 花 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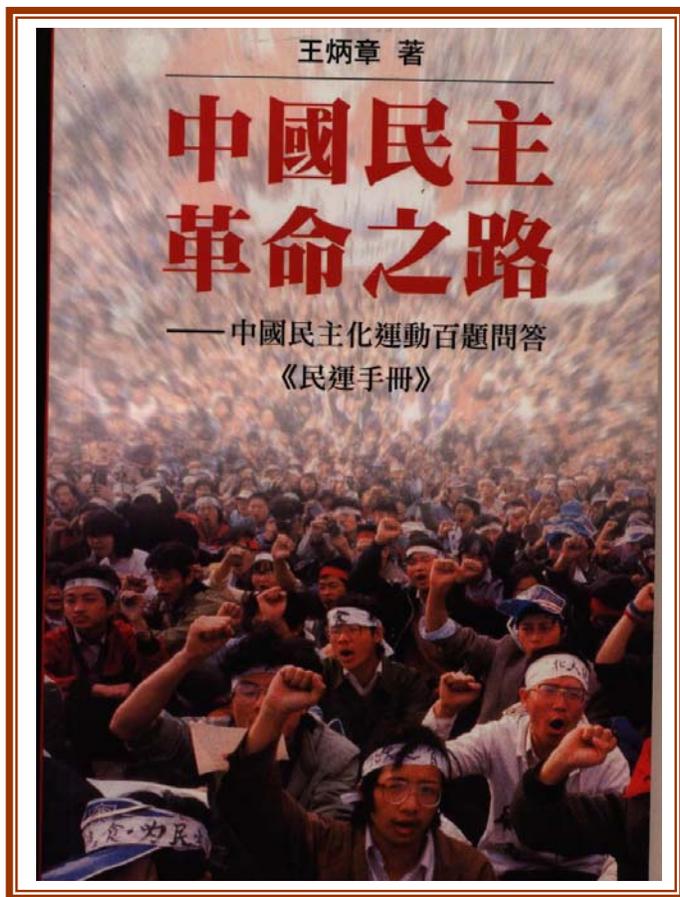
文 歷  
化 史

季  
刊

- 
-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on the left. To its right and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stone plaques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League (KMT) located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Each plaque is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of the city and the league's nam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plaques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they appear to be part of a larger monument or display.
- 民主運動要愛國
  - 關於反對台獨的若干問題
  - 聯邦地方分離主義 VS 中國民族統一主義
  - 中國別解
  - 台灣—是中國的肚臍眼
  - 二二八台灣國 與 九一八滿洲國
  - 民主統一為中華
  - 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的沉淪
  - 中華王道文化是怎樣形成的？
  - 公民社會宣言
  - 痞子毛澤東—讀李銳《廬山會議紀實》
  - 假若這也是“中國國民黨的競選宣言”
  - 指蔣宋貪污 絕對是捏造
  - 從唐弢不完成魯迅傳說起

王炳章博士

新年  
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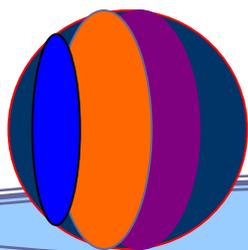


王炳章博士著述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

雖然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我祇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但祇因我你，在海外，都僅僅想做國內痛苦民眾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又要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所以，我們才被迫共享著“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產黨恨我們，國民黨嫌我們，民進黨討厭我們，“中共民運特務”們要仇視和誣衊我們……

辛灝年：致中共無期徒刑徒王炳章博士公開信



請讀內文：“寒衣翻作征衣情”

# 黃花崗

歷史文化季刊

二零零四年 第一期 (總第八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08  
Published  
February 27, 2004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mailto: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馬佩華、周美娟、姚鑫華、路人

董事會幹事 孫雲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易丹軒

主編 辛灝年

主編助理 李剛博士

特邀編審 吳學燦、李勇、王友琴教授

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

編委會名譽編委 王德耀、成其林、黃玉振、李勇、向厚祿  
黃其柱、黃偉悌、麥青芬、趙增義、孫國欽、韋峰、于京山  
張學海、陳慶國

編委： 丁抒 王友琴 尚戎 劉國凱 丁毅 楊海平  
陸耘 邢錚 楊三民 高陽 余建文 南明 辛華  
陳維健 嚴青 陸中原 周健 宮晨 陳一如 楊柳春  
林牧晨 王平 宋子明 吳學燦 翟心海 孫雲 林才君  
辛政 高優 夏雲 葉 賴安志 應易中 魏玲  
魏碑

本刊法律顧問：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葉寧

# 黃花崗 雜誌

第 8 期 (增刊) 2004 年 第 1 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February 27, 2004



深切悼念金堯如先生

## 本刊評論員文章

附文

## 新聞發佈會

## 民主統一為中華 專輯

## 論中國 說中華 專欄

驅除馬列

當代中國

## 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

紀念宋美齡

清算毛澤東

民主運動要愛國

全僑盟紐約研討會及其所暴露的問題

本期推出“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

黃花崗雜誌開展“誰是新中國”論戰

舊金山《走向共和》賞評會三波一折大獲成功

寒衣翻作征衣情

關於反對台獨的若干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肚臍眼

中國民主運動如何評估應因『台獨』

二二八台灣國與九一八滿洲國

公民自由與區域民主憲政問題

我為什麼贊成攻台？

民主統一為中華（講演錄）

聯邦地方分離主義 vs 中國民族統一主義

中國別解

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的沉淪（講演錄）

公民社會宣言

中國民間村級罷免報告

大陸社會真相調查報告（之一）

假若這也是“中國國民黨的競選宣言”

宋美齡之死 顛覆中共抗日謊言

大陸學者頌揚日機轟炸下的蔣介石和宋美齡

指蔣宋貪污，絕對是捏造

驕傲地笑吧（抗戰詩抄之二）

痞子毛澤東——讀李銳《廬山會議紀實》

本刊評論員 4

陸 耘 8

本刊 10

本刊 10

本刊記者 楊柳青 11

本刊記者 楊柳青 12

王希哲 13

吳學燦 17

劉國凱 21

阿修伯 24

陸 耘 26

大陸網民 29

辛灝年 49

孟德聲 41

趙增義 47

辛灝年 58

大陸 鄭貽春 31

大陸 楊銀波 35

大陸讀者 40

台灣 史絢麗 68

大陸 黃傑 69

大陸書籍摘錄 71

宋仲虎 72

仲 榆 74

75

## 誰是新中國 論戰文章

正面評價《誰是新中國》	《誰是新中國》的三個貢獻	莊思明	79
	辛灝年其人其書	李雲漢	80
	正面評價《誰是新中國》摘錄	本刊	84
負面評價《誰是新中國》	新中國要有新構思	細柳營	86
	沒有蔣介石的獨裁，哪有毛澤東的獨裁	民運人士網貼	88
《誰是新中國》的影響	王炳章給中國大陸同胞的一封信	王炳章	88
	中華新同盟會（大陸）新世紀公告	中華新同盟會	89
	驅除西洋馬列 恢復中華民國	大陸 傅鐘華	90
	還有一條更好的路——誰是新中國影響了台灣留學生	揚三民	94
<b>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b>	珍重珍重——新亞校歌與中華文化	孫國棟	95
	中華王道文化是怎樣形成的？	孫雲	99
<b>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b>			
紀念王若望逝世兩週年	重燃希望中迎來老伴兩週年祭	羊子	104
	王若望的遺訓：兩手準備	莊思明	105
	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王若望印像	陳破空	106
	並非一個人的遭遇（下）	王友琴	112
馬列中國的知識份子	吳宓和季羨林的生與死	李勇	107
跨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	二臣傳——香港名報人卜少夫記實	香港 段干木	122
台港海外的知識份子			
<b>理論探討 專欄</b>			
社會主義研究	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下期預告）	陳禮銘	
<b>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b>			
中俄關係記實	斯大林操刀分割外蒙古（下期預告）	龍勝熊	
	黃沙俄匪中華血（下期預告）		
	蘇軍佔領東北之後（下期預告）		
<b>時代與文學 專欄</b>			
文藝評論	從唐弢不完成《魯迅傳》說起	陳家驊	129
作品	鄭文英詩選	鄭文英	57
	詩二首：共軍神州五號升空（打油詩）	貝里斯 田夫	121
	來自湖南三青年		128
<b>世界華人 專欄</b>			
華僑人物	周詳自傳（續四）		133
<b>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b>			
	東海一臬雜文四篇	大陸 東海一臬	137
	申雪記實兩篇	大陸 申雪	141
	魔鬼辭典	大陸 金海濤	103
<b>《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b>			
	本刊董事會第八次財務公告		143
	本刊新增榮譽訂戶		74
	敬啟者		35
	聲明與更正		24
	編後、黃花崗雜誌和《誰是新中國》征訂單		144

本期義務編稿：吳學燦 辛灝年 本期義務校對：應易中 本期義務排版：李剛 辛灝年

# 民主運動要“愛國”

## ——兼談中國人民的歷史教訓

本刊評論員

### (一)

如果我們一定要用“民主運動”這個稱謂，來代表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推進行為，那末，現代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有了一百餘年的歷史，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論是從自一九七九年的“民刊運動”算起，還是從王炳章博士在海外舉旗高倡民主起算，也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人貴有自知之明。本刊祇是一家在海外創辦的歷史文化刊物，不僅明瞭自己的責任和範圍，而且從來不敢自謂也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一份子。但是，本刊畢竟是大陸旅外學人在民間華僑支持下所創辦的刊物，因此，作為一份中國人的刊物，作為一個意在通過對歷史的反思，而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澄清中國現代歷史的雜誌，我們與所有的中國人、甚至是所有的海外華人，不僅都有愛中國、愛中華的權力，而且也有捍衛自己的祖國不遭遇分裂、自己的人民不遭受侮辱的權力。這也是“天賦我權”，不容剝奪。所以，我們才不揣冒昧，要對當代的中國民主運動、特別是當前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這個是爲了中國走向民主的偉大運動，說一句諍言。

這個諍言就是：民主運動要“愛國”！

理由，很簡單，我們也已經說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論是海內還是海外，都是爲了我們的中國能夠走向民主，而中國也祇有在我們民主運動人士的奮鬥下走向了民主，我們的民主運動人士就不僅爲自己的祖國做出了鉅大的貢獻，同時，也爲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進步作出了大貢獻。更何況，在民主的進程上，我們中國已經大大地落後了。

因此，在爲中國謀求民主進步的奮鬥進程之中，一切意圖“以分裂中國而求中國民主進步”的想法和做法，都無疑是錯誤的；也就是說，一切試圖以贊成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和內蒙古獨立而

求中國民主進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甚至是荒唐的。因爲，這種種的想法和做法，都不是愛中國之爲；而一個不愛中國的中國人，又如何能夠爲了中國的民主進步而勇敢奮鬥犧牲呢？並且，如果中國已經分裂了，如果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許多民族都已經脫離了中國，甚至如某些人士所設想的那樣，中國的每一個省都獨立了，都建立了另外一個“與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新國家，那末，我們爲中國的民主奮鬥還有什麼意義呢？就算是實現了民主，則民主將“爲誰所用”？

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是，中國辛亥之後各省的獨立，是要從滿清王朝的中央政權裏面獨立出去，以促成專制王朝的迅速滅亡，而不是想從中國分裂出去，“另成一國”。而先後獨立的十六個省份，更沒有一家成立了一個“與中國從來就沒有任何關係”的新國家。這實在是連最無知的反動軍閥都不曾做、也不敢想過的事情。中國辛亥之後，於民主與專制反復較量和公開較量的艱難時期，因大軍閥要乘機以武力來“一統中國”，小軍閥才要搞“省自治”或“聯省自治”以自保，同樣不是要脫離中國，以“自成一國”，更不可能說他的“省自治或聯省自治”，已經“與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也是連當時人民最痛恨的殘餘地方軍閥都不敢想和不敢做的事情。

然而，在當前的中國民主運動、特別是海外民主運動陣營中，卻存在著種種與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背道而馳的想法和做法。雖然原因很多，有的是屬於民主認識上的偏差，有的是屬於對國家、主權和人權的認識混淆，有的確實是因爲“反共求民主”心切，有的則以爲自己是在使用重要的反共“謀略”……但是，不可諱言的是，有的，確與分裂勢力的拉攏甚至是收買難解難分。

## (二)

在紐約，有一位自稱是從事了“專業革命”十幾年，為求台灣的獨立奮鬥了三十年的鐵桿台獨人士。在七十年代，他自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是一位“社會主義台獨人士”，志在島內“推翻中華民國、消滅中國國民黨、並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台灣共和國”。這就是他所說的，從事了“十幾年專業革命”的革命內容和革命目標（註一）。八、九十年代以後，他又成了一個極端的台獨人士，或曰反華台獨人士。因為他向來就不認中國，至今還在說“台灣跟中國從來就一點關係都沒有”；向來就在參加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形形色色會議時，都要聲明“你們中國、我們台灣”；次次都要用他的“搶場藝術”，來強行宣傳他的“分裂中國有理”；甚至在大陸人士舉辦的“文革”研討會上，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註二）就是這樣一個人，幾年前，他突然要“參加”中國的民主運動了，要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而“奮鬥終生”了。而他確實又是一個“有理想、能奮鬥、善謀略、敢使手段的共產式革命家”。沒有幾年，據他自稱，他就用反華台獨勢力所創辦的“民主論壇”，輕而易舉地就“團結”了海內外的大陸民運人士近三百人。並且，確實有許多民運人士、特別是海外的一些民運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甚至是“好戰友”。因為，這個論壇，可以提供他們發表宣傳民主、批評中共的文章，可以為一些民運人士出版宣揚民主、特別是“贊成台獨藏獨”的書籍，可以出資邀請他們赴台灣參觀民主進步和“挑動族群鬥爭”的景象，甚至可以……

然而，也正是這樣一位反華台獨人士，在他認為自己已經成功地“團結”了中國的海內外民運人士，並且用台灣的話來說，“斬獲”很大的時候，他卻對二十年來大陸人民反思中國現代史的民間思想學術運動，特別是它的鉅大成果，深感痛苦；對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的再認識和再肯定，深懷痛恨；對在相當程度上總結了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反思之重大成就、並具有高度反共意義的《誰是新中國》一書，視如仇敵；直至罔顧該書出版後所造成的震撼，所受到的歡迎，所形成的影響，開始陰謀發難。祇因為該書作者辛灝年先生曾在

年初“致王炳章博士的公開信”中說過：“……雖然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我祇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但祇因我你，在海外，都僅僅想做國內痛苦民眾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又要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所以，我們才被迫共享著‘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共產黨恨我們，國民黨嫌我們，民進黨討厭我們，‘中共民運特務’要仇視和誣蔑我們……”（註三），於是，這位台獨人士，竟以竄改別人稿件的手法，將辛灝年自謂的“四面楚歌”移花接木式地說成是“自從出版了《誰是新中國》一書，作者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既在他們的《民主論壇》公開發表，又立即親自上網，到處張貼，特別是向中國大陸傳送（註四）。

這還不算，他的目標，更是對準了以反思中國現代史為重要內容的黃花崗雜誌，一本今天最為中共痛恨，很受大陸讀者歡迎，也被某些人懷著複雜的情緒，稱之為“最反共和最反動”的雜誌。祇為香港一位學者在黃花崗雜誌發表了一篇“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的文章，這位大陸著名學者因此而遭遇了太大的壓力，因而不得不發表一篇“嚴正聲明”，以求與“反動的黃花崗雜誌”脫離干系。未想，這份為中共淫威所屈服的“嚴正聲明”，竟然就由正在“傾心支持反共民主運動”的這位反華台獨人士，用他的“民主通訊”（E-MAIL），首先發向了全世界，還加上按語，說是“為了台灣的前途”云云……（註五）。雖然，他們的“民主論壇”和“民主通訊”，長期以來凡是辱罵和否定孫中山、蔣介石、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文章，便都在他們的首選之列。他們要和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唱“對台戲”。

此猶不足。由於台灣自競選開戰以來，民進黨天天都要高喊“公投廢憲”，天天都在吵嚷著要“為台灣國正名”，一心要改掉中華民國國號的民進黨，在被逼急了的國民黨乾脆也同意“公投廢憲”、同意“改國號”、甚至想乾脆把中國國民黨也改名為“台灣國民黨”算了，從而造成了民進黨在台灣大選的“困境”時，為重新打造民進黨“也是承認中華民國”的輿論，以為選戰“布兵”，民進黨和民進黨政府乃在紐約驚心策劃了一個先是名叫“中華民國要與台灣國和平共處”，後來則被迫易名為“台灣大選和

國家認同”的研討會。就是這個由台灣執政黨紐約地方黨部策劃、在台灣政府駐紐約“僑教中心”召開的大會，居然一邊“一再”邀請《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辛灝年先生赴會為該會打“招牌”，以吸引華僑參加；一邊卻由民進黨和台灣官方為被邀請的辛灝年先生準備了要在會上散發的、辱罵辛先生的“黑材料”（註六），……誠如事前就有心理準備的辛先生後來所言，原來，他們早就“沙盤推演”好了（註七），辛如果“識相”，不再批評台獨，哪怕是同情台獨，那末，明天的報紙上就有了他們所需要的新聞；如果辛“不識相”，則他們就要在會上抖出罵辛的黑材料，公然在會上給辛製造難堪，那末，同樣也是明天他們所需要的新聞……

上述這一切，難道是因為這位正在“傾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台獨人士與《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一個來自大陸的學者，有著個人之間的嫌隙或私仇嗎？否也！過去，他們一向都是以禮相見。這位台獨人士，一向對辛先生的講演才能十分佩服，當面的“好話”說過很多，他甚至對國內民運人士說，辛是在海外“講出來的大家”；而辛先生也曾明言相告這位台獨人士說，“抽去具體的內容，我們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祇是你追求的是台灣獨立，而我追求的是中國的民主統一。雖然我理解甚至同情台灣人民不願意‘為共所統’的心態……”。甚至為了不介入台灣大選的糾紛，在“綠營”邀請一位旅居美國的大陸著名報人去台灣講演“贊成台灣獨立”的同時，也受到了“藍營”邀請赴台灣講演的辛先生卻婉言地謝絕了（註八）。原因，雖是他不願意介入台灣內部的矛盾和糾紛，也是他認為台灣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台灣人民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即便如此，反華的惡性台獨勢力仍然不想放過他。

那是為什麼？

是因為，正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傳播和影響，中國大陸對中華民國史愈來愈多、愈來愈重要的反思成就，和史詩“走向共和”的出現，長篇歷史劇“孫中山”、“買辦之家”等的放映，特別是由它們所表現出來的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華民國及其民主建國道路的痛苦認知和認定，才使得台灣和海外的反華台獨勢力感到了鉅大的危機，感到他們一輩子與共產黨的共同追求——推翻中華民國、消滅中國國民黨的

“革命目標”，恐怕難以完成了（參見本期文章“民主統一為中華”）。而這一切，都與大陸的歷史反思有關，與這場反思的代表人物之一、《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辛灝年有關。特別是辛和他的著作，還有他所主編的黃花崗雜誌，在海外，在台灣，特別是在大陸，用那位發表了“嚴正聲明”的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教授的話來說，就是“影響之深且廣，難以想像”。王炳章博士之所以能夠登高一呼，要“重建中華民國”，同樣是為《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影響所致；而王炳章宣告要“重建中華民國”的文章就發表在黃花崗雜誌第二期上。這也正是李登輝要迫不及待地嘶叫“再不趕快改國號就不得了”的重要緣由。

還因為，決定中國命運的真正民主力量是在中國大陸，是在中國民主力量對自己民主追求道路的重大抉擇上。而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就是為大陸人民重新找到了中國人民早已開始了艱苦追求，祇是被共產專制復辟阻斷了半個世紀的那一條正確道路，即“孫中山的道路”。而這一條道路，反華台獨勢力非但不能贊同，而且不能承認。因為承認了，贊同了，就等於是永遠也“獨”不成了，這對於一個終身都要為“推翻中華民國和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分子”來說，也太“殘酷”了一些。而這個“殘酷”的製造者之一，就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和它的作者。

### （三）

當然，更重要的則是，這位連中國都不承認、卻正在“傾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反華台獨人士，他是真的在渴望著“另一個國家”，並且是他“視若仇讎的中國”能夠實現民主嗎？他是真的在用他的熱情和力量，來為中國人民謀求民主的幸福成功嗎？如果真是如此，則我們不僅要感激他，而且我們要把他捧到頭頂上來尊敬他。因為，今天，真正關心和純潔支持中國大陸人民民主追求的國家、政黨和人士，實在是太少了，連中國的國民黨都不屑為此，況乎他哉！

我們還是用他自己打給台灣民進黨的報告，也是他在民進黨的一個研討會上的公開發言，來揭開他“要全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和團結海內外中國民運人士的真相”吧。

他開篇就告白說：“我爲了達成台灣人民擺脫當代外來統治，以便當家作主的悲願，我從事了三十年的台灣獨立民主運動。其中，我做了十幾年的專業革命家。兩年前，我轉而全力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顯然，他把自己交待得十分清楚。（註九）

他看得很準地說：“協助中國的民主運動，乃是一種積極的攻勢。它讓中共忙於到處撲滅民主、民族運動的火種、野火而無暇對台動武……”當然，中共也就更無暇制止台灣“乘亂獨立”（註十）。

他終於亮出了底牌：“協助中國的民主運動，乃是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招。它讓中國人民的霸道、野心消失於無形，同時也讓中國文明起來……”他終於公然地誣蔑起中國人民來了。而他的真正矛頭就是中國和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共”（註十）。

……………

我們認爲，幾乎沒有一個尚存愛國之心的中國人，會認爲他是在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難怪著名的民運人士劉國凱先生在給他的公開信裡明言說道：“我對你的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早已‘洞若觀火’。”（註十一）。

我們相信，也沒有一位尚存愛國之念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會認爲他的所言所行，竟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特別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真正支持。正如中國民運人士陸耘所言：“他們和當年的日本國一樣，是在繼續做著分裂甚至是瓜分中國的事情（註十二）。”

中國人民曾有過一個可怕的歷史教訓，那就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當蘇俄的斯大林“出錢出槍派顧問”到中國，並且命令中國共產黨全部參加國民黨和中國的國民革命時，我們許多的國民革命人士都對斯大林和他的蘇俄“感激不盡”。然而，曾幾何時，當中國的國民革命就要被誘導成爲中國的共產革命；中國國民黨甚至已經因爲蘇俄和中共的“挖心戰術”，徒成爲“一具軀殼”（戴季陶言）；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成果——“北伐打倒軍閥與重建共和的中華民國”，就要因爲蘇俄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而前功盡棄，彼時，雖然因爲有了蔣介石和一批真正中國國民黨人的覺醒和奮鬥，才力挽狂瀾，保證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正確航向，卻爲後來中國民主進程的鉅大失敗，預留下了可怕的失敗種子……這該是一個何等慘痛

的教訓，是中國人民已經用八千萬條無辜的性命才換來的歷史教訓。

這個教訓，正是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反思的最重大成就之一；而這個重大的成就，對於我們今天的民主運動，是不是一副真正的“清心湯和覺醒劑”呢？

爲此，我們要告訴中國的民主運動人士們，千萬不要忘記台灣社會的那一句名言——“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定要警惕形形色色反華分裂勢力對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挖心戰術”。

我們更要告訴那個正在“傾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反華台獨人士，如你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所誣蔑的那樣，今天，“霸道的和不文明的中國人民”，自然包括中國的民主運動人士們，既然他們奉行的都是“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這樣一個不文明的“霸道”行爲，那末，你將一定是“給了也是白給，送了也是白送，請了也是白請”！所以，如果你要真正想通過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來達到他們“回報你贊成台灣獨立”的目的，你就必須先有本領“讓中國人民先文明起來”，否則，你祇會“竹籃打水一場空”。此次研討會的“會前陰謀、會上霸道和會後網上風波”，就已經確鑿地證明了，你已經團結了的那三百位大陸民運人士，就絕對不會以自己對國家民族利益的叛賣，來報答你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傾心支持和陰謀拉攏”。你那與蘇共、中共如出一轍的“挖心戰術”不會成功。因爲，他們的心裏，必定還深藏著民族的大義，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願望，還有，就是他們未來在自己祖國的政治前途……就不說你對中國人民的誣蔑和侮辱，就是對他們的誣蔑和侮辱了！

我們要感謝你們——所有願意和正在真誠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國家、政黨和人士！

我們要反對你們——任何企圖假民主之欺騙，以求分裂中國和誣蔑中國人民的形形色色人士及其行徑！

我們尤其想對海內外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含淚高喊三聲：

**反共是爲愛中華！**

**民主運動要愛國！**

**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是要愛中華、愛中國！**

註釋：

- 1、洪哲勝：“為什麼要支持《民主論壇》”，2000年2月26日發表於民進黨美西黨部在洛杉磯舉辦的《新世紀中的台灣、中國和世界座談會》。
- 2、在民運人士劉國凱於紐約舉辦的“文革35周年研討會”上這位高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反華台獨人士被趕下了台。
- 3、黃花崗雜誌第五期：“辛灝年致中共無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開信”。後來辛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時亦如是說。
- 4、參見黃花崗雜誌第七期從台獨《民主論壇》轉載的“辛灝年為何陷入四面楚歌”一文。
- 5、黃花崗雜誌第七期全文發表了這一份“嚴正聲明”。
- 6、就是從2003年3月起，自辛灝年先生在“營救王炳章”大會上“為王申冤”以來，由“民運人士高光俊先生署名”，專們在網站上月月貼、周周貼、甚至是天天貼的那一條用詞極其下流的“誣蔑和謾罵”。
- 7、參見2004年1月11日的“中央社”新聞。
- 8、2003年7月，全球“連宋後援會”在台北召開大會，請辛先生赴台講演，為辛先生所辭謝。黃花崗雜誌第七期新聞。
- 9、10、11均摘自洪哲勝：“為什麼要支持《民主論壇》”。
- 12、劉國凱：致洪哲勝先生的公開信，《罕見奇談》網站。
- 13、陸耘：辛灝年“必然”陷入四面楚歌。

附文：

## **全僑盟紐約研討會及其所暴露的問題**

旅美中國民運人士 陸 耘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日，由「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在紐約召開的「從總統選舉看國家認同」研討會「不歡而散」（紐約《世界日報》語）。臺灣的《中央社》也已經發出了不實的報導。許多人在電腦網站上也就此事發表了意見。民進黨紐約台獨鼓吹者、《自由時報》「民主論壇」主編洪哲勝先生甚至在網站上「破口大罵」。所以，筆者感到有必要將自己所知的這次研討會的情況，如實地向關心者介紹，並談談自己的體會。

### 筆者所知的「全僑盟」紐約研討會情況

阿修伯先生邀請辛灝年先生參加研討會，最初的題目是「臺灣國和中華民國和平相處」。辛灝年先生曾就是否參加問我意見。辛先生很尊重阿修伯先生，不願電話中拒絕阿修伯先生，希望我代為轉告阿修伯先生他不便參加這樣的研討會，這個阿修伯先生也知道。後來題目改為「臺灣大選和國家認同」，辛先生仍然很猶豫，但報紙已刊出新聞，祇好參加。

一月八日。當筆者知道王希哲先生要來紐約參加這一研討會，下午便告訴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王涵萬先生，請他設法安排王希哲先生講話。王涵萬先生面露難色，稱主講人已經確定了，要更改需「全僑盟」理事討論決定才可。我仍然建議他可否同理事們商量一下，留一點時間給王希哲先生，即使幾分鐘，讓王希哲先生作一簡短的發言也好。因為，以往類似的研討會，總會留一些時間，給與會者自由發言和提問，而且，給遠道專程而來的客人一個發言機會，也是一種禮貌，何況是王希哲先生這樣有影響的民運人士呢，祇會給這個研討會增加正面影響。

當天晚上，我電告王希哲先生此一情況。王希哲先生因旅行社已經下班，無法退票，所以仍然決定參加研討會，「不讓主講，聽聽別人的發言也好，自由發言談一下也可以」，王希哲先生很體諒別人，回答得很乾脆。

當晚，我再次將這一情況電告王涵萬先生，拜託他一定設法安排一點時間給王希哲先生講話，王涵萬先生答應盡力安排。我也電告阿修伯先生此一情況，並轉告他們辛灝年先生認為王希哲先生比自己更適合在這一研討會發言。因為王希哲先生和會議主持人以及各位主講人都很熟，我一直希望各方面都互相體諒一下，大家都留一點面子，「退一步海闊天空」，不要因這一小事，傷了和氣。然而，第二天，我在王涵萬先生的電話中，已經感覺到很難安排王希哲先生在研討會講話了。

九日傍晚，王希哲先生到紐約。我接到他後就對他說，王涵萬先生說這一次不能安排他發言，但許諾「將來可以再為王希哲安排一個專場講演」。當晚，王希哲先生與我們一起用餐時，辛灝年先生看他有些失望，就告訴他說：「如果當真不給發言，我就將我的發言時間讓給你。」這時，我們仍然認為，即使是在最後的自由發言時間裏，總會給一點機會讓王希哲先生講講話吧。

十日中午，王涵萬先生請王希哲先生吃飯，明確告訴王希哲說「我們不能安排發言」。我們也明白了王涵萬先生作為會議主持人，祇是會議執行者而非決策者。也就是說，這次會議的主持人沒有任何權力給與會者一點自由發言的權力。

十日下午，「研討會」在紐約法拉盛「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會議一開場，會議主持人就宣佈，他已經和王希哲先生有了「君子協定」，這次會議不安排他發言。而且重複說明，十分堅決，沒有餘地。會場上有許多人都有些詫異。

在洪哲勝、阿修伯發言後，由辛灝年先生發言。辛灝年先生在簡單地講了幾分鐘的話、並且已經言簡意賅地表明了自己對台灣問題的總體看法之後，說：“王希哲先生是一位一貫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傑出民運人士，而且對台海問題素

來關心，很有研究，何況他遠道而來，既然不能增加一名演講人，我願意將自己的發言時間讓給他，請求會議主持人同意。”很多聽眾馬上表示非常樂意聆聽王希哲先生的發言，會場上有很多人鼓掌，當時的會議氣氛也是和諧而又熱情。然而，主持人卻重申會議紀律和決定，並說他和王希哲已經有君子協定，絕然不予同意，王希哲站起來十分謙遜地說，「我和我的君子協定是不另外安排我發言，現在灝年兄將他自己發言的時間讓給了我，會場上大家都贊成，更沒有人反對，讓我發言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但主持人仍表示絕無商量的餘地。於是，人們開始紛紛離開會場。還有人說，“不給人講話，這會還有什麼開頭”？

從會議開始，會場上就有記者和一些聽眾同時收到了會議議程和攻擊辛灝年先生的傳單。這顯然是經過預謀的，精心策劃的，對辛灝年先生的人身誹謗攻擊事件。一疊傳單面朝下放在會議大廳門內的桌子上，據目擊者指證，現場參與散發攻擊辛先生的傳單者至少有兩人，會場中有多人發現民進黨政府駐紐約文教中心的副主任將此一傳單發給他人。在會議主持人拒絕辛灝年先生建議由王希哲先生代替自己發言後，辛灝年先生本來已坐回台下。當筆者和另外一位朋友告訴辛灝年先生，這個會議在會上散發對他惡意攻擊的傳單，建議是否要質問會議主持人時，辛先生回答說：「別人可以耍陰謀，我們一定要有風度」。之後，辛灝年先生才一聲未吭地離開了會場。

### 「全僑盟」研討會暴露的問題及幾點思考

一、「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簡稱「全僑盟」）宣稱是由各方人士組成，意在為各種觀點人士提供自由討論平臺。雖然大家都知道，「全僑盟」大多數成員均為民進黨和台獨支持者，少數大陸背景的成員也都是台獨鼓吹者，實為台獨的外圍組織，而且「全僑盟」的活動也以宣揚台獨「合理」居多。但我們還是幼稚地期望，「全僑盟」舉辦的這次研討會，能夠具有某種包容性。雖然我們看到，台獨鼓吹者的「理論」都是狡辯，講的都是歪理，往往東拉西扯，混亂主題。但是他們不是「理直氣壯」地宣稱台獨「合理」，符合「人權自由」嗎？他們應該有自信，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可以給王希哲先生和筆者等反獨的人以「迎頭痛擊」。但我們看到的卻相反，他們唯恐自己不能完全控制會議內容，視王希哲先生的到來為如臨大敵，無論我們如何推薦王希哲先生，這個小小的「研討會」在兩天前，「議程」就絕對沒有了任何彈性，容不下一個萬里飛來赴會的王希哲先生講幾分鐘話。這次會議名為「研討會」，實為主講人的「論述會」「宣講會」。中央社在其不實的報導中透露說：民進黨美東黨部前晚「曾做過因應措施等推演」，還說，「站在不願讓

全僑盟主辦的活動被人利用的立場，全僑盟前晚就達成共識，那就是民主議事的程序正義」。這又一次驗證了台獨人士們自知「理屈詞窮」。雖然他們可以收買「支持者」，但仍然對自己缺乏自信，畏懼民主自由地討論問題。

二，這次研討會由「全僑盟」主辦，他們不願讓反台獨的王希哲先生講話，不願「為各種觀點人士提供自由討論平臺」，當然是他們的權力。我們祇是覺得，他們的心胸不夠寬廣，顯得太小氣了。辛先生建議將自己的發言時間讓給遠道而來的王希哲先生，也合乎情理，主辦者當然也可以拒絕。但是，事後對辛灝年先生進行辱罵和攻擊，這就使人無法容忍了。聽眾覺得主辦者沒有氣度，不給人講話，因而退場，也是自然的事情。在會場已經鬧哄哄、許多人已經在退場，而且，會場上又發現了對辛先生的人身誹謗攻擊的傳單，辛先生這才離開了會場，這也沒有什麼不妥。即使把這理解為一種和平的抗議，也是他的自由權力。王希哲先生，辛先生和其他相關人士，並沒有「鬧場」，主辦人不應據此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和詈罵。

三、為什麼研討會會場上竟會發生對辛灝年先生的誹謗攻擊事件？顯然是由於辛先生長期以來一貫堅持「反共反獨和民主統一」，是海外僑學界反對國家分裂的一面旗幟所致。這些人太不光明正大，以陰謀詭計作為自己的「高明手段」，他們的作法和日本鬼子何其相似。這也又一次證明了在海外替大陸十三億被剝奪了講話權利的人民講話是多麼的不易，在海外真正從事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多麼的不易。因為，我們不得不面臨著來自中共，台獨，獨台，和保共勢力的多重圍攻。然而，我們也有華僑和留學生的支持，十三億中國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辛先生今天在海外所受到的華僑和留學生的歡迎，就是證明。

四、在歷史上，台獨和中共為了推翻作為自由中國反共復興基地的中華民國，曾多次密切合作（參見本期辛灝年先生的講演錄“民主統一為中華”一文）。今天，在對付中國的愛國民主人士方面，難道還要繼續“合作”下去嗎？

五，是什麼使紐約華人社區、甚至是整個海外的華人社區發生了分裂？是台獨和中共勢力的雙重破壞。中共勢力在海外處處打擊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台獨勢力的目的是要使中國更專制，更落後，以便乘機獨立，進而做日本皇民。所以海外愛國華人怎能與日本皇民團結得起來？

六，據熟悉情況的人士介紹，民進黨紐約台獨鼓吹者、《自由時報》「民主論壇」及「民主論壇」網站主編洪哲勝先生，以「民主論壇」為工具，凡中國大陸來的投稿，無論是否發表，一律給予一千字 30—40 美元的稿費。因為獲稿費的條件不高，所以，祇要勤快一點，每月投幾篇稿件，以中國大陸的生活條件，就有了一個月的生活費了。這被一些人

解釋為幫助中國大陸民運人士解決了生活問題。以這種方法，據稱有好幾百大陸「民運人士」被「團結」，有極少數人因為不了解海外的複雜情況，已經或正在成為台獨勢力試圖分裂中國的工具。奇怪的是，一些國外的反共民主網站，國內民運人士上不去，但是，洪先生的「民主論壇」網站，國內人士不僅可以上去，而且可以不斷發出、發表「論證、鼓吹分裂有理」的文章，卻安全無恙，安全地收到「稿費」。這再一次證明了，中共對國家分裂分子「網開一面」，對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卻嚴厲封鎖、無情打擊。

七，一些民運朋友認為台獨等分裂勢力可以為中共製造民主改革的壓力，可以對「中共」造成打擊，因而對民主運動有利，而且，可以獲得支持，所以，中國民運要同這些分裂勢力建立「統一戰線」，這實在是一種善良的糊塗。且不說中共本來就是亂中分裂的製造者。因為，在歷史上，中共和形形色色的國家分裂勢力就一直相互利用、互相支持的。而且，台獨等分裂勢力從來不支持我們反共，以免「激怒中國」。他們祇希望我們支持他們獨立。如果因為中共獨裁，就應該支持分裂勢力，支持打擊中國的任何外部勢力，那麼，清政府是獨裁的，在日清戰爭中中國人民就應該支持日本了？這種理論的荒唐性是再明顯不過了。事實上，台獨等分裂勢力和國際列強，決不希望中國民主，因為，誰都知道，和幾個寡頭獨裁者打交道，比和十三億人民以及他們的合法代表打交道要容易得多。

八，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祇能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奉獻才能成功。奢望在海外依靠台獨和其他政治勢力，最終必將發現是害人害己。我們悠久歷史中許多前輩不畏權勢，捨己忠誠為國為民的感人事蹟，是我們文化的精髓所在，更是我們的榜樣所在。為了祖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權而捨己奮鬥者，必將為人民所牢記。反之，則必遭唾棄。

---

新聞發布會之一

## 黃花崗雜誌第八期

---

### 推出“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

黃花崗雜誌於第八期推出了“民主統一為中華”之專欄文章共七篇。這些文章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志在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藉以在台灣和海外形形色色極端分裂勢力甚囂塵上的時候，來表明本刊在統、獨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標明不是所有追求民主的大陸海

外人士，都已經“為獨所惑”，或“為獨所統”，甚至“為獨所買”。正是從這些文章裏，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中國人民的愛國精神，和我們之所以追求民主自由之目的，就是為了愛國，愛我們的中國，愛我們永不要再遭遇分裂和出賣的民族和人民。我們祖國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慘遭分裂和出賣的痛苦歷史，需要我們這樣做；我們祖國即將和必將走上民主自由的光明未來，尤其需要我們絕不能對其掉以輕心。

敬請讀者閱讀本刊“反共促統為中華”之專欄文章。

---

新聞發布會之二

## 黃花崗雜誌開展

---

### “誰是新中國”論戰

---

本刊第七期為接受陰謀挑戰，而開始宣稱要開展“公開的大論戰”。

本刊首期大論戰刊出的文章，主題為“蔣介石是不是民族英雄和獨裁者”。其九篇文章，不僅對蔣介石“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和“不是一個獨裁者”予以了肯定，而且也將指斥“蔣介石就是一個獨裁者和絕不是民族英雄”的文章同時予以了發表。雜誌出版和上網後，頗為吸引讀者，不僅在傾心程度上起到了澄清的作用，而且予讀者以平實、公正和坦蕩的感覺。顯然，這種將論戰雙方的文章都同時予以發表的“論戰方法”，對讀者是為公正，對作者是為公平，本刊有胸懷繼續地用這種方式，將這一場大論戰開展下去。

本期大論戰的主題是對“誰是新中國”的辯論。因為自從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出版了他的歷史鉅著《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之後，由於反響日益廣泛，影響日漸深入；公然的圍剿雖然不多，暗中的圍堵卻從未放鬆；正面的論敵雖然少有表現，背後的暗箭卻是從未減少。儘管如此，為數極少的反駁和批判文章，也還是用“蔣介石是個早就有了定論的獨裁者和反動派”這樣一根“投槍”，來指斥《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胡說八道”。因此，關於“誰是新中國”的論戰既然離不開蔣介石其人；而對於蔣介石的評價，竟然又決定了“誰是新中國”大論戰的命運，所以，本刊乃決心將對“誰是新中國”的辨析和對蔣介石的評價結合起來，一起展開論戰，繼續來他一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讓讀者去閱讀和反思。是故，本期才將近年來讀者對《誰是新中國》一書有代表性的評價，以及它已經產生的影響，較為集中地發表和介紹出來；同是也將“以否定蔣介石來否定《誰是新中國》”一書之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或僅僅

是具有代表性的“語錄式網上跟貼”，予以轉載，以作為本期論戰的主要內容，為下一期“辨識新中國和還原蔣介石”之深入論戰做準備。

似乎應該說明的是，歷史學者辛灝年，即《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兼任本刊的主編，也是本刊的創刊人。關心《黃花崗》雜誌的朋友都應該看得出來，兩年來，直至不久前，在我們已經必須面對挑戰之前，本刊從來沒有發表過“宣傳、吹捧”他和《誰是新中國》一書的文章。但是，既然辨識“誰是新中國”和評價《誰是新中國》一書，已經涉及到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之大是大非的辨識和論戰，並且，是為“惡性台獨分子”所蓄謀挑起，因此，誠如朋友們要說服他的那樣，這已經不是他個人的事情，他也不應該把它看作是自己個人的事情。所以，在本期，集中發表對於《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評價，甚至集中地介紹《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影響，也就不是對辛先生及其個人著作的“宣傳或造勢”了。其意義實在遠大於此。

至於本期發表的批判“誰是新中國”的文章，和否定《誰是新中國》的網上跟貼，都選自那個專門收集、批判和辱罵孫中山及中華民國，專門收集、批判和誣蔑《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中國民主正義黨網站”。由於該黨將幾乎所有徹底批判和否定《誰是新中國》一書的文章，和對辛灝年先生的“一條獨罵”，當然也是“毒罵”，全部地和永遠地張貼在它的網站上，這就為我們的甄選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祇是四年多來，批判和否定《誰是新中國》的文章實在太少，在僅有的幾篇文章中，唯有本刊已經轉載的兩篇，一篇應算作批判文章，一篇能算作批判語錄，其它幾篇，不是叫人“不知所云”，就是令人“太感下流”，所以，祇好“忍痛割愛”了。

本期大論戰文章，載於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專欄，敬請讀者閱讀批評。

### 新聞發布會之三

## 舊金山三場《走向共和》賞評會

### 三波一折 大獲成功

【黃花崗雜誌記者特別報導】繼紐約賞評會頗獲成功之後，由舊金山眾多華僑出錢出力為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和《黃花崗》雜誌續辦的三場長篇歷史劇「走向共和」賞評會，再次獲得成功。這些活動不僅吸引了舊金山灣區眾多華僑，在美國西部造成了很大影響；更由於當地及港台報紙、電視、電

台等媒體的及時報導、傳播，以及對講評人辛灝年先生的多次採訪，令歷史劇《走向共和》在海外的影響更為廣泛，讓眾多華僑萌動對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命運和未來中國前途的真誠關心，使他們對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共和之路」有了形象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

舊金山灣區的三場賞評會，前兩場的場地均由舊金山《世界日報》社提供，第三場在市區的「國父紀念館」舉行。



舊金山世界日報報導走向共和賞評會新聞

首場於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時在世界日報南灣文化廣場舉行，由該報記者白立品先生主持，據《世界日報》報導有近兩百人出席。整個會場座無虛席，許多人一直站著觀看最後。《走向共和》精彩片斷的放映和辛灝年的講評交相進行，全過程掌聲不斷。其間有一位大陸女士、兩位來自台灣的華僑及一位極端台獨人士，不時企圖以「講民主就要讓人講話」為名，使用各種方式，甚至包括發難，來阻止放映和講評，但因遭到其他所有人的譴責而完全不能得逞。放映和講評結束後，賞評會主持人曾請這幾位人士發言講話。他們用種種理由為中共歌功頌德，對孫中山倡導的共和革命予以誣蔑。其謬論不僅為辛灝年有理有據地予以了駁斥，而且遭到許多來自大陸的與會者高聲譴責。到頭來台獨者祇能大喊一聲扭頭而去，大陸女士悄然離開，而兩位台胞則在眾目睽睽下灰溜溜地退場。賞評會結束後，許多人遲遲不忍離去，一些觀眾更是圍著講評人同話「走向共和」，對大陸藝術家們的膽識和水平表示了無限的欽佩。

第二場特別邀請了舊金山著名民運人士林牧晨先生主持。由於場地偏遠、又是星期日中午，到會者不足百人。但整個賞評會氣氛熱烈，非但放映和講評自始至終無一人攪局，而且在賞評結束後，全體觀賞者均自動留下，展開熱情、深入的討論，對《走向共和》予以了極高的評價。辛灝年也回答了種種的提問，以致依依相別之時，人人皆不知天

色已晚。該場賞評會祇有一件「趣聞」，就是一位大陸來的觀賞者，在討論中對辛先生提出了一個很有「見地」的問題，卻在會後一再要辛先生告訴他，歷史劇《走向共和》究竟是誰策劃的？策劃者叫什麼名字？並聲言「你傾心知道……」辛先生在他的一再追問下，祇能說：「我哪裡知道。原來我還不想看呢，是因為看過幾部清裝戲看煩了。還是王若望先生的遺孀羊子師母叫我傾心要看，我才看的。然後，我就為這部歷史劇深深地打動了，為國內的藝術家們和人民深深地激動起來了……」這樣的話，自然祇能使這位要向辛先生刨根究底的人無趣地離開……。

第三場於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下午二時，在舊金山國父紀念館舉行。由該館館長張人睿先生和老資格民運人士郭平博士主持。《黃花崗》雜誌董事長周光亞先生也從遙遠的東部趕來參加了盛會，並受到熱烈的歡迎。該館當日中午原有近百位華僑舉行了對孫先生的紀念儀式，周光亞和辛灝年也被邀請參加。嗣後，觀賞者絡繹而來，使得能擺下二百張座椅的紀念館一時間「人滿為患」。工作人員祇好不斷地增加座位，以至大廳後面的高台上擠滿了遲來的年輕人和其他人士。精彩片斷深深吸引了全體與會者，辛灝年的講評再度引發陣陣熱烈持久的掌聲。這已經是辛先生第四次應邀來該館講演。賞評結束後，老少華僑和曾參加過兩場賞評會的民運人士王希哲先生等人的發言，為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和《黃花崗》雜誌在舊金山的三場賞評會，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在舊金山三場賞評會的舉辦期間，為報導賞評會，為宣傳歷史劇《走向共和》，舊金山的《世界日報》不僅熱情、大篇幅地報導了這次活動，而且採訪了辛灝年先生，將辛先生對歷史劇《走向共和》的理解和認識完整地予以了介紹。大陸人背景的《新唐人電視台》和《大紀元時報》則進行了現場錄像和及時報導。《星島日報》粵語電台和華語電台也先後採訪了辛灝年，對宣傳賞評會功不可沒。台灣著名的《東森電視》則對第三場進行錄像，並於會後對辛先生，就大陸人民對「共和」的理解和對「台獨」的看法，進行了明確的電視訪談。《世界日報》的社長、總編輯和舊金山一些最有聲望的專家學者、華僑人士，還與辛灝年先生相聚一堂，交換了對兩岸問題的看法，讚揚了《誰是新中國》一書……

不能不提及的是，這次舊金山的三場賞評會，有許多熱情的華僑不聲不響地做了大量籌備工作，包括慷慨地捐贈可觀的用費；甚至還有華僑默默地為辛灝年先生和周光亞先生支付了旅館費。在孫中山先生倡導共和革命的海外故鄉之一舊金山，這次《走向共和》賞評會得到了「當代共和革命之母」——海外華僑——的鼎力支持。

## 寒衣翻作征衣情

〔本刊記者訊〕2003年11月29日，在紐約劉國凱先生的新書《草根蟬鳴》發表會上，應邀發言的辛灝年先生，在發完言，回到台下最後一排座位上坐下之後，一位大陸口音的老華僑，忽然走到辛先生的面前，將一個很沉、也很大的塑料提袋送給了辛先生，說：“新年就要到了，有一件小禮物，想送給你，一定要收下。”辛先生見老人言詞十分誠懇，滿臉愛惜的神情，雖然連說了幾聲“不好意思”、這怎麼可以呢”，但是，在那種場合下，他還是覺得應該先收下再說。雖然他心裏有些奇怪，也有些感動，卻也有些不解。

回到家裏一忙，他似乎已經將這件事情忘了。直到他的妻子對他說，“你怎麼還不看看人家送給你的是什麼禮物”時，他才想起來把那個很沉的塑料提袋打開，原來是一件嶄新的冬天穿的大衣，而且是他多年來都很想喜歡的那種式樣，雖然他從來沒有對妻子說過。就在他馬上便高興地穿上這件沉沉的大衣，並且立刻感到那麼合身、那麼溫暖的時候，他的妻子忽然對他叫了起來：“你別祇顧穿新大衣了，快看看從大衣裏掉出來的那一封信！”

辛先生這時才看見落在地毯上的那一個若大的信封。他連大衣也沒有脫掉，就忙忙地拾起來那一封信，拆開一看，原來是一張很樸素、也很好看的賀年片，上面寫著詩一般的幾行字：

《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先生：

四面楚歌，寒氣襲人；  
奉上征衣，聊暖心身。  
堅持真理，穩步前行；  
逆風萬里，正義必申。

老讀者敬上

2003年11月29日

辛灝年讀著讀著，不由得連眼睛都濕潤了，他穿著這一件新大衣——一位愛國老華僑送給他的“征衣”，真是感到又溫暖，又沉重，更令他懷揣著太多的安慰、感慨和信心。當淚水終於沿著他的臉頰慢慢地流淌下來時，他才發現妻子已經默默地偎依在他的身邊，臉上的淚水流得比他的還要急……。（所謂四面楚歌，請參閱本刊第七期相關文章）

# 關於反對台獨的若干問題

## ——駁迷惑中國民運的某些謬論

王希哲

### 1、「住民自決」

「住民自決」，好像成了支持台獨的不證自明的公理：什麼人住在什麼地方，那地方就是誰的。但是，誰承認過這個「公理」？當今世界上哪個列強在自己的國家領土主權範圍內承認過這個「公理」？中國人民，中國無論哪屆政府，承認過這個「公理」嗎？沒有。聯合國曾經提出過這一條，但它是有限制條件的；它不過是戰後解決殖民地歷史遺留問題的一種似乎理想、但實際卻貽害無窮的方式，不是無條件有效的國際法。

《中國民主黨迎接新世紀宣言》四年前就指出：

「民族自決」的口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壓迫、爭取自己獨立權利的鬥爭中，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必須指出，聯合國所有的主張民族自決，人民自決的宣言文件，都貫穿著一個前提，即它針對的是外國的統治：

「使人民受外國的征服、統治和剝削的這一情況，否定了基本的人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並妨礙了增進世界的和平與合作」，因此「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這個權利，他們自由地決定他們的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而一九六〇年聯合國大會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標題本身，就界定了民族自決與人民自決的適用範圍——結束殖民地制度。因此，在這個宣言的第六條裏明確宣示：「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

因此，民主黨人不贊成在一個歷史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主權國家裏，不負責任地，偏激地鼓勵「民族自決」的口號。因為它不可能為各族人民帶來幸福，

而只可能帶來災難。（《中國民主黨 2000 年迎接新世紀宣言 十一、民族問題》）

### 2、台灣的主權是屬誰的？

我們說，「台灣自古就屬於中國」。台獨分子和支獨分子不同意，要和我們辯論。這就要去翻史籍，辯歷史。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這能辯論出結果嗎？辯不出結果的！

我們說，「馬關條約，帝國主義日本掠去了台灣。經過艱苦漫長的抗戰，中國人民戰勝了日本收復了台灣。台灣主權早已回歸中國。」台獨分子和支獨分子又不同意，要和我們辯論。說是《馬關條約》有效；《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無效。於是你又要扮演國際法專家與他去辯國際法。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這能辯論出結果嗎？也是辯不出結果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不必辯論，就是二戰後，台灣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裏，從新成為了中國版圖中的一個省，而包括主要戰勝國美國和主要戰敗國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至今沒有任何一國敢於公然提出異議，這樣一個事實！

那麼，我們就先順從台獨分子和支獨分子 ---你們說，台灣自古不屬於中國，好，就算是吧。你們說，《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未必有效，好，就算是吧。

但是，二戰後，台灣回到了中國人的手裏，總算中國人民歷五十餘年抗戰，犧牲無數生命財產於戰火，幸而戰勝所得的戰利品吧！

中國人民的戰利品台灣，台獨分子和支獨分子要從中國人民手裏奪去，這不是與中國人民為敵是什麼？這不是向中國人民宣戰是什麼？

上面說了，台灣不是什麼「台灣住民」的。台灣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你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你和全中國人民一起，對台灣有戰勝國的戰利權和所有權；你不是中國人民一分子，你對台灣沒有任何戰利權和所有權，哪怕你從祖上起移住台灣，也不能自然產生所有權。就像今天美國唐人街上的中國人無論已經是幾代的「住民」，也決無對他腳下的中國城擁有一寸的所有權和「自決權」一樣。我們能夠想像，中國城的「住民」向美國政府、美國人民提出他們對中國城的「自決權」嗎？

你可以不滿中國人民對台灣的戰利權和所有權。那麼請日本人來交涉。既然你們聲言《馬關條約》有效，那麼當然只有日本人才有資格與中國人在台灣問題上對話。日本人還不敢說話，你們說什麼！

### 3、全中國人民對台灣的權利不容剝奪

王希哲被罵為「法西斯」。誰是法西斯？台獨民粹主義者是法西斯。因為它利用國共內戰造成的國家分裂之機，片面剝奪了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包括王希哲在內）對台灣的所有權和決定權。共產黨剝奪了十三億人民政治權利，我們罵它是法西斯。台獨民粹主義者片面剝奪十三億人民對台灣的所有權，為什麼不是法西斯？大陸人民反抗共產黨的剝奪，是正義的；為什麼反抗台獨對自己權利的剝奪，就是不正義的了？天下有這般道理？有人說，「在共產黨專制下，大陸人民沒有任何權利，談何對台灣的權利？」「沒有任何權利」是暫時的，人民正在與共產黨作鬥爭奪回權利。中國人民的權利本身還在。若被台獨拿走了，既成事實了，就連奪回來的可能也沒有了。

有幾個漂亮口號就能封住你的嘴：「公投」；「台灣主流民意」；「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公投」？誰在「公投」？剝奪大陸人民對台灣的戰利權、所有權和決定權，把十三億大陸人民拒絕在外的「投」，是私投，不是公投。是挑釁，是宣戰。

「台灣主流民意」？好個「主流民意」。一夥人把大多數人公共的財產盤踞起來，自行「公投」這筆財產的所有權是否屬於他們，「主流民意」還用問嗎？政權永遠主導著「主流民意」，特別在政權煽動狹隘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時候，更是如此，這是常識。在民進黨法西斯民粹主義大棒統治

下，今天狂熱支持台獨的「主流民意」，與當年日本狂熱支持對華戰爭的「主流民意」，與當年德國狂熱支持排猶虐猶的「主流民意」，把戲的性質沒有任何不同。

「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台灣人民」對台灣並沒有片面的所有權，憑什麼要「尊重」他們的「選擇」？大陸人民對台灣的所有權，就被「尊重」兩個字輕輕剝奪了去：「選擇權」只為「台灣人民」所有，大陸人民莫名其妙地就只剩下了站在旁邊看的「尊重權」。這個「台灣人民」又何其「尊重」大陸人民！

有人指責大陸人民反對台獨是被煽動的「狹隘民族主義」。瞎說。台獨才真正在煽動一種狹隘的偽「台灣民族主義」（實質是台灣日本皇民主義）。他們的全部生命，正建立在這種極其危險的煽動之上。

### 4、所謂台灣四百年抵抗「外來政權」

鬼話。依這個邏輯，中國哪個省的人民，不是在數千年抵抗「外來政權」？

台灣抗日的英雄們，絕對認同的是他們的祖國——中國，他們的後人，決不會墮落於原教旨台獨。我沒有研究過今日民進黨、台聯台獨民粹主義者每個頭面人物們的族譜，但我敢肯定，他們的父祖輩，即便未必人人是李金龍般死心塌地歸化日本的官吏，也決不會有一人是抗日志士，抗日英雄。不信，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稱為「貴抗日」的洪哲勝就在眼前，讓他說說他洪哲勝的父祖輩及李登輝，陳水扁，姚嘉文，丘義仁...的父祖輩抗日的光榮給我們聽聽！

### 5、台獨是中國民運兇惡的破壞力量

沒有蘇聯共產國際的支持，早期的中共不能成氣候。沒有高舉反共旗幟，堅持自由民主陣地的中華民國的支持，中國民運也不能（很難）成氣候。王炳章多次感慨談到，海外民運最興盛並有力量大舉向國內滲透的時期，正是蔣經國時期。而海外民運又正是被李登輝上台後推行的台獨路線所瓦解。在野的民進黨攻擊國民黨的反共國策，要求台灣與中共「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更使民進黨成為了在立法院吵鬧，極力要求切斷，並最終實現了切斷對中國民運經濟支持的窮兇極惡的打手。

不僅如此，根本消滅中國的民主陣地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南京憲法，則是台獨的最終目標。

也許，今天的陳水扁政府會看中大陸的幾個「自由派」知識分子，給他們幾個小錢，條件是他們寫文章辦網站支持台獨，鼓吹理解「台灣人民悲情」，「尊重台灣人民民意」。但是我要請這幾個人告訴我，假使中共聽了你們的意見，忽然幡然覺悟，「開明」起來，像你們一樣去「尊重台灣人民民意」，允許陳水扁政府公投台獨了，其結果對整體的中國民主運動會有任何的好處嗎？---「台灣國」陳水扁政府還會再罵中共一句？不會罵了，因為「睦鄰友好」「良性互動」還來不及呢！獨立離中國遠去的「台灣國」，就算它是多麼「民主」罷，它還會對中國的政治演進發生任何影響嗎？不會了，它們互不相干了。

因此，台獨極大的瓦解削弱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總戰線，它是中國民運兇惡的破壞力量，是顯而易見的。

## 6、反對台獨就是反對台灣民主化嗎？

反對台獨就是反對台灣民主化。幾位大陸「自由派」台獨辯護士總是振振有詞。

誰反對過台灣民主化？哪怕共產黨也從未反對過台灣民主化。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總喜歡按照民進黨對自己的吹噓和標榜，把民進黨稱之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那麼，長期與民進黨互為反蔣同盟軍的共產黨為何不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除了台獨口號，廣義民進黨「反蔣家專制」的哪一條理由沒有得到過共產黨的支持？哪一條反蔣理由不是從共產黨學來的？共產黨支持過「二二八」；共產黨支持過反「萬年國代」；共產黨一直在支持民進黨消滅中華民國...要知道共產黨從來不反對，甚至鼓動別人那裏搞民主，它僅僅反對在自己的地盤搞民主。

實際上，中華民國的民主化，從 1948（1946）年南京憲法的公佈實施，就已經開始。它的被打斷，完全是中共武裝叛亂的結果。台灣的長期戒嚴，不是因為「蔣家」的特別專制，而是非如此，不能保衛民主憲法重光的復興基地。

「但是七十年代起，特別是進入八十年代，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共產主義的罪惡一步步，一幕幕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世界人民醒悟了，站到反共

一邊了，共產帝國一個一個坍塌了，共產國家不得向民主國家取守勢，甚至取投降靠攏之勢，共產專制主義在世界整體上已根本消失了對自由民主陣營的威脅，這個時候，也只有這個時候，才能說時機到了，是中華民國回復憲政的時候了！美國的壓力麼？有一點，但沒有決定意義。

正是蔣經國看准形勢當機立斷，排除保守，作出了解除戒嚴，中華民國重新啓動憲政的決定。這個偉大決定，決不是什麼民進黨「鬥爭」「推翻」的消極結果，而是蔣經國在台灣高高豎起民主的旗幟，配合全世界自由民主陣營向共產專制殘餘陣營全面發起主動進攻的積極結果。」（王希哲：《中華民國在台獨的「暴政」在哪裡？》）

對台灣的民主化民進黨功勞何在？說來說去，它無非在國民黨已經在前述國際大形勢下開禁了的情況下發動過兩次群眾騷亂（「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兩次騷亂便能「推翻國民黨專制」實現台灣民主化？笑話！

80 年代回歸憲政的台灣已經實現了民主化。對台灣經濟建設，政治民主毫無貢獻的民進黨不得不以喪失理性的歇斯底里訴諸台獨民粹主義，謳歌皇民，美化其回憶，挑起族群衝突，而他們所要砸碎的，又恰恰正是台灣今日民主化的保障---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南京憲法制度體系。

為陳水扁台獨政策辯護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言必高唱「台灣的民主化」和「台灣人民的福祉」。我來問你，台灣還沒有實現民主化嗎？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為什麼還一定要砸碎中華民國國號和南京憲法？中華民國國號和南京憲法妨礙了台灣民主化了嗎？妨礙了「台灣人民的福祉」了嗎？沒有中華民國南京憲法，能有今天的台灣民主化嗎？能有今天的「台灣人民的福祉」嗎？

「中華民國國號使台灣走不出去」？台灣國就能走出去了嗎？「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反台獨不是反對台灣民主化，它反對的是把台灣民粹法西斯化。

## 7、為什麼說台獨的前途結果必是台灣民粹法西斯化

民進黨不是一個民主政黨。一個民主政黨，無論

它歷史上經過怎樣的鬥爭，歸根結底，它是一個政治建設的黨。而一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訴諸於某部分狹隘的宗教、地域、族群的排他心理，不停煽動這些狹隘民眾的分裂歇斯底裏情緒來達到自己執政目的的黨，必定是一個政治破壞的黨，一個民粹黨。更危險的是，這種執政後在自己統治區域內，不是調和社會矛盾，平息社會矛盾而是挑起階級糾紛和鬥爭（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挑起宗教、地域、種族、族群的糾紛和鬥爭，激化這些鬥爭，執政黨通過國家機器公然支持一部分人群，壓迫一部分人群，這個黨就將很快變成爲法西斯黨。

民進黨擅長煽情。什麼「台灣悲情」，也常被大陸幾位「自由派知識分子」鸚鵡學舌。但他們完全體味不出這煽情言詞背後可能隱藏的血腥。

二二八，通共的國民黨政府台灣長官陳儀屠殺了台灣人，但這之前的暴亂，又有多少不會說日語、閩南話而又躲藏無地的無辜「外省人」慘死在殺得兩眼血紅的台灣皇民的武士刀下？念念不忘的「悲情」意味著念念不忘的報復。

最近，台獨民進黨教父李登輝再行煽情，揚言若國民黨選勝，連戰上台「國家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連他的頭可能也會被砍下來」，所以他要「逃亡」。

切不可輕看了老於台灣故事的李登輝的這句話。他反面暗示了，若一旦台灣國獨立功成，則所謂半世紀給台灣帶來「悲情」的國民黨連戰、宋楚瑜、郝柏村們及無數的他們的「外省人」支持者的頭，通通可能也會被興奮萬狀的台灣新武士們「砍下來」！好一幅毛骨悚然的台獨國未來的族群血腥砍殺圖！危言聳聽的天方夜譚嗎？不，有前車不遠的巴爾幹—科索沃大規模族群殘殺爲鑑，仔細想想，一個執政黨長期在台上作著族群仇恨的煽情，它的結果將是什麼？李登輝透露的血腥屠殺，它將是台獨民進黨法西斯民粹主義在台灣煽情的必然結果。

## 8、反台獨就是統派？

「自由派知識分子」寫文章說，反台獨就是「統派」，就是「媚共」？胡說！民進黨長期與共產黨一丘爲貉，反蔣反中華民國，媚民進黨才是媚共。

我們期望中國統一、民主和強大。當然是統派。

但它必須統一於民主，統一於良制。在條件尚未成功前，保持台海現狀。這是我們支持和認同的國民黨長期堅持的方針（雖然它現在在台獨的壓力下趨於動搖）。莫非非要跟著民進黨搖旗吶喊作獨派才是「民運」。爲什麼？因爲民進黨在台上？給了你私人幾個小錢？何其勢利乃爾！

## 9、中國民運的立場

從本質上說，共產黨放手讓台獨民進黨替他們最終消滅了中華民國，獨立離中國遠去，使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的民主運動絕緣，是最有利於他們的專制統治利益的。民進黨其實早就看穿了這一點，故此，他們長期反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出賣大陸民運，甚至承諾獨立後與中共「睦鄰友好」，不斷地向中共搖動「善意」的橄欖枝，希望得到中共回報。但共產黨作爲中國主體的統治者，它又不得不肩負維護全民族利益的責任，不然它無法交代，這同樣也會根本危及它的統治利益。這個矛盾，正是共產黨對台政策長期虛聲恫嚇而又不斷搖擺的根源所在。

中國民運必須站在民主利益與民族利益相統一的立場上。

從這個立場出發，我們盡一切努力堅決保衛中華民國，不允許台獨（現在加上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和中共從兩個方面來消滅它。中華民國存在，是中國民運手中改造大陸的最重要的槓桿。

但是，若台獨最終消滅了中華民國（它的標誌是南京憲法被消滅），那麼，我們不但應「支持」，更應該鞭促中共不可猶豫，實現它向全國全世界所作的對台獨軍事討伐的保證。它絲毫的猶豫都可以成爲它出賣民族利益的最新罪證。有人問，中共討平了台獨，回歸了台灣，聲望如日中天，它的統治不是更穩固了麼？表面會是這樣。但「七一」「元旦」大遊行後的香港已經告訴我們，與大陸捆綁在一起，影響就是相互的；關係捆綁的越緊，相互影響就越深。我們當然反對「一國兩制」。但台獨既然幫助中共消滅了中華民國，也就只好「一國兩制」了。我們看到，被無奈地關進了「一國兩制」牢籠的八百萬傳統不問政治的香港人，不得不被迫團結起來向中共北京政權爭民主，甚至使得傳統親共民建聯也向他們靠攏。「七一」和「元旦」大遊行不但對香港的震撼，對整個中

國大陸的政治震撼，都是顯而易見的，而共產黨內各派至今對它的反應也是微妙的。在中國民主的發展方向上，中共不會永遠是鐵板一塊。共產黨通過討伐把本來只想離去無志影響大陸的台獨力量消滅了，把足以影響大陸的民主力量捆綁了回來，比香港百倍的頭痛也就發生了；他不得不改變自己統治方式的一天，也就很快來到了。

《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之二：

台灣

是中國的肚臍眼

吳學燦

中國地圖就像一只報曉的雄雞，總有一天會讓中華民族從專制籠罩下覺醒。台灣就像雄雞的肚臍眼，若即若離地掛在祖國的東南。隨著二零零四年台灣總統換屆選舉的緊鑼密鼓，台灣問題不僅震撼著所有中國人的心，也讓全世界關心人類命運的人士睜大了眼睛。

### 專制導彈與民主選舉

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大選的時候，我還在北京。倫敦的 BBC 電台通過越洋電話採訪我和戴晴女士，就共軍的導彈和台灣的大選進行了實況轉播。在實況轉播中，戴晴女士毫無顧忌地用戰國時代各國民眾生活狀況好於秦始皇統一之後來說明台灣的前途。我則避免直接談論統一和獨立。在實況轉播中，我的談話重點是：現在的大陸政府是專制，台灣的政府是民主。當專制導彈威脅民主選舉的時候，有良心的人自然應該站在民主一邊，譴責、揭露專制的蠻橫無理和倒行

逆施。在回答主持人關於專制導彈的提問時，我打了個比方：專制政權發射的兩顆導彈，就像北京胡同裏的兩個流氓，一個堵在胡同的東北口，一個堵在胡同的西南口，要對正在胡同裏繡花的美貌少女進行威脅、污辱甚至強姦。

### 謊言惡語與污言穢語

一九九六年八月底，我因無法繼續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只得背井離鄉來到遙遠的美利堅。自由世界，言論自由。在美國，不僅有發表反對專制的言論自由，那些擁護共產黨一黨專制的言論自由，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是，因為有言論自由，稍有認知能力的人自然不會聽信共產黨走狗的馬屁道理。至於獨立和統一問題，各種意見更是爭奇鬥妍、異彩紛呈。百花之中，自然並非全部都有香味。就像自然界有散發臭氣的花朵一樣，言論自由的百花之中，當然也有臭氣熏天的謊言惡語和污言穢語。最明顯的謊言惡語是：台灣人民急盼與共產專制的大陸統一合流。最荒唐的污言穢語是：台灣與中國從來就沒有任何關係。

### 良性台獨與惡性台獨

在關於獨立和統一的百家爭鳴言論中，來自台灣的阿修伯格外引人注目。阿修伯對台獨問題有深刻獨到的見解：既反對共產黨及其走狗的謊言惡語，又對哈日的皇民後裔的污言穢語嗤之以鼻。尤其是後者，更顯得這位台灣本省人的胸襟寬闊、目光遠大、頭腦清楚和認真負責。阿修伯自稱是良性台獨，並且把岩里正男之流定性為惡性台獨。

所謂良性台獨，如果我沒有誤解阿修伯的意思，應該是指不喜歡共產黨一黨專制、害怕共產黨一黨專制進而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台灣人，不願意和共產黨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不可能與別人分享政權，民眾也沒有什麼自由，更談不上什麼民主。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梁漱溟這些名人，只能充當共產黨的花瓶和階下囚、獄中鬼、刀下魂。

所謂惡性台獨，就是岩里正男·李登輝為代表的皇民後裔，作為皇軍在台灣第五縱隊，從島內掀起分裂的濁浪，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割離出去，並入日本，成為日本皇軍再一次「進入」中國的橋頭堡和不沈的航空母艦。

岩里正男是個正兒八經的日本人，取了個中國名字-----李登輝，在中國的土地上，講漢語，寫漢字，吃閩南菜，卻為日本人謀取台灣打拼。這才是真正的賣台、害台和毀台。

### 惡性台獨與共產黨狼狽為奸

惡性台獨與共產黨，就像當年的日本皇軍與毛澤東、周恩來的八路軍、新四軍，勾結起來共同對付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國民政府，殺戮中國人的時候，幾乎是一樣地凶殘和惡毒。

一九九六年共產黨發射兩枚導彈，就是為岩裏正男·李登輝助選。難怪李登輝胸有成竹地說：「是空彈頭，不要怕。」原來是共產黨與李登輝的默契與合作。共產黨事先向李登輝交了底，事後找個什麼劉連昆、王連昆的，作為替罪羊。這種手法，是共產黨的一貫伎倆。

說到良性台獨，我的心裏就像倒了五味瓶，不知如何是好。贊成吧，感情上過不去；反對吧，良心上過不去。

良性台獨，雖屬良性，但還是獨。作為一個中國人，不願意看到祖國的肢體被拆散。這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感情在起作用。

要我去寫文章反對良性台獨，一定是無法下筆，不能成文。我自己就是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受害者。被迫當了二十二年共產黨員，可以說是深知「我黨」。要我去勸說享受了自由民主的台灣同胞去嘗試共產黨專制的苦難，比緣木求魚還要難。這是因為我的良心不允許。自己逃出了共產黨的魔掌，卻要台灣人屈辱在共產黨的鐵蹄下。這還是人嗎？

我覺得：良性台獨與惡性台獨的根本區別就是：良性台獨分離的對象是-----共產黨，惡性台獨分離的對象是.....中國。

最好的辦法是：所有熱愛祖國、熱愛自由的中國人團結起來，爭取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舉起右手打倒共產黨，舉起左手打倒岩里正男之流的惡性台獨。因為大多數人不是左撇子，右拳更有力量。只要推翻了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岩里正男就像泄了氣的皮球，蹦不起來啦！

### 民主亂象與專制「穩定」

台灣雖然已經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卻飽受內外交困之苦。

在島內，由於台灣人歸根到底是中國人，不可能脫離幾千年專制文化的影響和毒害。從蔣經國開放黨禁起逐漸步入民主社會，但民主進程一波三折而且怪象紛呈。

今天的台灣民主亂局與民國初年相比已經是大大的進步。儘管美國的電視台把台灣的國會新聞列入體育節目，卻並不能否定台灣已經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事實。因為：

第一，國會開會時雖然時有肢體衝突，但畢竟只是個別議員的蠻橫而非多數和大多數，甚至連少數都談不上，只能說是個別。雖然是個別，卻由於議會是民主殿堂而引起世界關注。被美國的電視台列入體育節目，是台灣人的恥辱，自然也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

第二，民主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挺亂的，但是在實際上卻只是小亂，難以形成大亂。不象共產黨專制社會，封鎖新聞，鉗制輿論，表面上看起來死水一潭，成為共產黨宣傳的「穩定」；實際上暗潮洶湧澎湃，隨時可能演變成大亂乃至天下大亂。歷史上的八王之亂、安史之亂、黃巾軍、紅巾軍、太平軍.....，無不是天下大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王燦的名句「白骨蔽平原」，就是這種天下大亂的最好說明。至於共產黨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也都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多少人頭落地？多少妻離子散？

### 台獨背後的美國與日本

由於共產黨控制了十幾億中國人的命運，國際社會不得不與共產黨周旋。尤其是現在，恐怖分子成為自由世界的燃眉之急。

看到共產黨手中的十幾億人質，聯合國乃至民主強國美國、英國、法國等，都感到十分棘手，往往不得不屈服於共產黨的無理取鬧，使共產黨的惡行惡狀屢屢得手。聯合國驅除民主較少的中華民國，卻不得不接納沒有民主的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既是中國的悲哀，也是全人類的悲哀。

現在有人津津樂道地球村、全球化，從自由民主的角度來說，自然是好事。但是，當今的世界還存在

一百多近兩百個國家，地球村只是遙遠的理想，甚至是夢想和幻想。更何況還有民主和專制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和衝突？即使所有的國家都實現了民主，還有各國的不同利益所產生的矛盾和紛爭。

日本和美國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站在台獨的背後，分別是惡性台獨和良性台獨的支持者。日本是惡性台獨的後台，可以從岩里正男的表演中看出來。美國政府從未正式支持過台獨，但反對共產黨的專制扼殺台灣的民主，卻是歷屆政府一以貫之的政策。說美國是良性台獨的支持者，勉強可以。

### 愛屋及烏與恨烏及屋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剛到美國的時候，一位老資格的海外民運幹將對我說：「要讓共產黨垮台，只有搞垮中國才行。」我聽了大吃一驚。後來仔細一想，這也是一種認知。

不知是哪一位名人說過，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反過來也是一樣，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這個問題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就像我在接受《北京之春》記者專訪時說的：「是專制制度的凶殘造成了國民性格的軟弱，還是國民性格的軟弱造成了專制制度的凶殘？我不得而知」。

我們中國人追求的首先是在中國實現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共產黨。有人因此認為，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故鄉和老根。這是大錯特錯的。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土地上的共產黨，但種子卻是來自俄羅斯的蘇聯共產黨。蘇聯共產黨的種子來自萊因河畔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中國共產黨雖然是中國的共產黨，只是因為他們的成員是中國人。但是，這些中國共產黨人頭腦中的共產黨因子，卻不是中國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毛澤東把來自蘇聯的共產黨種子與中國的帝王術和來自馬克思故鄉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雜交揉合在一起，產生了共產黨的第三個高峰-----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盡管如此，共產主義還是來自異邦的邪教，並不是中國的土產。所以說，「要讓中國共產黨下台，一定要毀滅中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用一種簡單的方法來比喻：中國好比一座大房子，中國共產黨好比落在這座大房子上面的一群烏

鴉。要趕走烏鴉，難道一定要毀滅這座大房子嗎？

馬克·土溫對於政府與國土、國民的關係，曾作過一個很好的說明：政府就像衣裳，喜歡就繼續穿；不喜歡的話，就脫下來扔掉。難道因為不喜歡衣裳，就要把穿衣裳的人弄死嗎？

以上這種想法和說法，可以歸結為四個字：恨烏及屋。

恨烏及屋的人，不管台獨還是什麼獨，只要毀滅中國或者拆散中國，都行。惡性台獨最容易得到這種人的支持。因為惡性台獨才是真正的台獨，要和中國永遠、徹底地分離。

嚴格說來，良性台獨實際上不能算台獨，只能說不願意和共產黨搞在一起。一旦大陸實現民主，良性台獨自然成為自由民主統一中國的積極分子。

與恨烏及屋相反，許多中國人因為愛中國，連中國共產黨都要愛。難道就因為中國共產黨前面有中國兩個字，就值得愛嗎？照這個道理，中國流氓、中國強盜，也應該愛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壞最殘暴的流氓土匪強盜。這就是典型的愛屋及烏。

在台灣問題上，愛屋及烏者們希望民主的台灣現在就和專制的共產黨政府合二為一。

### 思想觀念與私心雜念

在惡性台獨的死硬分子與支持者中間，有的是思想觀念上產生的錯誤，有的則是私心作怪。一些人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是專制的主要基礎；直到今天，還是由於大一統的民族國家才造成了共產黨的專制。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

美國是統一的合眾國，並不是一個專制國家。大的、統一的，並不是專制的必然；小的、分散的，也未必就一定是民主。遠的說，春秋戰國時代，大小國家數十上百個，哪一個國家是民主國家？近的說，當今世界有一些專制國家，小的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縣、美國的一個 county。

太平洋上有一個地下石油不停地冒、地上鮮花四季長香的美麗富裕小國，最高統治者叫「蘇丹」，就是國王。這個國王，不像英國的伊麗莎白，也不像瑞典、丹麥的國王；即使是前專制國家西班牙、日本，他們現在的國王和天皇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政治權力。

這個蘇丹，把國家當成自己的私產。國民雖然富裕，卻是源自蘇丹的恩惠。這麼小的國家，差不多是中國的兩三個縣那麼大，你能說它是民主國家嗎？

中東的專制國家，除了沙特阿拉伯的國土比較寬廣，其它的哪一個可以稱為大一統呢？即使是金正日的北朝鮮，也不能說是大一統，更別說越南、古巴、緬甸這樣的彈丸小國了。

許多死硬的惡性台獨分子，其實是以「台獨」的名義，謀取自己個人的私利。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手法，就是把獨立和民主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像岩裏正男這樣的人，一旦台灣真的獨立了，他就可以成為真正的一個國家的前總統；甚至可以梅開二度，以台獨之父的面目，老氣橫秋地重登總統的寶座，在全世界招搖過市。

一些來自大陸的人士，為什麼也成為惡性台獨的支持者呢？有的是源於思想觀念的混亂，恨烏及屋；有的則是因為，支持台獨可以名利雙收。這種人口口聲聲說支持台獨就是支持民主，以民主先生、民主女士自居；實際上是因為惡性台獨不得人心、到處拉支持，這些人可以得到高價稿費或免費旅遊、講學高酬金等等的實惠。何樂而不為呢？

### 獨立市場與統一市場（反共市場與親共市場）

隨著交通、運輸、通信技術的不斷現代化，市場的觸角不斷延伸，市場經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包括人的臉蛋、身材，甚至一些想法，都可以成為商品。

人要活著，要有活著的物質條件，要有自己的物質利益。不同的是，有的人為了利益，可以放棄、出賣理念（他的理念在出賣的同時，已經不可以被稱為理念了）；有的人，為了堅持自己的理念，寧願去做苦工，也不願意放棄、出賣理念，去屈從願意出錢購買理念的人。最好的是從事符合自己理念的職業（工作），得到恰當的工資、稿費一類的收入；既保持了理念的堅定，又得到生活必須的物質條件。但是，像聖經所展示的現實世界那樣，人類社會充滿了醜惡和污穢。許多權勢者，自私又卑鄙。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勢和錢財，引誘、逼迫一些人就範，放棄理念為權勢者的私利去奔走呼號。

一些號稱獨立知識分子的人，刻苦讀書，勤奮寫

作，成了一個有名的筆桿子，或者是什麼活動家之類的人物。有了名，有了寫作、演講的本事，就可以待價而沽，賣給那些有錢的權勢者。這些能說會寫的活動家、學者、筆桿子，唾沫橫飛、舞文弄墨的時候，出現在人們面前的，首先是「獨立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說的是「自由民主」，寫的是「人權法治」。他們有本事，把不相幹的東西說成「自由民主」，把似是而非的東西攪和成「人權法治」。

口口聲聲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獨立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和「人權活動家」們，往往是反共市場的賣家。買家，有美國的某些政治勢力。最大的買家還是惡性台獨。特別是一九九六年岩裏正男惡性台獨掌握了台灣的政權，反共市場搖身一變成為獨立市場或台獨市場，而且資金雄厚、財源滾滾。

共產黨也不含糊。為了維持自己的一黨專制，他們打出了「反對台獨，統一祖國」的旗號，收買各種愛屋及烏的人。這些形形色色的愛屋及烏者，就是親共市場、統一市場的批發商和零售商。

這些親共市場、統一市場的賣家，其實是既不愛屋，也不愛烏，眼睛盯的是烏鴉嘴裏的肉。

這種親共市場、統一市場的賣家，被一些人稱為「愛國賊」。這些愛國賊是打著愛國的旗號，實際上是愛黨賊，歸根結底只能是愛錢賊，愛的是共產黨搜括來的民脂民膏。

### 獨立與民主

共產黨與惡性台獨，其實是穿著一條褲子，穿在各自的褲腿裏，共同演唱一齣統一與獨立的雙簧戲。觀眾主要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和全世界的炎黃子孫。由於這出戲精彩曲折，懸念不斷，高潮疊起，也引起了許多金髮碧眼高鼻子大塊頭洋人的興趣，看戲的人越來越多，戲台從台灣海峽搬到了紐約的聯合國世界大舞台。

五十幾年前，中華民國政府搬到台灣的時候，謝雪紅等人領導下的台共，早早地就打出了台灣獨立的旗號。由於臭味相投，岩里正男立刻成為台共的優秀黨員。二·二八事變中，台共的身影處處飄蕩，成為民主不多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心腹之患。當然，二·二八事變中也有不少反對政府腐敗、要求更多民主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者。

把獨立美化成民主的先行者，根本輪不到岩裏正男和一些掛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招牌的「獨立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共產黨才是這一高招的專利擁有者。早在一九三零年代，毛澤東等人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蘇聯的漢奸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大講民主，號召各省獨立，就是要用獨立的名義，搞垮民主不多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沒有民主的共產專制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招牌是人民共和，實質是共產專制。

共產黨從來沒有中斷過與惡性台獨的勾結。一九九六年，岩裏正男敢於拍胸脯保證「導彈是空的，沒有彈頭，不要怕」，不是共產黨漏底助選，又能是什麼別的東西呢？事後找個替罪羊，對於共產黨和岩裏正男來說，那真是廣東話「濕濕水啦」！

共產黨大講統一，是要騙取中國人的心。大多中國人希望國家統一、民族富強。但是，如果台灣真的獨立了，共產黨反而開心得很。為什麼？因為要對付台獨，國難當頭，一切共產黨的腐敗什麼的，都是小事情。為了統一，人民的利益都可以犧牲。共產黨「解放台灣」為借口，鎮壓人民的反抗。但是，共產黨並不是真的要「解放台灣」，只是張弓搭箭拉空弦，就像一九九六年的空彈頭。

共產黨什麼時候才會真的打台灣呢？那一定是大陸老百姓的反抗無法鎮壓的時候。一打台灣，一切反抗都會「自動」停止。當然，這只是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共產黨真的打台灣的時候，就再也沒有能力鎮壓大陸老百姓的反抗了！

### 台灣是中國的肚臍眼

一九九八年，在紐約的一個會議上，我發言的時候說：「台灣是中國的肚臍眼。肚臍眼可以洗幹淨，但不可以被割掉。」為了說明反專制和反台獨的關係，我說：「讓我們舉起右手打倒共產黨，舉起左手打倒李登輝的台獨。「我不是左撇子，右拳自然更有勁。因為中國人民的首要敵人只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權。日本漢奸的惡性台獨，只是配合共產專制唱雙簧的一個小角色。解決了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就從根本上撤掉了台獨的根基。

一方面，共產黨以台獨分裂國家為藉口，拒不進行政治改革。共產黨的理由是：政治改革以後實行真

正的多黨制，多黨制衡，不利於解放台灣的統一行動。這當然是謊言。美國的多黨制衡體制，決定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一邊，也不影響林肯總統統一美國、廢除黑奴的南北戰爭決策的制定和執行。

另一方面，以岩里正男為龍頭的惡性台獨，則藉口大陸是非民主政體，一定要帶領台灣走出中國，投奔他自己個人的祖國-----日本。從這一點可以明白，為什麼自從李登輝當權以後，就決不支持大陸人民推翻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民主運動。岩里正男只是以金錢收買部分所謂的獨立知識分子和自由撰稿人，以大陸民運人士的身份鼓吹台灣獨立，把中國的肚臍眼-----台灣，割掉以後再縫到日本的屁股上。

如果大陸真正實現了民主，岩裏正男之流不僅喪失了謀求獨立的藉口；而且，他們的合夥人-----共產黨，也不能再以反獨促統的面目，暗中與惡性台獨同流合污、共進共退。

從根本上來說，共產黨與惡性台獨已經歷史性地抱在了一起，成為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絆腳石和攔路虎。這一對難兄難弟，暗通款曲的牽線人，可能就是日本的新軍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時候，就通過田中角榮、大平正方建立了共產專制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把中華民國推向孤單的深淵。他們再以種種手法，支持並指導李登輝騙取蔣經國的信任，篡奪中華民國的政權，把台灣帶向獨立的泥潭。

肚臍眼可以洗幹淨，決不可以割掉！

《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之三：

## 中國民主運動

### 如何評估應因「台獨」

劉國凱

當今，台獨困擾著中國大陸；困擾著中國台灣；也困擾著中國民主運動；尤其是困擾著中國民主運動的組成部份——海外異議陣營。

海外異議陣營如何定義？換言之，什麼人算是海

外異議陣營的成員？我想是否可以這樣界定：凡是持有堅定的民主理念，明確地對中共專制主義予以抨擊譴責，並把這一抨擊譴責經常以公開的言論行動表現出來的人，就是海外異議陣營的成員。當然，如果再細緻一點，海外異議陣營的成員還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沒有參加民運組織，並以人權活動人士、或獨立自由知識分子自稱者。另一類是參加了某個民運組織的，他們又常被稱為「民運分子」或「民運人士」。

對於台獨訴求，異議陣營中有人非常支持台獨，有人堅決反對。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分佈著各種「濃度」的支持和反對。但是又有一樣明白無誤的是，所有異議陣營的成員都不贊成把一個基本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台灣统一到專制的中共政權中去。由於海外某些著名的獨立知識分子強烈支持台獨，而外界社會又把他們也歸入了「民運人士」（其實，他們強烈否認自己是民運人士），還由於某些名聲很大的「民運人士」也確實支持台獨，故外界社會形成的印象是海外民運支持台獨。這種印象是中共政權所需要的。而且可以說，這一印象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共政權刻意製造出來的。中共政權明明知道海外異議陣營中有些人明確反對台獨（例如筆者），但卻指令它的海外文化特務兵團極力渲染整個民運都支持台獨，這顯示把民運描繪成台獨的擁護者、支持者對打擊海外民運甚為有利。

應該說海外異議陣營的兩類成員有著不同的社會定位，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行為方式、不同的價值取向。自由知識分子們宣稱他們有絕對自由的思想表達權利。他們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主張時不在意其社會效果，自由地、不受約束地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是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行事準則。

異議陣營的「民運分子」中有一部份也是知識分子——如果受過文史類普通高等教育者都可稱為知識分子的話。（有學者認為，只受過理工醫農等高等教育者以稱專業人士為宜）但這些知識分子顯然並不那麼「自由」。因為他們在發表自己的觀點主張前除了審議這些觀點主張正確與否外，還應慎思這些觀點主張的社會效果。

對台獨訴求應採取支持還是反對有賴於兩個議項。一是考察台獨訴求是否言之成理。二是考察對台獨所採取的態度於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是否有利。對此，自由知識分子們不表贊同。他們認為只須有前一

個議項就行了。具體的政治操作、社會效果與他們無關，不在他們關注考量的範圍之內。對他們的這種處事方式 我不打算作任何的評論。只是想和盤托出自己的看法。

台灣島內的台獨人士為台獨訴求製造的理論根據有「台灣民族」論、國民政府外來論、日據政權比國民黨政權廉潔高效論。在這些論被駁倒後，又陸續拋出台灣本土化論、人民自決論等。對此已有朋友作了全面徹底的駁斥，我不再重復。我想談的是，在台獨理論明顯站不住腳的情況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民運人士」要去同情支持台獨，以及這種作法對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台獨若以不讓專制的中共政權「統一」民主的台灣為訴求，那麼可信會得到中國大陸大多數民眾的理解和同情。然而，現實情況是台獨不顧大陸政情有何質變，都以完全脫幅中國為目的。為此，它正在不遺餘力地拉大台灣與大陸在文化上的差別。它竭盡全力地推行台灣「本土化」。它力圖以所謂「台語」來作國語。它改動中學教材中一些內容，以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臍帶。總之，它正採取種種措施在台灣民眾中，尤其是在青少年一代中灌輸培植台灣自外於中國的意識，從而為今後的徹底獨立打下深厚的人文基礎。毫無疑問，這樣的台獨訴求在中國大陸民眾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而且這反感正在被中共政權挑動升格為憎惡。

本來，台灣獨立的問題並不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奮鬥者的首要關注之中。這是因為，單純來看台灣問題並不太影響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而且，資源匱乏的台灣對大陸的經濟發展亦無決定性的影響。但是，使奮鬥者不能忽略的是中共政權正在利用台獨大做文章，來為它那不復存在的政權合法性招魂。

綿延數千年「打了江山就可坐江山」的封建潛意識主宰著中國人，使中國人民認可了中共政權的「開國功臣分封制」。但是，在中共建政半個世紀以後，當昔日為中共建政上過陣的撕殺者都已老去乃至故世之後，中共政權基於封建倫理觀的合法性已逐漸流失。而且「六四」大屠殺和無可遏制的貪污腐化使之與人民群眾處於愈來愈尖銳的對立之中。中共政權力欲改變這種情況，希企找回民眾對它的認同。為此，它祭出了民族主義的旗幟。正在它心焦如焚地四處尋

覓插立民族主義旗幟的支點時，驟然膨脹的台獨訴求恰到好處地爲它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中共政權大聲疾呼地反對台獨。在那高分貝的喧囂中它不但把民眾對它這個專制腐敗政府的不滿部份地轉移到台獨身上，而且還趁機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國土完整的守護神。本已流失了的政權合法性在這個過程中又悄然有所恢復。

海外某些政治異議人士支持台獨的言論又恰到好處地被中共政權用來抹黑打擊海外異議陣營，它藉此把整個海外異議陣營都污蔑爲支持分裂國土的民族敗類，詈罵爲漢奸賣國賊。不要看中共政權表面上的捶胸頓足，其實它心中竊喜不已。它巴不得異議陣營支持台獨。因爲這樣它就擁有了打擊異議陣營的殺手濶。更爲美妙的是，它可在這個打擊之中提升它的劣質形像，搶佔道德的制高點。

除了中共政權的這一伎倆之外，還有一樣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大陸民間有那麼一些懦弱的「勇敢」者。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也是中共政權下權益的受損者。他們心中也有怨氣，但他們不敢對中共發泄，因爲那樣有風險。因而他們是懦弱的。可是台獨的出現使他們找到了一個出氣筒。在中國大陸咒罵台獨是非但沒有風險，而且會得到中共當局的容忍、默許和支持。於是他們吼叫血洗台灣。在這狂呼亂叫之中，他們不但可以無風險地享受了發泄的快感，而且還飄然地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名勇敢者。顯然，這是一種變態心理、扭曲人格。毫無疑問這些人會跟著中共政權辱罵海外異議陣營。

然而，如果說我們可以不理睬中共禦用文人和這些心理變態者的誣衊，那麼我們絕對不可以無視中國民間大多數民眾對台獨存有不同程度的反感。如果海外異議陣營贊同支持台獨，就會失去大陸民眾。推進中國大陸民主進程的根本動力在中國民間。如果異議陣營被中國民眾所背離，那將會成爲無根的浮萍，在歷史潮流中寂然漂去。

某些海外異議陣營中的成員說：過去中共爲了奪取政權搞統一戰線。我們今天爲了擊倒中共政權爲什麼不可以也搞統一戰線？管它什麼台獨、藏獨、疆獨、蒙獨，都利用起來，一起打倒了中共再說。

這是多麼膚淺輕率的觀點。統一戰線可以搞，但除了要講原則之外還要權衡利弊。台獨疆獨之類對中

國民主事業有什麼積極作用？它們資助我們建立了功率強大的電台嗎？它們資助我們辦了許多發行面巨大的報刊雜誌嗎？沒有，根本沒有。退一萬步來講，假設有，但還是得考慮，要了這些電台而失去了中國廣大民眾是否會得不償失。

有朋友認爲，如果中國的民主轉型以非和平演變的方式完成，那麼，疆獨之類的武裝打擊是摧毀中共政權的可借力量。這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想，它將遺害無窮。疆獨之類的武力坐大既針對中共也針對將來的中國民主政權。除非將來的中央民主政權認可中國分裂支解，否則終將與武力的疆獨之類兵戎相見。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還有朋友認爲，支持台獨，讓台獨高度發熱膨脹，使中共不得不打。一打，中共色厲內荏的本質就會暴露。全世界譴責它，美國會干涉。台灣沒打下來，中共自己就會先垮了。咋聽之下這是多麼妙的計謀呀！

但是，這首先是不負責任的設想。戰爭爆發，人民遭殃。兄弟鬩牆，骨肉相殘，是我們要儘量避免的。而且，這種情況真的會發生嗎？我們不是軍事專家，對海峽兩岸的具體軍事部署並不詳悉，但基本勢態也有所瞭解。中共 460 枚精確的中程導彈對準了台灣的主要軍事目標。蘇愷 27、蘇愷 30 和殲 10 的成軍使海峽制空權已轉移到中共空軍手中。現代級導彈驅逐艦的編入和世界第三大的潛水艦隊使台灣海軍明顯處於下風。只幾個鐘頭海艦航程的台灣海峽在當代的運兵工具面前根本不能構成天險。可信，只要中共決心攻台，絕無久攻不下之理。虛張聲勢的美國也不會爲此與中共大動干戈。不錯，中共此舉會受到全世界進步社會的譴責和經濟制裁。然而，請不要太看重這些譴責和制裁。「六四」大屠殺中共是絕無絲毫道理，但那譴責和制裁又能持續多久？遑論中共還多少能扯上幾句理由的攻打台獨。

更爲可慮的是，一旦中共攻台成功，將可大大強化它的政權。軍事上的戰績，維護國土完整的功勳，這無疑給它鑲上一道光環，使之取得了給自己臉上貼金的極好機會。這猶如給中共政權打了一支強心針，延長了它的壽命。

台灣民間本無強烈的省籍情結、台獨訴求。現在之所以鬧到這樣的地步完全是一些政治人物挑動出來

的。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中共絲毫染指不了它。實在用不著再刻意地去強調什麼獨立。在經濟起飛和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台灣本應致力於把自己建設成爲一個人間樂園。這樣也可對中共政權以無形的巨大壓力。使之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相形見絀。大陸民眾將會愛慕台灣，回過頭來會更憎惡中共。可是，一個好端端的局面給台獨攪黃了。台灣一些政治人物出於他們的野心、權力欲，不滿足政權的易手，硬要使這個政權不但在實際上，還要在名份上也自成一國。要能向世界一百幾十個國家派出大使。爲了鞏固執政權，他們竭盡全力的挑動省籍情結，煽動台獨訴求。在這種政治生態下，一些反台獨的政治勢力爲了制衡之，竟出投靠中共的下策。台灣的國民黨爲了爭取選票，重獲執政權也在向台獨妥協。海峽兩岸由此陰雲籠罩。

面對這種局勢，海外異議陣營中不贊成台獨的人們不應再保持緘默。我們應該道出我們的憂慮和心聲。

台灣島內的政治人物，請你們拿出社會良知和責任感，摒除個人權勢的企求，以增進台灣人民的福祉爲宗旨，去爲進一步完善台灣民主政治和發展經濟而努力。台獨訴求正在被中共利用來打民族主義牌，請不要送給它這樣一份政治大禮。

海外異議陣營中的人們，請掙脫由種種原因而造成的贊成台獨的迷思。這不僅由於台獨於情不通、於理不合；更由於台獨極有利於中共打偽民族主義牌來鞏固其政權；還由於贊同台獨會使我們失去中國大陸的廣大民眾，使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更加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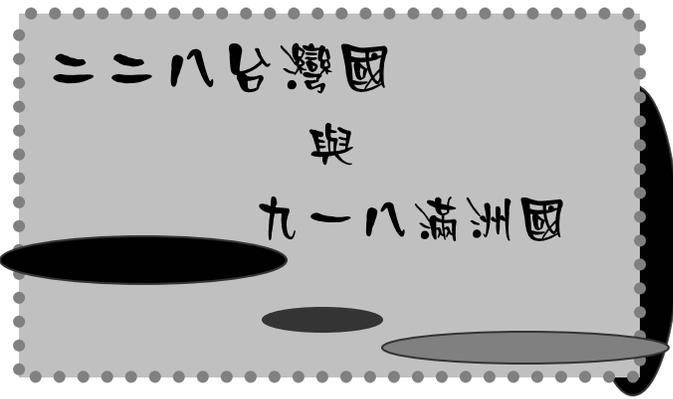
任何一個對我們數千年文化故國懷有深厚感情的民主志士當以實現民主政治、和在實現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國家不會分裂支解爲追求。

### 聲明與更正

□聲明：亞特蘭大著名僑領本刊榮譽編委趙增義先生特借本刊聲明，在中文網站上以他的名字發表的一篇“揭罵”曹長青、魏京生和王丹的文章，非其所作，敬希三位先生及讀者週知。

□更正：本刊第七期發表的署名“流浪者”的兩首舊體詩歌，應署名“國際流浪者”，特此更正。

### 《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之四：



二二八台灣國  
與  
九一八滿洲國

阿修伯

大約在十年前阿修伯參加紐約台獨人士的集會和示威大遊行，保留了兩面台灣國的國旗，其構圖是八瓣菊花，尖端向內，圍成一圈，大家稱之爲「八菊旗」。

話說日本皇室自鎌倉（KAMAKURA）時代（西元1183年）起，用菊花代表皇室紋章，明治維新後規定十六瓣爲天皇專用「菊之禦紋章」（KIKU NO GOMON SHO）皇族使用十四瓣，家臣使用八瓣，現在「台灣國」的八菊旗自然表明「台灣國」乃是天皇的家臣也。無獨有偶，1931年918之後，在中國東北成立的「滿洲國」其「執政」溥儀的「紋章」也是八瓣菊花，「台」、「滿」兩國皆爲日本之家臣！今日靖國神社懸掛的就是日本天皇十六瓣「菊之禦紋章」。

由八旗菊顯示了「台」、「滿」「兩國」的共同淵源，下面再來看看這「兩國」的共同命運和歷史經驗：

1894年甲午戰爭，95年簽馬關條約，日本要求清廷割讓遼東和台灣，清廷因遼東乃其祖宗發祥之地，不忍割讓，乃請法、德、俄三列強出面干涉，迫日本放棄遼東，由清廷加賠戰費贖回。

1904年日俄戰爭，日軍大將乃木希典猛攻我軍控制的旅順301高地，死傷慘烈，乃木大將兩個兒子皆在此役陣亡，乃木大將因此被日軍奉爲軍神。約四十年前，阿修伯在台灣看過日本出品的「明治天皇與乃木大將」電影，台灣人「皇民」觀衆情緒熱烈，鼓掌歡呼，好像是台灣國戰勝俄國一般。日本戰

勝後奪得大連旅順「正名」（仿台灣「正名」遊行）為「關東州」，統治長達四十年！這位乃木希典在滿洲立了軍功就升任台灣第三任總督統治台灣人，難怪台灣人看到前述電影如此興奮，原來乃木大將是台灣人的「故主」，懷念故主有情有意也。

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時的民政長官藤新平是統治台灣功勞最大的日本官員，他有一句名言：「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因為對台灣人的深切瞭解，實行「糖餡與鞭」的政策把台灣人治得服服貼貼。其後他被調往滿洲擔任南滿鐵路總裁，整治滿洲人為關東軍炮製滿洲國打下基礎。

台灣新竹人謝介石曾擔任滿洲國外交總長。日本統治台灣，高級官員百分之九十九皆為日本人，台灣地方又小。台灣人受到赤裸裸的民族歧視壓迫難有發展機會，於是紛紛向外找出路。追隨謝介石「過滿洲」的台灣人前後超過萬餘人，連李登輝都說過他年輕時也曾想到滿洲去經營農業，因他的本行專業是農業經濟也。

當年「過滿洲」的台灣人有兩種不同的心態，其一是心懷中國人的感情，與同受日本人壓迫的東北人有同胞的感受認同，另一種是認為自己比滿洲人早幾年做亡國奴，甚至自認為日本人，台獨老前輩王育德就這麼說：「與日本人並肩到滿洲南洋等地的台灣人，體會到優越感」（王著『台灣——苦悶的歷史』）。他這一類台獨人士狐假虎威，欺壓被侵略的人，心地十分卑賤醜惡，李登輝如果也「過滿洲」一定也是這麼一個東西！

今日有台獨人士說，中國人唯有東北人同情台灣獨立因為東北與台灣有共同的被日本統治的歷史經驗，其他中國人都反對台灣獨立。吾友前台獨聯盟副主席洪哲勝先生說：「我所認識的一些滿洲人，他們都主張滿洲應該獨立」。這全是台獨人士一廂情願的妄想。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台獨人士都在日夜期盼中國之崩潰，「台灣國」和「滿洲國」自然就紛紛獨立，然後再復入日本掌中。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不幸造成二二八事變，促成大陸建國運動，台灣內部族群對立遺禍至今。雖然國府已道歉、平反、賠償、立碑、建館紀念，但仍然未能化解，台獨人士年年藉二二八煽動反中仇華意識。其實二二八被害的台灣人死亡加失蹤只

有847人，比起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的屠殺鎮壓可謂小巫之見大巫。不談平定台灣時的大殺戮，僅治台後的「瞧吧，咩西來庵事件」和原住民「霧社峰起事件」就分別殺害萬餘千人！今日沒有台灣人紀念這些事件，日本人更沒有任何道歉、平反、賠償、立碑、建館等表示，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殺害是國府的十多倍至數十倍，台灣人對日本人不但不仇恨反而感謝！今日台灣人的反日抗日「基因」已被日本人殺除淨盡，剩下來都是崇日媚日的皇民奴！

1995年4月17日，是「馬關條約」簽約百年紀念日，此日台灣被中國割讓給日本。台獨人士在台灣舉行盛大的「告別中國」大遊行以示慶祝，又舉行學術討論會，受邀來台的日本學者本來準備在會中向台灣人道歉，因為日本人在統治台灣五十年中，做了許多對台灣人苛虐壓榨侮辱的事，想不到先發言的台灣人學者，一片歌頌讚美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日本學者反而不好意思道歉了。同一天，當時還是立法委員的現任副總統呂秀蓮女士也率領百人團赴日本馬關開紀念會，同樣歌頌日本統治，同樣使日本錯愕，不好意思道歉。呂女士並說出一句名言：「馬關條約，台灣被日本統治，是不幸中的大幸」。她並且瞻仰了天皇赤間神宮，充滿虔誠膜拜之情。以她的年齡算來，並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為何如此親日媚日，令人不解。

李登輝與日本人「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談話中大力讚美「日本在台灣做了了不起的大事」，又說「滿洲國」是「王道樂土」，中國華北人都蜂擁出關要來加入「滿洲國」，近日更替日本人赤膊上陣暴言：「釣魚台是日本領土」。

無獨有偶，中國大陸近幾個月來也有學者教授倡言「新思維」鼓吹中日雙方向前看，忘記舊日的冤仇，中國應幫助日本加入安理會，中日加強合作，並讚美日本已建立了民主政治，是亞洲人的驕傲。想不到今日中國大陸也有和李登輝台獨皇民心態一樣的人。日本人受到這樣的體貼、諒解、鼓舞，自然不會反省檢討其二戰之罪行，反而對台灣對中國是有恩的，不然為什麼台灣人中國人都感謝日本？日本人篡改教科書美化侵略史，否認南京大屠殺等等，都是因為這類中國人、台灣人的鼓勵才敢這樣做！接下去修

改憲法出兵海外，幫助台灣國滿洲國「復國」，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

像李登輝這樣私德敗壞、貪污腐化的人卻受到許多台灣人的擁護，九月六日，他主導的「台灣正名」（台灣國）大遊行，參加者達十五萬人，情緒熱烈，士氣高昂。反之，此日舉行的「捍衛中華民國」遊行只有八千人參加，更可怕的是前者幾乎完全是台灣本土人，演講、呼口號、唱歌皆使用“台語”，後者幾乎完全是外省人，演講、呼口號、唱歌皆使用國語（普通話，現在台獨人士稱之為『華語』，與『台語』分別並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民族劃分抗爭對立，而『華人』是那樣的弱勢，『台人』是那樣的強勢，台人是華人的二十倍！中華民國岌岌乎危哉！難怪李登輝敢說「中華民國不存在」。台灣勢在必獨！中國勢在必打！

九月十六日自由時報報道：「台聯黨計劃在十月二十日前成立大型的制憲委員會，由李登輝前總統擔任委員會總召集人」。「明年一月一日提出這部新憲法，發表制憲宣言，在二月發動百萬人連署新憲法」。「建立台灣國，則要靠制憲運動來推動」。李登輝打鐵趁熱，密鑼緊鼓制憲建國。同日同報陳茂雄教授大文：「今日已形成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對決」。九月十三日同報報導：加拿大台僑回台灣參加台灣正名遊行與老榮民（外省退伍老兵）口角 被老兵刺傷。已經有了小小的血腥味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新“二二八”的先兆！

雖然目前台灣還是主張維持現狀者居多，但台灣不可能永遠維持現狀，未來必然是非統即獨，而族群劃分的緊張日甚一日，台獨、親日、仇華、排斥外省人也日甚一日，新的二二八也是勢所難免。和平統一和平獨立都不可能了，阿修伯鐵口直斷未來台灣大流血大破壞乃是必然的命運，這是天注定在劫難逃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寫寫文章指出危機，希望激起大家一點良知理性，減少一些流血破壞則幸甚矣，可惜阿修伯的文字到處碰到封殺打壓，發揮的力量實在有限，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

本半仙並不希望我的鐵口直斷成爲事實，情願我卜算錯誤，大家砸了我的招牌。如果由於我的呼籲警告而避免了台灣的慘劇，大家歡歡喜喜「和平」的統

一或獨立了，救渡了成億的衆生，我的功德可大了！可以成佛了！

《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之五：

## 公民自由

### 與 區域民主憲政問題

陸 耘

現代民主國家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實行民主憲政制度，其一國之內，即使差異極大的地區，都能健康發展。這也給我們這些從事反對中共專制獨裁統治，鼓吹中國民主的人們以極大的啓示。這些國家處理類似問題的方法和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參考。

現代民主國家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保障，首先是在國家範圍內實現的，國家成爲公民自由權利的最終保障者。國家和各級地區之間實行分權管理，各級地區在其管理權限內實行地方自治。相應地，民意代表機構也就分爲全國範圍的國會和地方議會，直接民權的實施也分爲全國範圍的國（公）民投票和地區範圍的住民投票，不同範圍的民權的實施內容就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各地區範圍的地方議會和住民投票只能根據憲法規定決定其部分本地區事物，涉及到它地區的事務和全國範圍的事務則分別需要同它地區協商或由全國民意來決定，因爲這涉及到它區居民的民主權利和利益。如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一般沒有決定移民事務的權力，也就是說，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不能限制國內其他地區居民的移入（國家法律給予特定地區此種權力，則屬特例），因爲這涉及到國家保障的公民自由權利。再如國家憲法的修正，當然要由全國民意代表或全〔國〕民投票決定，不僅如此，許多民主國家還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和程序，規定憲法的修正要有決大多數民意代表同意，而且，需經大多數地區議會通過，方可實行。這是由於作爲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對於每個公民，每個地區，關係極大，必須考慮到決大多數國民的意願，徵得決大多數國民的同意。

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存在的地區獨立運動之所以不得成功並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制，其原因也在這裏，因為中央政府要顧及全國的民意和遵守國家法律，而全國的民意並不支持這些地區獨立運動。另一些得到全國民意支持的地區獨立運動則會順利成功（如七十年代某些非洲殖民地脫離歐洲宗主國的獨立運動）。

由上可知，就一國之內的某一地區而言，不存在正當的住民自決問題。因為當地住民只能根據憲法規定決定其部分本地區事物，而不能決定所有社會事務，特別是涉及到國內它區的全國性的事務，如全國法律的修正，國號，國土的變更等等。從本質上說，一國之內的某一地區居民，只是現時選擇居住在該地區的居民，對這一地區並不具有主權，它區居民，只要願意，就可移住該區，也就同該區居民具有了相同的權利。國內它區居民具有到這一地區旅行，經商，工作，居住等的自由權利（國家法律特定的地區，則有例外）。主權是同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只有國家才具有主權概念。主權具有明確的排他性，不具居留權的外國人，即使在這一國家擁有土地和資產，開辦企業，不通過移民法的許可，也不能在這一國家工作和居留。所以說，主權在民的民，是指全體國民的民，而不是當地住民。一國之內的某一地區的住民自決論，侵犯了國民的自由權利，違背了民主原則，是對自由原則的蔑視和褻瀆。

國際法庭曾經就芬蘭阿蘭德（ALAND）群島（其居民是與芬蘭不一樣的民族…瑞典族）問題的裁決，具有判例意義和現實意義。國際法庭指出，阿蘭德群島上的居民，無權單方面自己決定脫離芬蘭而加入瑞典。這一裁決，具體體現了國際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國民中的一部分無權通過單獨的意願與母國脫離，現行的國際法也不承認其他國家有權要求這種分離。

那麼，為什麼又有住民自決的說法呢？住民自決是對地位未定地區和殖民地地區的人民決定自己政治地位的一種辦法。在這一情況下，住民自決論是對原住民自決論或民族自決論的一種反動。因為在決定地位未定地區和殖民地地區的政治地位時，原住民或某一民族試圖只由自己決定本地區事務而排斥其他或後來的居民，甚至採取驅逐後來居民的做法，造成了更大的社會問題。而且，怎樣界定原住民呢？許多原住民其實是較早期的移居者的後代，而許多後來移居者

其實也是出生在此地的新移民的後代。有的民族聚居地，甚至是歷史上某一時期集體移居到此地的，以什麼時期來界定都存在對其他居民的不公平問題，是對其他居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的侵犯。而且，即使是一個地區的原住民，為什麼就一定應該比其他居民具有更優先，甚至獨佔的權利呢？土地和資源，是上蒼給予大家的，每人都應當有相同的享有機會。社會的管理者，應當由當地全體居民選擇產生，每人也都應當有相同的機會和權利，這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因而，政治家們為圖省事，也為了較為公平和較易操作，提出用住民自決來代替原住民自決或民族自決。

一國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是否就是殖民地呢，當然不是。從西方殖民統治歷史看，殖民地居民具有同宗主國國民間的不公平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地位，而民族聚居區居民享有同國內其他地區居民相同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就不是殖民地。

這裏需要指出，中國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實際上體現出在一國之內的某一地區實行原住民優先，或少數民族在其聚居地優先的政策，這是一種反向歧視政策。熟悉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情況的人士都明白，許多中國的民族自治區域，獲得優先地位的少數民族，既非當地的原住民，也不是當地的多數居民，只是在這一區域，有這一民族居住而已，但整個這一地區，卻成為這一民族的自治地。事實上，這一民族成了這一地區的貴族階層，統治民族，這一地區的其他居民，成了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這是公然的社會歧視政策，是政府推行的由某一少數民族對其他民族居民的公然的歧視。在這一地區，其他民族居民失去了本應由政府保護，法律保障的每一居民都應有的自由民主權利，使民族自治區失去了基本的社會公正。例如內蒙古自治區，蒙族人也是歷史上由貝加爾湖一帶遊牧到此，而且，蒙族人只佔不到全區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整個地區就成了蒙族人的「自治區」，蒙族人就享有了種種優先甚至獨佔權。民族眾多的新疆地區也類似，維吾爾族人並非原住民，比維吾爾族人更早的居民是漢族人，後來，維吾爾族人才移居到此地，但全區成為「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族人也就享有了種種優先甚至獨佔權，其他眾多民族居民也就失去公平的權利和機會。本是天賦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被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剝奪了。

一國之內的某一地區的住民自決論者，還有著不可解決的自身矛盾。如果某一省的住民自決是合理的，那麼，這一省某市某縣甚至某村的住民自決就應當容許，這樣，就將天下大亂，任何國家都可能立即解體，世界將永無寧日。可見，泛住民自決論不僅違反了人權自由原則，而且給人類帶來的將是無窮的災難和仇恨。

現代世界的政治現實，比以上的討論要複雜的多。英國在退出克什米爾前，當地曾舉辦了決定自己政治地位的住民投票，但英國，印度和巴基斯坦都無視當地住民的意願，使這一地區至今紛爭不斷。波士尼亞在西方的支持下，從南斯拉夫聯邦獨立，但波士尼亞內賽爾維亞人聚居區的獨立要求，卻在西方的漠視下，被波士尼亞政府殘酷鎮壓。許多這樣的事例都顯示出，地區獨立運動同國際政治的密切關係。

有論者認為地區獨立運動是這個地區人民的自由權利，這不是對自由的誤解就是有意混淆是非。公民的自由權利，一般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國家應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不受他人或政府的侵害。人民之間的事務，人群和人群之間的關係，則屬於公共事務，屬於政治範疇。故多數人不可以限制少數人的自由權利，但多數人可以決定公共事務，即使少數人不同意，也必須執行，這就是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因此，一般凡需經過投票決定的事務，都不屬於自由的範疇，否則，不就成了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自由權利了嗎？打著自由的旗號來限制和漠視一部分人的自由，特別具有欺騙性。為了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有必要認清泛住民自決論者的反人權自由的一面。

更荒唐的一種說法，把地區獨立運動和母國之間的關係比喻為夫妻關係，或比喻為兄弟關係，或比喻為父子關係，認為任何一方想分即分，而雙方都同意才能合為一國。這也是對個人的自由權利和集團政治利益不同範疇問題的混淆。這裏再次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利是天賦的，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和法律的保障，而不同人群集團間的利益關係，是政治問題，需要全體有關民眾，通過民主的方法，法治的方法解決。

因此，台灣地區近來關於公投立法的爭議，也體現出一個地區和國家整體之間的關係問題。依照中華

民國憲法，大陸和台灣地區，都在中華民國的版圖範圍，關於全民公決的議題，應該符合憲法的版圖。特別是關於國名，國土的變更，憲法相關條文的修正等等重大議題，應該由全民和他們的合法代表來共同討論決定，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人，那就不是全民了。只由其中一部分人和其代表來決定這些事物，其法律基礎就很薄弱了，而且也不符合民主的原則。

我們都知道，大陸在共產專制統治之下，沒有合法的民意代表，也無法進行類似問題的全民公投，因而，這些問題的全民公投，只有待大陸民主化後，才有可能。對相關問題，中共專制政權和任何個人的任何承若，都與法無據，不合民主程序，相信未來中國民主政府都有可能重新檢討。

中華民國是從大清帝國繼承了大統的，民主的共和國。中華民國在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全中國的主權和統治，具有堅強的法律和民意基礎。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為了民主和憲政的尊嚴，對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的討論，大陸地區的人民，有義務，也應該參與自己的意見。

這裏，我列出美國學校的「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供大家思考。美國大多數學生在學校展開一天的課程和活動之前，都會把右手放在左胸上，面向國旗，齊聲背誦超過一百一十年歷史的這一「效忠誓詞」：「我宣示效忠美利堅共和國國旗，以及這個共和國所代表的精神：在上帝庇佑下的統一國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與公義。」（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這就是美國教育美國學生要牢記的美國精神，這就是美國的文明，美國的自由。那些宣稱崇尚美國自由精神，又宣稱「獨立是自由權利」的人們，面對真正的美國精神，該作何感想。「效忠誓詞」體現出國家統一和自由這兩個不同範疇概念的不可替代性和統一性，它們都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的基石。需要說明的是，百年來，只有因宗教原因對誓詞中「在上帝庇佑下」提出異議者，沒有美國人對「統一國家，不可分割」的誓詞內容提出異議，足見民主國家人民認為「統一國家，不可分割」是必然的，無疑問的。布希政府對「在上帝

庇佑下」的異議的回答是「在上帝庇佑下的統一國家」一語，是「一種愛國的作法，而非宗教的見證」。讓我們在此也祈禱中國成爲…在上帝庇佑下的統一國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與公義。

《民主統一為中華》專欄文章之六：

## 我為什麼贊成攻台？

### 一個大陸老百姓的心裏話

大陸網民

**編者按語：**這是一篇網上文章。一讀，就知道是大陸人寫的。因為，不論是文風，還是內容，甚至是所表露的痛苦和怨恨，也只有生活在大陸的同胞，或曾經生活在大陸的同胞，才能寫得出來。當然，他寫的都是真話，特別是他對大陸人民「為什麼可能支持中共打台灣」的真正原因，和他們對於中共攻打台灣所懷抱的「寄託」，就更是大陸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我們奉勸極端台獨勢力，奉勸那些過分親共、媚共的台灣同胞，對大陸人民，切切不要走那「多行不義必自斃」的老路，這可是古訓。

不打台灣打誰？不打起來，這日子過得有什麼勁？

共產黨說了，中國人素質低，不能搞民主，不然會破壞了穩定的大局，十多億人亂起來，可不得了，別說吃不飽飯，只怕好多人命都保不住。溫總理上任之初說了，民主還是要搞的，但要一步一步來，不能急。據說西方人可以越級上訪，可以罵政府罵領導，可以在公共場合自焚自殺，可以任意思想、隨便說話、自由上網、自由辦報，還可以選自己鄉鎮縣市省領導人甚至國家的領導人，中國人不行。這些咱也認了，誰讓咱是低素質的中國人呢，誰讓咱偏偏攤上了個偉大的黨，非要對咱負責、作咱代表呢。咱不明白的是，解放前，解放初，工人農民都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和同盟軍，解放了五十多年，咋就成了弱勢群體素

質越來越低了呢，連個選村長的權力都不給全。管它呢，共產黨要打天下時就許下過民主自由的大願，中國人已經等了七八十年，再等等也沒啥，反正咱是看不到了。

說西方人素質高水平高咱就認了。至少西方的黨和政府就不敢把老百姓當兒子當孫子。可是，說台灣佬素質比咱高，說翻天咱也不信。台灣佬與咱同一個老祖宗的，都是炎黃子孫，小小一個台灣島，沒有咱一個小省份的地盤大、沒有咱一個大城市的人口多，領導過他們的國民黨，不過是咱手下敗將！他們還「牛氣」了，大陸妹爭當台灣新娘不說，台灣佬還老跑大陸，又是投資，又是辦廠，又是包二奶，又是領導接見，美死龜孫的了！他們不但錢比咱多，權也比咱多，還有權選啥子總統，憑啥？得了國民黨從大陸偷運搶奪過去的無數財寶國寶，富起來抖起來了，就嫌大陸窮，愛美國富了，光復大陸不喊了，扔開大陸不管了，就要鬧獨立了，憑啥？

你不光復咱，咱就支持共產黨光復你。有福同享，有狗同做。咱過不好，也不能讓無情無義的龜孫過好了對不？打，打它個落花流水稀巴爛，打它個天翻地覆慨而慷，把台灣打回「解放前」，打回猿人時代去！

打仗要死人？死人有啥好怕的，不打仗不照樣死人嗎。中國人的命狗屁不值。解放五十多年，餓死、凍死、窮死、病死的，被逼死、鬥死、打死、殺死的，自焚自殺死的、天災人禍死的，還有吃了喝了有毒的東西死掉的，木柁柁多呀。何況現在當兵的也壞了，什麼人民子弟兵，禦林軍罷咧，死了就死了唄。好在俺娃子不是務農就是打工，沒當兵的。話說回來，俺娃要是當兵的，當幾年農村兵，一退伍，還不是小百姓一個。不如轟轟烈烈打一場，老天爺保佑好人不死，沒准打出個軍官光宗耀宗哩。總算有個盼頭吧。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萬萬使不得。澳門呀，香港呀，不是一國兩制了嗎？北京大官們臉上有光了，與咱小老百姓沒個屁好處，去玩一趟比出國還難，據說駐軍的錢也要咱大陸出，中央還動不動就去送大禮，這不是請了倆大爺回家嗎。當家長的，貴在一碗水端平。既然一國，憑啥兩制？港澳台同胞天生就高貴，大陸人天生就賤？媽的。不打它丫的打誰！

別瞧好多人支持共產黨打台灣，那是有氣沒處出，「居心不良」啊，傻子才會認為他們支持共產黨。說句掏心窩子的話，這共產黨早就不是啥好鳥了。只是咱國人骨頭軟膽子小，都怕吃官司吃槍子，敢怒不敢言、敢恨不敢反哪。共產黨根基本來就鬆了、空了，挺不了多久了，再同台灣打起來，打贏了，耗盡精血，打輸了，丟盡臉面，不贏不輸，兩敗俱傷。不管結局怎樣，它都會垮得更快。咱就「坐山觀狗鬥」吧。不是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打起來，誰得道誰失道，就看得更清楚了。你信不信，一亂起來，好多狗官是要吃黑槍的。民心喪盡民憤太大啊，好多窮苦人巴不得找機會報仇雪恨哩。前兩天幫人打群架，你死我活的，有人一聲嚷嚷，大夥立馬不打了。那人嚷的是：都是窮兄弟受苦人，打啥子打？留著精氣神，好找狗日的貪官狗官王八官算帳哇！

這些話可千萬別外傳。咱怕？呸！豬狗一樣活了一輩子，苦吃足了，罪受夠了，世道看透了，怕個卵！上回有個官，領了一幫拍戲的下鄉（拍電視的），問咱還缺啥？咱說就缺陳勝、吳廣，陳咬金、洪秀全了。七老八十了，他們抓咱關咱得管飯，弄死了還得給咱收屍。咱是怕你出事唉。你還年輕，不曉得人心的壞，不曉得共產黨厲害。這些話說出去，被你的朋友、同事或者生意對手知到了，就等於送了刀子在他們手上。他們一告密，你就玩完。共產黨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就憑這幾句話，以前有十條命都不夠斃的，現在，關你幾年一點不冤！

所以，你如果寫文章，就要唱高調，要與上面調子一致，要說爲了「祖國神聖領土的完整」，爲了「解放台灣人民」「寧喪千軍不失寸土」呀，「堅決擁護共產黨光復台灣」呀，「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東方和平之師威武之師戰無不敵攻無不克」呀，「共產黨千秋萬歲一統江湖」呀等等。如果哄得中央大領導腦熱頭昏發下軍令：打！好戲就開場啦。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好好活著睜大眼睛瞧著吧。千萬不要逞英雄不要強出頭，不要實話實說，你千萬要當心哪：野豬惡虎臨死前掙扎起來會特別瘋特別凶的。

（談魯迅文，上接第 132 頁）想到許多不幸的先生，特別我最想念而為之不平的，無過於魯迅和雪峰。雪峰是刊物前期

主編，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曾代表延安中共，秘密來上海和魯迅聯絡。他不僅推動了魯迅向左，也推動了大批文學文藝界人士向左。當然受到國民黨的追究，陷身上饒集中營（編者按：馮雪峰身陷國民黨監獄，絕不僅僅是因為推動魯迅和大批文壇人士“向左”，而是作為一個正在外敵指揮之下實行武裝叛國叛族的政黨派往上海進行顛覆活動的重要人物，何冤之有？）中共當權以後，鑒於一些不得體的做法，他表示了：中國沒有出路，中國青年沒有出路的這一個意思，這就一棍子把他打下去了，再不得翻身，以致痛苦死去。（編者按：無可憐惜。因為他是製造“中國沒有出路和青年沒有出路”的“先驅、幹將和罪人”之一。）雖然以後情況發展，不僅青年沒有出路，中、老年的命運尤為悲慘。我想以後他是感到了這一點的，否則決不會把寫成的傑作燒成灰燼！（編者按：是否能夠稱之為傑作，“無棺”可以論定了。但以馬列洋教思想對他早已化血為肉的影響而言，特別是以他的那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創作方法”來說，怕是難以寫得出真正傑作來的。）

我原以為對雪峰、黃源他們之被處理，祇是因魯迅而捲入宗派主義吧了！因之我曾經爲他們悲哀過，也爲魯迅悲哀過。噩夢醒來，才發現人人都有痛苦的經歷，個個都有一段難唸的經。無疑，我是所有悲慘中的最悲慘的一個了。因爲我只是一個懦弱遲鈍對政治無知無識的無能的人，面對的恰恰是懷有陰謀陽謀絕招的多位“先知”和“人精”！

---

（周祥傳記，上接第 136 頁）

陳之邁大使只任了兩年。在兩年中，我和陳大使同去出席過大阪、橫濱、山形、仙台各地日華親善協會。在大阪會後，前日本首相岸信介、陳大使和我，三人在一家割烹屋，實際就是日本古典的藝伎館，藝伎陪酒，岸、陳都是善飲，我是點酒不嘗，在那裏消磨了時間二三小時。在山形正式晚宴後，所謂二次會，縣長、議長、參眾議員陪到割烹屋，藝伎陪飯，陳大使甚是高興，最後藝伎送他到旅社，次日我詢他藝妓漂亮否？他說他的眼睛在晚上視力不良，不知道，也算笑話一樁。在橫濱，陳福波委員，甚爲出力。

山形大久保會長親選蔣總統對日本以德報怨專著，國內秦孝儀、王昇同時協力提助資料，我則協助寫作。稿成，由秦王二任參閱，如有意見則寄我轉大久保會長參考。是項工作，幾乎費了一年的時光。我身邊現尚有該著稿本一大冊，已成爲很有價值的文件，有機會將攜該文件去台灣，交由政府保管。

（全部回憶錄至此中斷）

# 公民社會

# 宣言

大陸  
鄭貽春

要實現中華民族心嚮往之的全面現代化，要建立一個符合於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內容的公民社會，就必須連續不斷地分化、瓦解、拆毀、根除貌似強大的極權專制的共產政體，並大義凜然地掀開、去除、掙脫社會主義國家長期製造並業已形成的極其頑固的恐怖主義陰影，以形成民權消解極權、人權徵服黨權及其派生物-----政權、公民社會戰勝並取代共產王朝紅色中世紀的新氣象、新景觀！

建立公民社會，這是中國大陸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事業，這是超越極權專制及其所由生成的各種悲劇的全面的歷史變遷，這是引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向著現代文明的方向

迅速靠攏並勇猛進發的大規模的社會演化;建立公民社會，這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理想，也是中國人為爭取成為現代文明人的目標而做出的每一步踏實的努力，更是在扭轉不良歷史與不良現實的基礎上創造出適合於人的生存與發展、並激發人的想象力、創造力和一切潛力的新型社會。

建立公民社會，就是要實現一個簡單而明確、艱巨而光榮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在破除形形色色的諸如意識形態的、政治制度的和奴性習慣的禁錮之後，人不再是奴隸而復歸於人的本質。人，從以往的共產權力拜物教中挺直了卑躬曲膝的身軀。人，既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又是自身幸福的開拓者。就是說，人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人要做一個擁有全部權利和完整權利的人;建立公民社會，就是在重塑人格的基礎上奠定全新的道德規範，在自我規範的過程中完善人格的塑造，在克服勾心鬥角、互相猜疑、精於構陷的陰暗弊端之後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協作與相互友愛的和睦關係。在尊重他人的權利中贏得自我權利的實現，在實現自我權利的過程中維護他人的權利。

建立公民社會，就是要求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自覺自願地按照由普遍的民意所制訂的法律而行事。職務無論高低，掙錢無論多少，都要有禮貌，守規矩，既不允許自己胡來，也不允許他人妄為。在良心與法律的雙重規定下，每一個人都成為不僅造福於自己，同時也造福於他人，從而也造福於社會的行善之人;造成他人損失或社會損失的任何犯罪，都將受到法律規定的相應懲罰，其罪犯也將受到應有的恰當審判。量刑要適當，決不能忽高忽低。這一方面將根除人治意義上的所謂「嚴打」，另一方面使猴皮筋似的中共法律所造成的種種漏洞得到盡可能大的彌補。法律透明化，乃是確保司法公正的至關重要的基礎。司法要公正，就必須排除行政權與黨權的橫加干涉;建立公民社會，就是要求更有力地擴大公民私生活的領域，更有力地縮小政府權力的無所不用其極，並在徹底破除共產專制及其導致的社會生活的普遍政治化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和非意識形態化。人盡其能，物盡其用。能幹什麼就幹什麼，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幹什麼都可以，幹什麼都沒人管。信什麼都可以，只要不信奉暴力。凡是非暴力的一切，盡可以信。信仰什麼都沒有關

係。信仰什麼都沒人說是邪教，更沒有人興師動眾去亂抓亂逮。

建立公民社會，就是要求每一個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能夠為每一個公民提供盡可能完備的制度性保障，使人在免於恐懼中感受到無憂無慮、天真爛漫、返樸歸真之快樂，使人在免於匱乏中為了富足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而奮力地創造，在適合於自己的創造中不斷地豐富自己的腰包和頭腦。社會將為此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以創造出一個令人愉悅、也令人舒適的生存環境；建立公民社會，就是要求所有的冤屈都能夠擁有申訴的渠道，也能夠使之得到相應合理的補償。所有的冤案都能夠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最終解決。由於實現了合人權目的的政治改革、由於所有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各級權力掌握者通過徵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即通過競選的方式走上執政的舞台，故而所有造成各種冤案的根源將由此而被連根拔除，即告別悲劇、告別淚水、告別痛苦、告別哀怨；公民社會是在實現社會正義多元化或多元化社會正義的基礎上對於極權壟斷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運行方式的不正義、非正義和反正義現狀的有力克服。社會正義普遍缺失的政權奴隸制將從根本上得以遏制並將不復存在。在中國大陸扭轉了社會生活非正常化的不良局面而實現了社會生活的正常化之後，在正義戰勝不正義、非正義和反正義的所有邪惡之後，中華民族將迎來安靜、祥和、幸福的美好明天。

為了今天的覺悟，我們必須還歷史以真實，必須還歷史以公正；為了明天的輝煌，我們不能不克服現實的不足、不能不清理現實的弊端。無論歷史上發生了多麼慘不忍睹、多麼令人痛不欲生的一樁樁、一幕幕、一件件的殺戮和苦難，例如發生了導致三、四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發生了荒唐透頂的諸多毛式運動、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六四屠城，無論現實中每時每刻地進行著歷史悲劇的複製與克隆，例如對中國民主黨的取締、對信奉真善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等，從而引發了各種人道主義的巨大災難，我們都必須明確地認識到：所有導致這些悲劇和痛苦層出不窮的一黨獨裁及其統領的輿論造謠制度、信訪騙人制度、殘暴兇狠的文字獄制度等，都是建立公民社會所必須面對、必須思索、必須認真對待、必須全面解決的肮髒的乃至血腥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都是公民社會的文明內容

所要毫不含糊地予以堅決拋棄的卑鄙無恥的垃圾，都是公民社會所要全面清算和徹底消除的累累罪惡！

所有這些罪惡，都來源於現代王朝的中共一黨專政，都來源於沒有制約、也毫無規範的現代帝王寶座，都來源於沒有平等，更談不上平等意識的居高臨下的頤指氣使的極權指揮系統-----由極其廣泛的官本位愚民意識和有權就有一切的權力本位意識所共同營造的壁壘森嚴的金字塔似的等級架構。這個極權架構的頂端，就是至到現在還仍然在執迷不悟且與人類文明負隅頑抗的社會主義朝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公民社會，是在破除現行的紅色中世紀、破除共產王朝統治的社會主義新奴隸時代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權與政權相等同、政權與人權相一致的人權文明新時代，是在破除紅色暴政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人自由的新時代，是在破除造成恐怖的秘密警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公民受尊重、受保護，公民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利益不可剝奪、不可阻撓的新時代，是在掙脫了奴隸似的人身依附之可憐而卑微的地位之後人人能夠充分自由地行使依據自身的權利所作出的各種選擇，以期達成自我心願的新時代，是去除暴力、遠離暴力而生活在寧靜、和平環境裏的弘揚人性的新時代，是根除謊言、恢復真實、新聞輿論不為一黨之私所掌控，而為千百萬家私營媒體所分享的言論自由的新時代，是沒有文字獄，而有對文字、對不同觀點、對不同思想予以不同形式獎勵的令人鼓舞的新時代。

公民社會，是在不久的將來，在破除悲劇之源的現行的政治制度之後必定要實現的政治現實。它需要的不僅僅是先知先覺者的努力、民運人士的努力、各路精英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每一個中國人的努力，需要十三億中國人的共同努力；它需要的不僅僅是敢於同暫時強大的極權專制作鬥爭的勇氣，而且也需要建築公民社會良好架構所必需具備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廣博的知識、深入的學問、非凡的才能與偉大的智慧；它不僅僅需要先鋒的公共知識分子大無畏的獻身精神，而且也需要成百萬、上千萬乃至幾億人、十幾億人對於自我命運各盡所能地把握，對於自我價值的充分肯定，對於自我尊嚴不容半點遺漏的維護；它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資上的富足，而且也需要文化方面的豐富，精

神上的充實提高，政治權利的當仁不讓。

公民社會，就是把只有為少數幾個人所緊緊把持著的，並為一個政治集團、一個政黨、甚至一個政治寡頭所完全壟斷了的政治及其權力，普及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大規模轉移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政治及其權力，本來就是關涉每一個人的、屬於每一個人的公共事務，也必將由每一個人依憑自身的經驗、智慧、才學與思考而做出獨立自主的、而不是必須緊跟學習的；自由自在的，而不是外在強加的選擇。政治及其權力，是可以贊同，也是可以反對的；既可以被一部分人所稱頌，也可以為另一部分人所批判。通過符合於基本人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通過符合普遍民意的法律體系、通過非極權的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憲法保障，尤其通過允許他人說話的平等交流、允許對方自我辯護的平等機會，以及由己及人地尊重他人的機制保障和應該養成的良好習慣，而使不同的政治觀點蜂湧而出，以形成思想交鋒、言論交鋒的海洋般波瀾壯闊的浩蕩氣勢。通過談判的、競選的、投票的等等方式，達成尊重多數人意見、保護少數人觀點、多數與少數共存並存的良好局面。每一個特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都可以參與政治權力的遊戲。每一個人手中的選票，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代表了自己的真實立場。在選擇通過競選而湧現的代理人的過程中，每一個人將會充分地發揮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所應具有的責任、權利與義務。每一個人都可以毫無顧忌地對事關自己和左鄰右舍的國計民生乃至國家的不同領域、不同方面的政策發表自己獨立自主的意見、建議、批評和指責。當不同的方案都充分地展示出人性、人的訴求和人的全部願望時，那麼，整個社會的進步就必將呈現出加速度發展的不可逆轉的良好態勢。

公民社會，要求建立篩選政治家的市場及其法則，權力監督體系和權力制約體系等現代化機制。政治及其權力，既然不再是極權專制的密室產物和宮闈特權，也不再是爾虞我詐的陰暗與殘忍暴虐的血腥，那就完全有必要解除一切政治禁忌、一切政治秘密、一切政治雷區。要使政治權力的來源、運用、效率及其效果等，一改以往神秘莫測與一團迷霧的混沌而可恥的狀態。一切的政治活動都將變得明晰起來、透明起來。要透明、透明、再透明！要公開、公開、再公開！只有在透明化和公開化的基礎上，政治及其權力

才可能成為人人都可以評頭論足，甚至人人都可以盡情批判的對象。這樣，權力掌握者才能在收斂權力作惡本性的基礎上不斷地釋放出有益於公眾的善意來，才能在其合規範的政治行動中不斷地滿足民眾的普遍需求來。

政治作為權力的特定領域，不過是任憑選民們盡情挑選的市場而已。服務公眾的政治人物，不過是選民們可以挑選、也可以不挑選的政治商品。誠如我們所知，有需求就有市場，市場是為滿足需求而存在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一個管理的需求，一個管理目標或服務目標的需求。如果把幾個人或十幾個人設定為一個小組，把二十幾個、三十幾個人設定為一個班，把幾千萬、幾億、十幾億人，設定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那麼與此相應的管理者就叫做組長、班長、總理、國家主席、總統等不盡相同的名稱。班組長不過是總統或主席的微型化，主席或總統不過是班組長的擴大化或極端化而已。既然民眾為了自身利益的擴大化而產生了需要管理和需要服務的需求，既然根據這種需求產生了政府及其首腦，民眾就可以挑選你，當然也可以不挑選你。如果表現得暴虐殘忍，當然可以推翻你。這，就是民眾自由選擇的天經地義的權利。選民們可以挑選某個人做政治權力的掌握者，這叫做授權；也可以不選擇某個人做政治權力的掌握者，這叫做不授權。在未經民眾授權的情況下做權力掌握者，哪怕是做最高權力掌握者，由於沒有經過普選，由於沒有經過統計學意義上多數的認定，其所獲得的權力，只能是無效的，只能是非法的。換言之，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講，政治家必須經受政治市場的無情檢驗，或被選中或被淘汰。他們也只能由市場的主體，亦即作為買方的選民們來進行符合意願的取捨。作為政治人物或企望成為政治人物者，只能別無選擇地像模特兒似地表現良好，方可拿到高分，也才能獲得名次，至少不被淘汰。否則，如果表現得不盡如人意的話，那就根本不可能被挑選。

用這樣的觀點分析問題，可以不無理由地得出一個結論，即：中國大陸從秦王立國那天起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產生出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家！

難道有十三億人的泱泱大國、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大地，就真的沒有一個現代意義的政治家出現嗎？對於這個問題，回答無疑應該是明確的。哪

怕位置再高，權力再大，那也只能說是在形式上具有成爲政治家的有利地位或時機而已，本質上還不能叫做政治家，更不能說現代政治家。皇上、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國家主席、宰相、總理、大臣、巡撫督撫、部長、封疆大吏、省長、省委書記、市長、縣令、市委書記等等出了一批又一批，頂戴花翎一個又一個，重要講話一個又一個，紅頭文件一批又一批，最高指示的聖旨一道又一道，討伐逆賊的將令一通又一通，這些歷史的與現實的走馬燈似的東西，你方唱罷我登場，風風火火好不愜意！然而，可惜的是，這些東西都與現代政治、與現代政治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因此也都不能叫做現代政治或現代政治家。因爲這裏面包藏著的是，歷代王朝的黑暗、無恥以及令人髮指的狡詐、令人慘不忍睹的腥風血雨和腥風血雨的殘暴！這裏面不乏一個代表、二個代表、三個代表等等的竊國大盜。這些人等都是精神上高位截癱的陽謀家、權謀家、陰謀家。他們東拼西湊出來的毛澤東思想、秦始皇思想、鄧小平理論、朱元璋學說、武則天冊儀天下的無字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慈禧太后妖媚之詭術這些腐朽沒落的、強辭奪理的皇權思想、帝王臆念等，都毫無現代文明意義和價值可言，更談不上任何先進性！這些極權專制主義的大雜燴或統治拼盤，如虎似狼地吞噬著中華民族無數的生靈，腐蝕著華夏大地竟成千瘡百孔的醜陋之狀！這些野蠻暴虐、充斥著大一統謊言的東西，這些官職最高、卻毫無文明意識的傢夥，又有哪一個可以被叫做現代政治家的呢？像江澤民這樣只知鎮壓、根本不懂什麼叫做平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公民社會所固有的基本內容的戲子，又有哪一點像個現代政治家的樣子呢？

公民社會所應具有的政治家及其蜂湧而出的成熟的政治家市場，是文明社會自我完善、自我豐富、自我發展的必經之途，是抵達開明政治和文明政體的不可或缺的橋樑，是人類發揮自身的政治創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潛力所必然選擇的康莊大道。現在的中國大陸沒有這樣的政治家及其市場，更沒有這樣成熟的政治家及其市場，所以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期不斷地加以培育、營養、澆灌，直至使之儘快地成熟起來，完善起來。

要用公民社會如上所述的要求來審定、檢查、評

判、確診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現實，就不能不深刻地體察到，現實的中國人還不足以稱之爲一個公民。因爲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把現實的中國人稱之爲一個公民，只是有其名而無其實；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臣民社會稱之爲公民社會，是沒有其實而只有其名。實乃名不符實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實事求是地說，現實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現實社會中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存狀況，離公民社會所應具有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用天壤之別來形容，用八千里路雲和月來形容，實不爲過。

公民社會是現代化的文明社會，而不是現實中國大陸的非現代化、反現代化的野蠻社會。它否定極權專制主義黨壟斷或超壟斷一切社會資源的殘忍暴虐，也決不贊成一黨專政掌控和揮霍文化資源的肆意妄爲，當然，它也要取締阻礙經濟發展的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等可惡可恥可悲等導致墮落的相應機制。從這種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對極權專制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言，不啻是一場全面現代化的天鵝絨似的革命，或者說，全面現代化的實現過程，也就是公民社會不斷發育、不斷成熟並且最終誕生的盛大節目般的歡慶過程。

它提倡並鼓勵黨派之間的平等競爭，並以合乎統計學意義的多數認定的施政綱要、施政理念、施政能力走上國家行政管理政治舞台。它要求的是不可逆轉的政黨轉替制度，即，不能一黨獨大，不能一黨壟斷整個社會資源，不能一黨獨霸天下而不受制約。任何執政黨或在野黨都必須在相互批評、相互監督、相互替代的條件下不斷地增強自身的活力，以便於在幾年一期（四或五年）的全民大選中接受選民的或贊同或否定、或支持或反對的選票方式之評判。政黨政治的要點是：每一個政黨都是平等的，每一個政黨的理念都可以不盡一致或截然相反。公民社會實行的應該是兩黨制等多黨制。採取的是輪流坐莊、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在權力架構上，要在取締中央集權和極權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建立以分權、制衡爲特色的三權分立制度。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各施其職、相互獨立、相互制約，從而使國家權力不能爲一個人或一部分人完全地掌握在手中，壟斷權力的局面將不復存在。三權分立，是人類文明的光輝燦爛的卓越思

想。它業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實行了幾百年之久。實踐證明，三權分立制度能夠卓有成效地保障人權。它是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根除災難、實行法治，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協調發展的比較理想的制度。

公民社會認定公民社團的自發性與非暴力存在的合理性。代表不同階層、不同人群的具有自發意義的政治社團，能夠有效地表達其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之訴求，並能夠以自身的方式對於黨派和政府進行或贊同或不贊同的有力評判。公民自發的政治社團的存在是民間的普遍意願自我表達，且與執政當局進行勾通並施以壓力的必不可少的橋樑，同時又能夠緩解執政團隊從事社會管理時所必然面臨的緊張態勢，因而，公民社團不但不應該受到共產黨時代所面臨的強力打壓和毫無道理的取締，相反，還應該予以應有的鼓勵，以使之成為現代政治開明的繁榮景象。

公民社會需要創立適合於中華各民族廣泛協調、相互包容的新型國家體制。中華聯邦制或許是一種必不可免的明智選擇。各少數民族自治區、各省、市、地將在制度創新權，例如文化創制權、經濟創制權、法律創制權等方面擁有前所未有的更大權力。各地可以依據各自地區的不同情況作出適宜於本地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具有針對性的正確決策。

建立公民社會，需要現實的中國大陸刻不容緩地推進政治制度的全面變革，推進以言論自由為中心的輿論媒體全方位自治，推進司法審判的獨立與自為，推進軍隊職業化與國家化，等等，總之要實現推進社會全面進步的現代化戰略。這個全面現代化的戰略藍圖是：建立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實現之日，正是中國大陸全面現代化系統工程的峻工之時。

二零零四年一月上旬

敬啟者：

陳禮銘先生的“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一文本期暫停，將作為下期重點專欄文章發表。謝選駿先生的“論禮九章”一文連載，暫停一期。特此敬告作者和讀者原諒。

本刊編輯部

## 1999～2003：

# 中國民間村級罷免報告

楊銀波

**編者按：**一九八八年中共「人大」通過的「村選舉法」，也就是村民選舉村長和村民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法」，其本來的目的，是共產黨要把人民公社取消後已經難以管理的基層農村，「重新管起來」（本按語作者曾參與該選舉法討論，十分瞭解內情）；其表面的意義，則是中共要從這個「非政權性質」的村選舉中，表現它要從農村基層開始「民主選舉」了。然而，十六年來，伴隨著中共改革開放之「偉大政經腐敗成就」的，卻是這個非政權性村級選舉所招致的種種劣跡和民怨；伴隨著中國農民之覺醒和勇氣的，卻是他們已經愈來愈敢於反抗假村民選舉和要求真民主選舉。

然而，村民選舉卻是中共向海外標榜其「開始民主了和已經民主了」的一塊招牌，它既為海外保共改良派和國際無知學者所津津樂道，又是那些要蒙騙國際輿論、謀討金錢資源者的「法碼」。一位旅美教授，面對一位國內學者的質問，就曾厚顏地說，「我們如果不拿這個來欺騙美國佬，美國人怎麼會給我們研究和活動經費呢？」

但是，不論村民選舉這個非政治的「民主選舉」，是否像共產黨和那些「為共作僱」者們宣傳的那樣——它已經表明「中國農村已經實現民主」了；還是像一些講真話者所揭露的那樣，它不過是對中國農民的持續壓迫和對輿論的肆意欺騙；於前者，則說明，既然民主素質最低的中國農民都已經懂得了民主，都已經學會了民主選舉，中國農村已經是一片大好的民主政治形勢，那末，比中國農民素質自然要「高」了太多的鄉、縣、市、地、省直至中央的共產黨們，卻為什麼非但不能進行民主選舉，而且還要一再地高喊「一定要堅持一黨專政」，並且原因就是「中國人民的素質太低，他們不懂民主」呢？難道，在「黨政軍民」之中，級別愈高者，其素質竟反而越低嗎？並且低得連中國的農民都不如？那他們還有什麼執政當權的資格！況且，最近一次如此高叫者，居然就是那個「親民派頭十足，新政謊言太多」的溫總理呢？於後者，我們只要稍稍瞭解一下村民選舉十六年來，中國廣大農民日漸其深的痛苦，和他們對於專制暴政的日趨反抗，我們就能夠明白，所謂村民選舉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情了。如果說本刊第七期首發的廣東石壁三村的「農民上書」，已經能夠證明中國農民的困苦現狀；那末，本刊第八期首發的這篇「罷免」報告，則從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國農民已經敢於挺身「罷免」村官的勇敢之為，均值得讀者一聞。

### ■簡介

《1999~2003：中國民間村級罷免報告》，自2003年9月8日正式啓動，直至2003年12月22日徹底完成之時，總共歷時105天。本報告全長26704字，系1999年~2003年中國村級罷免狀況之民間個案版本，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問題的嚴肅檔案。其記錄的歷史跨度為：1999年3月6日~2003年12月17日；地域跨度為：黑龍江、浙江、河北、江西、福建、甘肅、山東、海南、江蘇、上海、河南、四川、山西、安徽、貴州、北京、陝西、內蒙古、寧夏、雲南、廣東等21個省級行政單位的53個村；其中27個村罷免成功，3個村罷免局部成功，7個村罷免失敗，3個村罷免性質非法，13個村罷免效果未知。因篇幅關係，本報告未將2001年6月5日福建省武平縣城廂鄉堯錄村罷免案、2002年1月8日河北省晉州市周頭區桃園鎮趙蘭莊村罷免案、2002年3月15日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鄭村鎮湘峪村罷免案、2003年2月10日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赤嶺村罷免案、2003年7月28日河南省上蔡縣塔橋鄉徐王村罷免案、2003年8月11日四川省廣元市朝天區西北鄉上壩村罷免案、2003年9月1日安徽省壽縣廣岩鄉謝墩村罷免案等更多村級罷免個案統計在內，敬請讀者見諒。

### 1999~2003：中國民間村級罷免報告

按：1988年，中共保守派彭真組織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遭到強烈反對。其後，該法在人大常委會中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確立。遭到反對並以「試行」的名義來確立的原因有三：1、認為農民素質低；2、認為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3、認為該法律不完善。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取消了「試行」二字。該法第十六條規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罷免要求應當提出罷免理由。被提出罷免的村民委員會成員有權提出申辯意見。村民委員會應當及時召開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罷免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須經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通過。」須特別注明的是：村民會議不能以村民代表會議、村黨員會議、村組幹部會議、村民委員會會議或者村黨支委會議來取代；村民會議是中國村級會議當中最為權威、最為莊嚴的會議，因此又被稱作「村民大會」；罷免村委會幹部的村民會議被稱作「村民罷免會

議」。

◆1999年3月6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北鎮集樂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董壽永。罷免效果：成功。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以後中國首例村級依法罷免案。該罷免案以「龍江第一村」徵地問題為主要導火索，由郝良德、徐國君等村民帶頭組織罷免。當時「龍江第一村」徵地的時候，董壽永比其他村民補償要多一些，所以村民提出罷免。這個「龍江第一村」，是哈爾濱市1998年在松花江北岸興建的一個大型的住宅旅遊項目，當時集樂村被徵去560畝土地，本來被徵去土地的村民都應該得到相應的補償費，但那時的董壽永在補償款的發放上透明度不夠，村民們意見很大。再有，大家認為董壽永是由鎮政府直接指派，這樣並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數村民的利益。1999年3月6日，在郝良德、徐國君等十幾名村民的倡議下，集樂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成功地罷免了董壽永。2000年3月，在包括董壽永在內的28名競爭者當中，集樂村通過海選的方式，選出了新一屆村委會。不出人們所料，董壽永落選了，新當選村委主任的是原來的村委副主任董身忠。郝良德、徐國君也被選為新一屆村委會幹部。

◆1999年4月9日。浙江省瑞安市潘岱鄉白蓮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何光壽。罷免效果：成功。

1999年4月9日，白蓮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何光壽被依法罷免。這是中國第二例、浙江省首例村級依法罷免案。

◆1999年5月24日。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梧埭鎮寮東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罷免效果：成功。

1999年5月24日，寮東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村委主任被依法罷免。這是中國第三例、浙江省第二例村級依法罷免案，但該罷免案曾被《南方周末》、《南風窗》等媒體誤視為「中國首例」，楊銀波特此糾正。

◆1999年8月24日。河北省檣城市崗上鎮小豐村。罷免對象：全體村委會幹部。罷免效果：失敗。

1999年7月的一天，小豐村村民白春洋、李新更、李新計、馮群路、白國子進入村委會廣播室，要求廣播，村幹部拒絕後，與村幹部發生爭吵。白春洋說：「你們不讓我們廣播，我們也不讓你們廣播。」並找來鐵鎗將廣播室的門鎖住。1999年8月16日上午，白春洋等人在村委會門口張貼

「大字報」公佈該村帳目，手持喇叭宣講，遭到村委會幹部的反對，有關帳目被撕壞。白春洋說：「大隊是俺家的，你們能賣地，我們就能賣大隊。」1999年8月22日上午，檣城市委派駐小豐村工作組在小豐村召開全村黨員會議，白春洋、白龍海、李新計、馮群路參加了會議。在會上，白春洋要求發言5分鐘未被准許，馮群路說：「不讓說話，這是開的國民黨會呀。」之後，白春洋、馮群路在村委會院裏對群眾表示，要罷免全體村委會幹部。1999年8月24日，白春洋等人制作罷免票、票箱、安裝高音喇叭，召開罷免全體村委會幹部的村民會議，被檣城市公安局抓捕。1999年9月15日，白春洋等人被正式逮捕。1999年10月13日，河北省檣城市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白春洋有期徒刑三年，判處李新計、李新更、馮群路、白國子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判處白龍海、魏華子、侯豐山有期徒刑二年。

◆1999年11月27日。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黎明鄉巨一村。罷免對象：村主任陳暖康、村副主任鄭加秀等6名村委會幹部。罷免效果：成功。

巨一村共有4000餘人，有選舉權的村民共計2730人。1999年7月，村民向有關部門反映村委會幹部的問題。1999年9月，鹿城區成立工作組進駐巨一村，對村民反映的情況進行調查。村民認為，村委會幹部未能履行他們為村民服務的職責，其所作所為嚴重損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已經失去了村民的信任。1999年10月24日，1293名村民用簽名和按指印的方式聯名作出書面提議，要求村委會召集村民罷免會議，罷免陳暖康、鄭加秀等6人，同時呈報黎明鄉政府。為了使村民會議規範化，並能夠依法行使民主權利，村民們還自覺組織起來，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浙江省的兩個《實施辦法》，虛心向法律界人士請教。然而一個月過去，村委會對村民的要求和行動根本不予理睬，也不召集村民罷免會議，他們指望的鄉政府也沒有給予「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村民們決定自己召集，並定於1999年11月27日召開村民罷免會議。他們自發組織起來，佈置會場、貼標語，掛橫幅，並把即將召開村民罷免會議的情況報告鹿城區、黎明鄉的有關領導和鄉黨委、鄉政府、鄉人大主席團以及村黨支部、村委會。要求罷免村委會幹部的1293位村民還推選了42名代表來主持會議。1999年11月27日，巨一村村民自發的村民罷免會議如期召開，1526位有選舉權的村民到會參加。會議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

會組織法》、《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的有關規定，經過了說明罷免理由、提出申辯意見、投票表決等程序，最後1482票同意罷免陳暖康，1480票同意罷免鄭加秀，而且還罷免了另外4名村委會幹部的職務。但此次村民罷免會議被鄉政府視為無效。2000年3月8日，巨一村召開村民會議，否決了村民代表會議同意陳暖康、鄭家秀辭職的決議。2000年4月12日，巨一村再次召開村民罷免會議，將包括陳暖康、鄭家秀在內的7名村委會幹部中的6名罷免。一個月之後，巨一村選舉出了6名新的村委會幹部。

◆2000年3月8日。江西省臨川市榮山鎮新街村。罷免對象：村副主任吳桂明、村委會幹部黎金山、吳福慶。罷免性質：非法。

1999年11月30日，新街村依法召開選舉大會。選舉產生了村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6名幹部。其中：吳桂明得1000票、黎金山得1092票、吳福慶得833票，均為合法當選，當場頒發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印製的「當選證書」。2000年3月7日，榮山鎮黨委召開會議，認為新街村委會班子存在軟弱渙散、缺乏戰鬥力的問題，作出了對吳桂明、黎金山、吳福慶3名合法當選的幹部停職，分別由另外3名未經選舉的村民代為村委會幹部的決定，並於2000年3月8日在該村村組幹部、村民代表會議上予以宣佈。其後，3名被免職的村委會幹部寫出《關於榮山鎮黨委違法罷免我們職務的報告》，向地、市黨委、政府等有關部門進行投訴。

地、市民政部門及時組成調查組，於2000年4月5日來到榮山鎮新街村進行調查，分別找到鎮黨委書記、鎮長、新街村支部書記和3名被停職的當事人瞭解情況。原來這次鎮黨委撤換新街村委會幹部，主要是根據新任村黨支部書記的意見研究決定的。考慮到該村工作不力的狀況，2000年2月23日，鎮黨委首先免去了村黨支部書記，然後圍繞新的村黨支部對整個村級班子進行調整。榮山鎮黨委撤換3名村委會幹部的理由不充分，程序不合法，造成了違法辦事的事實。調查組及時向地、市黨政領導提交了《關於臨川市榮山鎮撤換新街村委會成員的調查報告》，提出了三點處理意見：1、榮山鎮黨委、政府應在近期召開新街村民代表會議，宣佈2000年3月8日鎮黨委關於撤換該村委會成員的決定無效。2、如確需調整村委會成員，應嚴格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實施辦法》規定的程序和方法進行辭職、罷免和補選。3、對榮山鎮撤換村委會成員的違法事實予以通報批評，責成有關責任人員寫出深刻檢查。

◆2000年5月17日。福建省武夷山市興田鎮南嶺村。

罷免對象：村委主任、村委委員、村經合社主任。罷免效果：成功。

2000年4月下旬，龔建奎等200多名南嶺村村民聯名提出罷免要求。罷免的理由是：自1996年以來，村裏的財務狀況從未公佈，而《村民自治條例》則要求凡涉及村財務的事項至少每6個月公佈一次，接受村民監督。同時，這些村民還認為村委會班子軟弱，對村民不負責任等等。鑑於提出罷免要求的村民已遠遠超過「本村五分之一有選舉權的村民」，有關部門及村委會同意召開村民罷免會議，進行投票表決。2000年5月17日，南嶺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村民龔建奎代表200多名村民再次提出了罷免理由。3名被提出罷免的村委會幹部也依法提出了申辯意見。最後正式進行投票表決。全村共有選民476人，參加投票的有465人，表決結果：贊成罷免的有268人，反對罷免的有171人，贊成票佔全村有選舉權的村民一半以上，罷免要求獲得通過。

◆2000年8月9日。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青白石鄉楊家灣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楊海元。罷免效果：成功。

2000年8月9日，楊家灣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大會開始，村民代表楊同軍宣讀了由563人聯名提出的《罷免楊海元村委主任職務的理由》，其中包括楊海元從1999年當選村委主任以後，曾經向村民許諾過的家家通自來水、水利設施改造、修柏油路等三件實事一件也沒有兌現；一年多來，農村土地第二輪承包、計劃生育、稅收徵繳等工作迄今沒有進行；1999年正值冬灌時期，楊海元要求供電局停電，錯過了冬灌時機，造成100多畝農田沒有得到灌溉等罷免理由。楊同軍宣讀完罷免理由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委主任楊海元有權提出申訴，但是楊海元並沒有露面。村民們開始領取罷免表決票並填寫。有1729人的楊家灣村有合法選舉權的村民978人，當天發放罷免表決票955張，收回955張，其中同意罷免楊海元村委主任職務的表決票有815張，不同意罷免的有110張，棄權票和廢票有30張。當村民選舉的總監票人楊同珊宣佈罷免結果時，村民們熱烈鼓掌。

◆2000年8月15日。山東省桓台縣索鎮永和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罷免效果：成功。

2000年8月15日，永和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依法罷免了因參與宗派之爭、與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鬧不團結、擅自轉賣集體土地的村委主任。這是桓台縣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行村民自治進程中的一個重

要案例。

◆2000年8月23日。海南省瓊海市大種鎮雲滿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吳毓洲。罷免效果：失敗。

2000年8月23日9時，雲滿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村委副主任吳大法代表選民提出吳毓洲濫用職權，經常以個人代政府發號施令等8條罷免理由。吳毓洲提出他用了一年時間搞村財務公開，清理10年來的村財務帳目，清理源滿小學建校費帳目等7條申辯意見。經過近兩個小時的雙方答辯，上午11時，在市民政局、大種鎮委、鎮政府和村選民代表的共同監督下，村民領取選票，進行投票。雲滿村選民共有725人，共發出選票651張，收回選票611張，其中廢票7張，棄權票21張，有效選票583張，同意罷免的選票有325張，不同意罷免的選票有258張。因為同意罷免票數未超過選民數的半數，所以，投票結果：不同意罷免吳毓洲村委主任職務。

◆2000年9月29日。江蘇省灌南縣六塘鄉二圩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潘永祥。罷免效果：成功。

2000年，接連發生的一些事讓二圩村村民們越來越難以忍受：1、春天抗旱，鄰村早已機聲隆隆，二圩村村民眼巴巴地盼水，可村裏的三座電灌站始終沒有動靜。鄉里對此也很著急，鄉黨委書記專門跑了四次，最後總算見到一座電灌站在抽水，可抽了沒多久，機器就出了故障。潘永祥對此負有責任。2、調整農業結構是發展農村經濟的重頭戲，潘永祥身為村委主任，本應積極支持和引導村民投身這項工作，而他卻多次阻撓和反對村民調整農業結構。3、縣交通局到二圩村扶貧，帶來花卉種植和龍蝦養殖兩個項目。潘永祥見有利可圖，便一下子攬了過去，稱這兩個項目由他個人負責，用工自行安排，盈虧與集體無關。後來經營不善，他竟將2300餘元花卉項目的費用在村集體賬目上列支。4、協助鄉政府搞好夏糧收購，是村委會的一項重要職責，潘永祥不僅不配合、不支持，還帶頭不交，多次在村民中散佈：每公斤0.90元低於省定保護價（綜合了品質、水分、容重等因素，故略低於省定保護價），交了明擺著吃虧。可是，村裏好不容易籌集了一部分糧食，他卻在2000年8月下旬以每公斤0.78元的低價擅自賣給糧販4000餘公斤。

事情遠不止這四件，像甯連路積土用工、涵洞水泥筒被盜、六塘河堤植樹等，潘永祥都未盡到村委主任的責任，損害了集體或村民利益。有些村民會好言相勸，他根本不把村民的意見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2000年9月下旬，他為

發泄不滿，竟一意孤行，強行搶走了村裏的賬本。於是，2000年9月26日，二圩村部分村民提議罷免潘永祥的村委主任職務。當天下午，全村1417名選民中有660人在聯名書上鄭重簽上了自己的姓名。2000年9月29日，在村委會主持下，全體選民對罷免潘永祥村委主任職務案進行了投票表決。結果，在收回的1218張有效票中，贊成罷免的有880張，超過了全體選民的半數，罷免合法有效。主持人當場宣佈，免去潘永祥村委主任職務。

◆2000年10月10日。上海市青浦工業園區（農委）勝利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村委副主任。罷免效果：成功。

2000年10月10日，勝利村召開村民罷免會議。1132名選民中有982名參加投票。整個罷免活動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投票統計結果：村委主任、副主任得的罷免票分別達到了法定票數，被依法罷免。

◆2000年10月22日。河南省新鄭市和莊鎮小崗王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王某。罷免效果：成功。

1999年，王某上任伊始就把一直由村文書掌管的村委會公章要過來自己掌管。不久，本已混亂的宅基地審批雪上加霜，又多了3處違章審批的宅基地。他上任前承諾要辦的事，都是全村的「焦點」、「熱點」，一年多過去了，無一得以解決。鎮政府為解決群眾醫療問題，大力推行農村合作醫療，但王某卻視村民疾苦於不顧，只擔心自己的診所生意受影響，百般阻撓，致使小崗王村沒有一個村民加入合作醫療。王某的兒子異地入伍，按政策不享受優待金，但他卻以欺騙的手段，從鎮政府騙取了1200元優待金。等等。王某的所作所為，使廣大村民感到被欺騙和愚弄，他們聯名上書鎮政府，強烈要求罷免王某。2000年10月22日，在鎮政府的主持下，小崗王村村民進行了投票表決，1055名正式選民中有960人投了票，其中同意罷免的有695票，不同意罷免的有237票，棄權的有28票，一舉罷免了王某村委主任的職務。

◆2000年10月27日。海南省海口市新華區濱海街道玉沙村。罷免對象：村委主任符某。罷免效果：成功。

玉沙村共有565戶，共計1600餘人。2000年，222名村民聯名以非法出讓集體搬遷留用地以及在購買土地興建公墓項目中嚴重損害集體經濟利益等理由，要求罷免村委主任符某。在這222名村民中，有選民資格的187名，佔該村有選

舉權村民的24.7%，符合提請罷免法定人數。新華區委、區政府、民政局對此高度重視。2000年10月27日，玉沙村召開了村民罷免會議。經過罷免申請方代表和當事人的答辯後，在公正、公開的原則下，全村有選民資格的737人中有686人（含委託113人）參加了投票，495人同意罷免，171人投反對票，20人投無效、棄權票，表決罷免有效，會議當場罷免了符某。

◆2000年11月10日。四川省雙流縣萬安鄉高飯店村。罷免對象：村會計兼現金出納員漆貴發。罷免效果：未知。

2000年11月10日上午，高飯店村160多名村民手拿早已簽好姓名、押好手印的聯名狀來到政府，要求罷免戚貴發。罷免的理由是：1999年12月23日，漆貴發和9組村民代表一起到成都西門車站附近花2200元買來一台抽水機和一台電動機。不久，電動機突然被盜，房門鎖完好無損，而門鑰匙只有漆貴發才有。2000年3月14日，漆貴發未與大家商量，就擅自花1200元買回一台既無產品合格證又無正式發票的電動機。2000年3月25日，在安裝時有村民稱漆貴發買回的電動機正是原來被盜的電動機，經部分村民證實，該電動機外殼、進線板和扇葉上的痕跡就是他們在原來安裝時所留下的。為此，他們才要求罷免漆貴發。

◆2000年12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寬城縣棹羅台鄉楸木峪村。罷免對象：村委代理主任朱鳳海。罷免效果：失敗。

2000年11月16日，326人聯名並逐一按上紅手印的聯名告狀材料擺在了鄉政府的辦公桌上。材料中例舉了三大問題：1、朱鳳海虛報人口，多得國家糧食6萬多公斤（合人民幣3萬多元）。2、2000年大旱後，水庫的受益地區天津市送來的救災糧，朱鳳海多吃多佔了50公斤面、2.5公斤色拉油。3、按規定，2000年5月1日以前出生的孩子只要有正式戶口，都可以享受每年182.5公斤的救濟糧，孫鳳海的孫女出生於2000年4月17日，已享受到此待遇，但是同村2000年5月1日前出生的孩子卻沒能申報上戶口，懷疑此中有營私舞弊現象。鄉政府隨即召開了黨委會，責令兩個調查小組深入該村。調查結果：前兩條屬實，後一條否定。並逐戶查證實際按手印要求罷免朱鳳海的人數為244名，已過全體選民729人的1/5。從穩定的角度考慮，鄉政府有關部門曾多次試圖說服群眾不要走罷免程序，然而，情緒激動的部分村民堅持不允許「私了」。

那麼，按照河北省選舉辦法的有關罷免程序，棹羅台鄉

黨委、政府就決定於 2000 年 12 月 22 日召開村民罷免會議，並預計在這個程序之後，在原來的村委會委員中正式選舉產生村主任。200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多，經點查，26 個村民生產小組到會人數共計 386 人，減去 21 名在外打工兩年以上的選民，到會者超過了全體選民的半數。之後，會議上要求罷免一方的代表首先闡述了罷免理由，接著鄉政府向選民們公佈調查組的調查結果。之後是激烈的辯論。投票時間延長到了 2003 年 12 月 23 日，在工作人員的力主之下，當天近黃昏的時候，唱票員終於當眾唱完了最後一票。其投票結果是：在參加投票的 386 名選民中，不同意罷免朱鳳海的有 102 票，同意罷免朱鳳海的有 284 票。按照罷免程序要求，只有要求罷免的人數達到全體選民的一半，即 354 票才能形成罷免決定。故罷免失敗。（待續）

## 大陸社會真相

### 本刊讀者調查報告之一

先生：

收到你的來信我很高興。

這段時間我曾去湖北農村和武漢市的普通家庭作調查和瞭解，瞭解他們現在的生活和思想。先到的武漢市新洲縣，具體的情況是那裏的農村多被黑社會或者黑社會背景的人把持，村鄉幹部大發國家撥款救濟建設和亂收費的財。但現在有地農民可以吃飽了。

1，例如修條路，國家投入 100 萬人民幣，但用在建設上的最多二十萬，其他的被村鄉幹部私吞，所修的道路也很快就壞掉。還有中共為村裏修的乾淨的自來水系統，但因為資金被貪污，所修建出來的設備根本不能使用。

2，圈地問題。

村鄉可以不通過農民，或者來個走過場的形式，把農民的 land 賣掉，有的給外國人，有的就圈國家和商人的資金。應該說農民是有補償的，但我所瞭解的新洲有個鄉就沒有，我很奇怪為什麼？原來村鄉縣的乾杯大吃大喝和貪污後，農村已經破產了，每個人都要欠國家的許多錢，現在賣了土地，這部分錢正好還給國家。農民一分錢沒有。只有在武漢和城市裏流浪，做苦力，還是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有時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3，農村的民主選舉問題。

我問農民，那村鄉幹部不是你們選舉出來的嗎？他們苦澀的對我笑，最後我知道了真實的情況。原來農村的選舉是非常虛假的，是根本違背民意的。如，一個村有 200 人可以有選舉的投票權，但許多人因為生活而在外打工，所以實際的人數就沒有這麼多，甚至只有一半或者還要少，但分配下來的選票還是 200 張。而多餘的選配被幹部把持，農民再怎麼不願意也是不可能鬥過村鄉幹部的。

另外有個村，農民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出了自己的村幹部。應該說這個幹部是合法的，但因為他們不是圈內的人，其他的幹部就排擠他，沒有過多久，他就會被掛職棄用。

我問農民，什麼樣的人才能當村鄉幹部呢？農民兄弟回答：『紅黑兩道都要通，要站的住腳的，有工作能力的[主要是指收費]的人，可以做個很好的村鄉幹部』。

城市的問題

現在的下崗和失業的人幾乎都是 50--70 年出生的人，沒有多少的文化，但卻應該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但現在這個來源沒有了，許多的家庭連一日三餐都有問題，子女讀書是問題，醫療是問題。我哥隔壁的一個鄰居，因為沒有錢醫療小病，拖成大病，並在前兩天去世。

我瞭解了一下他的家庭，他們家兄妹四個，父母都健在。但他們兄妹和其配偶都失業，既無錢孝敬父母，也無錢撫養子女，更不能談醫療了。而居我的瞭解，現在這種情況在武漢市是很普遍的。以至有人挺而走險，去販賣槍枝和毒品或者其他的犯罪行爲。而大家居然對這種犯罪不再以道德的譴責，習慣了這一切。

我實在不知道中共的經濟騰飛是在哪裡，按共產黨說的那麼好，應該人民安居樂業才是，但事實卻是正好相反。當然在大陸被中共劫持的今天，什麼話都是中共在說和能說的今天，他說什麼都可以，不要說經濟很好，就是強過了美國，也不敢有人提出異議。

寫了這麼多，可能又讓您心情沈痛了，又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憂慮了。實在抱歉，這不是我的原意，只想您能在美國多為我們的大陸同胞呼籲，多讓世界瞭解共產黨的邪惡和反動，讓我們大陸同胞過上安居樂業和自由民主法制均富的生活吧。我先謝謝您，也拜托您。

祝您新年好！

貴刊讀者

2004 年元旦於中國大陸

# 聯邦地方分離主義 Versus 中國民族統一主義

## ——兼論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

旅美退休教授 孟德聲

**編者按語：**孟德聲教授的這篇文章值得認真一讀。它對於如何理解「國制政體」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政治意義，如何理解大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國統一的歷史由來，對當今大陸、台灣和海外關心中國前途的華人，對國際國內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國際干涉勢力，特別是對台灣極端政治分裂勢力，和一些來自大陸、聲稱要搞民主就應該贊成「分裂中國以成就台獨」的人士們，實在學術上具有相當的批評和說服力量。

### 一、前言

著名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於今年初出版《中華聯邦》（註一），大膽預測中國大陸多元區域經濟之蓬勃發展，必將席捲全亞洲，台灣為本身之生存及避免邊緣化，將會和大陸聯合而成為一個「中華聯邦」形式的政治／經濟實體，而時間上，他認為：「比較樂觀的推定是在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前後，所以把目標時間設在二〇〇八年前的某個中間點，應是比較有可能實現的。因此我預測，此一目標時間會是二〇〇五年。」（註二）

大前研一是由經濟發展的觀點作如上推測。他預料中國大陸將會出現一些大小「區域」（Region），小區域人口大約是五至七百萬，其經濟成長率達到15%—20%，遠超過馬來西亞、泰國、韓國、台灣等地區。大陸的這些小型區域包括深圳、上海、大連、天津、瀋陽、廈門、青島、蘇州等城市。這些小區域實際上是「大區域」（Mega-region）之核心，人口約是一億人。中國這樣的大區域可能有五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地區、北京／天津走廊和山東

。假如它們都是「國家」的話，足夠有資格名列於亞洲十大經濟國之中。如果把台灣和香港也包括進去，則在亞洲十大經濟實體中中國就佔有七個之多（註三）。

無獨有偶的是，十多年來，有若干新西化派、民運人士以民主和平、人權自由之名義，實際是基於地方主義和少數民族分離主義，而主張中國應採行所謂「有邦聯特徵的聯邦制」。他們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在舊金山開會討論，並擬定「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憲草〉）。主張把中國領土劃分為四大類：名為「自治邦」者有內蒙古、台灣、西藏、新疆、寧夏和廣西；名為「自治省」者為中國大陸原有的二十二省；名為「自治市」者有上海、天津和北京；名為「特別區」者有香港和澳門。依此〈憲草〉，民運人士所主張的邦聯／聯邦制具有下列分離主義的特色：（註四）

一、〈憲草〉規定：「台灣自治邦有權發行本邦護照、旅行證件和簽證，設立本邦終審法庭，管理本邦航天、航空、海運、郵政、電信」；「財政獨立，免徵聯邦稅」；「有權維持武裝部隊，並有權拒絕聯邦駐軍」。——這是將「中華民國」改為「台灣自治邦」，放棄統一目標，而將兩岸因國共內戰之暫時分離予以固定化和永久化。

二、「西藏自治邦為國家自然保護區，禁止在其域內進行核子、化學和生物武器的試驗及核廢料的儲存」。——這等於說，西藏不是「中華聯邦」或中國之領土。〈憲草〉規定西藏自治邦「財政獨立，免徵聯邦稅」；「有權設立本邦終審法庭」；「西藏自治邦之地位，在本憲法實施二十五年之後，由其域內公

民以投票公決檢討之」，不受憲法所賦與聯邦政府權力之限制。——這是西藏獨立分裂主義的主張，只是將獨立時間延後，以公民投票決定而已。

三、各「自治邦有權以『中國某自治邦』名義與外國締結非軍事性協定，有權自行決定參加各種國際組織，設立駐外代表機構。」——這是說明各「自治邦」有如邦聯制中的主權國，具有外交自主權。

四、〈憲草〉並規定：「自治邦與特別區得依據各邦或各區情況，管理本邦或本區之入出境。——這是說明「中華聯邦」或中國之公民在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各「自治邦」不擁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權利。換言之，各「自治邦」乃獨立王國也，有權剝奪二十二「自治省」十億以上中國人進出及居住各「自治邦」之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

不久前，有若干海外民運人士在美國加州成立「中國聯邦臨時政府籌備委員會」，並發表公告，謂該「臨時政府」之基本宗旨在「推翻中共，創立共和」云。該籌委會負責人表示，「臨時政府」版圖不包括台灣，未來將先與台灣建立邦聯，以後再考慮建立聯邦與否的問題。（註五）

如上所述，則新世紀初期中國民族所面臨的領土主權之挑戰是台獨、藏獨、疆獨和蒙獨等分離主義，假聯邦主義之名進行分裂中國之實。聯邦主義或聯邦制（Federalism／federation）是否適合中國？能否戰勝中國民族統一主義？大前研一是否過分看重經濟因素而使其預測落空？西化派、民運人士所主張的聯邦／邦聯制是否違反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如此在實際上的分裂中國是否符合現代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的基本願望？

## 二、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之確立鞏固與堅韌持久

中國古代有甚多部落、族群小國，如《左傳》哀公七年所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明末清初學者顧祖禹寫道：「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武王觀兵，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尚存千二百國；獲麟之末，凡百有餘國；而會盟徵伐可紀者約十四君。」（《讀史方輿紀要》）

自古迄今，人類之生存空間與生活資源均屬有限，同時人類欲望無窮，而且常以自我為中心，自私

自利，因此衝突難免，鬥爭激烈，生存不易，生活維艱，「人生而自由，但處處又在縲絏之中」（盧梭語）。人與人爭，與自然爭，為生存自由而爭，但單打獨鬥，無濟於事，故必須群居，由氏族、部落而民族，及民族聯合。

形成及鞏固一民族之基本要素為血統、語言、風習、思想信仰、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等。周初封建宗法社會，由氏族、部落自然演進而成；但聯邦及邦聯式的封建制度難以長久維持，春秋戰國亦是必然發展，過渡到統一的大帝國。促成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民族統一運動之因素甚多，例如個人權力野心（人性）、學術思想之發達、技術與實業之進步（即鐵器之發明與應用）、都市與商業之興起等等，而最根本的自是華夏民族生存之需要。此即長城線以南諸華夏族群、民族非統一團結不足以對抗天災（旱澇災難及其救濟）與人禍（異族侵擾壓迫、諸侯之爭權奪利）。

二十世紀著名英國漢學家、科學史學者李約瑟博士與已故美籍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博士曾合寫一論文〈中國社會之性質：一個技術的解釋〉，其要義如下：中國在二千多年前即因防洪、救災，及防禦北方遊牧民族之侵犯，構成統一局面，以文官治國，實行中央集權，發展燦爛光輝的文化。（註六）

此種理論是根據地理、地質與天象學。黃河經常氾濫成災，大規模防洪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全國統籌規劃進行，非局部地方權力所能為力。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勒石頌功，自稱「決通川防」，更稱秦為「水德之始」（《史記》）。故為回應自然環境之挑戰，中國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即必須統一。（同註六）

何故中國經常有水旱災？因中國之季候風係「氣旋風」，即夏季由菲律賓海吹向中國之水蒸氣，全靠由西北吹來之旋風（cyclone）將之升高，濕氣遇冷成雨。於是農作物所需雨量，全待兩種未知數之相遇而定。如果兩種氣流一再在某處上空相遇，該處必有水災；反之若是兩者經常錯過，則成旱災。根據二千多年以來的記載，中國幾乎年年有水災或旱災，有時水旱並至。只有大國大政府，掌有各種資源始能從事防洪救災。梁惠王見孟子，即自稱「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此為構成秦漢大帝國之地理、氣候因素。（同上）

由於天候氣象關係，在東亞大陸有「十五吋等雨線」（15-inch isohyetline）所造成的地理資源差別，因而導致族群、民族之生存競爭，亦必然迫使中華統一帝國之產生。英文 isohyet 一字來自希臘文 isos（equal 平等）與 huetos（hyet, rain 雨）之合併，即意指「等雨量」（equal rain）。因此在中國地圖上可以劃出一條十五吋等雨線，在中國北方與萬裏長城大致符合，在西部則經甘肅青海到西藏邊境。凡此線以南以東，平均每年至少有十五吋之雨量，可資農耕；此線以北以西，則低於此最少雨量，少數民族只能以遊牧為生。故此等雨線亦胡漢之分劃，亦邊疆民族與中原民族幾千年來長期交兵之處，尤以氣候乾旱與人口過剩時為然。邊疆民族有無需動員之便利，牧人即騎兵。中原民族則須徵集兵員，改變生活秩序，普遍抽稅籌餉。這亦使統一的帝國不可避免。等雨線象徵生命線，與等雨線相符合的長城線，亦即國防線。總之，因地理、氣候所引起的防災、救災和抵抗游牧民族之侵擾，青銅時代剛一結束，秦漢大帝國即告形成。（同上）

以上科學史學者對中國社會之性質，即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作地理的、氣候的與民族人文的分析，也就是歷史哲學家對中國社會、歷史之「外部構造」之分析：包括一、自然環境，二、鄰國（族）狀況尤其是技術之對比，三、由此而形成的戰爭、和平關係，即國（族）際關係。（註七）總之，無論是科學史家對中國社會歷史作「技術性」分析，或歷史哲學家之「構造的」分析，其結論均是中國民族在古代歷史發展中走向大統一是不不可避免的，亦即中國民族大一統歷史傳統之形成與確立是自然的、必然的趨勢與命運。二千餘年來，華夏民族，從分到合，分而復合，為生存，為自由，團結統一，別無選擇。這也顯示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之所以鞏固而持久。

歷史學者夏曾佑對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之論述值得引錄於下：「自秦以前，神州之境，分為無數小國，其由來不可得知。歷千百萬年而併為七國；其後六國又為秦所滅，中原遂定於一。秦又北逐匈奴，南開桂林象郡，規模稍擴矣。天佑神州，是生漢武，北破匈奴，西併西域，以及西羌，西南開筇樊，南擴日南交趾，東南滅甌粵，東北平濊貊，五十年間，威加率土，於是漢族遂獨立於地球之上，而巍然稱天國。

非此兩皇，中國非今日之中國也。故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此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自秦以來，垂二千年，雖百王代興，時有改革，然觀其大義，不甚懸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漢二君營其室，後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求適一時之用耳。不能動其深根寧極之理也。」（註八）

### 三、均權主義單一制與聯邦制

由於自秦漢以來大一統歷史傳統之確立與堅韌，我國各朝代之政府體制一直是單一制（unitary system），地方政府（包括某些時期的局部封建王國）之存廢及其權力由中央決定。先秦時期之封建制，天子分封諸侯，禮樂徵伐出自天子，亦可說是一種單一制。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天子失勢，無體制秩序可言，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東周時代之周王朝體制類似現代邦聯，諸侯會盟略近於現代國際會議或聯盟。列國紛爭，終定於一統。三國魏晉南北朝，統一運動不曾間斷，乃有隋唐之統一。唐之藩鎮，過於傾向地方分權，尾大不掉，內輕外重，分裂割據，由五代十國而過渡到宋之統一。宋代矯枉過正，強幹弱枝，內重外輕，無力抵抗外敵。明清專制惡化，亟需由統一的專制帝國進入統一的民主大國，要民主，也要統一。民主人權與國族統一，如鳥之兩翼，相輔而行，缺一不可。歷史教訓，班班可考。

一國之政府體制，依憲法規定，政府權力概括或列舉分屬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並非由中央產生，而中央政府往往由地方聯合組成，即聯邦制。地方政府及其權力由中央產生或變更，即單一制。在聯邦國家，中央與地方權力衝突時，通常由釋憲機構解決。聯邦制多側重地方之權力與民主（地方分權），但是，俾士麥時代德國採聯邦制，而行中央集權；前蘇聯採聯邦制而行極權主義；而美國聯邦亦傾向聯邦權力之擴大。單一制多側重全國性之權力與民主（中央集權），但法國是單一制，被認為是民主國。是故，聯邦制與地方民主或單一制與中央專制，二者無必然關係。

墨子有言：「瓜甜蒂苦，世無完美之物。」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聯邦制由地方分權民主可能走向分

裂獨立，單一制由中央集權可能走向專制。我國自秦漢以來為國族生存之需要採行單一制，有時地方權重，有時中央權多。晚近受西潮沖激，又有聯邦制與單一制之爭。中山先生是政治家與思想家，對我國政府體制之設計自有其卓見，此即均權主義的單一制或單一式的均權制之構想。簡稱均權主義或均權制。其發展概況如下。

民國元年，孫先生曾幾次主張單一制。他在八月十三日發表〈國民黨組織宣言〉稱：「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中之制，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同月二十五日，他復斷然言之：「吾國今日之當採單一國制，已無研究之餘地。」（註九）十月十日又言：「現信中國仍為整個單一制國家，且將永遠如是。」因為：「中國自廣州北至滿州，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為同一國家，同一民族。此種事實直至中國學生留學外國之時，始有完全之認識。故首知中國為偉大之單一國家者，乃留學外國之學生。現在余遊歷北部之觀察，更給余以鐵證，確知此種見解之正確無訛。」（註十）

民國成立以來，每次制憲均有「省制問題」之爭論。民國九年以後，又有「省憲運動」，其理由是「聯省自治」。民十一年，孫先生發表〈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為研究他對政府體制主張之最重要文字。他批評中央集權、地方分權與聯省自治等說法，「不過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常談而已。」他寫道：「議者曰：『國小民寡或可用中央集權，地大民眾非用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不可。』曾不知土地之大小，不單當以幅員為差別，尤當以交通為差別。果其交通發達，土地雖廣，猶比鄰也。中國若守老死不相往來之訓，雖百里不可以為治。若利用科學以事交通，則風行四海之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集權分權又何與焉？」（註一一）

他繼續寫道：「議者又曰：『中央集權易流於專制，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始適於共和國。』此又不可以不辯。夫專制雲者，為立憲對待之名詞。苟其立憲，雖中央集權何害？例如法國固行中央集權者，為民主立憲國自若也。北美之合眾國，議者樂引為聯省自治之口實，以為非如是不得為共和，而不知所引之例實際適當其反。美之初元，固行地方分權矣，然南北分馳，政令不一，深貽國民以痛苦。及南北戰爭

起，雖以解放黑奴為號召，而實行統一乃其結果也。」（同上）

對於中國不宜採行聯邦制以及聯邦制與美國之富強，孫先生曾作進一步說明：「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而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造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分開來。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為暫時的現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民權主義》第四講）

孫先生並積極提出其均權制：「權之分配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為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為對象。」「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紛歧，此權之宜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同註一一）均權制度之名稱及內容至民十三年他予以最後確定，如《建國大綱》第十七條之規定：「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由國民黨、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以及社會賢達等於一九四六年所制定之《中華民國憲法》即係採取均權制，並將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事項均予一一列舉，至於未列舉之剩餘權，仍依事務之性質，以認定其歸屬。遇有權限爭議時，由「大法官會議」解釋之。

回首二十世紀初期，軍閥割據，國家分裂，大軍閥約武力統一中國，小軍閥則要武裝維持割據，其時，乃有「聯省自治」即聯邦制之提出，除陳炯明等軍閥積極鼓吹外，西化派人物胡適也曾說：「中國太大了，不適用於單一制的政治組織」，因而也贊成「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註一二）

國民黨自始即倡導均權式的單一制，並主張以武力掃蕩軍閥，統一全國，因而有北伐之役。但它於二戰後未能抱持民族主義，團結全民，從事和平建國，在內戰中失去政權。其後，國民黨在內戰中自大陸敗退至台灣，兩蔣時代結束，分裂主義抬頭，統獨問題日益嚴重，國民黨失去政權，人窮志短，在二〇〇一年召開第十六次全體黨代表大會前夕，連戰主席擬放

棄國民黨所繼承之大一統歷史傳統（均權主義的單一制），而將「邦聯制」寫入黨綱，作為兩岸統一之模式，但未獲黨員民調多數同意，此議遂寢。至於國民黨大老陶百川及少壯周陽山等人所倡議的「台灣優先」與「中華國協」，其主張較邦聯制尤不符合中國歷史傳統之發展，離題太遠，應者寥寥。

至於中共，原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俄化（馬列）主義的政黨，忽視中國民族主義之迫切要求，反而相信列寧的民族自決論，並模仿蘇維埃聯邦體制。因此，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通過黨綱，主張「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的關係由各該地民族自決。」（註一三）中共於一九三一年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註一四）這是中共第一次以根本法形式承認國內少數民族之自決權。自是以後，中共一再申明此一主張。但至一九四七年五月內蒙古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後，中共即放棄此一少數民族自決之主張。

關於聯邦制，中共自一九二二年「二大」至抗日戰爭結束，曾多次提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或「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主張（編按：為什麼所謂海外民運與中共如此相像？）。二大〈宣言〉主張：「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註一五）此後中共曾再三申明建立聯邦共和國的主張。一九四五年《黨章》仍明確規定，中共「目前階段的任務是」「為建立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但至一九四九年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之《共同綱領》則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以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和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編按：它已經掌權了，並且是創建了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不需要、也沒有可能再以鼓吹聯邦制或邦聯制來分裂由它統治的國家了！至於民族自治，則純屬假話一句）

#### 四、地方 / 民族分離主義與聯邦主義

一、台獨分離主義：民進黨自建黨開始，在本質上即是一主張台灣獨立、地方分離主義的政治組織，並具有法西斯氣質。因此，傾向自由主義、並有民族愛國天良的重量級人物如費希平、朱高正、許信良、施明德、陳文茜等，均先後脫黨。該黨「台獨黨綱」聲稱「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該黨主席陳水扁於去年八月三日提出「一邊一國」論，聲言「只有 2300 萬偉大的台灣人民，才有權利對台灣的前途、台灣的命運和現狀來做決定」，並呼籲「認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前研一所著《中華聯邦》出版後第三天（本年一月十八日），陳即主動聲明：「中華聯邦」比「一國兩制」更糟糕，不可能為台灣人所接受。二〇〇五年的台灣還是台灣；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2300 萬台灣人民才是台灣這個偉大國家的主人，台灣前途只有台灣 2300 萬台灣人民有權作選擇及決定；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不是人家的一部分、人家的地方行省，更不是人家的特別行政區。台獨「教父」彭明敏曾向國際新聞界宣稱，即使大陸實行民主，台灣仍要獨立。葉菊蘭說，台灣與中國分離獨立，不需要聯邦或邦聯。

民進黨執政後，用盡心機「去中國化」，進行台獨，倒行逆施，經濟衰退，社會沈淪，人民痛苦指數日增；但在立法院改選中，它卻有所斬獲，這說明台灣分離主義是一種訴諸鄉土情感的族群主義，台獨人士並虛構「台灣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民進黨以民主為名，實為台獨黨，其目的在建立台灣國，不會滿意於聯邦制；他們甚至走向殖民地化（例如要廢除中國語文、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成為美日反華基地，挑戰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

二、藏獨分離主義：西藏問題之本質是民族和國際問題，以前是漢藏兩族之間的衝突與和解，晚近則是中英藏、中印藏、以及中美藏各民族之間的利益爭奪。而西藏問題之最大癥結在於藏人之「大西藏」觀念及其藏獨主張。藏人之所謂「大西藏」包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西部、雲南省西北部和甘肅省南部，即「所有的藏人居住區」，西藏「流亡政府」公佈此區為二五〇萬平方公里，比西藏自治區大一

倍。達賴近年雖言不尋求完全獨立，但自他所提出的「和平計畫」及其中「大西藏」定義，實際是荒謬的藏獨主張：（一）「把整個西藏（按即大西藏）轉化成為一個和平地區」。所謂「和平地區」即中國自此區撤除軍隊和軍事設施。（二）「中國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此在否定「大西藏」是中國領土，中國人不能移居該區。（三）「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武及貯存核廢料」。此亦是否定西藏是中國領土。（四）「對西藏未來地位進行會談」。此是「西藏地位未定論」。

回顧歷史，清末民初英帝國主義自殖民地印度侵略西藏。印度獨立後，自被殖民者變為擴張主義者，繼承英帝侵略西藏，因而有一九六二年中印之戰。印度戰敗後，數十年來，大力支持藏獨，並整軍經武，準備和中國再戰。同時，英國退出印度後，美國接手英國繼續支持藏獨。總之，西藏問題是一個族際和國際問題。

三、疆獨分離主義：唐代西突厥族遭漢族掃蕩後，部分西移為今土耳其人，部分殘留新疆，即今維吾爾族。疆獨主要成員為維族，是故他們自稱「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東土」）。新疆古稱西域，自古即為諸民族爭奪之戰略交通要地。漢唐時代，漢族與匈奴、突厥等爭控天山南北，晚近俄、英帝國均曾染指。一九三三年，英帝曾在南疆利用維族野心分子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但不久即被馬仲英部破滅。一九四四年，俄帝在伊寧製造另一「東土」傀儡組織，亦曇花一現而已。南北疆「東土」殘餘分子流亡國外，繼續其分離主義活動。

四、蒙獨分離主義：南宋亡於蒙古，漢族因人口眾多與文化優勢而能復國。惟大部分蒙古人仍回塞外，分韃靼、瓦剌兩部，與明朝始終相對峙。滿人採聯蒙制漢政策，滿蒙一家。民國成立，五族共和，蒙人自是中華民族成員，蒙古亦自是中國之一部分。惟帝俄及蘇帝相繼從事蒙古分離運動。一九四五年，國府屈服於蘇、美壓力，並以換取蘇聯不支持中共，而允許外蒙古公投獨立。中共上台後，立即承認外蒙為主權國，國府後悔不承認外蒙之獨立，但於事無補。一九六一年，外蒙進入聯合國。國共兩黨「聯手」斷送外蒙古，而內蒙古亦發生獨立分離或與外蒙統一運動。

## 五、結論

自以上各節觀之，可以明瞭諸歷史學者之論旨：「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鬥爭史」（郭廷以），「中國史者，即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相融合為一個中華民族之歷史也」（繆鳳林），「世界歷史大體上是民族鬥爭史。過去是遊牧民族、農耕民族、海洋民族相互鬥爭的歷史。至於近世，工業起來，農業國無例外的為工業國所徵服」（胡秋原）。

鄭成功於一六六一年驅逐荷人，第一次光復台灣。一八八六年，台灣成為中國一省。中國血戰八年，戰勝日寇，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光復台灣。因為台灣是中國之東南門戶，亦西太平洋國際戰略要地。

西藏即唐代吐蕃，吐蕃興起後，即於西元六三八年舉兵二十萬攻唐。唐派兵五萬擊退之。中共建政後，英帝訓練藏軍十餘萬對抗新中央政府，中共派軍四萬於一九五〇年擊潰藏軍，進駐拉薩，以保衛此中國西南後院。加晚清英侵略西藏，清政府派兵保護，民國有蒙藏委員會，關係甚洽。

自漢代斷匈奴右臂，經營西域以來，新疆一直是中國西北之國防要地。清末左宗棠率軍入新，先平回亂，繼驅俄軍，並呈請朝廷建省，謂「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

台灣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法統之爭，是中國內政問題。台獨運動是叛國行為，國民黨不能制止叛亂，並被台獨擊敗；但台獨取得政權後，不敢取消國號，不敢冒民族之大不韙，只以中華民國之名，行台獨之實。西方支持台獨是干涉中國內政。

至於藏獨、疆獨和蒙獨，乃歷史老問題，即漢藏、漢回、漢蒙之間的民族衝突與融合問題，由來已久。大前研一雖是經營大師，經濟學者，但）歷史是民族鬥爭史，大前研一當然更難明白僅憑經濟不能解決兩岸問題，更不能解決民族問題。至於老、新西化派，崇洋媚外，美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美國採行聯邦制，中國當然要向其學習。他們不知道聯邦制政治設計亦不能解決民族問題。西化派反傳統（包括大一統傳統），鄙視中國文化，抱持民族歷史虛無主義，又不懂政治科學和歷史哲學，不知聯邦制乃是使中國走上四分五裂之第一步；即或知之，由於他們反民族

(統一)主義，亦不惜中國四分五裂，所以熱衷聯邦制，乃至邦聯制。

聯邦制或聯邦主義乃是一種地方的、民族的分離主義，至少是分離主義之初級階段，不僅不能解決兩岸和邊疆問題，而且治絲益棼，將使中國陷於混亂狀態，是開歷史倒車，回到春秋戰國時代，不是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向前發展之道，不合於中國民族之需要。大前研一之預測勢必落空，西化派民運人士之聯邦／邦聯構想更是反傳統的幻想。(註釋見第 48 頁)



### 美國著名僑領 趙增義

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描述劉備三顧茅廬稱諸葛亮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這裡所說的天下，所指即為中國。魏蜀吳三國各有國號，而三國的集合體就是天下、就是中國。蓋古時認為中國四境環海，天下，外及四海，所以中國稱為海內。顧亭林先生有句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人把它改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其實，如閱讀原文，在亭林先生的認知中，天下與國家顯然有別，原文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

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明白地指出國家系朝廷王室的政治組織，而天下則為超國家的文化社會。歷代王朝祇是歷史一治一亂循環中的逆旅過客，而中國卻是千古長存的主體。只緣國家可以被武力滅亡，而文化不是武力所能改變。中國這個名號概括承受了歷代的興替隆衰；代表了累積的風土文物；表達了忠恕和平的民族精神；也像英女王的王冠一樣，是中華民族的團結徵象。

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在帕米爾高原以東，各主要河流之處，建立了許多部落社會，其中華夏諸族聚居在黃河流域、華山夏水一帶，由於得天獨厚，文物豐美，文化較高，在其四邊環繞著文化落後的部落，稱之謂夷、狄、戎、蠻，比之今日一個猶如文明的都市，其他好似偏僻的鄉村。當華夏進入農業社會，其他各族仍過著遊牧生活，也像散居的遊擊隊。為有別於邊陲的夷狄戎蠻，這個中心地區稱之為中原或中國。中國這名稱具有抽象性，屬於「文化中心」的成份多，而屬於「政治組織」的成份少。因為華夷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夷狄華化即為華夏。春秋時代，秦楚雖強，但文化較落後，即視之為戎蠻之流，其後進步就自然地成為中國的一份子，亦即所謂的「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沒有國際關係，只有華夷紛爭。五胡亂華華人首次退出中原，華人的重心自黃河流域移往長江流域，造成北胡南華對峙的局面；唐末藩鎮變亂五代十國再度分裂中國，這時期軍閥跋扈，道德墮落，可算得是個黑暗時代；及後宋代重文輕武，國勢衰弱，遼金崛起，竊據北方，華夷又復分治南北；迨至蒙古入侵以及滿清入關，整個中原已為夷狄統治。夷狄滅了西晉，滅了宋明，但中國不特沒有滅亡，反而壯大。中國在政治上失守，文化上還是主宰。入據胡人同化於中華文化之中，自然地化胡為華。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由亂而分，由治而合，不管分裂多少個國；不管分裂的時間如何的長，文化始終合一，中國始終只有一個。

歷史好似長江的流水，抽刀斷流水更流，那兒被堵住，那兒就有災禍；歷史也有因果關係，前者之因

即為後者之果。符秦、元魏、遼金、蒙古、滿清入主中國，他們的政經社會活動就是中國的歷史，不能視為世界史。中國文化兼收並蓄、有容乃大、以仁愛化解仇恨，不將仇恨留傳子孫，中國能歷久而彌新，是非無故。終元一代，南人為最賤之民，政府官員儘是不識字的蒙古人、色目人充任，斂財橫行，明代並未教導民眾仇視蒙古人。滿清文字獄累及無辜，辛亥革命成功，中山先生沒有倡導殺盡鞑靼，而主張五族共和，五族地位平等，更無本土與非本土之分。

現今兩岸對峙，為了「一個中國」四個字費了許多文字遊戲。一個把中國佔為己有，一個把中國逐出門外；中國該是他的他不要，不該是他的，他偏要。中國共產黨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完全忘了他們的老祖宗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奉行的是具有暴力思想的共產主義、是第三國際移植到中國來的政權。中國人民受馬列壓迫，中國文化被馬列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等於中國嗎？再說，中國共產黨以抗日及民主幌子而建國，其建國歷史、其殺人紀錄、其意識型態，早使他的政權失去了合法性及正當性。在「四個堅持」未撤除前；在文藝、教育、政經、社會各領域各層面未澈底清洗馬列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仍是個外來強權，非中國也！

自中共竊據大陸以來，台灣本是中國文化的燈塔，再兼之以經濟的繁榮、政治的民主，這一線光亮，使大陸人民見到了希望，有幫助大陸人民沐浴在這燈光之下而自求解放。但是近幾年來，這燈光消失了！台灣正由一種被壓迫的悲情激化為去中國化的運動，試圖以政治力塑造「台灣民族」。一般的見解：以小搏大，求勝之道，不外壯大自己、減弱敵勢，而去中國化的效果：在島內是社會分裂，價值觀混淆，經濟發展受制於意識型態，政治民主因民粹而難以深化；在島外則使海外華僑、大陸人民原有的向心在中共民族主義號召之下轉而支持中共，去中國化縮小了台灣，壯大了中共。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一」就是根、就是源，任何事縱然頭緒紛繁卻有系統脈絡可尋，找到根源，就可貫通起來，此即何晏所謂「知其元，則眾善舉矣」，中國就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根源。美國的保護傘不是萬年千歲的，甚或非百分

之百可靠的。台灣永久的保護傘是具有文化性的中國。台灣應該大聲喊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唯我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原載於《華聲》報）

（上接第 47 頁，孟德聲教授文註釋）

註一：大前研一於去年底出版該書原英文版《The Emer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hunghwa》，此書是大前繼去年出版《China Impact》與《The China Shift》之總結篇。

註二：大前研一，〈為什麼說二〇〇五年兩岸統一？〉《多維時報》，二〇〇三年，二月二日至八日。

註三：信懷南，〈大前研一的預言〉，《世界週刊》，二〇〇三年二月九日。

註四：《開放雜誌》，一九九四年三月，頁二八至三五。

註五：《世界日報》（紐約），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日。

註六：黃仁宇，《新時代的歷史觀》，商務，一九九八年，頁八至十二。

註七：胡秋原，《史學方法之要點》，學術出版社，一九七〇，頁四七至四八。

（上接第 78 頁，讀李銳文）

彭：這些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實錄》第一六三頁）。不必多引，這三句話已將二人不同性格品性勾勒出來。面對這群懦弱無用、患得患失的人，彭德懷出於一個中國人的道義感和責任感，不能不站出來講話。毛澤東的政黨及其政治，培養的是林彪、周恩來式人物，咬死的是彭德懷式人物。

## 有人要“反獨促統”為中共 有人要“反華促獨”為台灣

我們要的是：

# 民主統一為中華！

〔二零零二——零三年講於美國紐約、舊金山、  
亞特蘭大、休士頓等地僑學界〕

**內容提要：**當今的臺灣華人有兩個誤區，當今的海外華人有兩個偏向，當今的大陸人民有兩種情緒，當今的中國共產黨有兩個痛苦……什麼叫做惡性台獨？什麼又叫做良性台獨？中共與台獨有著怎樣親密的歷史關係？台灣分裂勢力八十年來又是怎樣地走過了一條從：

共產革命台獨 → 社會主義台獨 →  
反華惡性台獨 的歷史歧途



各位海外朋友：

今天，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 目前台灣華人在“獨統問題”上的兩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就是：台獨進程趨急。也就是說，台灣的反華台獨勢力，或如他人所說的“反華惡性台獨”，已經在明確的、而不再是隱晦地加緊了“分裂中國以求台灣獨立”的進程。他們與“良性台獨”，也就是承認中國、並且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卻不願意被共產專制中國所一統的台灣華人，是有著本質的差別的。

反華台獨趨急的準備階段，就是從兩蔣時代的“假民主之號召，以求台獨之路”，到李登輝的“假

民主之演進，以築台獨之橋”。前者為兩蔣時代社會主義台獨所使用的“共產革命方式”。一位著名的前“社會主義台獨人士”就曾公開說過，“那個時候，台灣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運動，就是以追求台灣獨立的方式進行的”。他的話是言不由衷的。因為，事實是：“他們追求台灣獨立的分裂行爲，是以反對國民黨所謂獨裁統治的方式進行的。”後者則是李登輝掌權時代所厲行的陰謀手段。因為，在李登輝已經做了“民主總統”、成了“民主先生”的時代，蔣介石安在？蔣經國安在？獨裁統治安在？所謂的白色恐怖安在？既然台灣早已沒有了“獨裁和恐怖”，沒有了“蔣家王朝和國民黨專政”，並且已經實現了民主和自由，台獨的領袖李登輝也已作了總統，為什麼伴隨著台灣民主演進的，竟然是愈叫愈響的台獨呼聲和愈做愈急的台獨行徑呢？至於舉世皆知台灣民進黨有一個著名的“台獨綱領”，和舉世不知台灣民進黨還有沒有一個“民主綱領”的事實，就更是說明，台獨，特別是反華台獨勢力，與台灣的民主實在是關係不大。雖然我們並不能說一點關係都沒有。

台獨趨急的過渡階段，就是：“假中華民國之名號，以行台獨之實”。因為，在李登輝確實為台獨“架好了橋、鋪好了路”之後，反華台獨勢力終於可以公開地“假中華民國之名號，以行台獨之實”了。用2000年民進黨大選獲勝之後，一些反華台獨人士意氣高昂的話來說，就是：“台灣早就獨立了，中華民國從來就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也就是說，他們要重實際的獨立狀況，而輕名義上的宣告獨立與否。因為，台灣的權柄已經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了。因為，“明獨”的陳水扁也已經做了總統，所謂“台灣人”也已經有了“出頭天”！

台獨趨急的加速階段，則是：“去中華民國國號，以正台灣國之名”。因為，在反華台獨勢力所追求的三大目標裏面，有一個大目標，就是伙同中共一起推翻中華民國。所以，祇要一天台灣還在用中華民國作為國號，他們的心裡就不會舒坦，而且在實際上，也就不能真正稱之為“已經獨立和真正獨立”。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難成”。何況，它還根本沒有達到“去中國化”這樣一個台獨的根本目標。並且，一旦民進黨在下次大選中敗下陣來，又讓至少在嘴巴上還在喊著“要維繫中華民國國

統”的國民黨上了台，所謂“台灣已經獨立”，豈非轉眼之間就成了一句笑話？所以，陳水扁上台之後，在短暫的興奮已經過去，掌權的反華台獨勢力也就因權力在手，而愈加急切地加速了分裂中國的進程，並且不論是明的叫囂——諸如公開要求改掉中華民國之國號以爲台灣正名，公然呼喊拋棄中華民國之憲法；還是暗的陰謀——諸如在教課書上竄改歷史，和叫喊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等等，都開始赤裸裸地操作了開來……謀求台灣獨立的政治手段，豈但是愈做愈“精”、甚至是愈做愈“橫”。

台灣獨立的進程因此而加快加急了，分裂中國的陰謀已經在一步步地“進取”之中，要製造大陸“亂局”以乘機會獨立的構想也因此而迅速形成……至於藉口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而收買大陸民主人士，藉口反民族主義而要拉攏藏獨、疆獨、蒙獨等“民族分裂勢力”，藉口捍衛台灣民主以建立全球性的“民主和平”組織來打民主牌，直至在國際上乞憐討好，便都成了他們加緊台獨進程的政治內容和政治手段……然而，這究竟是一個發了瘋的夢想，或僅僅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政治誤區呢？

**第二個誤區就是：親共勢力形成。**也就是說，台灣華人中的另外一股政治勢力，大多是四九年以後才移居台灣的“外省人”，卻在台獨政治勢力於台灣得意、得勢之際，乃懷著“熱愛中華民國和一心反對台獨”的痛苦心情，在中共對台灣施行的一輪又一輪陰謀統戰之中，在中共對他們一再地展現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之間，在中共因深懷陰謀而與他們“邀來迎往”的甜蜜歲月裡，他們中間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爲中共所統戰，所俘虜，甚至有人成了中共在台灣的宣傳家和代言人。其中一些政客文人，更是爲名利所趨，以一走中共的紅地毯爲快，以能夠與中共大佬合影留念爲榮，以至於不知不覺之間，成了中共掌上的玩物，甚至被玩得十分地興奮和快樂。其中更有人接過了中共交給他們的那一竿“反獨促統”的大旗，爲反台獨，而終於爲共所統，爲共所騙，爲大多數台灣人民和幾乎是全體大陸人民所厭惡。由於某黨的個別“反獨促統”人士，在大陸的中央電視台上公然贊成中共對台灣的“一國兩制”要求，甚至要爲中共“解放”台灣出謀劃策，直至跑到美國來得意地

宣稱“江澤民已經告訴他什麼時候就要打台灣了”，從而，一個原來要真正追求實現三民主義和熱愛中華民國的台灣政黨，就這樣在大陸人民的心裏，被認做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就不說某黨的政客和官僚們，在與中共的送往迎來、把盞言歡之時，又該斬殺了數十年來中國大陸人民對這個黨的多少反思和希望。正是因爲如此，要重建真正中國國民黨的深沉願望，才會在中國大陸廣大民間應運而生；要重建中華民國的偉大號召，才會在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已經辨識了“誰是新中國”之後，被真正的反共民主領袖轟然一聲號召在海外……

朋友們，之所以會出現上述這樣一種嚴重情形，說淺了，就是因爲內有反華台獨勢力的逼迫，外有中共利用所謂民族主義以進行統戰的成功；說深了，則是台海隔絕了五十年，台灣華人非但對中共的陰陽兩謀看不懂，而且也對中共改革開放的成就看不透，從而才會上當受騙，直至將愛中國變成了“愛中共”。這自然又是一個嚴重的政治誤區，而這個政治誤區，不僅已經導致台灣親共華僑今日不見容與台灣島的處境，而且還會招致他們來日爲大陸人民所絕難相容的悲劇。至於他們今日的行徑已經爲反華台獨勢力提供了何等“加緊台獨”的藉口，則是許多人都看在眼里、想在心裏的事情了。

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則是：

## 目前海外華人在台獨問題上的兩個偏向

**第一個偏向，就是 寧與中共，不與台獨。**

之所以如此，一是有中共在背後撐旗掌舵。二是某些善良的海外華僑錯將中共當中國。三是錯識中共改革開放成就鉅大。四是根本不了解大陸社會人心的真相。五是在台灣和海外長大的華人知識份子不解中國，缺少對中共專制統治行徑的起碼想像力，卻又要寫文章，發論文，當中國問題的專家，於是許多祇能令中共竊笑、叫大陸人民可笑的台灣和西方“中國問題研究成果”，便顛倒了事實，混淆了視聽，爲海外對今日中國的了解，起到了十分不良的作用。六是少數僑領懷擁美國或其它西方強國的護照，“吃兩岸”，特別是“吃大陸”，正好大陸的共產黨唯恐他們不與自己一起吃喝玩樂。於是，吃了人家的嘴短，

拿了人家的手短，不知不覺之間，便為中共所用，更為中共所統。美國華文新聞界的一位副總編輯，原來雖是個十足的反共分子，但祇因中共將他請回去在好山好水之間快活地旅遊了一趟，這位副總編輯回美之後，豈但不反共了，甚至成了媚共的急先鋒，直至敢於公然地在大會上講“中國就是不能搞民主”，講“八九年中共就是殺得對”，講“鄧小平說的‘殺二十萬保二十年’一點也沒有錯”！如果不是親耳聆聽了他“氣壯如牛、厚顏無恥”的講演，你絕對不敢相信這竟然是從台灣來的、一個西方“自由世界報人”所能夠說得出口的話。要是他在大陸也敢這樣講，他非被大陸老百姓踩死不可！至於當前在海外，由一些愛國華僑所說出來的，“共產黨已經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共產黨現在已經在實現三民主義了，現在的中國不能沒有共產黨”這樣一些話，特別是舊金山的一位著名僑領所說出來的，“大陸真好——山也好，水也好，姑娘更好、共產黨最好”的話，大約也祇能叫大陸的老百姓欲哭無淚、悲憤填膺……

然而，這些親共、媚共、擁共的華僑，卻全都是中共在海外推行“反獨促統”的急先鋒，並且就是這樣一些急先鋒，才造就了海外在統獨問題上的第一個可怕偏向——這個偏向，由於它有背景介入，有僑領帶頭，有知識份子參與，有許多“愛國”華僑響應，所以，它才在海外勢大，才能在全球發作，從而將一個好端端的反共海外，變成了中共的統戰戰場，直至叫一些明白人，贊成不是，不贊成也不是了……中共在海外的天下，就是這樣地打下來了；於中國大陸正在一天天地爛下去的中共政權，就是這樣地在海外一天天地好起來了……

朋友們，面對這一偏向，我們究竟是該哭還是該笑呢？受盡了中共欺侮凌辱的中國大陸人民，直到今日還在巴望著華僑能夠做“革命之母”的中國大陸人民，當真還能夠笑得出來嗎？

## 第二個偏向，則是 寧與台獨，不與中國。

首先，這個偏向形成的原因，就是台灣的民主確實是全中國的榜樣。所以，不同情，不支持，不捍衛，不發展台灣的民主，就是對世界潮流的反動，更是對中國未來的不負責任。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理由，任何一個聲稱是要為中國搞民主的人，如果贊成台灣

被中共统一到它的專制復辟統治裡面去，無疑都是應該遭到譴責的。這自然沒有錯。

其次，自從李登輝推行台獨由暗到明和由徐到疾，特別是在民進黨上台執政之後，海外支持民主台灣的聲音便不是那麼單純了。在中共操辦了世界“和平統一”組織之後，台灣民進黨政府便操辦了全球“民主和平”的組織。顯而易見，前者是在打統一牌，幫中共反獨；後者是在打民主牌，幫台獨促獨。所以，他們一個“死都不要民主”，一個“死都不要統一”，在海外將“統和獨”鬧騰得“壁壘分明”。於是，一個奇怪的效應，很快地就在海外凸顯出來了。那就是：台灣雖因民主而擴張了它追求獨立的理由和勢力，甚至得到了一些大陸民主人士的“衷心支持”；海外要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真正民主力量和正派民主力量，卻遭遇了兩邊的冷眼、孤立、詆毀，甚至是陰謀襲擊……中共因此而心滿意足，反華台獨勢力因此而快意稱心。

更為嚴重的是，反華台獨勢力，便以應該支持民主台灣這樣一個正當理由，將“假民主之成就，以求台獨成功”的台灣經驗，不僅推展到了海外，而且滲透進了大陸，既要用民主的理念去爭取海內外的大陸反共民主力量，又要用金錢和資源來拉攏收買反共民主人士。雖然有些人是否真在反共，還大大值得懷疑。於是乎，有真心要反共者，也有要投機弄勢者，更有“假民主而搞錢者”等形形色色的派別和人士，非但相繼而生，甚而蜂擁而至。一時間，“寧與台獨、不予中國”的理論、理由和行為，便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甚囂塵上：

他們使用的頂頂時髦的理論，便是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將兩個完全不同類的概念進行了不科學的類比，從而得出祇能由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前途”的結論，將全體中國人民對於自己領土的“主權”和“正當主權要求”一筆勾銷。

他們出於對中共出賣民族國家歷史的完全無知，便錯識中共的“假民族主義”為“真民族主義”，因而要徹底地批判和反對民族主義，甚至將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正確內涵，一概指責為反動、倒退和落後，“祇許講民族自決，不准講國家統一”，卻贊成反華台獨勢力們生造出一個所謂的“台灣民族”來，以謀求獨立。雖然這個“台灣民族”的概念，早在一

九二八年就被第三共產國際、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他們製造出來了（這個問題後面我還要講）。

他們有的乾脆用辛亥之後中國各省獨立作為歷史的“範例”，製造了一個“祇有分裂中國，才能讓共產黨倒台”的理由，因此認為“必須支持台獨”。卻不知，辛亥之後各省的獨立，是要從滿清王朝的中央政權裏面獨立出去，以促成專制王朝的迅速滅亡，而不是想從中國分裂出去，另成一國。而先後獨立的十六個省份，更沒有一家成立了一個“與中國從來就沒有任何關係”的新國家。這實在是連最反動無知的軍閥都不曾做、也不敢想過的事情。

他們為了支持台獨，或乾脆連疆獨、藏獨和蒙獨都大加支持；或為支持台獨，便不得不支持藏獨、疆獨、和蒙獨。將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殘酷統治歸咎於中國和漢族，甚至幫助當代各家民族獨立勢力，將中國境內各民族與漢族悠久和睦的歷史關係一刀斬斷，非但支持他們獨立，而且贊成他們建國，有的居然喊出了每一個省都可以獨立的瘋狂囈語……為了台灣一省之獨立，他們居然不惜分裂整個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

他們為了幫助台獨獲得分裂和獨立的合理性，甚至將中國辛亥之後，因大軍閥要以武力來一統中國，小軍閥才要搞“聯省自治”以自保，當成“中國實行聯邦制的美好歷史經驗”，要以允諾建立中華聯邦來預先承認台灣獨立。而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所謂“中華聯邦制”的構想，才使得一家轉眼煙雲的“海外革命政府”，居然在確定未來“中華聯邦共和國”的版圖時，宣稱“不包括台灣島在內”！

他們甚至使用中國民間的“天下分合”之說，用“天下之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小說家者言”，來證明和贊成台灣獨立乃“天下的大勢所趨”，為反華台獨勢力尋找“文學創獨”的理由。

即便他們當中還有一些存在著民族意識的人們，這些人提出的理論和理由，卻也是先讓台灣獨立，等到中共垮了，再求中國統一。殊不知，台灣一旦獨立成功，無異於是在中國製造了一場分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藏獨、疆獨、和蒙獨無疑將“大亂中華”，中國既已不國，則民主為誰而用？

……

上述種種支持台獨的理由和理論，不論出自任何動機，也不論出自何種“說不出口的原因”，說到底，都是因為“愛台而不愛華”或“反共而不愛華”所至，是打著支持民主的招牌，禍中國、害中華而已。因為，反共，就是為了愛國和愛民，一切不愛中國、不愛中華民族、不愛中國人民的“反共民主運動”——不論它打出了何種高超的理論，擺出了何等高明的理由，做出了怎樣悲天憫人的姿態，都是對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出賣而已。而民主一旦失去了為民族、為國家的奮鬥目標，民主就成了一個虛假的旗號和口號，並且什麼人都可以對它進行利用了。這樣的慘痛教訓我們經歷得還算少嗎？

由上述可知，祇因有了台灣分裂勢力和台灣親共勢力的存在和猖狂，當代中國大陸反共民主革命運動，較之沒有台灣和沒有僑民的“蘇聯東歐”而言，它的艱難、複雜和痛苦處境，該是怎樣地令人傷感和悵惘。

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就是：

## 目前中國大陸人民在台獨問題上的兩個情緒

第一種情緒，就是：理解台獨。

第二種情緒，則是：反對台獨。

首先，為什麼要說大陸人民理解台獨呢？

我想先編一個故事說給大家聽。

比如一個很窮的人家，兄弟姐妹一大堆，掌家的父親不僅專橫跋扈，而且好吃懶做，流氓成性，還是一個大煙鬼，把整個家搞得怨苦嘆心，但是，又個個都怕這個流氓老子，無人能夠奈何得了他。也就是說，這一家人，在這個流氓無賴的“統治”下，痛苦不堪。

這個人家，雖然有著十幾個兄弟姐妹，而且個個都在家裡受罪，但是，他們最小的一個弟弟，卻自小就被一個強盜搶走了，如今不但長大成人，而且學有所成，業有所成，又有名、又有錢，更過著自由自在的日子。於是，有一天，當他們的老子知道自己那個自小被人搶走的小兒子，年紀輕輕便在外面發了跡了，於是他便想著法子要把他這個小兒子弄回來，這樣，他豈不是又有“老福”享了嗎？但是，他的哥哥

姐姐們卻暗下裏商議說，小弟如今要是還念我們一母所生的情，念這些年母親因想他也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淚，若能夠回來幫助我們擺脫這個流氓老子的糟踐，或是乾脆幫我們逃出這個家，那是最好；就是不能，暗中能夠接濟我們一些，我們也感謝他。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回家來，要是他回來了，我們不但斷了希望，只怕小弟也會落到我們這般痛苦不堪的地步……哥哥姐姐們就是這樣地做出了決定，至於他們的弟弟在接到他的哥哥姐姐們給他捎來的信以後，願不願意幫他的那些痛苦無助的哥哥姐姐們，下面我們再說。

我想，這雖然祇是我編出來的一段故事，但受夠了共產黨殘暴統治已經五十餘年的中國大陸人民，不正像這個故事裏面的兄弟姐妹們嗎？而那個在外面過上了好日子的小弟，是不是也有些像那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呢？所以，我才會說，大陸人民的第一種情緒，是理解台獨。

就是因為有了這個理解，96 年中共要向台灣放飛彈時，在北京西山，就曾有老百姓對著從山洞裏拉出來的飛彈，忿忿地說，“人家台灣人活得好好的，憑什麼又要去打人家”？2001 年，當海外的一位華僑回國探親時，他的一位做教授的親戚才會偷偷地將他拉到一個冷僻的地方，對他悄悄地說：你們別在外面跟著共產黨喊統一好不好，祇要大陸一天還是共產黨當道，一天沒有民主，就不要幫著共產黨把台灣拉回來……

當然，大陸人民理解的台獨，是良性台獨。

但是，大陸人民的第二種情緒，卻是反對台獨。也就是反對反華惡性台獨。

我還是先把那個故事繼續編下去：

沒想，他們這個在外面發了跡的小弟弟，在接到他幾個可憐兄姐的信之後，豈但是對他的這些哥姐們毫無同情之心，根本不想幫助他們，而且連對他那個生身之母也決心不認。甚至還回了一封絕情絕意、甚至是十分刻毒的信，說他從來就不曾有過這樣一個家，更沒有他們那樣的哥哥姐姐，他也不可能認那個根本就沒有生過他的母親，管她想不想他，管她可憐不可憐。還說，將來要是再寫信或找人來麻煩他，他

就乾脆帶人把他們的家砸了，燒了，連他們這些哥姐，和那個又老又醜的母親也絕不饒過——甚至還叫喊著要砸爛他們這個窮家的祖宗牌位，燒光他們的家譜，登報聲明跟他們這個家斷絕任何關係。因為他根本不是這個家的人，跟這個家“從來就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的這封信自然會將他那個流氓老子氣得嗷嗷直叫，卻也叫他的那些窮哥姐們難受得眼淚直流，至於母親的傷心欲絕就更不用說了。雖然他們的老子成天都在拍桌子打板凳地喊著要“教訓教訓”這個臭小子，但哥姐們心裏卻還是不忍得很。可是，直到有一天，他們的那個小兄弟，不僅當真登了報，而且還帶人來上門威脅要砸祖宗牌子、燒家譜時，他的哥哥姐姐們，才因為實在是忍無可忍，而乾脆決定贊成他們的父親，要好好地揍這小子一頓了……

我早已承認這是我編的故事，不是真的，祇是做個比喻而已。但是，下面，我卻要說一段真故事，那可是我親身經歷的：

幾年前，我應舊金山一個大學的邀請，參加一個兩岸關係研討會。在這個會上，有一位很有名氣也很有地位的台獨人士在發言時說：

“我要告訴大家，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台灣必需獨立，必需走出中國的陰影，成立我們自己的台灣共和國……”說完，他便洋洋得意地走下台去了。

此刻，我以為滿堂為中國搞民主的人，總會有幾個人站起來駁斥他，但是，整個會場居然沒有一個人站起身說一句話。這時，我突然才想起這個會議是不是有什麼背景？

一念及此，我覺得自己是不能不說話的了。於是我便不請自邀的走上台去，指著那位“台獨分子”的臉說：“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此話當真嗎？”

因他依然洋洋得意地看著我，一副驕橫不可一世的樣子，跟我看慣了的共產黨和共產黨造反派的面孔，實在沒有二樣，我因怒從中來，便指著他的鼻子說：“你開口就是中國話，下筆就是中國文，一張黃臉皮跟我也長得毫無二樣，怎麼就跟中國連一點關係

也沒有了？！再說，就是你講的所謂台灣話，也是我們福建的閩南話，而閩南話，跟中國的古代語言關係最大，你就不覺得自己無知嗎？”

我因激動，再加上生氣，再說我看見他那張得意洋洋、無知無識的臉孔也已經變了樣了，於是我就乘勝追擊似地說道：“如果你要是說台灣曾經跟中國有過關係，後來有一段沒有關係了，再後來又有了關係，那也算了；如果你說台灣雖然跟中華民國有關係，但是，跟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從來都沒有關係，那就更加是算了；但是，你卻說台灣從來就跟中國沒有關係，而且連一點關係也沒有。那麼，今天就讓我來告訴你，連你心中頂頂崇拜的日本國，也就是你一心要做他皇民的小日本，都從來承認它和中國有關係，甚至在他們的教科書裡，都寫著日本深受中國漢唐文化的影響，而且至今在他的文字裏面，都夾著我們中國的許多漢字；我還要告訴你，在東南亞，又有哪一個國家說過他們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朝鮮還是越南，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泰國還是緬甸……我告訴你，他們誰都不會說自己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反倒是台灣卻跟我們中國沒有關係了？！你好意思說出這樣無知無識的話來，我真替你害羞，替台獨分子害羞，替你心中那個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台灣害羞……”

他當然無言以對，祇好一聲不吭，散會後，卻又找人來說，要與我溝通溝通。我回答說，不必了，祇要你一天說你和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之間就沒有任何“要溝通的關係！”

朋友們，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什麼才是反華惡性台獨，也就是我所說的極端台獨。由於這個反華台獨勢力對自己祖國和祖宗的無情無義；由於這個反華台獨勢力在實際上反對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邪惡勢力，而是反對中國；由於反華台獨勢力和共產黨一樣，豈但不會幫助我們大陸人民走上民主統一的道路，而且爲了“走出中國”，甚至要用分裂來干擾我們大陸人民對民主的痛苦追求，用“台獨”來爲我們海內外的民主奮鬥“添亂”；所以，我們大陸人民才會因這個反華台獨勢力的過於無情，而寧打勿縱！這就是中國大陸人民在對台灣獨立問題上，愈來愈和共產黨“貌似一致”的感情原因。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的原因和根本的原因。因爲，大陸人民既然理解“良性台獨”，自然就不會支持中共去打台灣，哪怕打台灣一定會給大陸人民推翻中共帶來“天大的歷史機遇”，大陸人民也寧肯放棄。這爲大陸人民對台灣的民族感情和民主認同所決定。但是，近年來，台灣反華台獨勢力的猖狂，特別是他們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對中國大陸人民所一再表現出來的無情、無義；和台灣親共勢力對於中共統治者的醜顏買好，及其兩者對中國人民民主奮鬥的冷漠、利用、干擾、甚至是破壞；因此，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痛感到非但不能指望台灣，而且整個台灣都已經成爲中國人民對民主統一之必須追求的反動勢力時，則大陸人民轉而支持、甚至是巴不得中共“有種”去打台灣，從而使自己獲得“解放”的偉大歷史機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這就是今天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大陸之所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真正原因，和中國共產黨“非到必須以打台灣作爲救其一黨之命的手段”之時，他都“祇敢高喊打台灣、而絕不敢真打台灣”的根本原由（請參閱本刊同期大陸民眾文章“我爲什麼贊成攻台？”一文）。

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就是：

### 目前中共在台獨問題上的真假兩個痛苦

先講第一種痛苦，是真痛苦，因爲它真反獨，不敢打。

大家都知道，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是天天喊著要解放台灣的。八十年代之後，也就是在它三十年的“內亂和內哄”之後，需要喘息，需要用改革開放、也就是要用“專制改良”來救自己的命。所以，他開始叫嚷要“和平統一”，但『不放棄武力』。到了九十年代，由於李登輝台獨之心愈來愈張狂，台獨行徑越來越迫切，中共雖然不喊叫“解放台灣”了，因爲全世界都知道台灣比大陸好，該解放的應該是大陸人民了，所以，它才又開始“文攻武嚇統戰”樣樣都來，叫嚷統一，叫嚷要“打台灣”，並且當真在台灣要大選的時候，不是放幾顆“空彈”，就是讓朱鎔基惡語相向，直至在做出了“調兵調糧”、做盡了“發狠要打”的樣子之後，又要派那個“毫無新政”的溫家寶到美國來求台階下……這到底又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近些年來，中共時刻不忘的便是“穩定壓倒一切”這一條。這就是鄧小平死了，有人去天安門廣場爲他送一隻花圈，共產黨都要先將他抓起來再說；北京大學的一位女學生被流氓強暴致死，他的同學們想爲她開一個追悼會，都不准；原因，全都是“不利於穩定”。因此，如果攻台的“內戰”一開，對共產黨來說，那還了得！更何況一九九六年，當他放飛彈意在威脅台灣時，人民解放軍西北蘭州軍區屬下就有眾多的軍官組織了秘密的“人民解放陣線”，準備一旦中共攻台，他們就會打向北京，爲中國台灣人民保平安，救中國大陸人民出水火。雖然事不周密，而造成數十名軍官被處決，該軍隊地下組織也遭遇破壞和鎮壓，但是，豈但是打台灣的心，中共不得不痛苦地收斂住了，而且連放空彈頭的膽量也不復存在了……這自然是中共的真痛苦所在。

但是，在反不反台獨的問題上，中共也不是祇有上述這樣一個真痛苦。就像蔣介石先生在領導全國軍民抗戰時，對那個不抗日、鬧擴張、專打友軍、不打日寇的共產黨，那有不想打、不想一舉殲滅的道理？但是，應該打，卻又不能打，因爲他必需擔負起團結抗戰的責任；因爲他打了，別人就會攻擊他不“一致對外”，甚至有可能爲日寇所乘，於對日抗戰有害。今天，共產黨作爲一個統一了整個中國大陸的專制極權政黨，台灣島在他的心裡，豈不是就象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在蔣先生的心裡一樣嗎？必須打卻又不能打，這便是中共的真痛苦所在。

然而，這祇是中共的第一種痛苦。

中共還有第二個痛苦，卻是假痛苦。原因，就是他假反獨、真統戰。

爲什麼？簡單地說：

第一， 中共從來就是與台獨一樣，是分裂我現代中國的祖宗，是背宗叛祖以製造兩個中國的始作俑者。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就已經宣稱：必需要讓蒙古、新疆、西藏自治，並要將他們化入“某個民主聯邦”。也就是說，中共建黨之初，就要將中國的蒙、藏、疆等奉送給蘇聯了！

一九二五年，中共領袖李大釗又在莫斯科代表中國共產黨公然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聯在外蒙古駐兵。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並發表莫斯科宣言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分離權和自決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共產黨用他們特有的邏輯，證明了：中國要統一，就必需承認民族的分離權和自決權，大概這就是今日必須先予台灣獨立之中華聯邦理論的源頭了！

一九三一年，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之下，於中國創見了認蘇俄爲祖國的“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在他的僞憲法中宣稱：“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此後，日本便在中國“以俄爲師”，挾持溥儀製造了第三個中國、即“僞滿洲國”。此後，中共即便是在全中國人民的熱血抗戰之中，都以建立敵後根據地爲名，篡立了分裂中華民國的農村獨裁政權（費正清語）。就更不用說，在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勝利、收回了台澎金馬、獲得了統一、正在準備憲政以建設一個統一的民主中國之時，又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支持甚至是參加下，發動並打贏了內戰，一邊倒地成了蘇聯的附庸國，從而造成了現代中國曠日持久的兩岸分裂……中共，作爲一個從來就是出賣民族和國家、一個從來就是要製造兩個中國的賣國政黨，它的心腸和那個反華惡性台獨勢力又有什麼兩樣呢？

第二、中共從來就是台灣獨立的領導者和支持者，與台獨有著極為親密的歷史關係，或曰“一體關係”。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以下幾個簡單的事實：

一九二七年，蘇俄和第三共產國際曾將台灣共產黨支部納歸日本共產黨領導，並由日本共產黨指示台灣共產黨發表了第一個台灣獨立宣言。原因，是共產國際要執行列寧“關於要在東亞弱小國家地區鼓勵民族獨立和分離”的政策，以便顛覆他們的政府，發動共產革命。現代反華惡性台獨勢力，由此而與共產黨和共產革命連成了一氣。

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成立，共產國際開始命令中共接管台灣共產黨。是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霞

飛路一家照相館的樓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台灣共產黨決定發表台獨宣言，提出“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和台灣革命”的三大主張，更在其綱領的第四條中，宣稱要「在台灣建立獨立民主政府」。台獨勢力，正是在隸屬於中國共產黨的台灣共產黨領導下，開始了它的“共產革命台獨”的歷程，屬於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部份。

一九三一年之後，台灣的共產獨立運動，在日本軍閥統治的壓力下，不得不轉入地下，實際成了台灣的共產革命運動，卻由於日本政府對本土共產運動的堅決鎮壓，而難有“出頭天”。

一九四五年之後，台灣回歸中國，台灣人民歡天喜地。但是，中共立即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在國統區內發起了一波又波的反蔣運動，並命令台灣中共地下省委，利用台灣某些“皇民謬種”對中國的仇恨情緒，與侵華日軍中一些被遣歸台灣的台籍日本軍人一起，領導了台灣地區的“反國民政府運動”。所謂一九四七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就是中共在大陸發動的整個“反蔣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中共台灣省委甚至還特別成立了台灣二二八運動的“地下指揮委員會”，以領導和指揮一心要在台灣推翻中華民國台北政權的台灣獨立運動（大陸學界將會在必要的時候公布所有的資料）。一位共產黨的著名報人就曾擔任過這個地下指揮委員會的委員。毛澤東則在延安發表廣播講話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部隊，支持台灣人民自由獨立、反對蔣家王朝的運動，如共產黨執政，共產黨將允許台灣人民進行公民表決，決定台灣人民的命運……”那個時候，共產黨員李登輝就是這個運動的參加者之一。

一九四八年，“台灣共產獨立運動”的著名領導人謝雪虹等，終於因為中共“解放”了大陸，而公然投奔了大陸，此後，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便立即得到了已經掌權的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領導，以至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整個七十年代，台灣的獨立運動，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的台獨運動，其實質，就是中共要利用社會主義的台獨勢力來推翻中華民國台北政權，以與中共要解放台灣作內應。雖然，社會主義的台獨運動，後來曾在理論上明確地將他們的運動，敲定為推翻中華民國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台灣共和國這樣兩個階段。所以，為前者，他們接受中共的訓練和支

持；為後者，則與中共要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理論和行徑完全一致……。七十年代，被稱為狂左狂獨的台獨雜誌《台灣時代》，就曾一再地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宣傳台獨，論證“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製造一個台灣民族的理論根據，更是台灣民族革命的綱領……”至於在海外的社會主義台獨勢力，不但由中共送給“津貼”，而且受中共召回“訓練”，然後再由中共用炮艇護送“闖島”，向全世界作“民主秀”……至於當前，他們則將大陸人民對歷史的反思，特別是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的再認識和再肯定，視為仇讎……（參見本期評論員文章“民主運動要愛國”等）。可以說，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獨立運動，才將中共至今都沒有完成的，要推翻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兩大“反歷史任務”，“光榮地”繼承了下來，並且先是“陰謀地”，後則是“公然地”予以推行了……

光榮的中國國民黨，終於在自己手辦的民主大選中，將軍政、訓政、憲政的歷史任務完成，實現了還政於民，這在全世界的所謂專制政黨中，未有先例；不爭氣的台灣中國國民黨，卻在自己於台灣推行民主建設的歷程中，將自己的黨被台灣反華惡性台獨領袖分裂和掏空，一蹶而難振……這個時候，台獨人士、台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終於在第一次大選挺扁時，說出了一句真情實意的話：“我們早期的台獨人士大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才跟共產黨最接近……”

所幸的是，社會主義的台獨勢力，也就是今日反華惡性台獨勢力的前身，非但至今沒有實現台灣的獨立，更無命在亞洲建立起第五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如果他們當真將這個“社會主義的台灣共和國”建成了，則台灣人民將要有多少人民會遭遇欺侮、凌辱、直至民不聊生、生靈塗炭，這還需要任何的論證嗎？中國大陸、北朝鮮、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在“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刀光血影下斷頭流血、慘淡呼號，不正是一整個人類在二十世紀的羞恥和血腥證明嗎？

朋友們，這就是中共與反華惡性台獨勢力的歷史關係。而我們也祇有明白了中共和惡性台獨竟有著這樣一個歷史關係，我們才能理會到：中共與台獨在今天的厲害關係。才能理解到，中共假反獨的歷史原

因，和中共要利用台獨來完成他消滅中華民國和消解中國國民黨的政治用心。因為，這才是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完成、但至今都沒有能力完成的“反歷史使命”。

今天，中共和海內外的反華台獨勢力，他們一個天天叫打，卻死也不敢打；一個歲歲叫獨，卻死也不敢獨；一個藉口“反獨促統”，而在海內外高舞著那一竿虛假民族主義的大旗，大搞紅色統戰；一個卻因中共“舞旗逼統”，而愈加有了高喊台獨和逼行台獨的理由。他們，一個是靠出賣民族國家起家的中共，一個卻是至今仍要侮辱中華民族、推翻中華民國的惡性政治分裂勢力——他們之間的和衷共濟與分道揚鑣，又該是怎樣地令世人驚訝不已！

我要講的第五個問題是：

**防止台獨、反對分裂、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正確途徑和方向，就是要高舉反共反獨的民族民主大旗，在全球建立一個志在追求中國“民主、統一、和平”的民族民主聯合戰線。**

因為：

第一、堅持反共反獨，就能夠將大陸人民反共要民主的萬難追求，包括在對於祖國民主統一前途的偉大歷史追求之中去，從而為我們的民主奮鬥大大地增強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助力。

第二、堅持反共反獨，就要堅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它不但會叫大陸人民開心，讓台灣人民放心，而且將使中國境內的各民族有了信心，有利於台海兩岸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從而大大減弱台灣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對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離心力。

第三、堅持反共反獨，才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為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和平”而建立一個最為正確和最為廣泛的“民族民主聯合戰線”。這個聯合戰線一旦形成，其結果，一是中共打出的“假民族主義牌”將因此而失靈；二是反華惡性台獨勢力的“反共民主牌”將因此而失算；而反共在先、反獨在後；民主在先、統一在後；解決中共專制統治在先，追求中國國家統一在後——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治本在先、治表在後”的這樣一個正確的大戰略，蓋因它“義旗高揚”，從而必得大陸民心，必轉台灣人心，

必改海外僑心，必能凝聚和奮發整個中華民族和全球華人為愛國而團結反共的偉大民族精神。

朋友們，我似乎沒有必要再提醒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統、獨問題的朋友們了，因為，一個確鑿的事實，早已在告訴我們，中共對台灣，是“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台獨對中國，則是“死也獨不成，想死了，它才敢獨”。因為，一旦中國的民主變革成功，則“和平談判桌、平等談判桌”，就會升起在我們祖國的陸島之間，如果到了那時，還有所謂反華台獨勢力，仍然不顧一切地要分裂，要獨立，甚至“挾洋自重”，無疑問的是，它祇能促使中華民族的兒女，包括我們在台灣的中華兒女們，上下一心，同仇共憤地高舉起真正民族主義的大旗，為了全中國的民主安寧，為了全中國的統一富強，而不得不為之最後一戰了。而勝利必將屬於包括台灣在內的我們中國！

朋友們，堅持反共反獨，堅持民主、統一、和平之追求，才是大陸人民之福，才是台灣人民之幸，也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中國能夠在將來實現民主統一的希望所在。

## 鄭文英先生詩選

### 台灣體檢

人民尚古意，政客太尖酸。  
部長多酷吏，總統是大騙。  
天天口水戰，事實吵翻天。  
真像模糊了，道德已枉然。

### 波音公司不讓參觀

不讓去參觀，就是反臺灣，  
雷霆一聲怒，臭氣一溜煙，  
喧賓能奪主？罵街爽一番，  
若問其中意，夕陽向晚天。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當代的中華兒女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識，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民族自尊，已經喪盡了自身的民族自信，那末，我們就自然就會喪失由這一切所形成的民族意志。

辛灝年講演錄之二

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第四個表現：

## 民族意志的沉淪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三）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存在過自身的民族意志嗎？

答曰：當然。因為，倘使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不存在民族意志，那我今天要說的，豈不是成了“空穴來風”？

那末，什麼是民族意志？

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所凝聚而成的，自我保護心志和自我進取心志。

為什麼要說“心志”？因為，有心才能有意；有志方能有意。有意、有志，方能有志者事竟成。孔子說“詩言志”。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就是說，學詩，可以幫助我們生發覺悟，可以幫助我們合乎人情，可以幫助我們觀察社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百姓的疾苦和要求。而這一切，都是在幫助我們做一個可以“代民立言”的有志之人。這樣說，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學詩、寫詩的人為什麼如此之多了！中國的“詩文化”為什麼又是那樣地豐富和瑰麗了！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的形成，該是有著怎樣久遠的歷史和怎樣深隧的文化淵源了！

可見我們的古人，對於心志的理解，是多麼地透徹和高遠。而心志作為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產生的民族基礎，又該有著怎樣悠久的歷史了！否則，我們就很難明白：華山之下、夏水之旁的一個小部落，何以就能形成一個包攬中原的東方大國？何以便能夠逐漸地形成這樣一個磨難重重、卻又生生不已的偉大民族？何以於耶穌降生四百八十年之前，孔子就已經編成了《春秋》？耶穌誕生前一百年，司馬遷也已經寫成了《史記》？祇因為我們的中華民族，在脫離了茹毛飲血之後，走向了文明發展之始，就開始有了心志，所以，我們

的民族，才成了一個“有志者事竟成”的民族，才不會害怕“惡流橫空，千流倒轉”，而終能引項向前。

但是，什麼才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呢？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同樣是“一在自我保護，二在自我進取”。所謂自我保護，則表現為志在民族傳承上面；所謂自我進取，則表現在為志在民族發展上面。因為，有了傳承與發展，就不會夭折和滅亡；不會停滯或倒退。

而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老話，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便是一句十分形像的說明。

今天，在海內外，一些有意和無心要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謂“人士人物”們，大概對我說的這幾句“褒獎自己民族的話”，又要“大不以為然”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先說中華民族志在傳承的事實。

第一是在國事上。

首先，中華民族不論今日怎樣挨罵，中華民族至今均不曾滅亡，這是一個事實。否則，當今的一些人士人物們，在馬列子孫將中華民族已經“殺夠了、罵夠了”之後，也就不會再“接著罵和接著殺”了，因為“挨罵挨殺的對象”，就像世界上許多同樣富有文化的古老民族一樣，已經死了。

其次，就中華民族的上古時期、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形成期”而論，祇因周平王是在其舅申候勾引外敵犬戎謀殺了其父周幽王之後，才繼位為王，被眾諸侯視為篡位，所以，雖平王東遷，各諸侯國，特別是東部以魯國為首的大國，均不對他行“天子”之禮，因此，周平王號令不行。而號令不行的結果，一是因上行下效而帶來了各諸侯國內部的篡奪和亂權：自魯恆公弑兄，魯隱公自立，其後十九年，列國國內篡權謀亂，竟成風氣。二是因列國內亂，才造成了各諸侯國之間發動征討和兼併的機遇。春秋初期，雖曾擁有一百三十多個諸侯國家，卻因此月消年滅，最後祇剩下了十二、三個大國，就是魯、衛、齊、楚、宋、鄭、秦、陳、蔡、曹、燕、吳等。上面兩種狀況的形成，對周建號以來華夏民族的發展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引發了游牧部落一一

戎、狄、蠻、夷的乘勢侵擾。在那個時候，這些雖然雜處在華夏民族地區的游牧部落，非但文化落後，而且崇尚武力。其中尤以北戎和自稱蠻族的南方楚國最富有，最有武力征服的力量，和最有武力兼併的野心。當此之時，正處在自亂和內亂之中的東周列國，倘使不能聯手以抗強敵，則華夏民族的存亡，特別是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便會成為一個大大的問號。但是，華夏民族卻能夠於此時，也就是在周王室號令不行的歲月裏，因齊恆、晉文的霸業已成，而能內聯諸侯，外抗戎蠻，不單以護疆保族為心志，更能以教化蠻戎為進取。其間，諸侯霸主晉國在武力上對群戎南侵的戰勝，和華夏文化對南蠻楚國的同化（我在後面要說到），非但未使華夏淪喪消亡，卻反而使得華夏民族，因歷經春秋“抗戎化蠻”之變，而擴大了疆土，傳播了文化，更使得華夏民族為形成一個有規模的諸夏民族，華夏諸國為催生一個多民族的統一中國，擴張了疆土，傳播了文明。它雖非主觀之想，卻成為客觀之變。為其後大中國的統一、特別是大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歷史的趨勢。千餘年之後，雖然族大國大的中華民族之中國，因東漢末年的長期混亂，三國鼎立的短暫形成，西晉一朝的政治腐敗，又一次招致了已經雜居在北中國的“五胡之亂”，不單造成了十六國相卷相生、相侵相克的國家混亂局面，而且造成了四百年之久的民族文化亂局，特別是為外來宗教文化製造了“乘隙而入”的歷史機遇，但是，蓋因中華民族的民族之根已經穩固，中華民族之民族文化的枝葉早已茂盛，所以，隨著隋唐的統一，中華民族的中國，還是迎來了她的又一個大中華和大中國時代。歷史就是如此地證明了上古與中古時代，中華民族生成發展的“顛撲不滅”之勢。

再就是，自中古以來，中華民族又在自己的歷史上遭遇了三次外族和外國的入侵，並且當真兩次都亡了國。一是宋亡於蒙，雖然她在歐亞諸國當中為蒙古人所最難征服者，抗爭時間也最長；二是明亡於滿，雖然它亡國的真正原因，誠如滿清攝政王多爾袞所言，乃是“大清的江山並非得自大明，而是得自闖賊”。由是，漢人的江山便兩度為兩個外來的游牧尚武民族所一統，這似乎是該罵的了。但是，惟其有著自我傳承的心志，而且擁有著足以保證傳承的優秀文化和文明，所以，大宋、大明的國雖然是亡了，中華民族豈沒有亡，而且將亡我者同化掉了：蒙古成了中國的一個部分，蒙族也進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滿人則全然為中華文化所同化。所以，我們的中華民族，我們的中國，國家居然越來越大，文化更是越來越豐富了！如果這還不能說明中華民族意在民族傳承的心志，不能說明這個心志的堅強、堅韌、及其所富有的偉大包容之心，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那一個民族比我們求傳承的心志更強、更烈了！

特別是中華民族所遭遇的第三次入侵，就是日本帝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面對這場侵略，前半期足足有四年半，我們祇能孤軍抵抗，何況日本侵略者又與中國國內的馬列子孫、北方的蘇俄共產勢力和殘餘軍閥中極少數最壞的軍閥相互勾結，遙相呼應，更被馬列子孫們擾亂破壞始終。但是，面對旨在亡我中華的頑敵，中華民族意在傳承的意志豈但不滅，而且堅韌不拔。民族大義之下，那些在抗戰前和局部抗戰期間都曾想作壁上觀的絕大多數殘餘軍閥們，這些在辛亥之後一直以持槍稱亂為能耐的殘餘軍事割據勢力，竟全部能夠在大敵當前、民族存亡之秋，一致團結抗戰，奮勇殺敵在前。一時間，中華民族，中國境內，除掉那伙口喊心非的馬列子孫們以外，可以說，無不達成了空前的民族團結，打出了未有的民族威風。否則，直至珍珠港事變前的整整四年半孤軍抗戰，非但無法堅持下來；就是珍珠港事變之後的三年半苦磨苦戰，怕也是無法打得下去的。與“一個在組織、裝備和訓練上幾乎比我們要先進一個世紀”的狂敵的抵抗中，中華民國不僅沒有亡國，中華民族更沒有亡族。用美國史學家易勞逸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要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後來的內戰中被中國的馬列子孫打敗，從而掩蓋了她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豐功偉績，那末，全世界的歷史學家們都會將她領導的偉大衛國、衛族戰爭，當作一篇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大書特書的……所以，如果有誰還要說我們中華民族沒有意在傳承的偉大心志，我們就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中華民族“有生無死、即死即生”的悠久歷史是怎樣形成的了！

## 第二是在文化上。

由於企圖亡我之敵，縱使有武力亡我國家，卻沒有“文力”來亡我文化，所以，他們才會最終地敗下陣去。更因為我們在文化上反敗為勝，而使得我們的民族不會滅亡，也不可能滅亡。因為，說到底，文化——民族的文化，才是一個民族的底氣和底力所在，才是一個民族賴以凝聚、存在和發展的“功底”。

然而，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或者說，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源頭在哪裏？她，又是依賴著一種怎樣的環境而形成的呢？因為，沒有形成，何來發展？而文化、特別是一種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非依賴於“自由”不可。一個思想從來沒有獲得過自由的民族，要想創造燦爛的文化，實際上絕無可能。歐洲漫長的中世紀幾乎毀滅了自己相對自由的上古文明，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中華民族在其“大民族”形成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而它所依賴的便是一個相當自由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這個環境，就是西周一朝，特別是東周的春秋時代，以及其後的戰國時期。如果說，西周的

建立，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華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那末，春秋時期，則將西周一朝所形成的封建貴族文化，也就是史家們所說的“王官文化”，發展到了“極優美、極高尚與極細膩”的高度。特別是其後的戰國時代，更有所謂“遊士”、也就是一批有著政治抱負的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將貴族的“王官之學”，推向了平民的“百家之學”，進入了“百家爭鳴”的自由階段。而也正是從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原來世襲的封侯建國，已逐漸地為新興的統治者或瓜分、或取代、或霸持，由是，封建政治的嚴格等級非但已經被衝破，學術的貴族藩籬也已經被沖決，儒學的創始者孔子，便因時代賦予了他身懷抱負的自由，研究政治的自由，創始學識的自由，記史訂史的自由，講學傳學的自由，和“敬鬼神而不事鬼神”的自由，因而，才使他成為我們民族“真自由派”、而非“假自由派”的開山學祖，和我們民族主流文化的奠基之人。比他稍後的歐洲先哲蘇格拉底，卻因為“窺探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而被法官用一杯毒藥處死（伯奈特：英文版《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80頁）。

孔子稍後的墨子，雖曾師孔子的儒學，卻又因他要做下層民眾的思想代表，他的反儒的思想學術，卻也非但為時代所容，而且為後世所傳，甚至得以學術大宗的歷史地位，且與孔子並列為“前二子”。孔、墨“二子”之後，雖因戰國的紛亂和各國政治的自由，使得遊士派知識份子，或仕，或不仕，或倡苦行，或倡為我，或願為人養，或不欲為養，但他們都為戰國的“後三子”——也就是既有聯繫、又有對立的後三派學宗——老子、荀子和韓非子之各家學派的形成，提供了一個過渡階段。華夏民族因此而不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體系，而且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規模；不僅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境界，而且結出了民族文化的碩果。可以說，秦前三代的華夏文化，終於為秦以後的中華文化，奠了根基。如同古代希臘羅馬文化，也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足足影響了整個西方歷史直至今天一樣，此後的二千餘年，無論中華民族是盛還是衰，國家是興還是亡，這個被後人稱做中華文化的我們的民族文化，均未因“時難年荒而煙滅”，亦未因“國運昌盛而虛化”，而是以它的深沉、遒勁、堅韌和綿密，非但能夠救我民族於沉溺之命，而且能夠救我中國於患難之時。也就是說，蓋因前秦三代萌發、造就、奠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所以，中華民族才有了傳承和發展的文化力量與文化功底，才有可能歷經數千年，雖顛仆不止，卻生生不已……

那末，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傳承下來的呢？

先秦的貴族文化和貴族文化向民間文化的轉擅，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我們民族文化的自由化和多樣化的形成，我

就不再說了。我想說的是，在秦以後的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那些朝代更替之時，我們的民族文化，又是怎樣地克服了千難萬阻，而獲得了傳承的。

我要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這是個中國歷史上人人皆知的壞事。因為秦始皇得罪的是文人，所以，他已經被罵了兩千多年，甚至直到今天，那些仍然不敢大罵毛澤東、不敢真罵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統治下既“有名”、又有“自由”的“自由派”們，也仍然在用秦始皇當作他們的“出氣筒子”。就象你祇要大罵西方的馬列洋教，他馬上就要罵中國的儒家文化一樣；祇要你罵毛澤東，他馬上就要罵秦始皇。其實，正如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教授所“罵”的那樣，“毛澤東實在比秦始皇壞了一百倍！”（《世界日報》古今上下版，2003年7月11日）

秦始皇確實是該罵的，但是，他該罵的地方，和他那個過於短暫的“二世王朝”，卻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影響不大——因為，既然已經給人罵了兩千年，也就是給人“否定”了兩千年了！說明後人從來就是不認同他的，甚至祇將他當成了一面“反面的鏡子”。儘管如此，倘若我們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其原因，以及他的具體做法，做一個簡單的說明，那末，一些偏要用罵秦始皇來代替罵毛澤東的人，便站不住腳。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起於“議政衝突”，起於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博士們“稱說詩書，引據古典，主復封建，李斯極斥之，遂牽連而請焚書”。並且這是在秦統一中國八年之後。也就是說，是因為被滅亡的六國舊貴族知識份子，也是為秦王朝所厚待的上層知識份子——博士官們，要“廢除進步的郡縣平民政治以復辟落後的分封式貴族政治”，才引發了這一悲慘的歷史事件。這是與毛澤東開朝即始便“大殺天下”所絕不可以相比的。而焚燒典籍其主要者，是“六國史記”，即“非秦記皆燒之”；其次才是“詩書古文”；其所坑者也有限制，即：“敢偶語詩書者棄市”，“百家語”不在其內；而“令下三十日不燒者，鯨為城旦”，卻未枉殺；其宗旨，則是“重禁議政，輕禁挾書”，所以，他坑的便是八年來歲歲月月都在逼迫他要復辟封建的四百六十個為他所厚待的舊貴族文人。這與二千年之後自登基始便要年年殺、月月殺、天天殺，甚至要一次又一次地“引蛇出洞”，一次又一次地要發動政治運動，以進行大規模、和史無前例之“焚和殺”的毛澤東相比，實在是天差地別！也許，這就是秦王朝雖焚書，但“史官、博士官卻未廢，真實的著述既未中斷，漢初群臣也多有學問”的原因。當然，這又是毛家洋教王朝的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們所不能想像、所更不能相比的了！更是那些至今還在“以大罵秦始皇來維護毛澤東”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所永遠也站不住腳的地方。

我之所以將焚書坑儒的事情說了這許多，目的，不是要辨識這一歷史事件，更不是要和直到今天還在對中共“小罵大幫忙”的“精英”們辯論，是因為我們祇有明白了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我們才能對中華民族在她文化傳承中所遭遇的第一個“鬼門關”，和秦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又是怎樣才解決了秦後我們民族文化傳承的問題，作一個必要的鋪墊。因為，毫無疑意的是，正是秦始皇的焚書，才為大漢一朝“存亡續絕”我優秀的民族文化，留下了一個及其重要的歷史使命。

所以，秦後漢初，中國知識份子們所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通過口傳耳記，將秦以前的文化典籍，予以恢復。這就是漢代“今文今學”的誕生。其後，由於不斷地發現了秦前的文化典籍，於是，對秦前文化典籍的辨偽和註釋，便又誕生了漢代中期之後的“古文今學”。而也正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相繼產生，才將許多被秦焚滅的中華文化遺產，從死中救活了過來。然而，豈但是救活，更就此又推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成了一位有見識有發展的大儒，司馬遷則成了舉世罕有的史家……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得以傳承，中國先秦的進步文化典籍也因此而得以保存、傳揚和發展。

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是：兩晉南北朝和五胡亂華時期，一方面是政治的腐敗，一方面是因民族混戰所造成的混亂，這樣，不僅胡人落後的文化曾伴隨著它們的淫亂氣質和嗜殺作風，入侵了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而且，乘虛而入的外來宗教——佛教，也就在五胡亂華的漫長亂世之間，擴張在我們的中華，其影響之速和播流之廣，迄今尚無一家宗教能夠與它相比。雖然，它始終祇是一個劇烈影響著我們民族文化的巨大旁支，卻從未成為主流，但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滲透，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輕看的。特別是它和傳統道家思想對兩晉南北朝士人風氣和性格的影響，就更是不能輕視。因為中華文化和文明那種向上的、富有創造精神的元氣，就曾在政治黑暗、佛老暢行之間，幾乎奄奄一息。但是，歷經了幾乎四百年的亂世之後，一旦隋唐統一，社會重入安定發展之時，由三百年混亂時代所帶來的，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干擾和破壞，非但祇需要一句“前無古人”的響亮詩句，就能夠號召起一家“古文運動”，使詩人們擦亮了眼睛，使得南北朝的浮糜文風迅速地得以扭轉，更在文壇上起到了革面洗心式的作用。特別是唐代中期之後佛教“禪宗”的出現，就不僅是用我們自身的民族文化，對傳入中國的佛教進行了一次磨洗，而且將西來的佛教經典，進行了一次向我們民族文化和我們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學”的轉型，從而使播流中華的佛教因擁懷“儒心”，而成為與中華文明相銜相透的真正中國式佛教。唐後，兩宋則乾脆在承襲唐一

代古文運動和“禪宗變佛”的基礎之上，不僅否定了魏晉，而且要否定兩漢，直接把民族文化的蹤源定盤在秦以前的三代之間，以重歸孔孟為號召，將代表了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學，信仰化、理想化、道德化和泛政治化了。於是，中華民族以宋明新儒家理學為宗旨的民族文化，便在遙遙七百年間，得到了又一次重要的傳承。

此後，元人滅宋，雖不知中華文化之貴重，卻以他們淺薄的理解，將中華文化的內容當成了政權賴以統治的工具，將漢民族文化中的政治文化，簡單地理解為“漢法”，並要“以漢法來治漢”，一方面踐踏士人的精神和品質，一方面卻又開啟了以宋註《四書》為經典的科舉考試之途，並流傳明、清兩朝。雖然對中華文化迄無建樹，卻既沒有坑，也沒有焚。經典子集，照樣在民間流傳，更在民間作為漢人的精神支柱，而得到了處處留心和時時在意的保存和保護。然後，明雖亡於清，但有清一朝，由於滿族統治者，一方面要全面繼承漢文化，一方面又要“留頭不留髮”的凌辱漢人，於是，知識份子中的有心志者，則為衛護和傳承漢學，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而鄙棄科舉，自沉於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疏通和考據之中，從而將滿清一朝竟做成了整理“族故”而有大成就的朝代。

至於辛亥前後由西學東漸而產生的，對於我們民族的自我輕易否定，甚至是自我侮辱，卻又因為三十年代出現了一批對東西學皆有專長的優秀中國知識份子，他們便以既要保存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又要消化吸收進步的西方近代文明為宗旨，意在融合和貫通東西文化，不僅傳承民族文化有功，而且借鑒西方文明有績，做出了不小的成就。要不是事後國難年年，國亂當頭，馬列洋教因一戰而屈我民族文化、滅我民族文化長達五十餘年之久，我們今日又何需再來重新認識自身的民族文化，並為了傳承它、發展它而痛心疾首，而大聲疾呼，甚至還要面對所謂“自由派精英們的虎視眈眈”呢？

**現在，我再來講中華民族志在發展的事實。**

**第一還是先說國事上的發展。**

我要說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東周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這段歷史時期，應該說是我們族史和國史上的一個極重要發展時期。因為，這個發展的動力，一是來自人民怨戰，潮流趨統。而“書同文、車同軌”等等的大進步，又祇對整個中國的發展有利，而非有害。二是由於戰國時期平民學術思想的迅速發展和興盛，和平民得以干預各國貴族政治的實際經驗和貢獻，才造就了為秦所頒定的，“廢封建貴族政治和置郡縣平民政治”——這樣一個在整個專制制度範圍內之

相對先進政治制度的出現。雖然它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在楚、晉等國局部地實行過。此後一千四百年，直到明太祖廢宰相始，其間歷朝歷代王室和政府的關係，雖然沒有上升到“君主有憲”的高度，但王室和政府的相互制約，卻使得歷代王室難以象明清兩代的皇帝所稱：“祖宗家法，乾綱獨斷”。而漢初雖然不得已而仍有“封侯建國”之舉措，但是，它祇是一種局部的和暫時的倒退。因為，漢高祖雖有封建，卻不廢郡縣。此後，歷經文、宣兩帝而直至漢武帝，封建和反封建的鬥爭就一直沒有停歇過。但在歷經了九十年“反封建和要封建”的反復較量之後，漢武帝終於以頒布“推恩令”為手段，而最終地廢除了“封建”。自此，封侯建國，才成了中國的歷史，而由郡縣制所標舉的平民政治，亦終於得以穩固和發展。

我要說的第二件事，就是現在常有“精英”們說，自秦以降二千年，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專制獨裁。但是，如果滿腦袋“洋教”的“精英”們當真也能夠虛心地瞭解一點自己祖宗的歷史和文化，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從“封建”而走向“郡縣”，固如我在前面所說，已經是一大進步；而自漢始，由皇室、外戚和軍人所組成的政府，卻能夠漸漸地變化發展成了士人、也就是由平民知識精英所組成的政府，這自然又是一個大大的進步。其後，士人政府在頻繁的朝代更替、特別是魏晉亂世之間，因形成了等級門閥制度，而至於妒才嫉能，造成平民士源的枯竭，直至必然走向腐敗和腐朽。但也正因其腐敗和腐朽的出現，直至禍國，才因隋唐的統一，而由門閥士人的專政，迅速轉變成了科舉競選。於是，一批又一批民間知識精英，便通過科舉競選，於反掌之間，就能夠躋身朝堂。唐宋以降，該有多少好宰相出自“寒們”、甚至是“貧下中農”之家……生活在馬列王朝的中共精英們，其實祇要稍稍瞭解秦以下二千年間中國君主王朝一再進步發展的政治歷史，大約在你們不敢“小罵”共產黨的專政獨裁之時，也就不會“大罵”死去祖宗們獨裁專制的“劣根性”了。

我要說的第三件事，就是辛亥革命對我們民族的偉大發展意義。而之所以稱它為偉大發展，就是因為它愛民族，敬民權，猶惜乎民生。而且，它“愛民族”，非祇愛漢家一族，而是愛我中華所有的民族。孫中山提出“驅滿”，祇是要驅除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而非在驅除滿族一族；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就更是說明他的民族主義，乃是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而“敬民權”，自然又是他要從我們老祖宗提出的“民為邦本”出發，再將其“維護君權”的本相，引導向真正地維護民權和提倡民主；而猶惜乎民生，就更是將全體國民的民生都包容在他的民生理論之中，而絕不為某一個階級去謀生活的幸福，這就

使他與任何一個被階級化了、被社會集團化了的偏激經濟追求，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劃開了一個鮮明的界限，從而消彌了人為地“製造社會等級”、甚至是“製造階級鬥爭”的可能。

朋友們，這個革命，這個革命的宗旨，這個革命的歷史性追求，和這個革命“作為一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革命”（歷史劇《走向共和》台詞），它對於前朝統治集團和統治基礎的“善待”，對於我們這個老大的民族來說，難道不是發展，竟然還是倒退嗎？難道不是應該，而是不該嗎？辛亥之後，在中國所發生的形形色色的混亂，說到底，無非是進步力量和種種旨在倒退力量之間的衝突和較量罷了。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叫做“一口吃不成一個胖子”，辛亥革命作為現代中國鉅大發展的一個開始，作為中國“走向共和”的開端，它之必然要遭遇形形色色反動勢力、甚至是革命名義下之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倒算，就歷史發展的客觀狀態而言，也就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情。而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認清她志在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就是為了捍衛它的成果，並為了繼續發展它的成果而努力。

這雖然又為中共一朝的精英們所反對，所痛罵，卻無疑為中華民族志在發展的心志所肯定。

## 第二再說文化上的發展

在舉例說明民族文化發展的幾個簡單事實之前，我以為有必要先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這樣一個評價，那就是：

首先，在我們數千年文化文明的歷史上，**中華民族形成并發展了一個在全世界都能夠堪稱是“最為文明開化”的“神教文化”**。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其次，就是在我們數千年的文化文明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開明通達的儒家主流文化。或者說，蓋因這個儒家文化又形成和發展了“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操守為標準的君子文化，和以自由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在各種文化均能共存共興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發展歷史上，儒家文化才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主流，或曰主流的民族文化**。

再者，就是從我們民族的文化文明發展脈絡上來看，除掉當今的馬列洋教復辟王朝以外，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一直都在享受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政治環境，一直都在表現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發展趨勢，從而文學成果輝煌。

**第一，我要先說我們中華兒女理當引以為驕傲的、“最為文明開化”的“神教文化”，及其形成和發展。**

應該說，我們的中國，從上古時代起，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健康和相當文明的“神教文化”，或曰“神教觀

念”。這一神教文化或曰觀念，不僅成爲中華民族數千年神教文化的主流，而且成爲中華民族在她數千年的文明歷史上，直至一九四九年之前，無論興衰存亡，都從未採用過“教政合一”這樣一種極端反動體制的根本文化原由。

爲什麼？因爲自上古時代開始，我們的古人就祇信天上的上帝，卻不供奉天上的上帝。而“上帝就是上天”，所謂“天、帝、神”合一。而他們的統治者，就是上天的兒子，也就是“天子”。西周以下，所謂“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所謂“民置於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說祭天是天子的事，而人民雖享受著上帝所賜予的福運，卻無需去祭祀他，因爲有天子作代表了。如此，既然天子已經成爲上天與人民溝通的“媒介”，人間社會也就“無需任何的專門神教人員和專門的神教組織來代表天，來幫助上帝和人民進行溝通”。換言之，就是專門爲“上則加冕皇冠、下則教化靈魂”的專職教會和教士，便沒有了存在的需要。由是而“教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也就失去了它建立的宗教和社會基礎。如此一來，我們古人眼裏的“天下”，便是由“上帝、天子和人民”來共同組成的；而宗教，不過是天子對上帝的一種“祭禮”，沒有那末重要。這是其一。

其二，春秋末至戰國初，隨著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學術的誕生，成形和發展，又正確地傳承了和大大地發展了我們古人的神教文化，從而根據實際的人間生活，逐步地和開明地調整了“上帝、天子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孔子因認識到“天道遠，人道邇”，而更加重視生命、人生、國家和社會，那末，他進一步說出的“敬鬼神而遠之”和“祭神如神在”之類的话，則說明他對現實人生的思考，已經更加地佔據了他的視野和胸懷。而鄭子產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將上帝和人民的關係進一步地拉近了，“合一”了。所以，孟子才會說出“民貴君輕”的話，甚至更進一步地說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推此心足以保天下”的話來。如此，“上帝、天子和人民”的關係，便被逐步地予以了調整。而調整後的關係則是：上帝既要聽人民的聲音，上帝還要考察他的兒子——天子，是否能夠“保民而王”，如果不能，他就會發出革命的號召或命令，也就是“變革天命”，亦所謂“皇天上帝，改元闕子”了！

到了漢代，由儒家學術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論，“五德終始”理論，已經認爲上帝會用“災異示驚”、直到要用“變革天命”來更替不能“保民而王”的天子和朝代。東漢光武帝開元的帝號取名爲“更始”，便是由此而來。它不僅對“要遞萬世而爲君”的家族永久獨裁思想予以了否定，在理論上建立了“爲保民而能夠、甚至是必須改朝換代”的合理性；而且，由於改朝換代的命令乃是“天命”，其過程才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所謂“天命難違”。

因此，在中國，宗教便不是這一變革天命的動力和權力所在，這就使得可以乘變亂而發展的宗教，卻不能於變亂之中獲取正宗的權力，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成就“教政合一”的宗教專制統治。這與西洋因宗教左右政治，由宗教來左右變革，甚至形成千年“教政合一”之極端反動的政治制度，直至不反對教會神權就無以進步的歷史相比，中華民族之神教文化，及其發展的進步性，就更顯得開明開化了。

其三，由於中國古代的主流文化，逐漸地朝著“視上帝於無形”和“上天更愛人民”這樣一些思想和要求發展，所以，從總體而言，我們的古人也就愈加地“重人道而輕神道”。而“重人道卻輕神道”的結果，則是“重學術而輕宗教”。春秋以下，因重學術，而重師道；因輕宗教，而輕教道；即便是懷有一定的儒家理想、卻又要廣佈神仙迷信的漢代陰陽家們，就算他們自己已經“得道成仙”，卻也樂意被人尊稱爲“天師”，一般的傳教者，卻祇能被稱爲“方士”或“道士”。所以，中國才會有所謂“師道尊嚴”的傳統，而無“教道尊嚴”的傳承。因而，在中國，宗教要想爬上比“師道”還要尊嚴的地位，甚至要爬到“天子”的頭上，以教權代替王權，更由教權來加冕王權，從而形成“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體制，也就更加沒有了可能。何況，在古代中國，不論是儒家，是陰陽家，還是後來的佛家，蓋因中國人重學術而輕宗教，即便是宗教，也常爲知識份子當作學術而予以研究，因此，各派學術乃至宗教，都不會成爲一個嚴密的人間組織，祇可能成爲一種鬆散的社會集團。一旦命逢亂世，即便有人要利用宗教思想來建立嚴密的“宗教組織”，以實行政治造反，則祇要“天命已改”，這一類旨在造反的嚴密宗教組織，也就如鳥獸散了，即使餘波流連，而漣漪終會消失。所以，一些“政教合一”的民間造反勢力，雖能於亂世之間得以短暫的存在，甚至是迅速的發展，卻既不能維持長久，更不能成爲正統，祇是造成了一度的紛亂而已，對於撼動舊王朝雖然有利，對於建設新天下卻無功。就不要說是在當代了。

其四，中國的神教文化起源於上古，初成於春秋末季，在戰國時期基本上已經“成形”，也就是已經形成了她自己的傳統特徵。如果我在前面已經敘述了這一傳統神教文化特徵的形成，那末，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正是在春秋戰國，中國文化、包括神教文化的形成期和成熟期，恰恰又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最爲自由的歷史時期。因爲，那時，中國尚未統一，各諸侯國尚處在客觀上“謀統”的自由發展時期。以諸夏文化爲主體的華夏民族文化，尚處在自身的發展成形期，和對雜處的犬、戎、蠻、夷等游牧部族予以文化浸潤的時期。所以，政治的自由和社會的自由，就必然地帶來了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而這個自由發展，既有力地形成了

後來中華民族之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又相應地形成了反儒的墨家文化。如果說，儒墨兩家文化為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注意，這裡是說民族、而非某個王朝的正統文化）立了根基，墨家文化的出現，則為儒家文化的反對派文化留下了“合法存在”的地盤。而孔、墨“前二子”之後，戰國時期“後三子”——老子、荀子和韓非子的出現，就更為“中華民族各派民族文化的自由生存發展權”，奠定了傳統的基石。這就是秦漢以下，不論何種思想文化流派曾遭遇過何等坑焚的命運，曾得到過何等至尊的地位，這個地位也不能叫它的天子和政府來為它而“殺盡百家”，卻仍然要予其它文化流派以合法存在。如果說秦始皇“焚書坑儒”，雖因恐懼六國舊貴族要求復辟封建制，害怕人民造反，沒有、也不可能“殺盡百家”（因他祇禁百家之書，卻不殺“藏、讀百家”之人），卻使得要想“萬世而立”的秦王朝“二世而亡”，那末，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也祇是“獨尊儒家學術和治儒的學者”而已，更不是要將儒家學術和儒家學者捧到政府和皇帝老子的頭頂上，由他們來加冕，亦由他們來“霸政、霸權、霸思想、甚至是霸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正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同時和之後，陰陽五行學說，神仙道家迷信，不僅誘惑了晚年的武帝本人，而且，正是在兩漢，才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才走上了發展的歧途呢？所以，即便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也不過是“視儒術為可以安邦治國的主流學問”而已。因此，將君主制度、平民政府定了型的大一統漢家朝廷，也就不可能推行“教政合一”這一足以窒息一切生機的極端專制統治了。不論是上層社會，還是下層人民，特別是各種層次的知識份子，還是都能夠傳承和享受著中國人所早已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

其五，兩漢以後，雖然中國亂紛紛了四百年，西傳東來的佛教，乘機擴張，上與名士清談相接，下與神仙方術相近，可是，在南方，即便有三位皇帝曾“為佛舍身”，梁武帝一人就曾三次“入寺為奴”，然而，這位篤信佛教的皇帝卻從未將實際政治和政務，與“信佛、揚佛”混為一談，甚至能夠開台打擂，與反對佛教的學人辯論，就是辯論輸了，也不抓人殺人！這該是具有著怎樣寬闊的思想文化胸懷！

但是，幾乎與中國的魏晉時代同時，即在紀元後 412—444 年，在歐洲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利亞的一位大主教聖賽瑞利，是一位人神一體論的擁護者，也是一個狂熱分子，他曾利用身為大主教的職位，幾次煽起對猶太人的集團屠殺，加害於住在亞歷山大利亞城中大片猶太僑民區中的居民。而他的名聲竟主要是藉著施加私刑於一位傑出的貴婦人希帕莎而獲得。在這個愚頑的時代裏，希帕莎熱心地依附於新柏拉圖哲學，並以她的才智從事於數學研究。但是，有一天，她卻被從二輪車上拖將下來，剝光了衣服，拉進教堂，

遭到讀經者彼德和一群野蠻、殘忍的狂信分子的無情殺害。他們用尖銳的蠟燭把她的肉一片片地從骨骼上剝掉，然後把她尚在顫動的四肢投進了熊熊的烈火……”歐洲中世紀宗教專制統治的殘酷，在此可見一斑；至於歐洲中世紀末的科學家哥白尼和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所遭遇的殘酷命運，就更不必說了……這不僅為中國古代開明開化的神教文化所不能想像，而且是直至一九四九年前的數千年中國都不可能發生的宗教慘案……

中華民族科學的神教文化，不僅在迷佛的梁武帝心中，影響深重，而使他難越雷池一步，更不曾想要“以教代政”，而且南朝的士人，亦不過是將佛教納為“清談”，重在“義理”之辯，而非關政治之實。在北方，石勒、石虎兄弟，雖因宣稱“朕生自邊垂，君臨諸夏，以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卻也沒有走向“以佛代政”或“佛政合一”。到了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他們的兩度“毀佛”，雖因佛、道衝突而起，卻意在抑制佛門的“肆意猖狂”，卻也沒有將道家推崇到必須“以道治國”和“道政合一”的地步。道教還是道教而已。北魏武帝的重臣，倡導反佛者崔浩的被誅殺；北周武帝時，大臣衛元嵩上書要武帝“宗周卻佛”（指中國上古周王朝），要“以城皇為首塔，即周主為如來”，他的目的，也不過是要抑制佛教對當下社會的不良影響。彼時，出身於五胡的北周武帝，之所以會贊同他的建言，甚至會說出“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的話，祇能說，他在文化上已經為中華文化所同化了。所以，他的毀佛法，才是抑制佛教，而非“與道教的合一”。

佛教信仰因亂世而入中華，亦因中華亂世而大獲傳播，進而發展、坐大，直至成為“有教義、有地盤、有財產、有僧眾的民間‘教政合一’式封建勢力”，但是，從南北朝而至隋唐，中華民族從揚佛而終於走向了“平佛”，即從對佛教的誇張、厚待、甚至放縱，走向了終於能夠以平常心待之，直至將它匯入中華的主流文化——儒學，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不僅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教化力量。唐代中期佛教“禪宗”的出現，就是佛教儒化、即中國化的一個結果。此後，不論宋、元、明、清視佛教是尊還是賤，佛教終不過是宗教自由之中國的一家宗教而已。

可以說，直至二十世紀，在馬列夾帶著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的鬼影，浸透著蘇俄現代“教政合一”極權統治的鮮血，入侵中國，對我們民族施行了瘋狂的文化侵略、無恥的武裝顛覆、和殘忍的宗教屠殺，實行了“五千年中國從未有過的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統治”，則中華民族便能自始自終地向這個若大的地球宣稱：吾國自古以來何有宗教戰爭？更哪有千千萬萬、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第二，我在前面說過，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文明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開明通達的儒家文化，它既是“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又是“以操守為標準的君子文化”，還是以“以自由為追求的人道文化”，所以，不論它自身有著怎樣的缺陷，對民族歷史的發展有過何種負面的影響，它還是以自己“王道文化”而非“霸道文化”的優秀文明素質，自始至終地佔據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地位，豈但影響了我們民族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而且勢將以它的“開明、通達、知新和通變”，來影響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歷史。特別是當前，在中華民族必須於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亟需下決心“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關鍵時期，它就顯得尤其地重要了。而馬列和中國的馬列子孫對他的既燒且焚，既批又殺，和中華民族半個世紀以來之整個文化道德的日漸“趨下”，甚至是日漸“崩潰”，恰恰從反面告訴了我們，今天，重新宏揚我們民族的主流文化對於我們民族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性，和對於我們必須“推倒馬克思像下的中國”，必須重建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中國的尤其重要性。

顯然，我不可能在這裏就儒家文化來作專論，這是我要寫的另一本書。但是，我卻可以在這裏，對以王道文化為“品流”的我們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作幾個簡單的和事實性的說明。

一個事實是，我曾在前面說過，在春秋的內亂和兼併時期，齊恆、晉文曾藉霸業之成，而北抗群戎，南抗蠻楚。其時，對於華夏民族與列國而言，最大的危險卻來自南邊的楚國。因為，當時的楚國地廣勢強，又富蠻夷之性，它曾宣言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也就是想乘亂侵略中國了。但是，南蠻楚國雖因乘機征伐，而滅掉了漢陽一帶華夏姬姓諸侯國眾多，但是，它卻在對北方華夏民族征討鬻亂的過程中，受到了華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響，竟然漸漸地變“嗜侵略”而為“愛和平”，變“亂中國”而為“入中國”了！也就是說，由一個彪悍的蠻夷而逐漸覺醒，並逐漸“善變”為一個“要知華夏文明、欲加華夏之盟”的“盟國”了，也就是說，蠻楚終於為華夏文明所同化。據歷史記載，後來，楚莊王雖曾攻打過陳國，卻因申叔時諫言，便恢復了陳國；雖攻打過鄭國，卻又能夠在打贏之後自行退兵而不佔領；於楚晉邲一戰中，它曾將宋團團圍住，卻祇因為有人告知宋國國內已經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況，楚王居然能夠以華夏文化之“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時的南蠻楚國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莽莽楚天，終於變成了我華夏民族的美麗南國……

如果說蠻楚吸收華夏文化的時期，還是我們民族“王道文化”的形成期，是儒家文化賴以形成的雛形期，儒家文化

也正是從這裏才吸收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營養，那末，春秋末期，隨之而形成的儒家文化，就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理論上，將我們的王道文化儒學化了，從此，儒學成了中華王道文化的核心部份，中華王道文化也以“儒學為體”了。所以，在春秋列國內亂、戰國各國紛爭的時代氣氛之下，孔子便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隨後，孟子則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到了漢代，賈捐之則在勸進皇帝的“罷棄珠崖書”中稱：“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至此，中華文化重教化而非重殺戮的主流文化——儒學，已經在國家、民族、政治等各個方面，處於明顯的主流地位。

另一個事實則是，時至漢武帝前後，通常都是在吃了匈奴的敗仗、或遭遇到匈奴的威脅之後，才會用“和親的辦法來安撫匈奴，解決邊患”；但到了我們的盛唐時代，唐太宗卻是在打敗了土番的侵略之後，仍然要派公主去“和親”。如果說這種處理民族問題的政治行為，已經表現出“孔子曰仁、孟子取義”的儒家文化內涵，鮮明地突顯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文明水平，那末，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更早體現了儒教文化以“仁義”為標幟的特質，彰明了依照儒家文化處理民族問題的文明方式。這個方式，還是“重教化”，而非“重殺戮”。就是將我們祇願以“文德昭之”的漢民族文明文化，具體地演化為處理民族問題的“文明原則”。這個文明原則，應該說一直表現在我們民族自身追求發展的道路。也許，我們並沒有完全做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但是，中華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上，主要不是靠“武打”，而是靠“教化”而得到的“廣土眾民”這樣一個事實；中華民族在其悠久的民族歷史上；主要是建武裝以自衛，卻很少以發動侵略來施行擴張的歷史行為；無不在在都表現了我們的文明成熟之早，和民族文化的成熟之深。當然，這個“深”字與儒學的關係，明眼者自然“一見便知”。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第三，我已在前面指出，除掉當今的馬列洋教復辟王朝以外，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一直都在享受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政治環境，一直都在表現著相當的和相對的自由發展趨勢，從而文化成果輝煌。對此，我祇想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的輪廓和本相，來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原來是一個搞文學的，既從事文學創作，又作文學研究，雖然水平不能說高，但也不能說完全不通。但是，我年輕時代閱讀的第一部文學史，卻是高爾基的“俄國文學史”。因為，共產黨“以俄為父”，我們也就在任何方面必須“以俄為師”和“以俄為學”了，甚至和現在那些高唱“俄羅斯是優秀民族”、“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的共產黨“精英”們一樣，以為俄國文學真是了不得，實在能夠作我

們中國文學的楷模。但是，待我稍長，並且在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論著之後，我的看法開始發生了變化。因為無論就文學史的源遠流長而論，還是從文學作品的深刻雋永而言，哪怕就是將被人吹上了天的貴族托爾斯泰，拿來跟我們的落難作家曹雪芹比上一比，托氏也不能與曹氏一比，或者說得謙虛一點，頂多也祇是“風采各異”罷了。再後來，當我不僅僅了一點真文學，而且懂了一點真歷史，直至多少懂了一點我們民族的文化歷史之後，我才能夠對中國文學為“何能夠源遠流長，為何能夠成就輝煌，為何能夠深刻雋永”這樣一些文學的大是大非問題，有了自己的一點見解。

什麼樣的見解呢？

第一，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來就有一個自由的文化環境作它的歷史和社會基礎，特別是如前所說，由於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史上，直至一九四九年為止，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政教合一”的反動專制統治，哪怕是局部的和短暫的時期都沒有。因此，必須以思想自由為前提的文學創作自由，也就因為深享自由而獲得了自己創造的自由天地。這既是歐洲千年教政合一統治幾乎完全窒息了文學生命的原因，更是中國文學史之所以輝煌無比的根本緣由所在。是中國文學無論世道是盛是衰，文學家們都能夠“一唱三嘆”，或快其胸臆、或流連自傷的原因。即便是魏晉時代，司馬氏要假“名教”以攬權，阮藉、嵇康卻也能以老莊的“自然”相對抗。彼時，雖然崇尚清談的南北朝，其文學“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是，陶淵明則能以“一枝獨秀”而唱出了山光水色間的“雅好慷慨”，雖無建安文學的氣魄，卻有自然人生的品級。就不說魏晉一代雖然“艷曲生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於北朝的“天蒼蒼、野茫茫”和南朝的“浮艷輕靡號宮體”之間，竟然是橫空一鳴地誕生了劉勰的“文心雕龍”——這樣一部曠世的文藝美學巨著，他那“明道、宗經、徵聖”的吶喊，豈但是對於魏晉一代文學發展的批評和臧否，而且為後來者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也就是號召中國文學回歸“思無邪”、“怨而不怒”和“好色而不淫”的正途，廓清了理論的通途。

第二、中國文學的數千年發展，雖因沒有教政合一的殘酷和痛苦桎梏，而獲得了極大的創造自由，從而成果輝煌，但是，卻也因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乃是深藏著要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持高度負責責任感的“儒家”思想，因此，文學的教化作用，雖然不為政權所要求、所強迫，卻成為文學家們自己所自覺擔任起來的職責。並且，他們也象儒家通人一樣，懷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修養，既在個人的文學創作活動中，懷擁著經世致用的抱負；又在個人的

文學創作活動中，詠嘆著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認知和感慨……所以，孔子早已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魏文帝也才會說出：“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意思便是在告訴我們“文學與經國之志”的關係。而這個關係，便是“文學的社會功用”，便是“文學的教化作用”，便是“文學雖然是自由的文化事業”，卻也與社會文化文明的關係甚大。

第三，雖然儒家文化要求文學應重視自己的社會功用和教化作用，然而，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不論是哪一朝和哪一代，也不論是任何一個文學家或文學理論家，都沒有象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時期，文學必須成為和祇能成為“黑暗統治的頌歌”，也不像近代德國的文藝家席勒那樣，要求文學去做“時代的傳聲筒”，更沒有象沒有美學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那樣，要求文學去“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從詩經始，雖然“上有名教”，卻又“下有人生”，從而為“人的文學”和“文學的社會真實性”，留下了偌大的地盤，從而才能夠發展著、深藏著對於“真實人生”的表現和對於“美好人生”的追求。所以，即便是魏晉時代那些被指為“平典似道德論”的文學，即便是那個為改變風氣、而希望端正文學社會影響的“唐代古文運動”，哪怕是在理學過嚴的宋代——特別是當民族鬥爭已經帶來民族存亡和國家興亡的重大危機時，中國的文人們，雖然在自己的文學裏面強烈地表達了自己欲要經世致用的政治抱負和為國為民的人生理想，他們也同樣沒有將文學納入“為政治服務”的死胡同，從而為政治而消滅文學。

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學家們，“有條件”將真實，也就是“真實的思想、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文學表現”當成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才會被後人稱做是“周以後的詩經”；哀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甫，才為後人稱為“詩史”；岳飛的“滿江紅”雖然是一篇愛國愛族的壯麗篇章，但是人們在吟哦它的時候，誰都會從“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詩句中，感受到文學本身的巨大感染力量。所以，即便是中國的文學，從詩經的“怨而不怒”，終於發展到了紅樓夢的“怨而大怒”，但是，文學還是文學，它既不是政治的傳聲筒，更不是“任何一家政治和任何一項政策的螺絲釘或工具”。宋以後的所謂文以載道，也主要是要求對於文學思想性的重視，而不是在強求對於政權的忠誠。否則，要是和一九四九年之後一樣，文學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為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服務，必須做無產階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甚至祇能做黨和政府的“馴服工具”，則金瓶梅、

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還有牡丹亭、桃花扇等等堪稱偉大的文學戲劇作品，也就不可能問世了。這，大概就是中國雖然為儒家正統文化影響了數千年，但是，一是儒家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質、而非政治特質沒有規定文學的政治工具性，二是中國文學從它發軔之初就極其重視它自身表現的人生真實性和社會真實性，才為我們中國的文學留下了這樣一個“雖要為社會、卻更要為人生”這樣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文學史的輝煌歷史，實非“偶然”二字可以解釋，更非所謂的“精英”們可以隨便否定。

第四、中國文學的自由，和中國文學發展的自由，還來自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是“多教並存”的好制度。對文學而言，這個好制度之所以為好，就是因為它不僅為文學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了大好的思想自由環境，而且，為文學風格多樣化的形成和文學形式多樣化的形成，帶來了存在和發展的自由條件。因為文學的風格和形式，常常就是品嘗文學的創造性和文學的藝術性之高低的又一個重要標準。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就因有賴於這樣一個條件，中國的文學才能從詩歌、散文、傳奇、戲曲、戲劇直至小說，都能夠成就非凡；中國數千年的文學發展，才會不論是命運亂世，還是命運治世，都有它可以發展的廣闊天空，或自由之一隅。所以，漢賦雖因大一統王朝的聲威而形成了自己鋪陳揚麗的誇張風格，漢代文學卻又因“緣事而發”而能夠產生盡情歌唱人民悲苦的樂府和古詩，從而為後世文學的發展，注入了“為世道和為人生”的活力。東漢末年直至三國之後魏晉南北朝，雖然“三曹七子”已去，“建安風力”殆盡，但是，回應司馬氏黑暗統治和南北朝之亂世的，既有“古曲橫吹”的北國胡音，也有“粉艷綺靡”南朝“宮體”；雖有“巧而碎亂”的文人“小賦”，更有清靈俊秀的山水詩文，就不說那個已經“獨成蹊逕”、還要“上下而求索”的五柳先生了。然而，正是這個亂紛紛的四百年，又為中國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形成，和中國文學之“北雄南麗”風格的融合，特別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對後世文學風格的影響，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條件。其後，不論是重內容、重品位的建安風骨，還是重情采、重形式的南朝文風，或是重義理、重思辨的玄歌禪詩，甚至是仙風道骨式的道家風采，他們都在唐以後中國文學的輝煌發展中，為中國文學發展的高峯期，做好了有心無意的鋪墊——滿身仙氣的李白，骨沉氣郁的杜甫，高雅恬適的王維，雄風四溢的王昌齡……等等，等等，無不為一部中國文學史增添了色彩斑斕的風格。至於宋以下，就更是隨著文化的普及和文學的普及，而愈來愈出現了文學風格和文學形式的多樣化。從而，無文化的蒙人雖然亡了我大宋的江山，卻產生了漢文學之戲曲藝術的高峯期；而同樣是少文化的滿人雖然滅了我們的大明，但有清一代，卻

將漢文學在戲劇和小說的發展，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紅樓夢的出現，實在將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學成就，推向了近代世界文學發展的顛峰地位……其後，“辛亥革命一聲槍響”，終於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語言、和新的社會生活基礎，短短的十數年，新文學在各個方面的非凡發展成就，足為後人景仰。要不是馬列洋教在蘇俄新沙皇帝國的槍炮聲中和俄羅斯文學的死亡聲中猖獗東來，才在中國的新文學陣營中製造出了那一個所謂的共產革命文學，以“文載共產革命之道”，復辟了已經為新文學所揚棄的落後“文以載道”思想，直至將文學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和螺絲釘”，從而在其後長達五十餘年對文學的專政和專制中，造成了真文學的死亡，則中國新文學的興旺，又該當何論，也就不容一辯了！

我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講“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喪失的第四個表現——民族意志的沉淪”了！因為，當我們在國事和文化上，瞭解了自己民族幾千年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之後，再來看一看我們那個還處在“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之極端反動統治下的中國，再來看一看這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並且也沒有可能出現的殘暴“教政合一”政權，看一看五十餘年來中華民族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已經被阻絕、毀滅到了一個令人怎樣傷心慘目的地步，從而們心自問：我們又是怎樣地在傳承著和發展著自己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和我們為自己民族及自身民族文化求傳承、求發展的“心志”究竟何在？面對這樣的詰問，我們是否祇能滿面汗顏，滿心羞愧，直至對馬列及其在中國的子孫們，滿懷著“族恨與國仇”的鉅大痛苦呢？

至于昨天那些自號是“改革派”的知識份子們，和今天又自號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們，他們直至今日都不敢徹底否定和大膽批判馬列和共產黨，甚至還在發了瘋似地繼續否定著和謾罵著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行徑，特別是他們面對著中國人民反思現代史的鉅大成就，面對著中國人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道路的重新推崇，面對著由真正的史詩“走向共和”、“孫中山”等歷史劇所大膽表現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民之“民族意志和民主意識”的轟然覺醒，居然還在變本加厲地對孫中山及其民族民主道路予以百般的詆毀和誣衊，就更祇能說明，所謂民族意識的喪失，所謂民族自尊的喪盡，所謂民族信心的破滅，所謂民族意志的沉淪，總而言之，就是所謂“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喪失”，其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集他們於一身”！因為，祇有他們，才自號是當代中國的“精英”，即當代中國精神文化的代表，所謂“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是也！。雖然這個“當代中國”，祇是一個“馬克思像下的中國”而已。

假若這也是

## “中國國民黨的競選宣言”

(台灣) 史 絢 麗

.....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開創了中國共和革命偉業的政黨，有了這個政黨，才推翻了腐朽專制的滿清王朝，才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君主帝制，才創建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才使得擁有著五千年文明文化的中華民族，從此開始“走向共和”，並從此開始了對於民主憲政的艱難追尋.....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政黨，一百年的風雨滄桑、痛苦鮮血、成功和失敗，都改變不了她這樣一個政治的本質。所以，中國國民黨才要堅定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復辟。也就是說，只要有人在中國復辟了專制，中國國民黨就要戮力反對之。並且不論它是要復辟帝制，還是要復辟滿清，抑或是北洋軍閥要“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哪怕它是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在中國廣袤的大陸地區，歸復了專制的極權統治，篡立了他那個虛假的“共和國”——實際上的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中國國民黨都要義不容辭地、堅決地和勇敢地反對之。歷史的事實是：正是有了辛亥之後十七年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勝利，才有了中華民國的初告統一，和中華民國三十年代之民主繁榮的“黃金時代”，才有了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才有了“雪百年之恥”的輝煌業績——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贏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領袖國地位，擔任了聯合國宣言起草國，享有著創始會員國的榮耀，收回了我們可愛的失土，統一了中華民國除外蒙古以外的全部版圖.....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也正是因為抗戰勝利之後，那一場接踵而來的，志在抵抗馬列侵略、反對專制復辟的民族民主戰爭慘遭失敗，才造成了中國大陸曠日持久的專制復辟，才造成了大陸人民史無前例的災難和浩劫，才在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造成了這一段漫長的“亂世和惡世”，造成了中國歷史的鉅大倒退。對此，中國國

民黨責無可咎，更責無旁貸地要繼續高舉著反對專制復辟的旗幟，直到我們中華民國能夠最後地戰勝復辟，直到我們中華民族能夠最終地走上民主、統一、和平的光明前途。因此，任何對中國國民黨要“聯共反獨”的誣蔑和誹謗，都無非是為了“走向台獨”才蓄意散播的政治謠言而已.....

雖然，蓋因為陸島分裂已久，國家觀念遂至淡泊，加之不明白對岸“假反獨和真統戰”的陰陽兩謀，特別是它為“保共改良”而製造的虛假繁榮，確使我們的少數黨人，甚至是重要黨工，淡泊了理念，放鬆了警惕，喪失了“黨性”，直至為中共拉攏和收買.....但是，祇要我們敢於堅持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敢於堅持為台灣和為中國的立場，我們就能夠清除敗類，教育黨員，為了本黨的最終目標而奮鬥到底.....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奉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教誨，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軍政、訓政和憲政為革命建國之歷程”的民主政黨。他以“軍政”——外反列強的欺凌和侵略，內反殘餘軍閥的武裝造反和中共在蘇聯直接命令下的武裝叛國；以“訓政”——來保證向憲政的過渡，以求最終能還政於民，實現憲政治國，完成中國人民志在“走向共和與完成共和”的偉大理想.....迄今為止，他雖因外患內憂，特別是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公然顛覆，而未能在全中國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但是，她卻在第一度訓政期間，為捍衛民國、建設民國和抗戰救國奠定了精神和物質的基礎；更在對馬列和中共的民族戰爭失敗之時，退守台灣之後，在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下，恢復訓政，不僅將台灣建設成了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且首先在台灣手創了向民主憲政的全面過渡，用和平的、毫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權轉移，實現了政黨輪替，在世界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輝煌範例，為中國大陸人民也能最終地“走向共和”，豎立了歷史的楷模.....

中國國民黨還是一個一貫堅持“民主統一”、反對“專制一統”的民主政黨。她不僅在百年前，就為一個正在遭受欺凌的古老民族高舉起了輝煌的民族主義旗幟，外反列強的欺凌和瓜分，內反殘餘軍閥的叛亂和割據；而且，在她志在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每一步艱難奮求中，她都把自己祖國的統一大業當成了為民族和為

中華的最高理想，即便是敗退台灣，卻民族意志不改，統一大業不放，不論天空捲舒著怎樣愁慘的國際風雲，不論兩岸呼嘯著何等慘烈的炮火，“中華民國才是全中國人民自己之唯一合法中國”的自我認定，均一直激勵著中國國民黨人將自己的心緊緊地、緊緊地和自己的祖國和祖宗連在一起……雖然竊據了中華民國國權和中國國民黨黨權的李登輝，在他執掌國柄和黨權的十二年間，“假民主之號召，以求台獨之路”；雖然擁有著舉世聞名之“台獨綱領”、卻非“民主綱領”的台灣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手辦的民主大選中獲勝，剛剛走上了執政的舞台，就立即奉行起“假中華民國之名號，以行台獨之實”的台獨路線；甚至立即開始了“改國號、求分裂”的種種行徑；但是，中國國民黨在內有極端台獨勢力作亂，外有中共對台灣進行持續打壓和陰謀統戰的外患內憂之中，其大多數黨人，還是能夠以“抗共為經”，以“反獨為緯”，胸中懷著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中華民國，而非馬列子孫的中國——那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猶以民族信念和民主信念為支撐，外抗強權，內撫異志，既未向中共稱臣，更未向台獨低頭，卻艱難地、甚至是痛苦地堅持著中國國民黨斷然不能拋棄和斷然不應拋棄的偉大歷史追求——這就是民主、統一、和平在全中國的最終實現……

中國國民黨心如明鏡的是，在台灣，有一股由來已久的惡性台獨勢力，他們絕不同於那些僅僅是不願意被“專制一統”到中共極權統治下的“良性台獨”同胞，而是一貫地、從未間斷過地、和處心積慮地要推翻中華民國，消滅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自從二十年代的第三共產國際、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為他們擬訂了那一份“台獨綱領”之後，他們就在共產黨的領導、配合、支持下，非推翻中華民國不可，非消滅中國國民黨不可。時當今日，在中國共產黨自己已經不能完成這一“反歷史的使命”時，如今竟然又被當代中國台灣的反華惡性台獨勢力，擔當在肩頭了——他們一邊要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一邊卻在大喊著要改掉中華民國的國號，要建立所謂的“台灣人民共和國”，這便是反華惡性台獨勢力與共產黨如出一轍的——“陰陽兩謀”的手段和“人鬼兩面”的作風。台灣的一切亂源，均來源於此；台灣民主化實現之後，整個台灣島對於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的離心離德，更是來由於此。當此多事之秋，中國國民黨毫無疑問地應該堅定地站出來——反共反獨，因為，反獨乃是為了台灣的安寧和發展；反共，則是意在斷絕製造台灣混亂和不得安寧的根源，更是為必然要到來的全中

國的民主統一，盡中國的國民黨之心，盡中國的國民黨之情，盡中國的國民黨之志……

最後，中國國民黨還深深明白的是，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在“護國護法”之最為慘淡歲月裡，唯有的本錢，便是那一艘“中山艦”了。然而，他非但不曾氣餒，而且越戰越勇，直至由蔣介石先生率領中國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了要“走向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今天，我們中國國民黨，雖然在中國的台灣，完成了我們革命的光榮歷程，但是，作為中國的國民黨，卻遠沒有完成自己理應擔負的歷史使命。因為，我們故國的那一大片壯麗山河，仍然呻吟在中共的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之下；我們故國已經飽受了共產專制之苦的人民，仍然哀號在共產制度的蠻橫壓迫之中；特別是當我們的大陸同胞，不僅由他們自己用痛苦和鮮血擦乾淨了歷史，辨識了《誰是新中國》，認清了“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並且已經在大聲疾呼要“重建中華民國”之時，我們中國國民黨，理應懷抱愧咎之意，奮發之想，立足台灣，放眼全中國，以“台灣島之碩大航空母艦”為駐足之地，轉眼西向，志在“北伐”——用三民主義的思想，中華民國的正統，孫、蔣兩位領袖的歷史魅力，台灣民主繁榮的事實，特別是大陸同胞已經對歷史的覺醒，為全中國都能夠真正地 and 最後地“走向共和”而繼續奮鬥下去。

如果我們做到了，則台灣人民不僅會擁護我們，中國大陸人民則同樣會擁戴我們。我們中國國民黨，就不僅有可能擁有在台灣選戰的勝利，而且有可能擁有了我們更加廣闊的大後方，也就是我們真正的前途所在——因為，中國的國民黨，從來就屬於全中國！

.....

## 宋美齡之死

### 顛覆中共抗日謊言

（謊言更無市場，北京尤其尷尬）

黃傑

## 一、宋美齡之死引發對抗戰史的回憶

最近，高齡一百零六歲的宋美齡的去世引發了大眾重溫中國現代史、尤其是抗日戰爭史的回憶。宋美齡的一生跨及三個世紀，然而她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正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抗日戰爭期間。不但海外對宋美齡抗日戰爭時期的獨特貢獻推崇有加，就連中國大陸的輿論也絕大多數對宋持肯定態度。中共幾十年來有關抗日戰爭的謊言，也因此而再遭尷尬。

香港媒體稱宋美齡之死顛覆中共主流論述。新出版的香港中文亞洲週刊稱，宋美齡之死意外引發新的歷史詮釋，顛覆了中共的主流論述。國際鋪天蓋地的悼念資訊，正引發大陸民間對宋美齡「平反」的論述；民間和網民議論紛紛，涉及對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評價等話題，正在民間和學術界發展、擴大、甚至發酵。

大陸媒體廣泛報道宋美齡的生平，一些學者敏感地發現宋對抗日的貢獻，顛覆中共抗日史詮釋，北京非常尷尬。原來，中共的教科書上稱，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了抗日戰爭，帶領全國人民抵制蔣介石「攘外須先安內」的投降主義，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而宋美齡之死，卻意外地揭開了中共隱瞞了半個世紀的謊言。中共幾十年來有關抗日戰爭的謊言，也因此而再遭尷尬。

## 二、傳奇女傑的抗戰貢獻，奠定了她的歷史聲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在西安發動兵變，扣押了當時中國的最高統帥蔣中正（介石）。由於張在此前即與中共暗通款曲，事變發生後，中共和張都有殺蔣而後背靠蘇聯割據一方之意。然而當時蔣是中國當之無愧的領袖，就連蘇聯共產黨獨裁者斯大林都認為，只有靠蔣的聲望領導中國進行抗日，才能夠對蘇聯在遠東所遭遇的日本威脅起到緩衝作用。斯大林遂對中共施壓以促放蔣，這是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的根本原因。

雖然如此，宋美齡在解決西安事變中所展現的勇氣仍然令人肅然起敬。宋在事變之後局面危難時力排眾議，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勸說張學良以大局為重而釋蔣。西安事變的解決，顯露了宋美齡的大智大勇，使她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傳奇女傑。

一九四三年二月，宋美齡到美國，不僅獲邀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夫婦家作客，而且於美國國會面對參眾兩院議員發表演講。她以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堅定有力的語氣表達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中國人民獨立抗戰五年有餘，我們寧願奮勇犧牲到最後一兵一卒，絕不願苟延殘喘接受失敗」。她的

講演獲得全體議員們的如雷掌聲，並贏得了美國政界、傳媒界和民間一面倒的歡迎和支持。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也由此打開了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宋美齡與蔣介石一起赴埃及，參加了討論二戰結束後世界新局勢的美英中三國開羅會議。開羅會議確定了中國將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常任理事國席位，並確認被日本佔領的台灣與澎湖列島將歸還中國。

宋美齡曾創記錄地十一次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人物，其中數次與蔣介石共同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最有名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蔣宋夫婦雙雙被評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作為現代中國一位傑出女性，宋美齡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貢獻是偉大而獨特的，她因此而獲得的榮譽也是空前的。

宋美齡終其一生，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堅定反對立場從未動搖過。即使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宣稱改革開放以來，宋美齡也多次嚴峻拒絕中共頻頻送來的統戰橄欖枝。一九八一年其姐宋慶齡病死，宋美齡亦未曾同她見上一面，更未參加追悼會，以避免自己被利用來替中共政權塗脂抹粉。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統戰頭目廖承志發表了致蔣經國的公開信，表達中共統戰往來之意。蔣經國未予答復，由宋美齡發表了一封轟動一時的致廖承志公開信作答。宋以此信兜頭澆了廖承志和中共一大盆冰水，信中除指陳中共以平反冤案而自暴的諸多作惡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共奉馬列為神明之荒謬；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襲諛外，如將彼（按：馬恩列斯）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在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大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 三、歷史事實顛覆中共抗日宣傳

宋美齡的逝世不僅重新掀開了她對中國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一頁歷史，也對中共官方幾十年來的抗戰史觀產生了最新一輪衝擊，導致人們進一步質疑中共於抗戰時期的種種作為及其官方一貫說法。例如，關於中國抗戰的領導力量問題，中共官方歷來聲稱中共是抗戰的主導力量，甚至指責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從峨嵋山下來摘桃子、竊取勝利果實，宋美齡在抗戰期間的傑出貢獻已足以推翻中共的說辭。

歷史學家辛灝年十餘年來致力研究中國現代史，出版了

著作「誰是新中國」。中共在抗戰期間的行為是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了抗戰期間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變的發生和解決，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史實，中共抗日不力而極力反蔣之策略，以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等歷史真相。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辛灝年揭示出的真相幾乎無一例外地顛覆了中共幾十年來的官方結論。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齡的生平和辛灝年的研究所還原出的真實抗戰史之外，中國大陸的民間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漸現出與官方不同的聲音。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建政後不久爆發的第一起大案高崗、饒漱石案，牽連到當時中共高級情報和公安官員潘漢年和揚帆等。潘和揚為中共秘密情報工作立下汗馬功勞，不料遭此大難，吃盡苦頭，潘並死於監禁中（按：有說曾於七九年平反出獄而死）。數十年後，潘揚案雖在鄧小平時代被平反，但官方對其中緣由始終語焉不詳。後來才逐漸爆出：原來，潘和揚受饒漱石領導的中共華東局委託，與汪精衛當局特務機關暗中聯絡，新四軍遂與日汪軍和平共處而主要致力反蔣和擴大地盤。潘漢年甚至與汪精衛直接秘密會面一次，奠下日後被當作「替罪羊」的結局。

就連中共一貫津津樂道的三五九旅延安開荒，近年來也被揭露出其種鴉片販賣斂財的真相。毛澤東老三篇中首篇「為人民服務」裏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也被揭出是在燒制鴉片煙土、而不是燒炭的窯洞中被埋；這也順便解釋了許多人對中共為何不惜派最貼身可靠的警衛團戰士、而不是一介老農去燒炭的「歷史性疑問」。

## 大陸學者 頌揚

# 日機轟炸下的蔣介石和宋美齡

選自《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第 151-153 頁  
中國大陸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一版

……按照日本陸海軍航空兵《中央協定》的方針，日本空軍在「航空進攻作戰」時，「特別要捕捉，消滅敵最高統帥」（按：指蔣介石）。日軍在「五·三」、「五·四」猛烈空襲重慶後，曾廣播海外，稱蔣介石已趨避成都，國民黨中央也將遷離重慶。這時，蔣、宋的行蹤、命運成了敏感的話題。

1939年5月5日英國路透社自重慶發出的電訊稿率先對蔣介石行蹤加以報道稱：

昨夜今晨，蔣委員長夫婦同往災區巡視。

委員長昨命市內一切公私車輛，一律供疏散人員之用。今晨各車輛奉命集中於一指定之地點。有蔣夫人指揮疏散婦孺。⑦

美國傳記作家埃米莉·哈恩記述了其間的經過：

……整個晚上，蔣夫人馬不停蹄的四處奔走，監督救難的工作。直到五月五日中午過後，她才有時間照料她自己的孤兒。因為夫人和委員長自己的座車已被用來運送傷患。（一對老夫婦拒絕進入座車，直到他們確信這不是冒犯為止。就算如此，他們還是堅持在入車之前叩了三個頭）。夫人只得帶了幾個隨從，乘坐卡車辦事。

天空破曉，一隊有六千名兒童組成的隊伍被送往鄉間，城外數裏的一處地方是他們的暫棲之地。他們在清晨五點到達之後，吃住立刻成了問題。

在路上，（蔣夫人）他們遇見了那支由孤兒組成的隊伍。……蔣夫人下令停止所有用來疏散重慶市民的卡車及私家車。這些車正要空車回城裏去，而蔣夫人則命令他們回來載孩子。她站在路中，手中揮舞著旗子，召喚駛來的車子。車內的人一聽要載孩子往往立刻掉頭就走，而不知和他講話的就是蔣夫人。這也難怪。因為此時的夫人滿臉塵垢，全身衣裳不再整齊，連她的侍從副官都被派去為孩子們張羅吃的了……⑧

……

目睹眼前這一切，蔣介石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慘絕人寰的慘案」。他還從現場救護時發現：市民蒙難「雖慘不忍睹，可民眾毫無怨言」。蔣介石慷慨論述說：「中華民族的正氣，自古以來，都是在遭受異族侵略是迸發出來的。任何殘忍暴行都不能使我們屈服。」

5月9日，中央社記者在當天的電訊稿中，報道了蔣介石再次前往被難市區視察的詳情：

記者適過其地，於蔣委員長去後即熟詢民眾，無不同聲感戴委員長之愛護人民，有高呼「擁護救國救民之中央者」，有高呼「愛戴救國救民之領袖者」。同時載指怒目，謂日人濫施轟炸，能毀吾人之身家，不能毀吾上下抗日之精神……

蔣委員長之在渝勸諭民眾，中央絕無移動之意。日人造謠技術於此可憐可笑。⑩

- ⑦ 同前《東方雜誌》第36卷12號第54頁。
- ⑧ [美]埃米莉·哈恩：《宋美齡傳》第215—218頁，農村讀物出版社1988年6月版。
- ⑨ 同前《重慶大轟炸》第125—126頁。
- ⑩ 同前《東方雜誌》第36卷12號第56頁。



舊金山世界日報刊載

**中國“四大家族”斂財？  
宋仲虎為文澄清誣蔑  
舊金山世界日報發表記者劉開平報導訴諸海外  
本刊發表宋氏家族子孫宋仲虎全文：**

## 指蔣宋貪污，絕對是捏造

在參加蔣夫人追思禮拜後，從紐約飛回舊金山的途中，我的思想仍浸沐在追思禮拜的情緒中，許多人讚美蔣夫人口才、氣質，甚至對於她面對危險的勇氣，幾乎每一位都會提及1937年十二月她毫無武裝，徒手地飛到西安去與張學良協商，救回蔣公，於聖誕前夕突然返回南京的英勇事蹟。周聯華牧師並回憶，蔣公及夫人如何地在受難日對政府要員們傳講福音。時代廣場教會的康倫牧師是一位紐約市中心戒毒、戒酒工作前線的服事

者，他提到有一天，無論是有錢的、有智慧的、甚至有權勢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寶座前，在那裡，只有耶穌基督的寶血可以贖他們的罪。甚至政界代表錢復先生(當天代表陳水扁總統)，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美國前參議員鮑布多爾，保羅西門都強調我姑媽的宗教信仰影響了她的性格及一生的功業，我想這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來說，都是一個有基督信仰生命很好的見證。

當我看到我最喜愛的新聞雜誌上的一篇報導，其中提到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的援助都被浪費，美金的援助也被蔣家中飽私囊...等。讓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國外援助在我們八年生死搏鬥地與日帝國主義抗戰的中途才進來，多少中國同胞在中國獨自抗戰時已陣亡及被殺害，蔣家的居所是日軍鎖定轟炸目標，家人親屬死傷甚多，就連蔣夫人本人在一次從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被日軍轟炸，從車中被炮震到車外並受傷，險些喪命，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任何人連保命都來不及，那還能忍心將國家救急的款項轉到自己荷包裡？就算有權勢的人想中飽私囊，也需要下屬的幫助才能完成他的企圖，但在全國同胞被日本人大屠殺的慘境下，誰能保證那些貪官污吏的部屬會保持緘靜？他們能保密五十多年而不說出來？況且有許多更投到共產黨的旗下，難道他們不會把眼見貪污的事實揭曉來換取在共產黨的信任與獎賞？

雖然肯定自己沒有鉅富名人的生活型態，但生長在舒適的加州，早年常和家人親屬接觸，我也確信那些盜佔上億款項的故事，絕對是捏造出來的。

蔣夫人的長兄宋子文先生曾是中國的外交部長，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當時透過一個在華盛頓的中美合作公司，及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管理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借貸款項，這些公司的高級成員中，都是由美方推薦著名的有實質經驗的傑出優秀企業、財物管理人才。當時有名的威廉揚勉先生就是由羅斯福總統指派在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的總經理，戰後，他參加美國國際保險集團公司被選為最資深公司 C. V. Starr & Company 的總經理。1971年在宋子文先生死時，指定他為遺產執行人，據他在1985年三月十八日所寫的一封信中提及「...戰後宋子文從中國只帶了很少的財產到美國來，在他死時，擁有相當的產業是因他在美國勤奮地靠著他的才能、成功的投資而得來的。你如果不怕麻煩，你可以到紐約遺產律師事務所(Surrogate

records)找到所有的詳細資料，藉著紐約著名的律師事務所(Sullivan and Cromwell)，我曾查了宋先生所有銀行及財務紀錄，我確定他沒有任何一點未登記的財務。」

蔣夫人的弟弟，宋子良先生，在幾年前他的妻子死時，並沒有任何繼承人。他所有的幾十萬遺產都捐贈給Vanderbilt大學。蔣夫人最小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親，宋子安先生，雖然我不透露任何人的隱私，但我可以說我父親大部分的財產都投資在舊金山廣東銀行一半的股份上，這財產的價值在他死的時候，是很容易被估值得，因為銀行是被加州銀行管理部所管理，每間銀行每年都要公告銀行的資產。

先總統蔣公死時，沒有任何遺產，連蔣經國總統也是一樣。蔣方良現仍住在政府配給的房子裡，因她沒有一棟自己的房子，蔣夫人自己也逝世在孔家的公寓中。

蔣夫人的大姐，宋靄齡女士，嫁到孔家以後，有了更多財富上的祝福，孔家早在國父革命之前就是一個鉅富之家，以經營錢莊及許多投資事業，但是在1949年大陸淪陷之後，失去了大部分的財富，孔家現在仍擁有的財富乃是因為長子令侃有眼光的土地投資而來的，在佛羅里達迪斯耐世界未建之前，他就買了土地在附近，結果變成了天價。

許多家人都陸續在美過世，他們的遺產或在法院查驗，或是經過其它不同的法律程序，在美國超然巨大的財富都會在公開紀錄上留下紀錄，但前面所提的都不被列入其中。

有些人或許會更進一步的問：「如果沒有火，那來的煙？」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因素：第一，1920年因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故意毀謗蔣介石及他的家人，在這個工作上，他們得到許多西方所謂的懂得那些煽動性故事的新聞雜誌記者的支持，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能銷售他們的書，往往一個編織的謊言，被重複了太多次以後就變成真的了。

第二個因素：在當時美國政府，面對許多“誰丟掉大陸”的爭論，有些人為了推卸責任，很隨便地造出一些讓人很能接受的故事，來博得別人的認同，掩蓋自己所做的錯事而引來中國如此悲慘的下場。我們不應該忘記是同一個政府，因為國務卿一句話「南韓是在美國國防之外之事。」而促成了韓戰。

也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家人要等這麼久才解釋那些謠言？答案是澄清的事實早就已經做了，只是被媒體

疏忽了。在1950年二月六日，美國《時事周刊》雜誌這樣敘述：「美國內閣有一個詭計，如果有人批評他們台灣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太激烈的話，他們就準備發表中國國民政府的官員，出賣自己國家，把自己和別人財產拿到美國來，美國的財務部都有那些名單。」有人問他們為什麼不發表，財務部就說：「那些財務人員就說為了別人隱私不可拿出來。」孔祥熙先生和宋子文先生的朋友要他們讓美國政府發表他們的私人財產，(在這些朋友中包括John Foster Dulles，後來成為艾森豪內閣的國務卿)，宋子文拒絕，他說：「如果公開一個謊言，往往更助長那個謊言。」

結果，美國紐約時報一位有名的記者Constantine Brown，作了同樣的攻擊和報導說：「有人告訴他，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國擁有八億五千萬的財產」；於是孔宋二人同時寫了一封信給國會，要美國政府公佈他們二人所有的財產，在1950年五月十日，上議院國會紀錄中登出，孔祥熙寫著：「我完全同意讓美國國務院或財務部公開我個人在美國所有的私人財產，」他的信又說：「基於共產黨的災害，我失去在中國所有的事業及財產，我當時所搶救出來的錢財只能勉強維持我和家人的需要。我相信這足夠可以證明我現在只不過是美國一個普通居民而已。」宋子文先生寫著：「我絕無反對美國財務部或政府公佈我所有財產。」他又寫了一封信給國務院的Dulles先生，解釋：「雖然我是一個外國人，在這個國家，我當然希望不要牽入任何爭論，我只想在被不公正的攻擊裡，澄清我的名譽！」

後來對以上的事件，美國對華政策委員會(一個由著名人士組成的機構，如Clare Boothe Luce, William Loeb, Congressman Walter Judd, and Mrs. Joseph Schumpeter等人)發出一則挑戰信給六百五十間報社的編輯，向美國政府挑戰，要求國務院公佈所有關於媒體報導的上項爭論的詳細資料，結果，國務院當然沒有任何一點資料可以提出來，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證據。很奇怪的，在以前有那麼多媒體控訴，現在居然這些新聞媒體，竟沒有報導關於國務院說謊的事實，及在被挑戰時沒有辦法提供任何記錄及資料的窘態。

雖然蔣夫人的家屬沒有因私盜國家財產而致富，但我們是很被祝福的！她留給我們的遺產是她一生對國家的貢獻，及留給中國婦女在政治及社會上該有的地位，以及她事奉神的美好榜樣。在追思禮拜中，蔣夫人在南

京及台灣創建的那些遺族學校的孤兒們，露出感恩的笑容及傷心的淚水，比任何金錢所能代表的一切更有意義。我們心中永遠感激！

(作者宋仲虎先生，是蔣宋美齡女士的姪子，現居加州，是位企業家，並在教會服事。)

##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

### 抗戰詩抄 之二

林牧晨 提供

# 驕傲地笑吧！

仲 榆

向著全世界，我們驕傲地笑吧

中國的人，

在今日——

是表現得何等壯烈，

何等英勇！

你看看！

那些軟弱的人們

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

對於保障和平底戰爭，

是連正眼都不敢一睜。

在美國

短視的人主張著孤立，

在英國

保守的人向法西斯屈膝，

在奧地利

二十四小時中不流血的犧牲了自由和獨立；

在中國

連婦女們

都死不屈節。

每一個中國的人：都在感謝——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火，

卻把我們鍛煉成心如鋼鐵！

每一個

中國的人：

都在歡欣——

借日本帝國主義底魔手

調染著，我們正義底血，

創作了四十年代人類歷史上，

藝術的最高峰。

這是一幅中國的大史詩，

這是一首遠東的大史畫，

這是一曲世界的大合奏，

這是一幕人類的大史劇。

這個價值的藝術底中心意義：

使日本的野蠻

反映著中國底文明，

使日本的侵略戰爭，

反映著中國底愛好和平。

向著全世界，我們驕傲地笑吧！

中國，

中國的人們，

在世界的舞臺上，

它是演出得

何等壯麗！

何等英俊！

原載《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 本刊新增榮譽訂戶

(2004年元月27日止)

袁耀鏢 (兩年) 余健文 (兩年)

孫絡典、麥 非、劉國凱

劉國旋、魏 玲、陳華山

# 痞子毛澤東

## 讀李銳《廬山會議紀實》



此為‘胡溫新政’？還是“毛周舊政”？（世界日報照片）

毛澤東內心有一種極其偏狹的邪惡心理和犯罪稟賦。他的蠻橫性格很有幾分秦二世胡亥的昏庸加趙高的惡霸氣，他的狡黠心計則帶有更多曹操的城府和狡詐。毛之得逞，奪取政權前，是靠搞亂社會秩序、鼓吹暴動、拉起桿子、打家劫舍；取得政權後，則靠搞亂社會風氣，毀滅正風，摧毀人們正常的感覺系統和思維系統，摧毀人們的常識和公正的價值判斷，以歪風邪氣壓正氣，以荒謬口號和不近人情的種種歪理摧毀正常感覺和判斷，以指鹿為馬壓正直見解，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唯他的馬首是瞻，於是他肆其所欲。

### 中共中央猶如黑幫團夥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說到底，是毛澤東痞子性格的大得逞。倘若彭德懷提出的問題能夠得到正常的、公正的討論和解決，中國後來的歷史則可能走上不同的另一條路，七年後毛澤東策劃的那場罪惡的「文革」也就不會發生，劉少奇等黨人以及眾多知識分子當然也就不會慘死，儘管可能還會出現毛澤東搞的其他形式小動作或大陰謀（毛澤東絕非安分之輩，不甘退居幕後，更不肯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然惹事生非，撥亂其間），但卻不容易成氣候了。

在毛的倒行逆施大得逞的整個過程中，有許多幫兇和幫手，諸如康生、林彪、陳伯達、江青等，其他如劉少奇、周恩來、柯慶施等人，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沒有這些高層人物的幫助或合夥，毛澤東不可能犯下如此歷史大罪。他們吹捧毛澤東，跟隨毛澤東，站在邪惡一邊，毫無良知和政治道德，打擊正義之士，起到助紂為虐的作用，他們後來都自食其果。對別人不公正，就是對自己不公正，「多行不義必自斃」，古人之言確是不易之論。

廬山長達近兩個月的會議，留下許多可疑點。人們讀到若干記載，總感到許多東西語焉不詳，心生疑惑。諸如：彭德懷等人的觀點明顯正確，提出的問題皆是人人切身、可見可感的重大事實，態度極為和氣，語氣極有分寸，而且他致毛澤東那封信是私人之間往來，不過是交換個人看法，卻被毛發動全體中央委員批判；劉、周諸人對當時中國經濟情況之糟糕，心裏極清楚，為何對彭德懷也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後快？毛澤東對經濟和國情一竅不通，卻混充內行，頤指氣使，以打仗的辦法指揮中國經濟建設，大肆鼓吹「大躍進」「人民公社」「共產風」，造成可怕後果，這是上層人物人人深有所感、看得很清楚的事，為何不趁此良機，支持一身正氣的彭德懷，剎住毛氏這股誤國勢頭？他們到底為什麼如此委瑣昏庸、不辨是非、知白守黑？

一般說來，是非問題是很簡單的，可是中國人總是懷疑自己的良知和感覺。這是中國當代病態政治、陰謀政治給人們造成的心靈疑惑，使人們的理智與感覺分裂。凡是不情之事，必有大奸偽。中國當代政界的怪異現象之一就是：是非很簡單，人事卻不簡單，而且一切均在黑幕中。這就使外界的人很難理解中國政界之事。廬山會議也如此，它的真面目並不神秘，更不高尚，而是非常低級、世俗，如同黑幫團夥。

李銳的《廬山會議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一書，留下珍貴史料，許多蛛絲馬迹，皆從中透露。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會議記錄，特別是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記錄。發言者的面部表情、聲音色調、手勢動作，雖未見描述，卻有如目睹，那些發言本身已將各自肚腸、潛在欲望、心中癥結乃至靈魂，勾勒得極為生動、深刻。歷史和政治，正是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不可

明說的自私自利、隱蔽欲望、躲躲閃閃的言語作用下發生並且產生重大結果。

這次廬山會議，原本不過是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諸人同毛澤東的一場爭論，卻莫名其妙轉化為歷史恩怨、人事關係問題，人人招喚心中的仇神上來撕咬，顯現毛澤東時代政治之貶君子親奸佞特色，庸俗的人事關係完全淹沒了事物本身的是與非、正義與邪惡性質。悲劇和冤案，正是這種政治的必然產物，時至今日，中共還在大肆逮捕提出民主和建黨要求的人士，仍在不遺餘力從事政治迫害、製造冤假錯案，亦可知中國新一代從政者以及中國當代政治，仍無長進。

研究一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對手彭德懷的手段，不僅對瞭解毛氏其人深有裨益，對瞭解中共黨內鬥爭實質亦有舉一反三之效。

### 毛澤東耍賴、狡辯

毛澤東一上來使用的手段，就是市井無賴的不認帳態度。他七月二十三日大會講話揭開批彭序幕，對「大躍進」錯誤一方面嘴硬不認錯，另一方面推卸責任，把這些當初被他宣揚為共產主義「新鮮事務」的東西推給群眾。且看他的狡辯：「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場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麼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子也有錯誤。我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臺？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裏頭，沒有垮一個，……」（《實錄》第一五三、一五四頁）。把孔夫子的「錯誤」和列寧手稿上的修改痕迹拿來為自己的禍國殃民開脫，是毛常見的毫無邏輯、文過飾非的手法（例如說「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來為自己開脫），欺騙和蒙混那班群官僚大老粗，倒顯得他讀書多、有見識似的，其實不過是個誇誇其談的江湖騙子而已。

問題出來了，他卻推卸責任、不認帳：「（我）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第一五五頁）那麼，毛是怎麼「略略一管」的、都管了哪些方面？他在下面有一段話又這麼說：「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

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第一五六頁）。這不是不打自招了麼？其實，他實在是巫師鬼婆似地太會呼風喚雨，管得也實在太多了。對於人民公社，他的推廣之權，必然比發明權更有禍害。毛的講話，都是這種自打嘴巴、毫無道理、虛偽狡辯的謊言騙術。他有這樣一手，在自己無理時先胡攪三分，再施展騰挪之術，轉而滿天胡掄，忽忽悠悠，扯起歷史小故事，冒充滿腹經綸，或講起自己遭遇，貌似婦人之仁，惹人同情之淚，以取柳暗花明、絕路逢生之效。這才是大奸詐者的脫身術、籠絡術。

毛澤東第二個手段，就是中國下層社會常見的背後惡毒詆毀他人、播弄是非、散佈謠言、挑撥關係，頗類叔嫂勃蹊、飛短流長，屬於下流政客手段。在廬山會議期間，毛獨自在房間裏，對他的秘書林克散播對高層同事這種詆毀之言：朱德是個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個右派（第一九二頁）；他還對自己身邊的衛士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麼名字嗎？」「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中華。」（《紅牆內外》第二七二頁）等等。這類太監奸佞之徒和小老婆枕邊進讒式的詆毀之言，在他與其他常委暗中往來溝通時應當更多。在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這麼當面挑撥眾人與彭的關係、誣衊彭的人格：「（你）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說你是偽君子，象馮玉祥。」「鄧小平在你面前有顧慮，對你並非沒有意見。」（第二二三頁）八月十一日的長篇講話（題為《論彭德懷及其「俱樂部」》）中，毛有這麼一段話：「（他們）跟許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六個同志，『俱樂部』的同志沒有一個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對我而已。如果單只反對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個，還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究竟能說得出來的氣味相投的有幾個？我看很少吧。還有元帥，十個元帥，我聽說彭德懷同志跟九個不合作。至於大將、上將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將更多了。他們從來不提倡團結的口號。」（第三四三頁）毛是以此孤立彭德懷。毛這番話，正可見彭德懷等人不群不黨、光明磊落的獨立精神和君子氣質，他不靠群狗式的團夥暴力而靠個人的正直和灼見（彭德懷在八月一日常委會上說：「我也一個不拜，孤獨」「管軍隊要純的人。我沒提過任何一個人，無任何私人來往，也沒有私人信件。」）。

### 共犯結構：這個黨「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

毛澤東第三個手段是威嚇同黨人：我們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絕無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第一五六頁）這是明說：咱們都在一條賊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們誰也別想跑。他還說：「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

你們的責任，我交待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第一五六頁）毛的虛偽和無恥，不言自現，大躍進出了大亂子，他就事後耍賴，對整個中共中央耍賴：現在你們來批評我了，當初你們為什麼不吭聲？事實上，當初他就是專橫跋扈、動輒斥為「右派」、「右傾機會主義」或「反黨分子」，誰能說一聲不？

共產黨政治是一個共犯結構。在這個共犯團體中，人人有罪，每個人的心靈都是複雜、陰暗、見不得陽光的，因此，他們對重大事物的考慮以及他們的行為特點，第一個議題的就是：怎麼做對這個團體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麼做對民族和歷史進步有利。這夥人每當處於重要歷史關頭做出的選擇，總是最壞、最絕、最無人性的方案。這種最壞選擇機制，正是共犯結構的產物之一，正是這個小團體的私欲和私利決定的。毛澤東利用高層人的自私心，使他們明白這是一個共犯團體（別以為彭德懷批評我、與你們無關），拉他們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維護錯誤路線，徹底消滅彭德懷及其代表的那種政治良知和勇氣，以保持黨作為政治團夥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錯誤，大家需要一起兜著，共同維護中央權威即團夥利益，不能使這個團夥出大醜，儘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醜惡。這種考慮本身，就是一種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蠅營者態度，而非政治家之所為。這個時刻，毛等人特別需要團結。而這種團結，本質上是一種犯罪團體串供抵賴、共同謀殺檢舉人的惡徒式「團結」??

毛澤東把他這種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該滅亡。」

這段話顯示，毛澤東對自己及其政黨十年來犯下的滔天罪惡實在太清楚了，他知道這個黨十年來「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旦登在報上，「一定滅亡」，否則天理難容。共產黨絕對不能允許新聞自由，這個道理毛澤東在此講得再清楚不過了：若有新聞自由，他本人就得下臺、中共就得滅亡，可見這個政權是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的，是從根本上敵視自由和民主的。毛澤東這番話，是將厲害關係向全黨高層講明白，讓他們知道這是一個犯有累累大罪、本該被

推翻的共犯團體，十年來民憤甚大，樹敵太多（從知識分子到普通農民），必須團結在他身邊，捍衛本集團的利益。

接下來毛澤東的手段，就有點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嚇：「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三爺，您自己看著辦。」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說，假如你們要登在報上，自找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頁）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攤牌：我要不計後果、大動干戈、禍亂全國，將你們統統打倒，重演董卓進京故事。

這種軍事恫嚇腔調並非毛氏口頭空言，而是輔以具體行動。他在會議中途突然電召林彪上山，向眾人顯示身邊有鐵桿元帥護航，這是暗示武力威脅和干預的一種強烈信息。這是他動用強硬手段、在對手逼宮時搞軍事政變或政治分裂的一個重要砝碼，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帶有明顯威壓性質。此時的林彪，正是鴻門宴上舞劍的項莊，曹操身邊有匹夫之勇的許褚，董卓身後的「三姓家奴」呂布。有此人物滿臉殺氣、持戟而立、保駕護航，他人不敢輕動。毛這個人，從來不信什麼民主不民主、仁義不仁義，始終只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像商人只認錢、政客只認權、流氓只認勢力和打架。別跟他談什麼仁道信義、溫良教養，他自稱是粗野之人，後來我們又從李醫生那裏知道，此人從來不刷牙不洗澡，連玩弄女性也不講衛生，是個什麼都不信，只將暴力視為最後立身之本的光棍。

### 劉、林、周：狗苟蠅營

毛澤東也充分利用劉、周諸人膽怯無能、懦弱怕事、自私心重的性格和弱點，使他們選擇助毛倒彭立場，幫他渡過政治生涯中一大難關。這種助惡伐善、既不義也不智的行為，挽救了毛澤東，使中國這個頭號大禍害日後在政壇上更瘋狂地造孽，這種狗苟蠅營行為，也充分暴露了中共高層人物普遍的目光短淺和懦弱自私心性，後來他們一個沒跑脫，均陷入毛澤東的魔掌，作為他們當年犧牲彭德懷的一個報償。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兩天政治局常委會，是核心領導層面對面的批彭。然而，這兩次核心會議，水平之低劣、內容之庸俗，是難以想像的，可以當作政治學研究專制主義的絕好材料。毛在七月三十一日會議上這樣挑別彭：「在幾次路線鬥爭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裏恨得要死，今後也很難說。（彭插話：我六十一歲了）」。毛繼續挑別：「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完全是小人勃蹊口吻，將治國大業扯到個人關係和幾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彭德懷回答

得極好：「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瞭解。」（第二百零六頁）可見彭頭腦清晰、敏銳，遠勝毛澤東諸人。

八月一日常委會上，朱德第一個發言，還未講完，毛澤東極不滿意，擡起腿，用手指搔鞋面，粗魯打斷朱德的話，譏諷道：「隔靴搔癢」，朱德臉一紅，停止發言。這是一個絕妙細節，暴露毛的飛揚跋扈，這種低級下流動作與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脫靴敲桌異曲同工。

在這次會議上，毛說了那段極其下流的「操娘話」：「華北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補足了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云云，（這段下流話在八月十一日大會上毛又重複一遍），完全一副流氓腔，讓人覺得是一群流氓團夥在內鬥。

其他人如何表現？劉少奇避而不談彭德懷提出的意見本身正確與否，卻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這樣挑剔彭德懷：「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毛插話：交不親的朋友）」「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著眼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延安整風審幹，也不滿意我。感覺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像老婆子坐在門檻上數落陳谷子爛芝麻。

就是在這個時候，劉少奇率先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後來在文革中泛濫成災，變成舉世聞名的現代崇拜，而劉少奇是始作俑者。他對彭德懷說：

「兩個歌子，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毛澤東思想領導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原起草時，就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八大決定不要，又反對。（彭德懷回答劉：「這樣推測，就難講話了。陰謀，兩面性。……）」」

劉這番話，既向毛投媚眼，又揭露和出賣彭。彭不喜歡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喜歡叫「主席」（見第七十九頁），彭反對毛的個人崇拜，正是他清醒之處。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再次大力宣揚「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並表示：

「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第三六九頁）雖然劉少奇最

後亦死於這「個人崇拜」的刀劍之下，但細讀他當年的話，可知他的私心。

林彪就更是陰陽怪氣：

「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毛：以真話形式出現的假話。）……好犯上。……總覺自己行。……（周恩來插話批彭：「很驕傲，犯上。」）」

「馴服就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

「（你）是個不馴服的黨員。……長期以來獨斷專行。……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詞：就是野心，派頭氣勢是有的。……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平時以二桿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一貫跟劉談不來。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內有二心，外似張飛。）」

「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來。……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都是丘八，就是那麼個材料，那麼大作用。……相處過少人，總覺你特別，威風氣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負太大，剛愎自用。」

林彪的虛偽、惡毒、奴才式表白（「我有暮氣」），都躍然紙上。他就是在八月十七日會議上，被任命為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取代了彭德懷。

周恩來也專門挑剔彭的個性，發言很短，屬於插話式。他的話比劉、林的話要輕，有敷衍之意。應當說，劉的心思和城府遠比周深。

掌握中國命運的這個核心層，把彭德懷提出的救國救民大問題拋在一邊，卻喋喋不休數落個人恩怨的舊賬，把如此重要會議開成飛短流長、噉噉喳喳、評頭品足、發洩個人恩怨的炕頭嚼舌根聚會。讀了這樣的會議記錄，便令人釋然：原來毛澤東的「路線鬥爭」是這麼一回事！原來中央常委就是這樣一群狗苟蠅營、裝傻充愣、助紂為虐的黨棍鄉愿！中國怎麼能不餓死幾千萬人呢？

上廬山前，彭德懷曾對周小舟感慨地談到政治局常委內部民主生活不正常，二公（劉）不便講，三公（周）和朱總不能講，陳（雲）和鄧也很難講，小平說話不多（見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第一五六頁）。寥寥數語，已將中共核心的病態情景和一群庸奴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的會議上，彭對周恩來不在大會上講真實情況而深感遺憾，他與周有這樣幾句對話：

（下接第 48 頁）

誰是新中國論戰之一：

# 《誰是新中國》的三個貢獻

——給辛灝年的一封信

前中共“新華社”著名記者  
越共“越南之聲”著名記者

莊思明

編者按：莊思明先生的這封信，早於去年就由羊子女士轉交給了辛灝年先生，並希望能夠在本刊發表。但因辛先生考慮到，這是一封肯定自己著作的信，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可能有所不當，所以才未予以發表。現在，因本刊“論戰”的需要，更因為該信已經在香港發表，所以，本刊決定予以轉載。為保持這封信的原貌，本刊在發表時，未作改動，祇將信中“偉大貢獻”等詞改為“重要貢獻”，餘未及。

灝年兄：

我反復研讀了大作《誰是新中國》，引起了我強烈的思想震撼。我只能深深感謝你，你花了十多年的寶貴時間，嘔心瀝血，對中國和世界近代史作深入細緻的研究，把馬克思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假革命真復辟」的面目，系統、全面、徹底地揭露出來，如實地指出：「中華民國，才真正是全中國人民的新中國」而北京政權實是「中共全方位復辟專制制度」的政權。

## 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

難怪北京暴跳如雷，指使嘍囉製造謠言，誣衊你是國共兩黨的「高級特務」，對你威脅、恫嚇，狂吼「在解決了王炳章之後，就要解決辛灝年了」！這種叫囂，正是他們心虛理虧的表現，對你來說，恰是最高獎賞！

這部巨著的偉大貢獻，是從理論上和組織上給中共致命的打擊。你尖銳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是「在革命的名義下，

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的專制復辟理論。你又指出，中共的老子是蘇共。中共是蘇共「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國際專制復辟勢力的一部分」。你同時指出，專制復辟七十四年的蘇共，一日之間分崩離析；專制復辟了五十年的中共，也必將如蘇共一樣，在大陸此伏彼起民主自由浪潮衝擊下，最終土崩瓦解。

## 中共將如蘇共土崩瓦解

這部巨著的第二個偉大貢獻，是「認孫中山先生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高舉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義旗，高喊救國的真理：「驅除馬列，還我民國；實現民權，愛我中華」。今天的中共，還在「掛羊頭賣狗肉」，口口聲聲要堅持馬列毛，繼續愚弄，欺騙大陸老百姓。因此，凡我炎黃子孫，必須奮起砍掉這面黑旗，讓大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史無前例的罪惡；中國共產黨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錯誤，而是專制的瘋狂復辟與超級復辟」。所謂「左禍」的實質便是「俄禍」，是由蘇俄蓄意在現代中國所製造的「俄禍」。因此，必須「驅除馬列，還我民國」。

## 蔣介石功垂千秋

這部巨著的第三個偉大貢獻，是以大量事實肯定了蔣介石領導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不朽功勳，把被中共篡改、歪曲、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歷史的真實是：中國自古立國以後，三次受到外侵，兩次亡國，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沒有亡國，並且全面戰勝外侵的便是中華民國。他是當之無愧，功垂千秋的民族英雄。反過來，毛澤東用盡各種陰謀手段，在蘇俄幫助下，奪取大陸政權。在他統治中國的二十八年間，害死、餓死了八千萬至一億多中國人。「千古罪人」的惡名，當然是非毛莫屬。

## 李慎之希望的年輕人

「六四」後「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先生，多年前給另一個「大右派」許良英先生的信中說：

## 辛灝年

## 其人其書

前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會會長 李雲漢  
轉自《近代中國》2003年7月號

2001年6月17日，是美國的父親節（Father's Day）。前一天晚上，女兒接我夫婦去一家中國人開設的「帝國」自助餐廳（Empire Buffet）吃飯，同時受邀前來參加者有女兒女婿的同事好友王又新、陳莉明夫婦和鄭偉全家，共有四對夫婦，共五個半大不小的男孩。是好友餐敘，也是為我們提前賀節。飯後，陳莉明交給我一本書，書名是《誰是新中國》。她說「這冊書先送你看看。著作人曾聽說你主持過國民黨的黨史會，很想有機會和你見面談談」。凡是談論中國現代歷史的新書，我都喜歡閱讀。因此很高興把這冊書帶回家看，至於是否見面，那是以後再考慮的事，先瞭解書的內容為宜。

我的習慣：閱讀一冊書，先從瞭解著者的學術背景開始。這冊《誰是新中國》的著者，是辛灝年（Xin, Haonian），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讀過書內的「作者簡介」和「後記」，才曉得「辛灝年」是筆名，著者的原名是高爾品，他的簡歷是：

辛灝年，原名高爾品。中國安徽巢縣人，1947年生，11月2日生於南京。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大陸知名的作家和學者。「六四」之後，曾數次上街遊行，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並憤而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嗣後，曾兩度應邀赴北美講授「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文學」。1994年春，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同年底，應臺灣《聯合報系》的邀請，赴台作訪問研究。1995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擔任訪問學者，翌年2月被哥大聘為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1997年後擔任哥大訪問學者。辛氏曾於中國大陸出版十餘部文學歷史著作，具有廣

「我早幾年就有中國近代史必須改寫的想法，但總覺得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於年輕人」。我想李慎之生前大概未讀過《誰是新中國》，否則必會拍手叫絕，歡呼這位年輕人就是辛灝年先生！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新華社移居香港，我不斷探索中共造成大陸大災難的原因，我研讀了許多在大陸看不到的有關中國的書籍。我發現，著名學者徐復觀教授，對中共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他在《論中共》一書中說：「毛澤東的天資、經驗，主要發揮在對敵鬥爭的謀略上；是以共黨的組織及群眾路線為運用的基礎，所以表現得非常突出，使中共獲得了政權。但他不僅缺乏一般學術上的知識，即對共產理論，也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所以他在文革中的言論，固然只有『霸氣』而無『理論』；甚至在語意上都有問題」。（215頁）對鄧小平，他認為，「鄧小平的白貓、黑貓『只能作一時的修修補補』，不能奠定千百年長治久安的法制」。（224頁）他還認為，「大陸的知識分子，假定把二十九年親身親聞親歷的情形加以反省，反省出所以出現『大亂』的原因。則一反掌之間，去偽存真，為國家人民思考問題的思想家便大批出現了。解決人自身問題的思想家，本是從憂患中產生的」。（233頁）

### 徐復觀看法很深刻

徐復觀先生的看法是很深刻的。大陸不是正在出現許多反思中國五十年災難史的學者和文章嗎？辛灝年這本巨著，正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我對你有兩點建議：

第一，廣泛宣傳《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不只在美國，特別要在香港發行這本書，讓香港、大陸、臺灣眾多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能夠讀到這本書。我曾買了十多本《誰是新中國》送給美國、大陸、臺灣、澳洲的朋友，他們讀後反應都非常熱烈。

第二，出版一本《誰是新中國》的縮寫本，讓沒有時間讀這本六、七百頁厚書的人，能夠先讀到縮寫本。

撰安！

莊思明  
2003年8月8日

泛影響。1994 年來北美後已發表中國現代史專論 20 篇，並應邀在美、加十幾所大學和各地僑界講演「中國現代史反思」系列 50 場，次次引起震動。

辛灝年這冊書，有一位美國學者和兩位中國學者寫過「序」。美國學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他開頭即說：「這本書展現了一個人獨自探索歷史真相的成果」，認為著者的思想已得到「熱烈的反響和接納」。兩位中國學者，一位是謝功果，他認為辛灝年「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這本書「是理的彙聚」，也是「情的凝結」；另一位是鄭義，推崇辛著「是一部傑出的歷史著作」，不但建構了「民主革命史」的體系，而且使「歷史事實」得到「再發現」，並認為「本書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論年齡，辛灝年足足比我小了 20 歲。他是在抗戰勝利後第三年（民國 36 年，1947 年）出生的人，受的是中共統治下的教育，與我一直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教育與政治制度下成長、工作，並親歷「九一八事變」之後的 6 年國難，8 年對日抗戰，4 年國共內戰，50 年臺灣建設與趨向沒落的背景，完全不同。我以一個背景完全不同，卻都同樣關懷並投注於中國現代史的「老者」身份，來閱讀並評價辛灝年這冊《誰是新中國》，確有不少異乎尋常的發現與感慨。

書名《誰是新中國》，著者說「為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建議」，這說明《誰是新中國》這個問題，是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共同關注、共同探索，也有相當程度之共同認識的中心問題。問題的核心是：「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著者的答案是：「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第 348 頁）。在自序「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著者特別指明他所視為「新中國」的中華民國，是孫中山與蔣介石兩位先生先後創建與捍衛的中華民國，而非假藉中華民國名號進行毀滅中華民國陰謀的「中華民國」。著者於卷首特別聲明：

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歷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曾艱難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即有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繼承者們所開創、所捍衛、所建設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卻要拋棄中華民國的國統；承繼了中華民國國統，卻又要背離整個中國；掛著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卻要菲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詆毀中國國民黨的民主性質，歪曲中華民國建國的艱辛歷程，否定曾在艱難時代為臺灣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歷史基礎的蔣介石先生——即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臺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

著者寫這段話時間是 1998 年 11 月，他的書出版於 1999 年 6 月。出版後不到一年——2000 年 5 月，他所擔心的情境在臺灣出現了——中華民國國號已被盜用，而中國國民黨則於選戰敗北後欲振乏力，著者看到此種情形，悲憤之情恐難自己！

內容上和結構上，《誰是新中國》包含四部分；一為導論，含兩章，陳論世界各國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歷程及趨勢。二為上卷，主題為「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含 8 章，佔 307 頁的篇幅，析論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起源、發展、成功的條件，中國國民黨捍衛、建設中華民國過程中的困難與成就，凸顯孫中山和蔣介石兩位領導人的歷史地位與貢獻。三為下卷，含 7 章，佔 276 頁，主題為「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以批判筆法，析論中共的建立，對中國民主革命參加、破壞和背叛經過，假抗日以圖存擴張，發動內戰「打江山」，終於在中國大陸復辟了專制制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毛澤東。四為總結，謹佔 3 頁又半，主題為「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和民主與專制的三大較量」，其對中國前途的論斷是：「中國的統一，前題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制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著者認同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定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上卷，第 1 章），其歷史意義在於「創立了真正的新中國——中華民國」（91

頁)。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長流中，居於「分水嶺」的明顯地位，他說：

由於辛亥革命劃清了新舊中國的鮮明歷史界限，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成為中國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分水嶺」。但是，近 50 年來，因毛澤東的旨意，和毛氏所發明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荒唐理論，中共史學界也就不不得不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啓年代，強行劃定在爆發了五四運動的 1919 年。……今天，當我們在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中，已經能夠明白毛氏這一劃分的「用心」時，重新將光輝的 1911 年，即偉大辛亥革命爆發勝利的年頭，當作我國現代歷史的起點，就不僅是在學術上對於歷史的一個澄清。而且關係到我們對祖國前途的歷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上卷頁 95）。

否定毛澤東的一些欽定教條，大陸學者中非只辛灝年一人，但態度之堅決及言詞之銳利，應以辛氏為首選。他在「後記」中透露：他在海外使用的筆名辛灝年，係「取『辛亥年』之諧音」（671頁），其對辛亥革命竭誠肯定的熱情，可以想見。一個一直在中共統治下成長的文學家兼史學研究者，有全面的、直截了當的，絲毫沒有保留的向中共一向所堅持的史觀挑戰，絕對是一位勇者的表現，也是經過多年對歷史反思所獲致的結論：拆穿騙局，回歸歷史的真實面。

著者對孫中山、蔣介石兩位先生，有由衷的推崇。他在《誰是新中國》的首頁，表明此書之撰著，是要獻給兩大群體和兩位偉人。兩大群體，一是「半個世紀以來，用智慧與痛苦、鮮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書主題的——中國大陸人民」；一是「一百年來為推進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而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所有先賢和先烈們」。兩位偉人則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共和制度的創建者，現代中國的開拓者，和中國民主進程的歷史領袖——孫中山先生」。和「領導了北伐，統一過中國，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奠定了臺灣民主繁華基石的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

對孫中山先生的推崇，史實俱在，不會有太多的爭論，稱頌蔣介石先生為民族英雄，在大陸學者有關著作卻不多見。著者在本書上卷共八章中，以整整五章的篇幅來論述蔣氏的歷史功勳，而於第六章附文〈民族英雄——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西安事變〉首段，即以抗戰勝利一事舉出了「為什麼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的四項理由（287至289頁），大意是：

——宋之岳飛、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都是反抗外敵侵略的人物，然未能挽救亡國之禍，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使國家免於危亡，且贏得光榮勝利。岳、文、史諸人均被稱為民族英雄，蔣「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亡了國，蘇俄雖未亡，但「其淪陷的土地即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戴高樂等人都能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蕩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誇之」？

——蔣介石先生在抗戰中的實際指揮、建設及「持久戰」大戰略等作為，「就更能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若與「一心只要『日蔣火拼』，心心念念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毛都能成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作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著者自承於本書上卷中為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作「辨析和辯護」（作者自序），但對孫中山、蔣介石兩先生和中國國民黨也有若干批評。他批評孫中山於決定及推行「聯俄容共」政策時「出現了嚴重的失誤」（155頁），失誤之一，是孫先生「在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

甚了了」。至於「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歷史錯失」，著者亦毫不隱晦的指出「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思想陣地先敗」、「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反被指為獨裁」、「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困惑黨人民心」，「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等大端（311至322頁）。對中國國民黨，著者著眼於中共的指稱國民黨為「反動」；他從歷史上看到中國國民黨一百年來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帝制，創造共和；二是「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三是領導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且「成爲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四是在內憂外患長期交相煎迫之下建立了憲政體制，「頒佈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五是長期堅持反共以維護中華民國，數度獲得成功，最後卻慘遭失敗；六是在臺灣實施民主憲政，堅持中華民國法統與國統，從而將臺灣建設成爲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民主繁榮境界（349頁）。他的結論是：

一個政黨，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確而成功，一件失敗但並非罪行，那麼，這個政黨還是反動的嗎？還是一定要打倒的嗎？（349頁）

儘管著者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有著比較完整的瞭解，但關於引用的歷史文獻和原始史料不足，本書上卷也出現了一些錯誤。舉例言之：

——把同盟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中的後二詞，次序顛倒了，寫成「平均地權，創立民國」（82頁）。

——把1906年的萍（鄉）瀏（陽）醴（陵）之役，誤作爲「萍、瀏、豐起義」（88頁）。

——將革命先烈禹之謨寫成「禹之模」，陳可鈞寫成「陳可君」（89頁），又列有「劉神終」一名，未知何所依據！

——廖仲愷，寫成廖仲凱（159頁），雖一字之差，然亦不可疏忽。

——著者提到：「國民黨『一大』所選的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11名（一名候補）」（157頁）。錯了，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共24人，其中中共黨員僅3人：譚平山、李守常（大釗）、於樹德。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有7人爲中共黨員：沈定一（玄廬）、林祖涵

（伯渠）、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

本書下卷，論述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著者不同於一般中共革命的作者，他不以中共的建立與發展爲主軸，而系以中國民主革命爲主軸，而以中華民國爲主題，來評論中共的「叛國」陰謀與行動，且看其全卷七章的標題：

- 一、中共參加、破壞和背叛中國民主革命
- 二、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爲一個農民造反黨
- 三、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上
- 四、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下
- 五、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 六、中國共產黨全面復辟專制制度
- 七、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著者是在抗戰勝利後出生，完全接受中共教育的陶冶，對中共在大陸建政後的作爲有直接的體驗，但對中共早期活動的理解，則系由於後來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與反思。文字上，他指責中共爲叛、爲僞，所敘述的史事則有所依據，絕大部分都合於事實。他在上卷中即批判過馬克思（Karl Marx）「剩餘價值觀錯誤」（46頁）及「對資本主義認識錯誤」（48頁）；也談論過：何謂「國共合作」「何謂新三民主義」（165至169頁）。他認爲中共聲言曾有兩次「國共合作」——一是1924年之參加國民黨，一是1937年之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參加抗戰，著者則認爲兩者都不是「合作」而是：

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與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爲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與虛假歸順（165頁）。

總之，在著者心目中，中共的專制統治，是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的「逆流」（自序）。鄭義的序文中，則點名著者的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中華民國歷史上一段專制復辟時期」。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向是民主，「專制復辟」必將「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終地土崩瓦

解」。(8頁)他也曾善意的提醒中國國民黨人：「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大陸，而不是在臺灣」(349頁)

讀過辛灝年這冊近700頁的《誰是新中國》之後，確有不少感慨。這樣強烈認同中華民國國統法統和中國國民黨的著作，不來自臺灣，而出自中共統治下大陸青年學人之手，能不令中國國民黨人於欣慰中感到愧作而深刻的反省！

2001年6月21日於北美旅次

誰是新中國論戰之三：

## 正面評價

### 《誰是新中國》舉例

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無疑是二十世紀的「天問」。

——《中國社會民主創黨宣言》

一位著名的中國教授對我說，《誰是新中國》這本書與中國未來的前途關係很大。

馬悅然：在2001年舊金山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大會上的講話。

我的這些想法，受辛灝年教授的啓發很大。辛教授寫了一本專著《誰是新中國》，值得一看。該書以無可辯駁的史料闡明，孫文先生締造的中華民國，才算得上是結束專制制度後的「新中國」；而共產黨建立的所謂「新中國」，實際上是專制制度的復辟。結論非常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應當回歸到孫文先生的起點。大家知道，蘇聯解體後，俄國並沒有搞一個什麼全新的建國方案，而是回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那是結束沙俄舊制度的革命。現在俄國採用的國旗，就是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三色旗。

辛灝年教授現在像苦行僧一樣，在海外四處演講。講孫文，講孫文學說，講三民主義，講中華民國。其論點不但得到廣大同胞的認同，也獲得廣大大陸留學生的認同。

辛灝年教授的活動，不但受到中共勢力的打壓，更受到臺灣國民黨勢力的打壓。按道理說，他的活動在宣揚國民黨呀，國民黨本應歡迎才對，為什麼反而打壓他呢？其實，仔細琢磨，國民黨不打壓才是怪事。你想想，一個在街上擺攤賣假藥的，看到有人端著真藥來了，能不上去把賣真藥的趕走嗎？否則，他們的假藥還怎麼賣呀？臺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雖然還頂著「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招牌，其實是一群賣假藥的！

因此，重新舉起孫文的旗幟，重新舉起孫文學說的旗幟，是重建中國的正確方向。

王炳章博士：《中國民主革命史》

香港環球實業出版公司2001年版

一九九九年，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學者辛灝年根據多年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的結果發表《誰是新中國》一書。辛灝年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從十六世紀黎德蘭革命至今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就是一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反復較量的過程。這一觀點為我們解讀紛紜複雜的世界各國政經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歷史意義非同凡響。辛灝年並著重指出：

「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只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君王復位，王朝復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復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意所在。」

陳禮銘：「從社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

《罕見奇壇》等，本刊將於第九期轉載

在現代中國，像高行健一樣，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作家和歷史學家都發現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怪圈，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著者辛灝年先生，如他在該書的首頁題解中所概括的：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

局面，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祇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不能倖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傅正明；「歷史怪圈中的高行健」GOOGLE 網站

振興中華，絕對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需要宣傳、需要行動。今天辛灝年先生的巨著「誰是新中國」，不但給迷失了方向的中華兒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為那些有志於投身民主革命的志士武裝了思想，昔日民運朋友那種像沒頭蒼蠅般亂闖、幻想共產恩賜民主的局面已經結束，等待著中華兒女的是團結奮鬥合力推翻共產極權暴政，完成國人的百年夙願。

中華新同盟會新世紀宣言（GOOGLE 網站，本期）

近年來，海內外湧現出了一批像辛灝年教授這樣的學者，他們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發掘並整理了一大批有價值的共產賣國資料，它強烈地撼動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進一步提高了中華民國本就具有的道義價值。海內外所有從事抗共民主運動的個人和團體，千萬不要低估這一發展趨勢，千萬不要迷失中國將來發展的基本方向，毅然舉起「驅除西洋馬列，恢復中華民國」的旗幟，必將獲得大量的政治民心和政治資源，並由此奠定民主在中華大地全面開花的勝利基礎。

傅鐘華：“驅除西洋馬列、恢復中華民國”

GOOGLE 網站，本刊第全文見本刊第 8 期

抗日戰爭「成就」了中國共產黨，「英勇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基本上是袖手旁觀、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建政以後，中共又長期在歷史教科書、史學論文中醜化蔣介石，誣指他「消極抗戰，對日妥協」等等。今天，翻開辛灝年教授出版的記錄國共兩黨真相的《誰是新中國》和主辦的《黃花崗雜誌》，我們不禁要大喝一聲：那些把並不屬於自己的功勞硬望身上撈的人是可恥的人，是用意可疑的人，是千方百計抵制臺灣民主制度的人。

楊銀波：“談中日索賠的原則”，《華夏快遞》等

杜憲成為我的偶像是她在熒屏上消失之後。但是，她最後一次出現在熒屏上的時候，我卻沒有看見，因為在那之前的幾天，我就不看電視了，我痛恨這個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的時代，從童年始即為謊言所哺育，受欺騙之教化，所慶倖又是，在一片假、大、空的喧囂中所長成的一代，竟成為

最早的覺醒者和叛逆者，並且出現了像辛灝年這樣的成功的反思者，《誰是新中國》便是他代表這一代人在痛苦中思考的結晶。也只有經歷過這種痛苦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發憤，應該感到慶倖的是我們已經產生並且正在產生著許多像辛灝年、任不寐、王怡、劉曉波這樣一批新啟蒙運動的中堅力量，更多的人們正在走出中世紀的黑暗。

“也談偶像”，《博訊新聞網》

歷史學家辛灝年十餘年來致力研究中國現代史，出版了著作「誰是新中國」。中共在抗戰期間的行為是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了抗戰期間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變的發生和解決，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史實，中共抗日不力而極力反蔣之策略，以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等歷史真相。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辛灝年揭示出的真相幾乎無一例外地顛覆了中共幾十年來的官方結論。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齡的生平和辛灝年的研究所還原出的真實抗戰史之外，中國大陸的民間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漸現出與官方不同的聲音。

黃傑：“宋美齡之死顛覆中共抗日史詮釋”

《博訊新聞網》等，本刊第 8 期

《北京之春》編輯部：

年前美國的傅先生給我寄來了《黃花崗》創刊號，細讀之下，覺得似曾相識又耳目一新。似曾相識者，此種觀點在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老一輩人中曾口耳相傳；耳目一新者，是對中共長期仿造歷史欺騙年青一代的「傳統說法」提出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來個當頭棒喝。二零零二年元旦，李先生又專程從紐約給我送來一本《誰是新中國》的書。雖來不及研讀，但已是「驚鴻一瞥」。一刊一書，皆為辛灝年所編作。蓋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建都南京至今，足足被人罵了八十年，從工人兄弟、農民父母、革命師生、愛國僑胞到紅衛兵、黨外民主人士，哪個不把「國民黨反動派、舊社會反動政府」罵個狗血噴頭，痛快淋漓？於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成了「舊中國」；抗戰領袖蔣介石將軍成了「賣國賊」；保家衛國的國民革命軍成了「反動派」；為國效勞的黨政公務員成了「反革命分子」！然則，辛灝年以嚴謹的治學精神、非凡的道德勇氣，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還它的本來面目。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受盡了中共獨裁政權的蠻橫與殘暴的統治，煎熬之苦。絕望之餘，再度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天問。《誰是新中國》「回答」了這一個問題：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在九十年前早已經解決了，三民主義是理論，中華民國是實踐，只不過，孫先生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須努力」。「未成功」者，包括失敗與傾覆；「努力」者，包括奮鬥與犧牲。明於此，對中共目前的猖狂，我們大可視作中華民國史上，繼「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的第三次封建惡勢力的反復而已。國人莫再徬徨與遲疑，迅即奮起共同結束專政獨裁，再造民主共和，使中國真正立於世界自由民主國家之林，真正實現「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的豪言壯語。

乃木：《北京之春》：民運情況通報

共產黨是怎麼產生的？是中國人民自覺自願地根據“俄國 10 月革命一聲炮響”而產生的嗎？顯然不是，辛灝年先生的名著《誰是新中國》一書已經把共產黨的產生、發展與毀滅的軌跡做了完整詳細的描述。

清水君：“清水君愛民講座之二”  
《博迅新聞網》等

辛灝年先生發表了巨著「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堪稱中國近代史教程，它把被共產黨顛倒過來的歷史又重新顛倒了回來，同時也給中國民主運動提供了理論指導，那就是「推翻共產、振興中華」。

……無庸置疑，隨著辛氏「中華復興」論的廣為傳播，一場有組織、有目標的革命性復興救亡運動將在中華大地迅速展開，滅亡共產暴政、復興中華大業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紀曉峰：2000 年 12 月 11 日於波恩，《中華評述》

.....

## 負面評價

### 《誰是新中國》舉例

之一：

### 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

簡評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

細柳營（轉自電子雜誌《楓華園》）

近來看到許多人在議論辛灝年教授的書《誰是新中國》。現在有些人認為這書是民運的理論綱領性著作，不過筆者在讀過後認為還是相去甚遠。推崇孫中山的中國民主理論當然是無可非議，為大家同有的共識。而如辛先生這樣如此推崇蔣介石著實是令人吃驚。我們閱讀歷史，也應該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面對歷史事實，而不是以個人的情感和需要隨意作拔高誇耀或貶低剔削的炒作。要真實地反映面對歷史的事實，才真正能夠對新的歷史起創造和推動作用，這才是研究歷史的真正目的。這點非常重要，而辛灝年書中所缺乏的也正就是這點實事求是的精神。辛灝年的書中至少有三個原則問題值得質疑和商榷。

其一：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和蔣家王朝的許多腐敗其實是歷史的定論，而不完全就是中共的刻意宣傳。辛著非常推崇的是 1947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從字面看或許這個「憲法」確實有許多民主的詞彙，甚至能與美國的憲法相媲美。但是大凡獨裁者常用的手段，就是能夠找到一些文人墨客來造就一些華麗詞藻，或者拼湊一個所謂的「民主」憲法作為招牌，掩飾自己獨裁的本質。這種現象在世界上是屢見不鮮的。以下舉出三個例子，從歷史的真實事出發，我們就能看出蔣「民主」的虛偽性，專制的實質性。

第一，在抗戰行將結束之時，蔣邀中共以及其他社會政治力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國是，簽訂了「雙十協定」。「雙十協定」內有一非常重要的條款，就是要釋放政治犯。中共等當時至少提出兩個明確而重要的政治犯，就是張學良和楊虎誠將軍。然而蔣卻沒放。不要小看了這個細節，事實上是反映出蔣介石從一上來就公然違背雙十協定，也就是對全國人民民主信念的背信棄義。

第二，戰後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要解決這個經濟問題，要穩定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專制導致的腐敗集團通常是更加能夠在這個局面上發國難財，使得國民經濟更加雪上加霜。1947 年「國大」開過以後，蔣經國奉命在上海開展金融和幣值的改革，對改變當時的經濟危局不失是一個良機。蔣經國年少氣盛，辦事雷厲風行。這舉動也不但被美國朝野各政治界看好，而且也被華爾街也看好。然而由於經濟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體制的問題，也就是必須會觸及到反腐敗。因蔣經國的「反腐敗」碰到了蔣介石當時的「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兒子的問題。蔣介石就丟下東北幾十萬大軍的危局不管，飛回上海來救這「腐敗」的命。他強行中止了蔣經國已開展的改革活動。此舉不但造成極嚴重的經濟後果，而且還導致東北精銳盡淨丟失，使得中國當時已經是危機重重的經濟最終崩潰，也使蔣的國民黨在全國所有階層人民中嚴重失了信，失去了絕大部份人民的支持。這還真正改變了美國等國際社會

對中國的看法，被迫全盤從新考慮對華政策；最後還有造成了蔣經國與宋美齡個人之間終身的不睦和對立，事實上也破壞了他蔣家族自己。辛灝年的書號稱是收齊了全部主要的歷史材料，然而對蔣介石此事卻是只字未提，這又是什麼原因？

第三，辛灝年不懂，在軍事上一貫是以成敗論英雄的，因為軍機不可再現。軍事鬥爭條件特徵導致軍事的失敗者一般很難得到再實踐的機會。說是中共怎麼樣利用抗戰壯大了力量，但無論如何400萬優勢裝備的軍隊怎麼就會敗在120萬「大蓋槍」部隊手下？我們仔細回顧和研究了國共兩黨在內戰戰場上各個階段的形勢和態勢，雙方的軍事指揮才能應是各有千秋不分上下，導致蔣介石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他自己。蔣介石發動內戰的主要意圖是消滅中共當然毫無疑義，但是利用內戰排斥消滅異己卻也是動機。他將「雜牌軍」放到內戰的第一線，企圖利用中共的手來消滅這些異己，不想人家調轉槍口，成了葬送他「嫡系王牌」的關鍵軍事因素。這種倒戈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多見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商湯的軍隊臨陣倒戈使周朝的軍隊取得勝利。中共在軍事上能夠「取之於敵」和「引君入甕」固然是高明之舉。不過企圖借敵之手達到清除異己之道卻常常是封建專制統治者慣用的，但往往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舉。

其二：辛灝年在很多問題上立論不清而自相矛盾。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一邊標榜他自己是「民主」的，而且以實現「民主」作為他著作的主題，而另一方面又稱蔣介石失敗的重大歷史錯失之一就是「權威領袖不威」。而怎樣才算「威」呢？他從新權威主義的認識觀點出發認為就是要對文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一句話就是不讓文人開口。大家可以看到這恰恰就是專制獨裁的特點。民主體制和民主領袖最不怕的就是文化自由，因為光靠說或罵是不能整垮任何東西的，害怕說害怕罵本身就是因為有虧心見不得人之處。一切坦蕩由民眾作主這就是民主的最大特徵。如果這麼說彎子還轉不過來，不妨打個比方。就說江澤民也有一部「民主」的憲法，雖然上面還有「四項原則」，但那僅是暫時對付腐敗集團「太子黨」的一副安魂劑，事實確實是如此。江澤民就算是沒有「錯失」的民主領袖，現在就不讓高爾品說話，而且不讓他回國。因為這樣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防止他現在罵我「民主」的江澤民，而去為「叛亂叛國」的魏京生效命，最後在魏京生之流的「專政」下被處決被迫害。是不想讓他的鮮血將他這些「民主先驅」推到歷史罪人的地位之上。魏本來就是毛澤東的「紅衛兵」麼。這樣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樣的邏輯想必高爾品也是難以接受的吧？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才真叫是讓人啼笑皆非又令人作嘔的敗筆。蔣宣揚孔孟之道，那就是他專制獨裁的本

質所為。對於日本的侵略，他一邊是害怕日軍，一邊又是別有用心企圖借日軍手鏟滅異己。他一面以豪言壯語「鼓勵」那些異己與日軍拼命，但一方面又暗中採取有利於日軍的行動。這是國民黨自己編的歷史書現在也不忌諱的事實。就算這些歷史書全部都不足取，但筆者卻一直知道一個真正的事實。筆者出生在江南，自小一直聽長輩講到抗日戰爭的事。江南的民風一貫憨厚且懦弱，人們借助得天獨厚的風土氣候帶來的五穀豐登，祖祖輩輩希望安居樂業，不是到達極端他們不會奮起拼命的。然而自從抗日的烽火驟起，家園被毀，特別是日寇的屠殺政策激起人們的仇恨和義憤。筆者外公就救助過一位全村被殺死裏逃生的鄉親，據說他一邊褪換下血衣一邊咬牙切齒不報此仇不殺日寇誓不為人。這樣的人在當時數不勝數，然而他們參加的都是新四軍，都是共產黨的隊伍。當時國民黨確實是消極抗戰，至少是沒有發動人民進行抗戰。在「親善睦鄰」概念下掩蓋的賣國途徑，為的是維持他的獨裁統治，這種政策不論是在抗戰初，還是在抗戰勝利後，都會激起人民的反對，這也就是蔣介石最終失敗的必然原因之一。至於蔣介石退到臺灣以後臺灣經濟實現的騰飛，有一種說法是蔣將大陸國庫的黃金全部運到了臺灣，因這批黃金作為基金導致臺灣經濟的騰飛。筆者對這倒是不以為然，金錢只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對於一個個人且如此，對於一個政體就更不要說，憑一堆黃金是不能夠導致經濟騰飛的。而真正導致臺灣經濟騰飛的原因卻是美國，是美國向臺灣開放了美國和東南亞大洋洲所有美國勢力控制範圍地區內的所有市場，這樣導致了臺灣的經濟騰飛。從這點我們也能看到今後大陸開放以後的前景，大陸今後對臺灣經濟的影響，以及台獨的完全不可能性。至於蔣介石「將臺灣推向中國五千年來前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推動了臺灣人民公民權力的保障和發展」。不用多說了，就請高爾品去問一下現在臺灣執政的民進黨精英領袖們，看他們能否認同，他們是怎麼說的，再來討論我們的問題吧。

其三：說到高爾品的致命弱點，與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是不懂得科學和經濟。因此許多問題上他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因而他的「理論」不可能指導中國革命或改良的實踐。我們說後兩位畢竟還是一代歷史人物，而前者可能不會在歷史上產生影響。歷史是有情的，而真正的有情在於能夠創造歷史。則所謂歷史造就英雄，英雄創造歷史。同樣在歷史遺產的基礎上致力於客觀造就一個新中國，一個新世界，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這個歷史任務確實需要我們這代人來完成。這需要一個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聽友人說高先生身體不是很好，筆者是學醫學的，從醫學心理學的角度看，很清楚如果一個人畢終生經歷從事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業，其終生目的造成的社會心理壓力就不能導致身體健

康；相反如果他的事業是成功在望，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事業，他的心情一定是開朗的，身體一定會是健康的，也是長壽的。筆者雖然上的是醫學院，但不瞞說還是利用偶然的機會獲得一些有關歷史的知識。在大學上的政治課是「中共黨史」，筆者利用這個機會開拓思維，認真研究過「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在研究生階段政治課是「自然辯證法」，筆者別出心裁專門研究了軍事辯證法，因而也瞭解了軍事。當時在本行功課之餘，去南京的原中央圖書檔案館及南京軍區資料室的出入很多，兩門課的開卷考試都獲得全校第一。如果筆者沒有記錯，高先生稱他的著作雖然完成於1995-1998年間，但是構思卻是1995年以前完成的。在這個時代，歷史已經是日新月異，作為指導社會歷史前進的思想不更需要更新和創新嗎？如果迷信宣揚新權威主義，人們會不會懷疑你的「自我流放」實質是為逃避「反腐敗」？臺灣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當魏京生才到美國時，克林頓總統非正式會見他，問到美國政府能夠為中國民主做些什麼？魏不會回答，只是說不要輕信中共。克林頓只好笑了，因為會見他本身就是不在輕信。其實當時回答講一句至關重要的話，能使中共感到無限的壓力。就是讓美國出售更多更先進的武器給臺灣。協助臺灣軍隊實現改裝，客觀上對鄧小平末期黑暗民心向背的中國形成軍事上的反攻態勢。臺灣的「漢光15」軍事演習還真正反映了這個軍事構思，後面的「漢光」就不行了。無奈魏京生認為這是人輕言微，不屑一顧；而臺灣經李登輝和陳水扁在台獨的末路上越走越遠，已經在中國民主事業這個領域失去了原民主社會帶來影響中國的那點優勢。然而歷史還是要創造的，確切地說還得由我們來創造完成。創造未來中國的歷史不是靠翻閱歷史教科書能夠解決，這需要有新構思，需要有創新。筆者認為通過「科研—創業—政改—整軍—拓邊—完成新中國」這是一條路，是創造21世界世界超強新中國的必經之路。這中間有許多細節，我們今後可以慢慢討論，或者探索。但是我們必須掌握科學，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能夠崛起於世界的前提。這是民主先驅孫中山先生，以及毛澤東和蔣介石都不曾擁有的，是他們的缺憾。然而我們就擁有，歷史將由我們來創造。我們要敢想前人沒有想過的事，設計前人沒有設計過的藍圖，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業。要敢於創造，善於創造，如果說世界是一個創新的世界，其真正的涵義就是在這裏。

之二：

## 沒有蔣介石的獨裁，哪來毛澤東的獨裁？

沒有蔣介石的獨裁，哪來毛澤東的獨裁？那本為蔣介石獨裁作全面辯護的書《誰是新中國》，其所列出的幾乎每一條理由，都可以現現成成地拿來為今天的中共獨裁作辯護。這是全書的致命傷：反今天的專制，卻從昨天的專制中去找自己今天「反」的合理性。理論學術與政治操作不一樣，前者只有徹底才能服人；後者則可以與昨天或明天的敵人結盟以反對當前之敵。（民運人士網上跟貼）

## 《誰是新中國》的

## 社會政治影響

之一：

王炳章

## 給中國大陸同胞的一封信

孫文（孫中山）於公元一九一一年在中國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孫文和早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民主的共和國，她永垂史冊，世界公認。

今天，我們大家達成共識，在中國大陸推翻中共之後，新的民主政府叫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也是中華民國之後，中國大陸就回到了民主憲政的時代，已經實現民主憲政的臺灣，獨立的要求很容易就說服了，大家自然回到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我們在推翻中共之後，重新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有利而無弊。

目前，我們正在中國大陸內部策劃和組織力量，發動中國大陸內部民眾起義。很快我們將宣佈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我們將和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一同努力，重建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出生於中國大陸的同胞們，只要你們目前還沒有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和其他外國國籍，只要你們在不久的將來願意公開承認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中華民國政府，你們將成為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的最光榮的公民。在中國大陸推翻中共之前，你們將有資格向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申請取得一切中華民國公民的權利（有部分限制，例如已經取得外國永久居留身份或難民身份者例外）。

請您在下面的表格簽字。中國的民主未來一定要實現，中國的民主未來很快就要實現，讓我們共同來努力奮鬥。

王炳章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十日（2001年10月10日）

（轉自《營救王炳章》論壇原為機密文件，現予公開，2003年4月5日上網）

之二：

## 中華新同盟會（大陸）

# 新世紀文告

（二零零一年元旦）

元旦的鐘聲已經敲響，隨著這鐘聲人類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世紀裏，人類經歷了兩次大戰的苦難，世界目睹了從蘇聯、中共國到紅色高棉上演的共產主義悲劇和鬧劇。東西方長達幾十年的冷戰，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把毀滅性戰爭的陰影懸掛在世界人民的頭上。然而，在世紀末的二十多年裏，世界範圍裏興起了民主大潮第三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葡萄牙、印尼、蘇聯、韓國、東歐各國、南美大部分國家等幾個專制、獨裁和威權政權，在第三波裏像多米諾骨牌似的紛紛倒塌。第三波同時也宣告了共產主義的失敗。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把世界帶入了新的紀元。

中國曾經在民主浪潮的第一長波裏趕上了末班車。十九世紀末，中國百年第一偉人孫中山先生創造了集東西方智慧於一爐的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為旗幟的中國同盟會，在二十世紀初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中國幾千年帝皇專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可惜，中華民國多災多難，先有袁世凱稱帝，後又有張勳復辟，接著又有北洋軍閥的混戰，孫中山不得不發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革命。可是，當孫中山離開世界的時候，中國的民主革命大業仍然沒有完成，他很痛心地下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孫中山的繼承者們取得了北伐的勝利，民主制度在全國建立已成爲可能，但是緊接著的內亂和外患打碎了中國人的民主夢。這個內亂，主要就是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的共產革命，這個外患就是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共產革命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孫中山在「孫越宣言」第一條明確無誤地宣告：「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

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宣言中也明確指出：「對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

然而，蘇聯背信棄義。中國的共產革命，在蘇聯的指揮、支持下，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歷史條件下，得以苟延殘喘，最後用暴力把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趕到了臺灣，並且在大陸用馬列主義建立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使中國形成了五十年的國家分裂局面。

鑑於日本入侵造成的危難，鑑於共產黨的武裝叛亂，同時也鑑於孫中山先生繼承者們自身的局限和錯失，他開創的中國民主革命事業在中國大陸遭到了完全的失敗。中共一直把它武裝奪權建立的中共國稱之爲新中國，可是這個所謂的新中國實際上是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封建極權國家，其極權專制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它甚至對每一個人的思想言論都實行了專制。毫無疑問，中共推翻的不是專制皇朝，而是推翻了專制王朝才建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取而代之的乃是以人民和共產革命的名義復辟了的封建專制體制，因此它根本就不是新中國。

對中國人而言，二十世紀是民主革命興起而又遭遇挫折和失敗的世紀，也是共產主義革命興起和苟延殘喘的世紀，更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作殊死搏鬥的世紀。今天，在這新舊世紀交替的時刻，我們已經可以肯定地說，整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孫中山的立場是正確的，共產主義是中國的禍水，它是一個殘害中國人民、使億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主義。

事實上，共產黨早已成了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屍，它早就拋棄了馬列主義，現在保留下來的那麼丁點共產術語，也只不過是虛張聲勢、愚弄人民、爲其統制權力的合法性、合理性遮羞的破布簾。與此同時，隨著臺灣社會民主實踐的成功，孫中山先生創導的三民主義及其在中國開創的民主革命事業，正在重新新興起，並得到越來越多的海內外華人的認同。面對二十一世紀，追求民主、自由、科學的每一個中華兒女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新世紀裏，我們將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結束共產一黨專政，推進並完成整個中國範圍內的民主革命事業。

今天，中華兒女奮鬥的目標是：驅逐共虜，還我河山，再造共和，振興中華。驅逐共虜、還我河山，是要像當年驅逐韃虜一樣，推翻共產黨從蘇俄引進的紅色王朝，把它們建立起來的暴虐的極權體制徹底砸爛，把那些喝中國人血的共產匪徒從這個世界上統統清除掉，讓國家真正回到人民自己

的手中、重建民國。再造共和、振興中華，就是要回歸孫中山鋪設的民主道路，完成民權主義的目標，建立具有四大民權、五權憲法的民主制度，並在此基礎上恢復五千年華夏文明傳統，復興祖先留下的中華文化，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科學、社會生活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振興中華，絕對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需要宣傳、需要行動。今天辛灝年先生的巨著「誰是新中國」，不但給迷失了方向的中華兒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為那些有志於投身民主革命的志士武裝了思想，等待著中華兒女的是團結奮鬥合力推翻共產極權暴政，完成國人的百年夙願。

華人同胞們，海外僑胞，華夏子孫歷來都有赤心報國的優良傳統，大家起來，向共產極權暴政宣戰，還我河山，走向共和的偉大歷史目標，一定能夠得到最後的成功。

之三：

## 驅除西洋馬列，恢復中華民國

傅鍾華

### 一、「恢復中華」口號在技術層面上的價值

在同中共進行的政治鬥爭中，「恢復中華民國」這個口號在技術層面上的價值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共產黨肆無忌憚地利用民族主義愚弄中共國人時，使用這一口號不但可以揭露中共假民族主義的虛偽本質，而且可以制中共於非常被動的地位。近十多年來，中共大打民族主義牌，玩所謂「愛國主義遊戲」，個中的秘訣就是要把「異端」、「外種」的標籤硬貼在反對它的對手身上。抗共民主運動如果能洞查這一陰謀，就應該毅然接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旗，把「異端」、「外種」的標籤歸還給吃俄國人奶水長大、而後又利用日本侵華發跡的中共黨匪。一旦，民主運動對共產賣國「畫像」成功，就等於先贏了一大半，往下的文章就好做好了，盡力痛打就是了，而且願意出手幫著鋤奸的人有的是。中華民族有著比任何民族更加悠久的鋤奸傳統，中國人的鋤奸意識歷來高於禦寇，孫中山當年開中華民國之先河，就是看準了這一形勢，並大力推動此一「畫像」活動，終於最終取得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偉大勝利，堪稱是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典範。

誰都知道，那時的國民革命者，完全是從外國（主要是從西洋列強各國）的制度得到啟發、進而尋求救國真理的。他們不僅學習西方制度，而且還從西方朋友那裏獲得資助，甚至遇到危險時還托庇於列強的保護。孫中山當年在倫敦從事革命活動，清駐英使館會將他秘密逮捕，就是因為有英國人的幫助和英國政府的積極介入，清政府才不得不老老實實放人。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這些國民革命者無疑是「投靠」洋人的走狗，他們的外異性有如禿子頭上的蒼蠅，想都不用想。清政府當年要是中共今天這樣巨大的宣傳能力，他們完全可以說：「林則徐遺恨綿綿，關天培屍骨未寒，革命黨就喪心病狂地去同不列顛外賊勾搭成奸，地地道道是十惡不赦的賣國逆賊。」那樣的話，孫先生當年在清國國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會比今日海外某些人好到哪裡去了，國民革命也會因此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正統資源，此種民眾認識上的劣勢如果不能扭轉，則革命成功的機會是很微小的。

可以設想，如果當年武昌起義者們不講革命藝術，實實在在地喊出「實行民主，振興中華！」或「師法西洋，改造中華！」之類的口號，那就非砸鍋不可，那十次辛亥革命十一次都會失敗。然而革命黨人頭腦很清楚，他們比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聰明，他們喊出了對清廷最具有殺傷力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鬼才相信國民革命者真的想「反清復明」，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一句口號卻實實在在地把外異性的標籤牢牢地貼到了滿清朝廷身上：三百年前你們是洋人！我們才是中華正統。

外種滾蛋，正統回歸！對於一個具有數千年傳統的古國來說，還有什麼比回歸正統更崇高更神聖的事業呢？「恢復中華」的口號一出，國民革命者立即在道義上取得了優勢，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一下子就壁壘分明了，民主運動只要證明我是漢人、你是滿人，誰都會立即明白，是韃子就是異類，就應該被推翻、被驅逐，用不著再多費口舌。當年的國民革命者就是這樣不失時機地發揚了自身的優勢，輕而易舉地給自己的事業打上了無可爭議的正統烙印，從而在一開始就「贏定了」。

### 二、「愛國主義遊戲」並非共產黨的專利

其實，「愛國主義遊戲」的秘訣人人都懂，只要設法把對手套牢，任何人都會使盡渾身解數去尋找對手的外異性。這裏必須特別指出，「愛國主義遊戲」並不是共產黨的獨家專利；也就是說，外異性乃是「不分貴賤一碗酒、你有我有

全都有」的東西，誰都套得上，誰也甩不掉，真可謂是愛國不分君賊、捉姦不分你我。在此，我們不妨簡單地回顧一下本世紀的中華「愛國遊戲史」，由此也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非專利」特點。

比如張作霖，現時的人提起他，總覺得有親日漢奸味，殊不知人家張大帥也有很地道很上乘的愛國表現：一九二七年，當北伐軍步步逼近中原時，他老人家斷然下令出兵蘇聯駐華使館區，將藏匿在帝國中東鐵路大樓內的共產頭目李大釗抓獲，並從重從快地審判、處決了李。張作霖的這一鋤奸行動，毫無例外地博得了民眾的擁戴，一時間張大帥英勇捍衛國家主權的形象十分高大，而李大釗卻暴露了他投靠俄共、挾蘇自重的漢奸嘴臉。儘管黨匪一直供李大釗為烈士，但它們至今不敢將李當時被殺的細節曉諭年青一代。

中共國成立，愛國主義遊戲依然不改舊規。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在廬山向毛澤東提了點「意見」，竟然使毛頭痛得「吃了三次安眠藥還是困不著覺」。細究起來，概因彭德懷舉起了一面共產黨喊得爛熟卻從不打算執行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彭德懷鐵心要來一次「為民請命」，他想借道義上的優勢迫使黨匪大頭目改弦更張，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然，從毛這一方面來看，彭德懷惡毒之極，他在這場爭鬥中抽盡了道義資源，沒給毛留下任何高尚的藉口：要麼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堂皇承諾，要麼把「為民請命」的人給宰了。在當時，毛澤東要想解決彭德懷問題，難度確實很大。於是，毛搬出了愛國主義絕招，大喊一聲：「彭德懷裏通外國」，一下子就把廬山會議上支持彭的人給鎮住了，彭德懷再怎麼喊冤枉也無濟於事。接著成立的彭德懷專案小組，也就只能在毛預先設定的「愛國」框子裏盡全力去證實領袖「英明」的洞察力了，查清彭賊叛國「事實」、徹底打倒紅朝「海瑞」的政治任務豈有不取得「最後勝利」之理。

後來，毛摧毀劉少奇司令部也是用的同一戰術，戚本禹寫了一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作為攻劉檄文，很快就同毛平起平坐的國家主席搬掉了。共產黨再往下的路線鬥爭就更戲劇化了，林彪掙扎了幾個回合後竟死在外國領土上，這是絕對的叛國投敵，說什麼也洗不掉當漢奸的罪名。再過幾年，到清除四人幫時，華國鋒也毫不客氣地把「崇洋媚外」、「裏通外國」的屎盆子扣到了江青頭上，因為這位毛「愛人」喜歡服進口藥、看好來場電影，而且又專門讓美國女記者寫了本「紅都女皇」史。接下去，英明領袖華國鋒也中箭落馬了，罪名則是驚人地相似。據說，他想進口大量

的外國設備來發展中共國經濟，這就觸犯了「洋罪」，按當時的說法叫搞「洋躍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必須搬掉借用帝國主義力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黨主席，讓反對搞「洋躍進」的鄧總設計師來掌權。蒼天有眼，經歷過二十年「改革開放」的每一個中共國人都可以作證，將華國鋒與鄧總設計師兩相對照，究竟是誰搞了「洋躍進」？

講到這裏，任何思維正常的人都能看出點兒名堂來了：這「愛國主義遊戲」規則，根本不管你做沒做什麼，也根本不管你將來打算做什麼，而在於你究竟會做還是不會做，在於你究竟能不能把外異性的標籤貼到你的對手身上。中國的反共民主運動，要是明白了「愛國主義遊戲」規則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明白了它的殺傷力極大，而且一直都在有效地運行著，任何人想躲也躲不開，想繞也繞不過，那就只有挽起袖子來挖他共產黨的老底了。

### 三、以中華正統立場討伐外來異物共產黨

從技術層面上來看，民主運動同中共玩「愛國主義遊戲」的勝算非常之大，比起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清廷來說，中共的外異性實在太多、太現成了。滿人入主中原近三百年尚且洗不掉洋異氣味，共產黨攫權這才多少年？中共原本就是洋胚洋種由西洋人植入中國的異物，它身上的異端夷記號可以一大把一大把地抓：黨旗上、憲法上、軍政體制上、文件上、大小頭目的講話上，乃至中小學的教科書上，到處都是，到處都有。反共民主運動應該理直氣壯地站在中華正統立場上，討伐那個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外來物——共產黨。

首先，應該要求廢除中共國憲法總綱中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條款，因為那是不折不扣推崇洋人的條款。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從先秦諸子、孔孟之道一直到程朱理學，那一派、那一家不是博大精深、上通蒼穹下貫地核的高級學問？到什麼地步上，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請兩個德國和俄國的洋人到中國來瞎摻合，瞎多嘴。以大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為本，我們早可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綽綽有餘（筆者寫到此處渾身上下每個毛孔都充滿民族自豪感）。如果硬是要學習其他民族的長處，中國人知道該怎樣做，根本用不著去看馬列是怎麼說的。總之，絕對沒有在憲法中保持這一堆「洋垃圾」的必要。

其次，應該要求取消學校中所有強制性的馬列主義課程。站在民族立場上問一問，為什麼這些西洋人要嘴皮子的

玩意兒比咱們五千年文化還高、還重要？馬克思讀過「詩經論語」嗎？恩格斯瞭解杜甫李白曹雪芹嗎？列寧曉得什麼叫「仁義禮智信」嗎？斯大林知道「四庫全書」有幾冊嗎？如果沒有，憑什麼說他們的學說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發展呢？

再有，應該要求取消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制度，這制度完全是從蘇聯照搬來的，是具有共產極權特色的特務監軍制度。查我中華民族五千年軍事史，從來都沒有這等怪異的洋玩意兒。

討伐共產異物，有許多許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有許多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反共民主運動要自覺地站到愛國主義、大中華主義的立場上來，要有一種「襲中華正統、捨我其誰」的氣概，要把維護中華利益的調門提得最高最高，讓共產黨沒法招架，讓它不得不號召全黨起來「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當年，毛土匪爲了應付社會輿論指責中共背叛民族利益就曾不遺餘力地提倡過「國際主義」，反對過「狹隘的民族主義」，結果反而使中共黨效力俄國充當漢奸的嘴臉更加暴露了，並因此使它們在政治上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地步。

在此，我們不妨再看看海峽對面現今的國民黨政府，它們在同中共的周旋中之所以處處被動，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國際支持上了，它們打心眼裏不願意同中共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臺灣國府一直都在設法同大陸中共國劃清界限，它們企圖說服國際社會認同兩國分治的現實，卻認識不到這實際上是一種捨本求末的笨法子。國府方面從沒有想過，台海危機的真正原動力來自中南海內的護權要求。邏輯地說，消除台海危機的最佳途徑就是表現出你動搖中共政權根基的能力。然而遺憾的是，臺灣那邊許多人都認不清這一點。

中共政權以什麼爲本？只有一個字：「權」。在中共八十年的歷史上，你找不到哪一個歷史事件與權力鬥爭無關。毛澤東說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特別善解毛意的林彪元帥替毛闡述得更加明白：「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中共半個多世紀來的一切行動都以政權爲依歸，「江山易變，黨性難移」，什麼領土完整，什麼民族利益，全是籌碼，用得著時加上，用不著時丟開。權，就是全，就是一切。與共產黨打交道，決不能忘記了毛的「教導」，權才是它的命根子，抓住了這個要害，你就一通百通，一切疑難都會迎刃而解。

反共民主運動千萬不要客氣，要抓住機會充分利用中共的「嗜權如命」特性！你絕對不會失望的。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政治勢力，只要你有能力在權力得失問題上讓共產黨有所感覺、有所牽連、有所顧忌的話，中共就會以非常友好、非常誠懇的態度與你協商，甚至贊同你的一切做法，哪怕是在此之前共產黨曾經多麼堅決、多麼自信地宣稱你是壞蛋、是匪幫、是殘渣餘孽、是妖魔鬼怪，那也沒有關係，它遲早是會同你「同流合污」的。說白了，你就是讓中共公開支持臺灣獨立、支持中國的任何一部分獨立，只要能同它的「權」搭上關係，那全不是什麼難事。共產黨就是這麼一個毫無原則的權力怪物，你用不著鼓勵、用不著用繩子去拽，它自己會搶著去幹的，排除萬難也會去幹的。

要知道，歸根到底，我們在這裏談的不是南宋、不是吳三桂、不是滿清、不是張作霖，甚至也不是汪精衛，而是一個敢於領取盧布作爲暴動經費、敢於在中國國土上用打砸搶燒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敢於面向全中國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的漢奸政黨。共產黨匪連這樣一條任何人都難於接受的底線都敢跨越，它們還有什麼原則不能拋棄？還有什麼面子不能撕掉？如果當年願意爲毛澤東周恩來們撥出經費的不是莫斯科而是東京的話，也許現在中共國某個地方已經建起了「中華大日本共和國」了。朋友，當你想到這一切，然後再聽到中共大小黨官口口聲聲誓言保衛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尊嚴時，你肯定會覺得噁心、覺得滑稽、覺得他們嘴裏吐出來的每一個音符都透著濃濃的西洋馬列餿哈氣。

### 三、毅然高舉中華義旗、民主終將取得勝利

現如今，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一直都在抱怨中共「矮化」了它們嗎？這兒早有現成的、也是很有效的反制措施：中共在國際社會裏「矮化」中華民國，國府就不妨轉移一下戰場，到大陸民眾中去「外化」中共政權，還你一個異端外種的本色。中華民國有天然的權利指稱中共爲外賊叛逆，因爲中共不只一次地宣誓效忠國民政府，而後又幹起背叛的勾當；毛澤東本人也曾多次表示過對蔣介石的景仰和忠誠，甚至在中共已決定背叛國府時，毛仍於大庭廣眾之中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中共國完全是憑藉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建立起來的，對付共產黨的「統一」牌，國府本來就站在道義的一邊。臺灣方面完全可以說不是我不想統一，你中共才是分裂的始作俑

者，只要共產黨廢棄了西洋馬列邪教，恢復了中華民國法統，兩岸的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必須承認的是，「中華民國」具有天然的正統性，這是歷史已經賦予了的，決不以任何人、任何政黨的意志為轉移。在以中華民國名義外化中共政權方面，不單是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這個能力，而且所有的中共國人、海外華僑、民運人物，只要是願意舉起「中華民國」大旗的，都有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可能因來得非常容易，容易得使你驚喜，使你不敢相信。當然，這首先需要感謝國民黨人，是他們在失去了絕大部分國土之後仍然能夠百折不撓、兢兢業業地實踐三民主義，才終於創造出了經濟發展的奇跡，所以，連中共極權也不得不承認台灣的進步，不得不去尋找所謂「來自大陸的黃金」之類可笑的論據，來掩飾它在輿論宣傳上的尷尬處境。

在這裏，無可掩飾的基本事實是：中華民國原來定下的、以後走過的路子根本就是正確的。早在五十多年前，甚至還要早，中華民國就已經在努力建設市場經濟了，就已經在努力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了。是共產黨的倒行逆施，才把中華民族這個良性建設過程粗暴地阻斷了三十年。最後，共產黨山窮水盡了，中共國民不聊生了，共產黨政府的財政收支入不敷出了，共產政權本身的生存也因此陷入了危機，中共頭目這才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放棄自己作過的孽，偷偷效法起中華民國來了。然而，它們在宣傳上，至今還要打腫臉充胖子，厚顏無恥地把這種「前朝政策」命名為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

其次，我們也應該感謝共產黨近年來的「愛國主義」努力。這一努力，本來是用來鞏固其權力地位的，表面上看好像也確實起到了這方面的作用，但這種努力所產生的副作用，共產黨卻沒有想到，這就是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殺傷力。在中華大地，民族主義正在膨脹、正在發酵，任何政治勢力只要一旦被貼上了「外異」的標籤，那就是注定的輸家，而且會輸得極慘、極慘。如今的共產黨，站在逃到西方的民運分子前面，還人模狗樣地擁有正統地位，但要是站在中華民國面前，這外異性尾巴就藏不住了。中華民國用過外國國旗麼？中華民國「堅持」過外國的什麼「主義」麼？中華民國把洋人條款寫入自己的憲法了麼？中華民國請洋人印製本國貨幣了麼？等等等等，數賣國行徑，共產黨真是樣樣不缺，處處領先。

可以說，不管是誰，臺灣當局也好，民運分子也好，一旦舉起中華民國的大旗，就等於坐上了正統的寶座，就可以

痛斥共產黨的叛逆賣國行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中國大陸廢除西洋邪教制度。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上對共產黨說話，再用不著去苦心孤旨地去說明「民主是當今世界之必須」，去劃清「狹隘」民族主義與「正當」民族主義的區別，去界定學習各國先進經驗與崇洋媚外的不同....所有這些全都是費神耗時、艱澀難懂、使不上勁、派不上用場的「新八股」。對於億萬中國民眾來說，反共民主運動只須用最簡潔、最通俗的語言作號召：如今中國大陸上的一切黑亂醜全都來自於西洋邪教，馬列主義乃萬惡之源、乃眾邪之首，只有廢了它、除了它，中國才有希望。

應該指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本無須承擔「光復大陸」的義務，大陸的反共人士也無須把自己隸屬於臺灣當局的某個部門。說實在的，大陸人民並不指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回來執政，大陸的問題終究要由大陸人民自己解決。「中華民國在臺灣」，本該提供很多支援，雖然這種支援也完全符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和臺灣人民的利益，但卻不能代替大陸人民完成中國大陸的改造。說到底，中華民國的理念與制度屬於全體中國人民，這是一筆十分寶貴的政治資源。

當前，反共民主運動不可能找到比這更具有正統力量的政治資源。回想十年前，沒有幾個中共國人能提出「走中華民國道路」這樣的主張。那時候，由於中共當局的長達幾十年的封鎖消息和愚民宣傳，「中華民國」在大陸民眾心目中幾乎沒有任何正面形象，以至只要一談到民主運動，一般人就會把它同共產宣傳的「臺灣國民黨特務」掛鉤。然而今天，隨著中共極權的日益腐敗沒落，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共產暴政的不可改造性，也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移向了海峽對岸，特別是投向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對中華民國的興趣正在受共產愚昧的華人圈中與日俱增。

近年來，海內外湧現出了一批像辛灝年教授這樣的學者，他們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發掘並整理了一大批有價值的共產賣國資料，它強烈地撼動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進一步提高了中華民國從來就具有的道義價值。海內外所有從事反共民主運動的個人和團體，千萬不要低估這一發展趨勢，千萬不要迷失中國將來發展的基本方向，毅然舉起「驅除西洋馬列，恢復中華民國」的旗幟，必將獲得大量的政治民心 and 政治資源，並由此奠定民主在中華大地全面開花的勝利基礎。

之四：

## 我們還有一條更好的路...

### 《誰是新中國》影響了台灣留學生

楊三民

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僑學界邀請辛灝年先生赴芝城參加紀念“六四”死難烈士的活動，並邀請他講演。沒想到，講演會還沒有開場，辛先生剛要走進會場，一位非常英俊的年輕人卻迎面攔住了他，問道：“您就是辛灝年老師嗎？”

辛先生連忙答應說：“我就是。”

這位年輕人立即說：“那我能夠請你簽個名嗎？”說著，他已經從自己的書包裏拿出了一本書，原來是一本《誰是新中國》。

辛先生有些奇怪這個操著一口台灣國語的年輕人，怎麼會找到這裏來請他簽名，正要問他是從哪裏得到這本書的，因為台灣不賣這本書，這個年輕人居然已經將書的封面打開，將筆送到了他的跟前，甚至已在含著淚水對他說：“辛老師，是你，改變了我一生的道路……”

辛先生十分詫異地抬起臉來看著他，正在書的扉頁上簽字的筆，不覺也停住了。

這時，年輕人仍在含著淚水繼續說道：“我是台灣的留學生，剛來美國讀大學不久，無意中，在書店裏發現了您的書，我就站在書店裏看了三個小時，然後我就買下了它……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就在我和我的台灣同學們已經決心走‘台灣獨立’這一條路的時候，你的書改變了我整个人生道路，使我們發現台灣人還有一條更好的路可以走，就是和你、和大陸的同胞，一起走‘大中華民國的道路’。並且，我還認為，這才是台灣人民最應該走的一條正路，一條大道……所以，這就是我在報紙上發現你今天要來芝加哥講演的消息時，我就決心要趕來見你的原因……”

辛先生十分感動地聽著他的話，在走進會場的時候，眼前不覺浮現起幾年前自己在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講演“誰是新中國”時，那一群來找他“辯論”的台灣留學生們，後來也與他“異途同歸”的歡樂情景，眼前這個留學生對他說的話，實在與他們跟自己分手時說過的話太像了！

還沒有開講呢，他的心已經覺得有點燙燙的了。

沒有想到，當他講完了“現代中國學生運動之比較”，場上的掌聲經久未息之時，這位台灣留學生又走到了台上，

不僅又拿出了他的那本《誰是新中國》，而且還突然抖開了一面偌大的中華民國國旗，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輝映著這個年輕人的滿眶晶瑩淚水，令人心動心跳。此時，伴隨著他那“我們還有這一條更好的大路可走”的洪亮宣示的，已然是那一陣潮水般的掌聲……

辛先生的眼睛也濕潤了。從他“自我流放”到美國，雖然在中國大陸留學生請他講演的講堂上，曾因他講演“誰是新中國”，而不止一次地引發過如此激情的掌聲，但是，由一個台灣留學生對《誰是新中國》一書所產生的認同和激情，和由這份在當今臺灣已經罕有的激情所催動起來的，對於中華民國的重新推崇，在他，還真是第一次……

台灣留學生楊傑倫與大陸學者辛灝年成了“忘年交”。

二零零四年的元旦，這兩個“忘年交”又在紐約相會了。年輕的留學生帶著他的同學和弟弟來看他的辛老師，而他的辛老師，如同在大陸留學生身上所看到的希望一樣，也在台灣新一代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華民國的希望，和全中國必將在孫中山的旗幟下，改變“馬克思像下的中國”，拋棄分裂主義的台獨道路，還我中華，走向中國民主統一的光明前途！

（魔鬼辭典，上接第 103 頁）

【義務教育】並非按基本教育法所規定的由國家提供的免除學費的九年教育制度，而是家長有義務要送孩子去接受教育。

【集體無意識】此處「意識」一詞並非生理學中所指的意識。它有兩層意思，其一，在我黨長期宣傳教育下人們已經喪失了政治意識，對任何政治問題無所反應，表現為集體失聲；其二，是指對外界所有事物喪失反應能力，比如，在大庭廣眾之下看到壞人搶劫、偷盜等作惡行徑熟視無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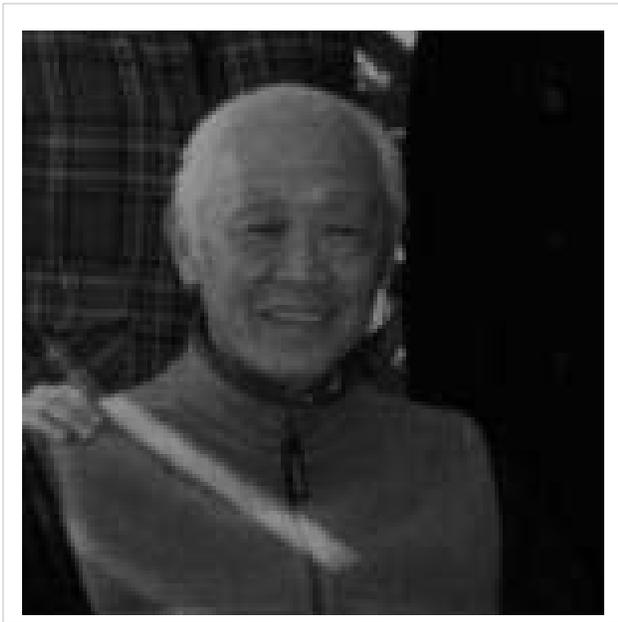
【主旋律】非音樂術語，乃我黨宣傳工作的指導方針之一，即所有報紙、廣播、電視以及網上等媒體的內容均應遵照我黨中央的要求、按照統一部署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其他一律免談。

【輿論導向】即原來毛澤東主席「輿論一律」指示的最新提法，因「輿論一律」的提法有極度箝制輿論的法西斯意味，對外而言形象不佳。雖然改成輿論導向，但仍應按輿論一律的要求對媒體進行嚴格控制，以免偏離主旋律。

# 珍重珍重……

## ——新亞校歌與中國文化

孫國棟



本文原為新亞研究所五十週年紀念專刊而作。近百年來，中國社會風氣，以蔑棄中國文化、追逐西風、或奉行馬列思想為時尚。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民族能屹立幾千年，其文化精神必有不可磨滅的文化價值，如欲吸取西方文化，英將西方文化的精神種植於中國文化的真精神相融合而生長，然後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的新養料，如果祇求表面的「邯鄲學步」，則模仿所得的必無生機。至於奉行馬列思想，則與中國文化思想完全相背，對中國的傷害必更深更重。錢先生蒿目時難，以發揚中國文化的真精神為己任，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創辦新亞書院與新亞研究所，欲以會通中西文化。他手撰的新亞校歌，句句緊扣中國文化，熱切地盼望新亞全人及廣大的中國青年能自重自愛、建立正確的人生理想，為中國民族的前途奮鬥。這番精神與《黃花崗》雜誌所揭櫫的精神相應。所以我把此文一併寄《黃花崗》雜誌。

新亞書院校歌雖祇有一百五十一字，但充滿真情、充滿學問與智慧，同時充滿故國之思。要瞭解體會此校歌的精神，必須瞭解作者錢賓四師（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時的心境和他的教育理想。

最能表現賓四師當時心境的，是他於創辦新亞書院前後自撰的兩部著作的序文。一是民國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寫的宋明理學概述序文中說：

「顧餘自念，數十年孤陋窮識，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雖居相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成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成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敢忘先儒之桀獲，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所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在江南大學，赤氛方熾——感觸時變，益多會心。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再度流亡——今年續成此書，此皆十年來大病大亂中所得——」。

賓四師志節之貞烈，不為任何環境所動搖，垂老之年，天良未泯，童心猶存，在這種心情之下，創辦新亞書院，所以要瞭解新亞校歌，必先體會賓四師這種心境。

再讀賓四師於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所撰莊子纂箋自序述其內心的感觸，猶為深切。他說：「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相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遊乎，則何逃於隨群而處禪？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遊刃而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剪儻忽無情，混沌必，德符雖充，梓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雖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魚於濛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從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以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揚米非則已，若尚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至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內心之苦，是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

可見賓四師之創辦新亞書院，用心之苦，是欲為往聖繼絕學。此種精神，一一浮現於校歌之中，所以特別指出「人」之尊嚴，以為斯文之繼。如果我們能認知賓四師九十六年莊嚴的生命，對校歌的瞭解一定會更深切。

賓四師從十八歲開始，即致力於學術。以後八十年，從事研究、講學、著述、教育，未嘗一日中斷。八十年中，學術著作專書八十二種。文章五百餘篇。舉凡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學史，以致歷史地理，無一不遍及。所關涉的問題，都是國史上的重大問題。他學問的廣博精深，架構之大，真可謂自南宋朱熹以後八百年中第一人。

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中國奮起抗戰，初期中國東南沿海淪陷於日寇，國人憂疑大南之將作。賓四師四十四歲著國史大綱，從國史上的大關節處證驗中國之必不亡，以振奮人心。當時又有不少知識分子競逐西風，鄙夷國史，賓四師乃嚴正指出：「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相棄其國史，而其國族猶可以長立於天地間者」。真可謂對當時之知識分子作獅子之吼。

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賓四師九十一歲，任臺北文化大學博士班導師，六月九日作告別專壇的最後一課。他最後的贈言是：「你們是中國人」。

民國七十九年（西元一九九零年）賓四師九十六歲近去世指前夕對「天人合一」觀念更有新的體悟，於是撰最後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歸宿處，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可惜文章未完成，他便溘然長逝。未把他體悟到「天人合一」的新觀念完全道出，這是非常可惜的。幸而他指出途轍，將來學者循此途轍，更往前探求，必可得其全貌而供獻於世界文化。

賓四師學術多方，而核心則在宋學。他自述說：「自問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賜」。

他的教育理想，亦以宋代的書院制為楷模。

宋代承唐末五代之後，五代是國史上的大黑暗時代——政治敗壞、社會殘破、學術凋零、思想虛無、道德墮落。人幾乎無以自立為人。北宋承此大崩壞之餘，學者面對大難，認為要救國族的危難，必須從教育工作挽救人心，使人能恢復人格，然後社會可以重建。所以宋代學者多是教育家，於是書院大興，莫不以重建人生認為急務。宋代的國勢雖不及漢唐之盛，

但學術與思想則遠超於漢唐。中國文化的統緒乃得以延續。今日中國的情況，有些方面頗似五代。賓四師創辦新亞書院，不但要建立學術，同時要建設人生。把宋代書院的精神，寓於現代的大學制度之中。這番理想，表現於他所手訂的新亞書院的學規中。

學規第一條：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第二條：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的最高旨趣在做人。

第十六條：一個活的、完整的人，應該具有多方面的知識。但多方面的知識，不能成為一個活的完整的人，你須在尋求知識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為知識而求知識。

第二十二條：起居作息的磨練是事業，喜怒哀樂的反省是學業。

第二十三條：以磨練來堅定你的意志，一反省來修養你的性情，你的意志與性情將會決定你將來學業與事業之一切。

第二十四條：——敬愛你的人格，憑你的學業與人格來貢獻於你敬愛的國家與民族，來貢獻於你敬愛的人類與文化。

不瞭解賓四師這番心情，就很難深切地體會校歌的精義。

## 二

校歌第一節：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心呀精神」。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是何等莊嚴的景象！它喚起人莊嚴的情懷。人生有輕快的一面，也必須有莊嚴的一面，輕快由於感情的流動、灑脫；莊嚴由於感情的凝定、執著。人生如果全無輕快之情，則人生太淒苦，不足一萬滿地實踐生命。但是，如果祇有輕快而無凝定的感情，則人不能挺拔地站起來。因為要聽吧地站起來，必先有一定點，才可以立定腳跟，然後可以挺立。所以要挺立，必須有凝定執著的感情。凝定而執著的感情，必須有責任感，責任感是道德與理想的起點，正是人能挺立的起點。所以莊嚴的感情必不可無。

天地生化萬物。萬物在天地的懷抱中生生不息，此中實蘊藏無限的仁心。所以天地不是祇晨昏晝夜、

四時健行。毫無情意的大自然，它同時是重山蒼蒼、江水泱泱的有情世界。它賦予人感情與睿智，於是人在此蒼茫的大地發展出燦爛的「人之文化」。

在人之文化中，不但人均應被尊重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同時每人應自重為一有靈魂的人，不把自己作為工具，也不視別人為工具；不把自己作為追求物欲的工具；不視別人為實現自己物欲的工具。人人就自己才性之所長，開啓自己真實的理想，懷一顆敏感的心靈，去接觸自己的真生命，過一種真實的「人」的生活。

敏感的心靈常被人世的苦難所觸動，於是發願為救助世人的苦難而奉獻心力，此之謂理想。理想是公的，因為希望世間無有苦難是衆人心之所同。所以理想有普世的意義與價值。它與欲望不同，因為欲望祇是個人的私企求（如權力欲、財富欲、地為欲——等），與理想不同。而世人常誤認「欲望」為「理想」，新亞人必應知兩者不同而有所抉擇。

理想把人的心胸推廣，廣闊至極的胸襟如張載西銘所說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下之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實現理想不但要有廣大的胸襟，還要有長遠恒久的毅力。因為有價值的事，不會一朝一夕，一蹴而成，所以要實現一個真正的理想，不但要突破一己的私欲，還要突破耐心的限度，長時間對理想保持不厭不倦之情，把生命中最佳的力量奉獻出來。

當此舉世如狂地追求物欲的今日，我們應有豪傑的氣概，獨往獨來，不與流俗合污為中國文化理想的荷負者。

新亞校歌是新亞精神的讚歌，它要喚醒新亞全人人格的自覺，點醒中國青年真實的生命，以廣大的胸襟，遠大的目光，把生命中最寶貴的力量獻給中國文化的長流。

### 三

校歌第二節：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五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是對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最深情的讚歎。如果我們切實回顧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我們不必覺得這是真誠的讚歎。

中國有壯麗的河山，有可歌可泣的歷史，有使人仰慕的聖哲，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豪傑行誼，有數不盡優雅動人的文學藝術，有極豐富璀璨的文物，尤其重要的是有一貫串於歷史、人物、山河、藝術、文物中之道德精神的文化統緒。她陶冶出中國人特有的生活風格與情調，成為世上一個非常有個性的群體。她的寬宏大度能搏合許多族群而成一大民族。所以中國是由歷史、文物、山河、藝術、文學、文物所搏合而成的一有機體，她與現在國際上一些缺乏歷史文化的軍人政權不同。現代不成熟的政治學以為凡具備人民、土地、主權三者就可結構國家。他們祇認識國家的體質條件，未認識到國家的精神條件。於是有些軍事強人，掠奪了土地，掠奪了人民，自建政權，即僭稱為國家。其實他們祇是一些政權而已，與中國大不相同。當然，中國在體質條件上亦具備人民、土地、與主權。不過中國的人民，是指有數千年文化素養、具有中國文化氣質的人群，不是如政治學上所指的自然人；中國的土地，是曆幾千年沿革，幾千年整理，附著幾千年文物的人文地理不同於現代政治學上所指的自土地；中國歷史上的主權觀念亦與現代政治學上的主權觀不同，現代主權之說是由於近代國際間政權林立，為了保護本土的利益而設計出來的。中國歷史上是東亞的最大宗主國，四周圍的國家大都是中國的藩屬，各國行事其自主的權力並不互相衝突，所以各國有實際的行政權力，無須狃狃於主權的爭辯，所以現代政治學上憑人民、土地、主權三要素而結構成的國家，是淺化的、量化的國家。而中國則是有深度的、質化的國家。當然中國文化不是全無瑕疵的，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她的弱點。因為文化是由多種因子配合結構而成，當各因子配合得宜，適合環境需求時，文化就表現得光彩奪目。但社會環境不斷在改變，當文化的各因子配合失宜，位能隨時改變不能與社會環境相適應，便表現暗淡無光。中國近百餘年來文化的因子失調，加一長期受非理性的政權所傷害，未能適合近代環境，至內政外交遭遇種種挫折，於是不少人因中國近百年的挫折而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殊不知文化是具有生命的特質，它不斷在成長，不斷在新陳代謝——剝落腐朽的部分，又吸收養分新生一部分。祇要文化生命的生機未斷，雖受斷傷，仍可再生。而且民族文化常寓有該民族賴以生存的力量，因為民族文化是該民族在長期奮鬥磨練中長成，它的性格必帶有一種克服困難的能力。尤其一個歷史長遠而成熟的文化，它的生命力必是極堅韌的。所以中國經歷數千

年，曾遭遇不少挫折而終能渡過艱難而挺立於世，此證明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很強健。我們更應進一步認知：文化生活的強弱，在於其成員當時所作貢獻的品質與多少而定。貢獻不可以空言必來自其生命最真實、最精彩之處。新亞的教育理想，就是點醒人的真實生命，喚醒人真實生命的良知。校歌就是要興發一顆顆真實的心靈。

但是，有些人對新亞校歌可能仍存有幾點懷疑：

- 一．中國歷史上有不少極邪惡的人物，怎能說「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呢？
- 二．新亞精神似乎保守性較強，而進步性較弱？
- 三．新亞特別指出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此是否與當前排斥西方文化的「東方智慧論」相類似？

不消除這幾點疑慮，對新亞校歌終難有深入的體悟。

就第一點而言，如果從個人觀察，則每人都有弱點與缺點。但是，如果從社會的總體看，則大多數人都盼望社會進步與光明。著大多數人善良的盼望，就是社會能進步的最大力量。因此，人類社會雖有種種罪惡，而人類社會依然在進步，這是人性最大的光輝，同時表示人性本質的善良。所以中國人深信孟子的「性善說」。我們從此處體認，然後可以瞭解「今來古往一片光明」一語的意義。

就第二點來說，新亞精神似乎保守性較強，而進步性較弱。不錯，我們必先認知保守不是一貶詞，祇是表示一種態度。新亞書院的態度不是抱殘守闕，而是要保持原來有價值的精神，為原來有價值的東西拂去它表面的塵埃，使它再煥發光輝。我們必須認識，一切有價值的精神都來自人的真性情，是真性情的流露。所以道德精神是在每個人的身上，在每個人的心中。因此，就道德精神的本質言並無新舊之別，所不同的是表現的方式而已。新亞書院所欲保持的使人的真精神，也是道德的真精神，不是它所表現的方式。試看現在世人所歌頌的道德如人道、人格、正義、誠信……等，何一而非由二千多年來「性善論」所主張「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而來。即使今日所歌頌的政治道德如人格尊嚴、民主、自由等觀念，也無一不與「性善說」想通。試想倘使人性為不善。何有人格尊嚴可言？倘使人性為不善，如何可以付予民主之權？倘使人性為不善，又將何以寄託此自由之身？道德不會毫無根源而今日突發的，它必有淵源，必本於人性，有人性發育而來。所以今日所患者不是「保守」而是正患不能保

守原來有價值的真精神。能保守原來有價值的真精神，然後可以求進步。進步不同於改變，進步是要有價值的理想作為目標。向有價值的理想接近，才是進步，不向有價值的理想接近祇是「改變」，不是「進步」。現在世人熱心於求「改變」而不求「進步」，正是當前的流行病。新亞書院所追求的是有價值的進步，不是無價值無理想的改變。

至於第三點說新亞書院強調中國文化似乎和當前一些強調「東方智慧」以排斥西方思想者相類似。著點懷疑是對新亞精神最大的誤解。當然，中國文化是東方寶貴的智慧。惟其是智慧，所以必非排外的。凡有智慧的文化必不斷地吸收新養分以強化其自身。中國的政治觀念發展得較慢，亟需吸取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加速中國政治觀念的發展。何況民主自由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的精粹，與原來中國文化的真精神正相融合。祇有「反智慧」的文化然後才會排外，中國文化必不排外。

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智慧有二：一是肯定人的價值，所謂「立人極」；二是認取「性善」之說。惟其性善，所以人有最大的價值與意義。所以性善說與「立人極」是相一致的。此不但為中國人所自認，而且認為凡人類都如此，所以宋儒指出四海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豈有半點排外的意思。現在排外的人喜歡用「民族大義」作為排外的理據，殊不知講求民族大義最重要的在健全民族的文化，追求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是講求民族大義的最重要課題。無論用任何藉口，排斥外來文化，都是一種反智慧的行為。新亞創校的精神是繼承中國文化的性善說，所以特別標舉陸九淵所說東南西北四海聖人心同理通的話。願新亞人能體認人性的光明，體認文化的光明、歷史的光明，即自己內心的光明，更擴而充之。

#### 四

校歌第三節：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一無所有，一無平藉，我們赤手空拳，祇有滿懷理想，滿腔熱血。我們把全副生命，為追求理想，投向無盡的未來。因為中國需要新生，人類需要新生。道路雖然險阻，我們不害怕，我們會自我警策，環境

雖然困乏，我們不氣餒，我們對理想愈見深情。責任維重，道路雖長，我們願意承擔，願意承擔。我們用堅韌的毅力，用強壯的兩肩來承擔，我們以歡樂的情懷，無怨無尤地去承擔。讓我們都懷著青春的活力，結隊向前，因為我們都是中國文化理想的荷負者。

# 中華王道文化

## 是怎樣形成的？

孫雲

### 一、什麼是王道？為什麼要探討王道文化？

王道，是中華民族在其漫長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一種不同於宗教的，以人為本、以天下為目標的獨特文化認同。她倡導的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她追求的是：能而不強，不霸而王。

人類自產生文明以來，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和傳統習慣的不同，形成了許許多多的文化，如科目不同的自然科學文化，軍事文化，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學藝術和眾多學派流派的哲學宗教文化等。但是以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本質屬性來區分的話，人類的文化祇有兩種：一種是服從於叢林法則的霸道文化；一種是崇尚和平和諧的王道文化。霸道文化的教化會使人趨近動物，而王道文化的熏陶則使人接近完美。

從當今世界存在國家間的矛盾和各文明間的衝突來看，王道文化不但具有探討的必要，還需要進一步的傳播和推廣，讓更多的人瞭解王道文化形成的不易和她追求和平和諧的寶貴。這不但是因為今天人類已進入了核子時代，更重要的是“人之所以為人”，她本該名實相符（冷兵器時代的爭霸稱王戰爭雖然會使人口大量減少，但還不至於毀滅人類本身；而核子戰爭則會毀滅人類，據說人類所擁有的核武器已可以毀滅地球幾十次）。

### 二、解決現實世界的紛爭需要探討王道文化

美國學者薩彌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寫的《文明的衝突》一書(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傳播，它也確實反映了現今世界的部份現實，也就是說提出了問題，但是它不但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而且還有混淆文明和野蠻以及為叢林法則正名的錯誤。中國特定的歷史所形成的王道文化卻正好彌補了人類文化的這一缺陷。她是中華民族對人類著名的四大發明之外的，一個被忽視了、但意義卻更偉大、影響更深遠的文明貢獻。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王道文化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偉大的第五大貢獻。

有兩點需要指出：

1) 薩彌爾亨廷頓所劃分的文明區域都是以宗教來區分的：像反省懺悔的基督教和行善積德的佛教等；唯獨我們中國的儒家不屬於宗教體系。可他並不區分這種性質不同的文化有著本質的不同，而是一視同仁。這看上去似乎很公平，其實他無意之中提昇了宗教文化的層次，卻把中國發達的，早在二千年前已經擺脫了宗教束縛的先進的人文文化給降了格。

2) 亨廷頓在書中認為伊斯蘭文明對基督教文明的衝擊祇是小打小鬧，真正的挑戰來自中華文明。他感覺到了中華文明的力量，但又不作認真的研究以分析她的性質，祇是把她看作與宗教相似或更具潛力的文明。這就不但給「中國威脅論」者提供了理論依據，還把本是和平先進的中華王道文明當成了落後低級的霸道文化。同時也混淆了中華王道文明和中共專制政府的區別，為民主列強推行「親共反華」政策開了方便之門。

### 三、研究宗教的衝突和宗教的發展需要探討王道文化

宗教的衝突和迫害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一直是個世界範圍的大問題，因為宗教文化是以上帝的意志為意志，所以對其他的宗教教徒，她常伴隨有以上帝的名

義而發動的宗教戰爭或宗教迫害。像歐洲中世紀的宗教黑暗統治及十字軍東征等。

因為，作為不同於宗教的以人為本的王道文化是通過修身養性來提升自己的素質的。這裡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過去人們一提到儒家所倡導的「仁」，就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仁者愛人」，其實這是輿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造成的誤導，抑或是中共批儒的水準不夠造成的。孔子曾就何為「仁」何為「智」分別問他的三個學生，子路答「智者使人知，仁者使人愛」，孔子給他打的分數是「下士」；子貢的回答是「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孔子打分是「中士」；顏回答稱「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孔子給了「上士」的最高評分。確實，一個不自知自愛的人是不可能愛人和使人愛的。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中華王道文化的自知自愛不同於任何其他的宗教文化。有一個猶太人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人的仁慈同化了猶太人》(Chinese Kind Killed Jews)。此作者到中國河南開封宋朝時猶太人的聚集地進行了實地考查，他看到了他們猶太人特有的小氈帽和猶太教寺廟的遺跡，也向一些老人詢問了他們祖先的生活習慣，但他發現這些猶太人的後裔除了鼻樑骨略高一些之外，其他外表長相和生活習慣都已完全漢化而無從區分了，可重要的是那裡沒有發生排猶和對猶太人的集體屠殺。同樣的信奉猶太教，同樣善於經商聰明智慧的猶太人，他們在世界各地的遭遇和在中國的和平的被同化，說明了自知自愛的中華王道文化熏陶所造就的人民：心胸寬廣，充滿人性，並且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深入人心。這才是宗教衝突和宗教迫害在中國的歷史上極為少見，宗教戰爭在中國的歷史上幾乎沒有，而當今的中共馬列邪教對其他宗教、特別是對本土宗教的迫害，更是史無前例的根本原因。

隨著現代社會形態在世界範圍內的建立，特別是民主制度的確立，她既為宗教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制約了宗教的排他性，而作為不同於宗教的、以人為本的中華王道文化，對各宗教間的新關係和新發展也將提供借鑑。

#### 四、對「中國威脅論」的批判需要探討王道文化

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現代西方民主國家基本上是起了負面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害怕中國民主化之後強大起來進而會威脅到他們。他們總是戴著他們習慣的「霸道」眼鏡，來看我們中國人民的

覺醒和中國的崛起。北約可以為波斯尼亞和科索夫而投入戰鬥；美國也可以二戰解放伊拉克；而對我們中國：過去，他們不僅不支持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還要支持腐朽的滿清政府和扶持各地方的軍閥以阻擾國民革命在中國的成功，美國率先支持蔣介石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算是例外之例，值得我們感謝和贊許。而如今，某些西方政客卻推行「親共反華」的政客謀略，甚至指使他們收編的「世界公民」，拋出「要民主的到西方來，要專制的到中國去」這樣一種挖牆計謀，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利是弊，顯而易見。

任何國家都可以宣佈不會侵略別國，但實際是否如此，這就要從這個國家過去的歷史表現和現在制定的方針政策上來作判斷。探討王道文化的形成過程，認識王道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具體表現，我們就可以解答一些疑問。比如熱愛和平的王道文化的中國在古代也侵略過邊境國家這樣一個事實：但它是國君好大喜功、或窮兵黷武的個人意志的表現，卻不是人民陶醉於侵略意志的“霸道”反映。隋陽帝攻打高麗(不過他沒打贏)，人民沒有稱贊他是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攻打過高麗，雖沒有成功，人民卻推崇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的君王；對「霸道」成功的傑出代表秦始皇，中國人向來就以暴君之稱來否定他。如果說中國人熱衷於霸道的話，那就應該非常崇拜秦始皇才對。所以，從文化層面來看：無論是自然順隨的太極武功，還是兼顧前後的牌九娛樂，更有包藏宇宙哲理的圍棋藝術和深入華人骨髓的對“天人合一”的認同，在在顯示了中華文化是“上順天理、下合人群”的俗而不俗的人的文化。從社會習慣層面來看：什麼「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君子動口不動手」「和為貴」等等，都是經過了春秋戰國爭鬥狼之後對“禮，忍，讓”的回歸。另外就拿從軍來說吧，中國有句話叫做「好男不從軍，好鐵不打釘」，撇開它本身對錯不管，中國男子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普遍都羞於從軍當兵的不爭事實，怎麼也不能講中國人是好鬥尚勇喜歡侵略別國的民族。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那首著名的膾炙人口的民歌「男子漢大丈夫 應該當兵，再不要一天天談愛情」所表現出的鼓動性，便與深講“信義和平”的中國人大不相同了。

正是既經歷了春秋戰國血雨腥風的洗禮，飽嘗被霸主征服的屈辱和痛苦，又在不長的時間之內推翻了暴秦的關東六國人民，建立了統一的漢朝天下，並經四百年的大融合而初步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

這才使得上古形成的王道文化在漢代通過儒學的豐富和完善而流傳下來。如果秦朝的統治不是十五年而是四百年，那麼今天我們“民族欄”裏所填的，可能就是秦而不是漢了。族名的不同還是其次，可憐的是我們可能還不知自己是已亡之族，可能還以征服者秦人自居，可能還想去征服別人。環顧世界正是如此，多少民族被征服了，多少民族被強迫同化了，他們還不自知，還想用霸道去征服別人。四大文明古國，到如今，唯獨我們中華民族一脈相傳綿延不斷，原因是：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其結果也正如老子《道德經》所寫的「就其下，而成其大。」

### 五、對比現代「民主」與春秋「變法」 需要探討王道文化

春秋時期凡是成功「變法」的國家無一弱國，但同時他們又威震鄰國，伺機爭王稱霸。同樣，日本明治維新君主立憲以後國力強大了就向外擴張；民主選舉出來的希特勒德國在解決了內部問題之後就立即推行侵略戰爭。

變法的原因：外因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弱肉強食的大環境下，大國強鄰的虎視眈眈。內因是國內平民向貴族政治發起了挑戰，要求權力的重新分配。

變法的內容：鼓勵農耕，獎勵軍功，限制商賈，開墾荒地。

變法的目的：富國強民，爭雄稱霸。

民主的原因：蒙古的西征給歐洲帶來了憂患意識（類似近代英國打開中國的國門）。

宗教的改革使歐洲擺脫了政教合一的束縛。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平民由於經濟地位的提高而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權力。

民主的內容：議會制度，自由貿易。民主的目的：人民的自主與國家的富強。

「變法」和「民主」都能使本國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國家富強，但這是對內的；對外部世界來說她並不具有什麼安全上的保障。這也是當今民主國家在高舉民主大旗的同時不願看到中國這個大國真正民主的又一個原因。然而“以人為本，以天下為目標”的王道文化在經歷了春秋的大洗禮之後，卻早已越過了國家，種族和宗教的格局，所以就有了二千年前封建中國的“有教無類”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主美國還存在“種族隔離”的對比；就有了猶太人幾乎在全世界遭到歧視，而在中國卻被和平同化的對比；就有了

世界各地宗教衝突不斷，而在中國宗教和平共存的對比（當今中共治下的大陸除外）；就有了世界其他古文明都已中斷不復存在，而唯獨我們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至今的對比；而從反面來看，古代的尊王攘夷和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同樣可以找到當代的翻版——所謂「人權高於主權」。

「變法」和「民主」既相似又不同，他們的最相似之處都是順應不同時代潮流的競爭機制，所推行的範圍都是在一國之內；他們的最不同點是「變法」的國家君王是世襲的，而「民主」國家的總統或首相是民選的。從這兒可以透過貴族政治，平民政治，民主政治的演變，看到人民自由度的延伸和權力的擴張。「變法」的國家與鄰國的戰爭責任是由君王自己承擔的；而「民主」國家與外國的戰爭責任是由國家承擔，總統或首相負責，並通過民意來調節的：這個調節的衡量標準就是國家利益。所以，在「民主」的國家祇有因損害了國家利益而下臺的總統或首相：如英國首相張伯倫及二戰時日本內閣的更替等。沒有因事件本身的非正義而去職的：如殖民擴張，販賣黑奴等。他們共同的盲點是：一國的利益與天下的利益相衝突。而王道則是以治理天下為目標，以天下的利益為依歸。

有一個情況是需要說明的：二戰時的日本和德國是否屬於民主國家，為什麼我把他們歸於民主國家。這要從民主國家的定義來判斷。祇要一個國家（包括君主立憲）的總統或首相是真正人民選舉產生的，所謂一人一票，是民意的真實反映，那她就是民主國家。而二戰的戰勝國把日，德稱為軍國主義國家以區別民主國家，是為掩蓋民主制國家在對外關係上並不一定是和平的這樣一個表現。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優越，使得民主國家在國際爭霸中有本錢競爭，有能力取勝（包括軍事上的）。德，意，日是在國際爭霸中戰敗的民主國家，而英，美，法祇是在國際爭霸中獲勝的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從民主列強對中國民主化的假支持、真阻擾來看，也能從反面說明這個問題，即：假如民主國家一定不會侵略別國，那就應該趕快讓中國改變成民主國家，這樣，中國的威脅就不存在了。

通過比較我們知道：如果英，法在他們的擴張中失敗或者美國在西部的開拓戰爭中失利，那他們將得到德，意，日同樣的指控，祇是不具有二戰的世界意義罷了。德，意，日軸心國挑起的二戰就是為了爭奪國際資源，重新分配國際市場的份額。所以希特勒稱

他的對外侵略是爲了「德國的生存空間」；日本至今還認爲是爲了「解放亞洲」。這正是「春秋無義戰」在當代的生動再現。祇要民主國家的人民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民主制度對內對外的二重性；祇要有一定的客觀衝突的外在條件(像這次美國解放伊拉克所引起的利益衝突)；祇要後起的民主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達到足夠的強大；那麼善良的世人想要避免戰爭也就常常是“一廂情願”。

我們不要認爲法，德，俄的反對美，英對伊拉克動武是出於正義，更不要天真的相信美，英是爲了解救伊拉克人民於水火。恰恰是這個犯了眾怒的胡森，給美，英的全球戰略找到了動武的口實。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主動挑戰美國的強權地位，但美國在世界多個核大國存在的情況下也不敢隨便主動出擊。這就形成了“誰掌握了世界的資源，誰就掌握了主動權”這樣一個新格局。由是，對擁有豐富資源的弱小國家的爭奪，便成了當前國際爭霸的新形式。

## 六、建設明天的新中國需要探討王道文化

當代中國的民主轉型又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民主呢？是中共在「不能全盤照搬西方民主」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煙幕下所繼續維持的一黨專制嗎？當然不是。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簡單複製嗎？也不是。在我們比較了「變法」和「民主」之後，便能夠知道，如果我們解決不了一國利益與國際利益的矛盾，就會重演春秋戰國的歷史。

當代中國的民主轉型是在經歷了近代民主列強的侵略，共產專制的復辟，現時又遭受歐美民主政府「親共反華」政策阻撓下的轉型；是在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王道文化底蘊的中華大地上的轉型。這就決定了我們當代中國的民主轉型不同於任何其他的民主國家：他們祇是在補上中國二千年前春秋戰國的爭霸這一“課”，還未嚐到它的惡果，並且正在回味它的甜頭；而在愛好和平的中華王道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則必將把人類的文明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推崇民主，因爲她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符合人性(在一國之內)和更加完善的競爭機制；我們不迷信民主，因爲她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存有盲點。

當代中國的民主轉型是集二功於一役的民主轉型，她有兩大任務：一、推翻中共一黨專制制度在中國的統治。二、建立崇尚王道文化因而能夠給世界帶來和平的民主中國。同時我們中華民族還肩負著向世

界推薦，傳播王道文化的重任。其間，還有這樣幾個誤區我們必須理清：

一、《中國可以說不》：在中共專制統治的大陸出了《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這當然不是民主制度學術自由的產物，祇是一個可以爲中共假民族主義利用的對象。如果此書的作者是爲了表達一種對國際強權的抗爭勇氣，那他們必須先要知己知彼，要知道那些強權是怎麼強的？爲什麼中國強不起來？當代真正的國際強權都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國家，她是由民主這個好的制度作保障的，所以她們不但軍事強大，經濟，文化都是全面高度發達的。而中國之所以強不起來，是由落後的中共一黨專制造成的。如果作者們想依靠落後的中共一黨專制去抗衡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國際強權，那就像要騎著自行車追趕汽車。所以與其對國際強權說不，不如先對共產專制所不，這才是正道。

二、《超限戰》：在中共專制統治的大陸還出了一本《超限戰》，歐美別有用心的軍事專家還評論是一本真正有戰略思想的書，有些糊塗的國人還沾沾自喜。大家都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人肉炸彈了吧，這就是沒有先進民主制度作保障的國家所發動的《超限戰》。中共就是要用中國人民的人肉炸彈去維護它的集團的既得利益，但它卻死也不肯改變爲它帶來了既得利益的落後的一黨專制統治。而民主列強們卻正好可以用此不自量力的《超限戰》來證明中國對世界的威脅。

三、「中共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和鬆綁已經變好了」：中共一鬆綁中國人民的活力就解放出來了，這並不說明鬆綁好，這恰恰說明捆綁中國人民是罪惡。捆綁害苦了中國人民，捆綁阻礙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人民正應該推翻“予中共捆綁中國人民以權力的專制制度”，同時再也不給專制復辟以任何的機會。

同胞們，是清醒的時候了！因爲：

我們中華民族是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偉大情操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懷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偉大氣節”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擁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一高雅自信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懷有「無邊落木瀟瀟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之暢達精神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擁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瀟灑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懷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之美好情懷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擁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之無比豪氣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懷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之雄心壯志的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是堅信“仁者無敵”的民族。

本人僅以此文作引玉之石，望各方大家，前輩先賢為弘揚我中華王道，復興我中華文明而共同奮鬥！

## 魔鬼詞典(一)

金海濤

### 編輯說明：

1. 本詞典的內容僅適用於中國大陸。
2. 各詞條中的詞「黨」如無特別註明，則均指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不可錯用。

【四項基本原則】(多義詞)(1)太上皇鄧小平為我黨制定的最高準則與行動綱領，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我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2)中共官員為實踐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而自訂的行為準則，版本甚多，其中的一個版本為：煙酒基本靠送；情婦基本靠貢；政績基本靠吹；老婆基本不用。

【三個代表】(多義詞)(1)李鵬是「六四」天安門慘案屠殺群眾之劊子手的代表；成克傑、胡長清、慕綏新是我黨貪官污吏的代表；李鵬家族是利用手中特權而成資產暴發戶的代表。(2)堯、舜是原始社會明君的代表；康熙皇帝是封建專制社會明君的代表；毛澤東是中國後封建社會暴君的代表。(3)華盛頓是民主共和制度下開明總統的代表；希特勒是法西斯獨裁者的代表；斯大林是共產極權制度下暴君的代表。

【小平】系英語 SHOPPING 的音譯，意即做生意、倒買賣，當然包括政治和商業上的生意與買賣，其中鄧氏小平生意做得最大，最後掌控了中國的一切，並成了中國當時的太上皇。

【貪污】我黨官員獲得錢財的最佳途徑。

【大款】也稱款爺，他們大多是利用與官場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而使自己財富迅速增加的暴發戶，而有些則是

靠自己的善於經營成了富翁，但也必須在致富的過程中向官員們進貢、納財，否則，麻煩不斷，事業受損。

【性賄賂】不良大款將金錢換來的美女送給官員作情婦，從而獲得超值錢財以及政治上好處的操作手法。據我黨中紀委報告披露，貪官背後幾乎都有情婦的影子。

【權錢交易】官員和大款相互勾結的操作過程。官員提供的是權力，獲得的是金錢；大款提供的是金錢，獲得的是更多的金錢、金錢的替代物或官位。

【權色交易】官員和大款相互勾結的操作過程。官員提供的是手中的權力，獲得的是美女的肉體；大款提供的是金錢，獲得的是更多的金錢或官位。見「性賄賂」條。

【民主黨派】中國裝扮、粉飾民主的政治花瓶，目前共有八個。

【公僕】此處的「公」即共產黨的「共」，「僕」即僕人，「公僕」即共產黨的官員僕役百姓的意思。「公僕」即「僕公」，即僕役大眾的意思。

【憲法】專門用來維護共產黨一黨統治而讓老百姓遵守的紙上條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法典，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憲法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列在上面的諸多條文只是個幌子而並不付諸實施的，比如遊行示威、言論、結社等等的自由。

【小蜜】一般指我黨官員的情婦。

【人民日報】我黨中央機關報，其特點是「滿紙荒唐言，整篇虛假事」，它所追求的並不是新聞的真實性與普世的價值觀，而是多多製造一些類似迷渾藥之類的東西，讓讀者隨之起舞。其一位前副主編有驚人語：人民日報除日報頭每日所刊日期為真實之外，其他都是假的。誠哉斯言！

【豆腐渣】並非製作豆腐而剩下的殘渣，而是指大興土木構築的各類工程，其質量有如豆腐渣。相近的詞尚有「首長工程」、「王八蛋工程」、「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等。

【US Army】並非「美軍」的英文原名，而是中國大學生參加軍訓時衣服背後的文章--University Student Army 的縮寫，即「大學兵」的縮寫，但這一創意的發明者恐怕崇美心甚重，缺少了我黨諄諄教導的愛國主義情懷。

【法院】在黨委領導下為我黨辦案的法律大院。社會上關於「黨委大，還是法院大」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法院在黨委領導下，當然判案要以黨委指示為準，有些法院堪稱楷模，他們的判案準則是：黨委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判。

(下接第 94 頁)

# 重燃希望中 迎來老伴兩週年祭

羊  
子

兩年前，病魔突然從天而降，極短時間內，奪走了我相依為命的老伴王若望。兩年來，華人世界和部分美國人，賜我以普世間人情、溫馨、友愛，磨平我心中憂傷，灑向我人間最甜美的仁愛，真的，我重又感到活著的意義，更要緊的是，更感到要挺舉老伴畢生無悔、探索中國未來民主的義旗，像九十二年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那樣，前仆後繼，不怕犧牲。至今，百年求索尙未果，革命遠未達成功，我等後人，必須沿著國父孫中山的遺訓：同志尙須努力！

最近，在老伴的精神遺產中，偶爾讀到一篇文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老伴出席孫文學會活動中的發言。多年過去了，如今讀來，雖然在「資產階級革命」等概念上仍留有毛時代的影響，卻仍然感到他向十三億中國同胞推崇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基本理念前後如一；在切身經歷國、共兩黨牢獄生涯對比後，仍然覺得臺灣的民主轉型，是大陸的明天；三民主義沒有過時。現將它發表出來，在老伴離開我們兩週年之際，謹誌紀念：

## 辛亥革命的現實意義（提綱）

王若望

……

毛澤東為了突出共產黨在革命中的作用，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估價是有意貶低的。他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成了幾十年來大陸佔統治的論點，誰也不能說「不」字。要公正而客觀地研究辛亥革命史，就應有勇氣批判以毛氏為首的官方的觀點。例如：大陸流行的一個觀點，據毛說：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幼小，所以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必須無產階級領導，這話就是不對的，如果說孫中山是「代表」資產階級革命，那麼它推翻了滿清政府，並建立了一個國民黨，你能說她軟弱幼小嗎？即使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比起英、日、美等國幼小，社會革命家的任務是扶植他，為它的大發展掃清道路，難道因為他弱小就將它連根拔或砍倒嗎？另一方面，毛說中國的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特別強大和富有鬥爭性，如果此說能成立，辛亥革命前

夜的黃花崗起義，惠州起義和秋瑾、徐錫麟等烈士前仆後繼的鬥爭，難道不是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性和組織性嗎？按照歷史發展的規律來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共生的，而資產階級結成政治集團的自覺總是比無產階級早一段時間，難道剛剛從農村轉入城市的中國無產階級可以跨越這條歷史法則？何況中共並非從中國工人中產生，而是從俄國搬來的。

還可提一條，毛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這麼說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下的政治綱領，故而是舊民主主義，只有實行了國共合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才是新的三民主義」。

在這裏，他沒有否定三民主義，也沒批判三民主義本身，只是給他扣了一頂「舊的」帽子，舊的延伸即「過時了」，再延伸下去：應該拋棄了。要他不過時，只要加上個「聯俄、聯共、聯合工農三大政策就變成新的了」。歷史已證明：聯俄這一條就不『新』，其實是上當受騙。比如說：列寧宣佈的十月革命後就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中俄簽訂的璦琿條約和其它不平等條約就沒廢除，相反，還把我國的外蒙古成為大俄羅斯帝國的一塊殖民地。孫中山在遺囑裏所說：「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眾所周知，蘇聯老大哥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過中國，不論是對蔣介石或是毛澤東。

回頭來再研究毛氏的論點：增加了國共合作三大政策，就是舊三民主義一躍而為新三民主義，這種說法在邏輯上說不過去，因民族、民權、民生三條政綱無所謂新舊，問題的要害在於是否真正實現它，另外硬貼上兩個不想幹的條件，並不能改變三民主義的性質，更非決定其應該宣佈應予放棄的理由。歷史證明：加上這三條大政策反而使三民主義的實現大大地推遲了。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仍然成為九十年代直至下個世紀的中國人民奮鬥的目標。毛澤東給三民主義加上個「舊」的標籤，同樣是為了貶低國民黨和孫中山，一方面又是為了抬高共產黨，似乎什麼陳舊的東西，一經共產黨領導馬上就變「新」變「香」了。

當共產黨達到一黨專政之日，在「民權」問題上有什麼新的地方呢？不許人民提出人權的要求，把人命視作草芥就

是「新」的特點嗎？毛的這個論點流毒很廣，近代史上從此把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文人稱作新的民主主義者，而把早期的沒有響應共產主義思潮的文人稱作舊民主主義者，這樣就按照毛的標準給學界人物排了等級。（以上所引毛的兩個錯誤論點皆引自毛的《新民主主義論》）

只有批判了毛圍繞著辛亥革命所發表的一系列錯誤觀點，才有利於如何從辛亥革命歷史中吸取現實的教訓。例如，大陸的歷史界和民革把紀念辛亥革命的現實意義都歸結為「促進海峽兩岸早日統一」，這一條沒有錯，但如果大陸一方的意識形態上還在堅持貶抑孫中山，低估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雙方就沒有共同語言，從思想到實踐就談不上統一了。再如：中共方面把實現西方式的議會制度和實現貨真價實的民權體制，中共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誰若在文字上口頭上提出中共應該致力於改善人權方面形象，中共就暴跳如雷，說什麼這是用西方的概念干涉中國內政，關於民權建設，恰恰是七十年前孫中山革命學說中的重要部分（當民族獨立已經解決了，民權問題就突出成為核心部分了），何必要把孫文學說的歷史遺產一腳踢開，把民主主義和人權解放的旗幟奉送給西方國家呢？

……

中國的歷史兜了一個大圈子，回過頭來看，大陸的中國不如臺灣民主，不如臺灣富足，正是由於大陸在「以俄為師」上走了四十多年的彎路所致。

一九九四年秋

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要結束專制王朝，確實要花好幾代努力，千萬千萬請注意：欲速則不達；九十二年前、那驚心動魄的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那可歌可泣的悲壯情懷，大凡血氣後代，都銘記心懷！當初，老伴剛剛睜開眼睛看世界，就如我們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所看到的，中華民國政府剛剛成立之初：滿清遺老遺少企圖復辟、各地軍閥稱王稱霸、民主風範的孫中山謙讓總統、夢想當皇帝的袁世凱趁機圓夢、後來的老蔣總統又面對日本侵略的強大攻勢、毛共巧言令色，一來在後方不斷破壞抗戰，甚至勾結日本侵華勢力，阻礙蔣總統抗日，二來迷住無數天真追求自由民主進步的青少年，投奔所謂革命聖地延安（不幸老伴成了其中之一）。直至毛共們奪權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血腥面目大暴露，老伴既看到無數志士仁人遭清算、無數無辜者受迫害，個人又遭受家破人亡大災難，更由於牢獄中，難友死在他懷中的真實故事，終於讀明白了中共的本性，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背叛！走上了再不要毛共的不歸路，至死不渝！

同仁們都還記得，四人幫垮臺之際，老伴也已步入晚年，一而再的牢獄之災，一而再的開除黨籍都未能讓他閉

嘴，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中，胡喬木要他帶頭批判王若水等所謂的污染源，他躲開了；八九年血腥鎮壓學潮中，老伴的「肩披」上寫著「鐵石心腸，可悲可歎！救國救民，先救孩子！」參加了聲援孩子絕食七天的遊行隊伍，從而成了國內最年邁的政治犯，入獄一年多；一九九二年被逐以來，只要有聲援行動，老伴一概出席，從不間斷，好多照片上可看到，嚴冬臘月裏，抑或春寒料峭中，你可看到，老人默默地站在華盛頓（DC）的聲援隊伍中；或者是烈日炎炎裏彎著腰，滿臉無畏地站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面前，聲援著國內牢獄中堅持理念的同胞們。

有一位葛紅兵教授，他曾頗有感慨地對某一知名的老人作如下感歎：「有智慧但是沒有信仰，有感念但是沒有境界，有想法但是沒有勇氣，只求一己之明哲保身，只願意看自己，不願意看世界，眼睛只看到眼前的一點物質生活，看不到宇宙的大發生、大故事。……也許某人（故隱其名）老了吧？老人會有老人的想法，尤其是一個非常智慧的老人，他會為他的一生做總結，會覺得自己成功的一生有很多經驗可以傳授，可是這種人生經驗實在不過是老人受了過多的人生折磨也享受了不少的人生快慰之後的『黃昏哲學』而已，對世人是有百害而無一用的，尤其是對年輕人」。葛教授真正是在憂國憂民；作為黃皮膚，我也深深同感。葛教授的感歎，觀照老伴一生，我深深感到，老伴是平凡的，卻是對祖國人民深懷愛心的、無愧於後代的大寫的人！可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實踐了人生的真諦。

期望我中華民族，繼往開來，循先烈足跡，不遺餘力地求索祖國的明天！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紐約

## 王若望的遺訓：兩手準備

莊思明

幾天來，腦海裏不斷浮現出一位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輩的影子——王若望。因為再過幾天，就是他的忌辰了。

十二月十九日凌晨，思念之情更深，我無法入睡，起床拿著劉賓雁題的《王若望紀念文集》，從頭至尾又翻閱了一遍，追思這位中華民族偉大兒子的偉大事蹟和遺訓。

### 不平凡的一生

人人都有一死，但死後全世界二十多個國家一千多人，組成龐大的治喪委員會為他發表訃文，至少是我這個七十歲

老人從未見過。

王若望這麼受人敬仰，絕不偶然。他是一個平凡的人，卻有著極不平凡的一生！

十五歲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十六歲第一次入獄，因參加罷工鬥爭，坐牢三年。

十九歲參加中國共產黨。

爲什麼？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說過：「一個人在青年時代不信仰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到老年還信仰社會主義是沒有頭腦」。

王若望是個先知先覺者，還未到老年，就看透共產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貨色，成爲共產黨的叛逆者。幾十年間，他被加上「山東王實味」（在延安被中共砍頭的作家）、「右派分子」、「資產階級自由化老祖宗」等罪名，被批判、被整肅、被開除出黨、被逮捕入獄。1992年，他已經74歲，帶了第二任夫人羊子（他的前妻早已因王老受迫害，發瘋而亡），流亡美國。

## 不要共產黨的人

在美國，王老成爲真真正正的民運戰士！

「堅定地反共」！這就是王老最強烈的呼聲，也是他最高的原則。爲了「反共」，他不計較利害得失，不顧年老體衰，四處奔波，走遍全球，到處演講，募捐義款，支援民運。可惜在「民運」隊伍中，有些人「心裏有個小毛澤東」，他們打著民運的旗號，實是中共的「變種」，給王老造成不少傷害。但王老以基督耶穌的偉大胸懷，寬恕他們，捐棄前嫌，竭力團結他們，壯大民運隊伍。

《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指出，有兩種人，「一種是共產黨不要的人」，一種是「不要共產黨的人」。王老是從「共產黨不要的人」，徹底轉化成「不要共產黨的人」。因爲他看透共產黨的本質，對中共再也不抱有幻想，甘心走艱苦的反對派之路，這正是王老崇高的理想主義表現，也正是王老最可貴的崇高品質。

## 政改要有「兩手準備」

民運元老王炳章曾經與王老探討了結束中共專制、過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能模式，他們的共識是要作「兩手準備」：一方面希望並積極呼籲中共政治改革的和平過渡；另一方面，必須準備第二手，倘若中共拒絕政治改革，人民有權起來，以「人民革命」的模式推翻中共專制政權。

王炳章和王老認爲，「八九」民運最重要的教訓，是整個運動缺乏有力的組織導向，是運動的主流意識仍是「寄希望於共產黨的改良」；缺少「革命意識」；缺少「取代中共政權的意識」；缺少「更改政權乃天賦人權」的思想指導，

錯過了推翻中共政權的良機。他們認爲，需要有意識地進行「推翻、更換中共政權」的準備工作，才能在下一次運動高潮到來、有機會推倒中共政權時，不失時機地推翻專制政府，建立民主政體。

「兩王」的這些看法，正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真知灼見。真正有志於救中國的民運戰士，要好好地吸收血的教訓，才不會讓「六四」的血白流！！

兩年前，逝者已去，我們當高舉王老的精神義旗挺進！而如今，年富力強的王炳章，卻在專制政府的鐵窗裏苦捱；我敢說，王老要是健在，他一定會不遺餘力，爲營救王炳章而奔波努力，相信，我親愛的世界第一多人口的中華同胞，必能繼承王老的遺志，從此眾志成城，爲營救無期徒刑煎熬中的王炳章而盡心盡力。

謹以此紀念王老逝世兩週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奧克拉荷馬

## 第一次和最後一次

### ——王若望先生印象

陳破空

1996年11月27日，到達美國的第二天，距下飛機不到十二小時，我參加了由陳軍和辛苦等同仁組織的「百日囚車活動」。由陳軍發起的這一活動，意義是爲了聲援國內依然被囚禁的中國反對派戰友。就是這一天，我第一次見到了王若望先生，及其夫人羊子。

寒風刺骨。記得在前往中領館的路上，我已經初次領略了紐約冬日冷風狂吹的景象。許多時候，我和辛苦不得不背向風力，倒退著行進。位於42街與12大道交界的中領館，也緊鄰哈德遜河畔。寒風在寬闊的河面上聚集了更大的力量，狂猛地灌入42街，抽打著街道兩旁的建築與樹木，也抽打著那輛裝飾成囚車模樣的破舊小車。車尾鬆脫的牌照敲打著車身，一次又一次地跌落在街面。

忽然聽見辛苦說：王若望來了。於是，我看見，一個瘦小的老者，由一位健碩的中年女士相挽著，裹著寒風，跨過街道，朝我們走來。這便是王若望夫婦。

簡樸的服飾，從容的神情。言談間，我瞭解到，流亡海外的生活，對年近八十高齡的王老來說，艱辛而貧寒。然而，於信念，卻彌韌彌堅。這，可以從他對北京政權斬釘截

鐵的批評聲中強烈地感受到。除了信念，情不自禁地，他也流露出懷念：希望有生之年，能夠重返故國。

時而沈默，時而隨意地說上兩句，言談舉止盡顯普通和平淡。當 1986 年我們在上海掀起大學潮的時候，王若望被當局視為那次學潮的精神領袖之一，事後，與方勵之、劉賓雁二位先生一道，同遭「整肅」。此刻，對我來說，怎麼也難想象，站立在面前的這位「小型」長者，便是大名鼎鼎的王若望。與方勵之、劉賓雁並列為三大「巨頭」的王若望。被鄧小平冠以「資產階級自由化」「老祖宗」的王若望！

之後，年年「六四」，都能在中領館前，見到參加紀念活動的王若望。靜靜地立著，或默默地坐地，偶爾也有簡短的演講，那一定是慷慨激越之音，悼念英靈，鞭笞獨裁，自有他獨特的表達方式。每當高亢的聲音從那瘦小而高齡的身軀裏發出來，都格外地振聾發聵。

最後一次見到王若望先生，是 2001 年 12 月 16 日，在 Elmhurst 醫院。晚期肺癌正吞食著王老的生命。八十三歲，瘦小的老人愈加瘦小了。探望的人絡繹不絕，無不心情難過。與探望者相反，王老樂觀而幽默，褪盡血色的臉上始終寫滿笑意，甚至跟每一個人開玩笑。我掏出一點錢，算是微薄的捐助。當羊子告訴王老時，王老在一陣劇烈的咳嗽之後，居然用力喊了一句：「破空，你破費了！」全場大笑。

三天後，王老辭世。因為不願低下高貴的頭顱，未能落葉歸根，報恨客死他鄉。

十天後，各界人士為王若望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流亡海外的中國反對派人士，空前難得地齊聚一堂，共同追思他們推崇的前輩。王老安詳地臥在松柏叢中，讓人覺得他只是熟睡了。在他的遺體兩側，懸掛著一幅用遒勁大字書寫的對聯：

「風骨動天地，鐵膽驚鬼神。」

這十個大字，不是我書寫的，卻是我思考和提議的，幸為眾同仁所採納。這十個字，字字出自我心海深處。我覺得，唯有這十個字，匹以概括王老的一生，及其不朽的精神。

謹以此文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兩週年。

最近，美國各地中文學校掀起簡體字與正體字孰優孰劣之爭，這使我想起中國大陸已經去世的名學者吳宓。他在 60 年代寫過一篇列舉簡體字不當與讚揚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賈禍，遭到嚴重批鬥。從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鄉壽終正寢，結束了屈辱的一生。

吳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陝西涇陽出生，一九二一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回國後曾任東南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主任、西南聯大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學衡雜誌社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歷任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教授，長於西洋文學研究、紅樓夢研究，著有吳宓詩集，翻譯法國馬西爾論「現代美國之新文學」等，是治學勤奮、寫作不輟的學者兼作家。

吳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陸掀起反右運動之前，曾就大陸推行的簡體字發表文章在「光明日報」上，評論簡體字的

不當與不便，並認為簡體字不應該透過政治壓力來推行。沒有想到，反右時他因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為他的致命傷，導致他被批鬥、毆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後被當局從北京遣回西安家鄉，鬱鬱以終，享年八十四歲，是苦難中苟活壽命較長一個「臭老九」。這裏簡述他被整受害的一段過程，讓他在海外的親友對他有所瞭解。

吳宓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遭到衝擊的。四川西南師範學院的紅衛兵衝進他在重慶的住所就打，並把他供奉妻子鄒蘭芳的遺像撕得粉碎，從此以後，大批小鬥，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但是，吳宓的生命力特別強，任由紅衛兵小將揪、打、踢、罵，終於熬到文革結束，真不容易。

綜合吳宓被鬥的現行罪名，歸納出三個：（一）供奉臭老婆亡靈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隨便貼在牆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實，有反對毛主席之嫌。（二）在課堂上向學生放毒，反對簡體字推行，怨責口糧不足，說什麼「三兩尚且不夠，何況二兩乎？」（三）肆意宣傳帝國主義——美、英、法的文化。

紅小將命令吳宓跪在毛主席像前認罪。他不跪。被紅小將猛踢後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斷仆倒，接著紅衛左右兩邊揪他耳朵，不斷扭擰，使他痛徹心肺、兩耳欲斷，最後被紅衛兵一腳踢翻在地，昏死過去。醒過來之後，紅衛兵已離開，

吳宓與季羨林的

## 死與生

李勇

他掙扎爬起來閉門思過，檢討自己罪行，銷毀文件、日記、著述、文稿、書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沒有想到抄家接踵而來，家裏一切有文字的東西都被抄走。幾天後，吳宓便被關入牛棚。未幾，又被單獨隔離，住在一個積水二寸的小房間。房裏只有一張木床，工資取消，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維持他的「生存權」。

吳宓生活雖苦，活下去已無問題，但卻準備隨時挨批鬥。十年中鬥了多少場，他都記不起了。只知道有兩種鬥法：一種是集體鬥，另一種單獨鬥。兩種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時左右打耳光、有時有鞭抽、有時用棍打、有時用針刺，不論哪一種方法，都令人疼痛難熬，恨不得當場死去。

鬥爭的方法雖可怕，鬥爭的姿態更難忍。在紅衛兵一聲令下，被鬥的吳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頭、雙臂前探如噴氣式飛機，然後迫他交代、揭發、追問、批判，滿場都是吼叫聲，他則被拉扯、踢打、辱罵。紅衛兵追究吳宓的歷史罪名有：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兇，等等。對這一切罪名，吳宓絕不抗辯，只支吾二句後就不吭聲，這樣還可苟延殘喘三五日。

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的黨委書記張永清，也在劫難逃被批鬥，歷史系講師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誣張永清組織一個取代中共的政黨，有黨章、有綱領、開過會、有人事安排、有發展組織計劃、有發展對象，吳宓是其中之一。紅衛兵得此口供大樂，視為「特大捷報」，所有被攀誣的人，包括吳宓都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大會小會、個別追查、車輪戰術、疲勞轟炸，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

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說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他們才問他好不好玩？最後，吳宓實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吳宓難過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裏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

碗廚房丟棄的泔水，裏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

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難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才停止那種慘無人道的「鼻飼」，但紅衛兵繼續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說出同謀，於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對吳宓來說，這些皮肉之苦已經習慣，也知道如何應付，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難友間彼此幫助的情義。正如吳宓所說，那是「牛棚之誼」。

吳宓曾經向親如兄弟的另一位學者張紫蓮敘述一件事，他們學院的年輕院長，是一個只有五十歲的工農幹部，是中共中央根據外行領導內行派到學院當院長，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類，與吳宓等「反動學術權威」一樣挨打被批鬥。有一段時間，他每天與吳宓在一起排隊躬身，讓紅衛兵以鞭棒打屁股。爲了減輕吳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揮棒時把臀部向後突出，超過吳宓，所有打下來的棍棒他都承受下來，甚至打吳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吳宓十分感動。這在當時人整人、人害人、人殺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點人性光輝。

吳宓對年輕院長的「義舉」很感動，曾多次向院長說：「你怎麼可以替我挨打！」院長回答說：「你這樣大年紀，又瘦成這個樣子，怎麼吃得消，再打斷骨頭怎麼辦？我年輕、身體棒，多吃幾下沒關係。」

有一次，四川兩派造反派武鬥，雙方都有長短槍、手榴彈，鬥得十分激烈，因此禍及被兩派強迫勞動的「反動學術權威」。有一天，吳宓正埋頭揮鋤、汗流腦轟，突然，在一旁勞動的年輕院長大叫一聲：「快！有手榴彈！」說著就撲向吳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溝飛滾，跌入溝水中，而落在吳宓身邊的手榴彈爆炸，彈片四濺，接著槍聲四起，土炸彈橫飛，院長救了吳宓一命。

吳宓另一個「牛棚友誼」，來自一名女性「反動學術權威」劉尊一。時間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吳宓已從牛棚出來，返回西南師範學院，改善生活、恢復工資，校革命委員會的幹部告訴他「希望他加強學習，改造思想，不要辜負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吳宓歷劫餘生，當然對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時，吳宓已經視力衰退、耳聾目盲，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步履不穩，膝腿折斷無法復原。住在右鄰的劉尊一女士卻來結伴照顧他，替他打飯、購物，使他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但這種生活維持不久，又出來兩個專搞「群眾專政」的男女來找麻煩。他們規定吳宓與劉尊一每天早上七時到下午一時做義務勞動，打掃地面、清理陰溝，但要自備工具，過幾天要到專政機關去聽訓半天、清潔半天，再過幾天還得接受革命群眾大會批鬥一次，回到家中不准關門，必須端坐

屋內反省罪惡，晚上睡到半夜，隨時有群眾專政的男女闖入屋內踢醒他們查抄，防止他們變天造反報仇。

某次，劉尊一與吳宓在造反派和當權共幹押解下去勞動，共幹命六十開外的劉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沒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難拔，她用力過度仰面跌在地下，吳宓立即趨前幫助，被共幹制止。共幹罵他多管閒事踢了他一腳，命劉尊一爬起來再去拔草，不料此時草叢中跳出一個癩蛤蟆，那兩名男女幹部立即改變主意，不再叫劉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癩蛤蟆。劉尊一沒有選擇，立即奉命轉身去抓癩蛤蟆，當她奮身撲去抓癩蛤蟆時，沒有想到癩蛤蟆比她機靈，快速跳入草叢，劉尊一又再奮身撲，又撲了個空。此時兩名男女共幹一面笑一面罵劉尊一這個「臭老九」、「臭婆娘」蠢笨，並命她快把癩蛤蟆抓住，否則有她好看。劉尊一年老體衰，既恐又急，只好奮力再去撲抓，但癩蛤蟆已失去蹤影。劉尊一亦已渾身塵土，臉部被叢草刺傷流血，兩手也血跡模糊，樣子十分狼狽。吳宓眼看老友慘狀，放下手中鋤地工作，去幫劉尊一在草叢中找癩蛤蟆，兩名男女共幹大怒，衝上前去一腳把吳宓踢翻，罵他多管閒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後掏出身上紅寶書，朗讀幾段毛語錄表示懺悔，折騰到晚上才讓他們回去，結束了這段鬧劇。

這位被整得灰頭土臉的劉尊一來頭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師範學院的教授，抗戰期間投身戰時兒童保育工作，做過「歌樂山第二保育院院長」，與蔣經國在江西女友章亞若結拜姐妹，章生下學生的章孝慈、章孝嚴兄弟後，只有劉尊一去探望、安慰她，並做了兩兄弟的乾媽，幫章亞若撫養這兩兄弟很長一段時間（她從不向吳宓之外的人透露）。

吳宓與劉尊一在受難期間彼此照顧、互相關懷，成了好朋友，但他們所受的磨難、所受的批鬥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後還沒有結束，而鬥爭他們的男女共幹仍然把他們視為階級敵人，硬把他們往死裏整。他們的說法是：「讓這此臭老九徹底改造，國家才有希望。」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愛國理論。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批准從陝西來的吳宓的外甥兒——他妹妹吳須曼的兒子把他接回老家。吳宓不想回去，因為他與妹妹一家人很少見面，無共同語言，而自己已經八十二歲，眼盲腿斷、行動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個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不再認他這個「反動爸爸」。他想留下讓劉尊一繼續照顧他，但劉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吳宓只有含淚離開四川，兩年不到傳來他在家鄉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師範學院革委會為吳宓開了追悼會，鄭重評價他是「有真才實學、道德高尚、熱愛祖國的學者。」

吳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謝「黨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並向「祖國母親」保證不會辜負「毛主席與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這樣說，絕無諷刺吳宓之意，假如吳宓歷劫不死，活到今天，也會像北京大學另一名「反動學術權威」季羨林一樣，受盡毆打羞辱後，不但感謝「黨和人民」寬大，甚至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飾解脫，並把共產黨加害中國人民的政治暴力解釋為「父母打錯了子女」，子女不應記恨，相反要向「黨和人民」交心，叩謝「祖國母親」不殺之恩，感謝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季羨林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自己被中共解放後所受的種種苦難，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無怨無悔，並表示對「黨和人民」永遠忠心耿耿，絕不會為過去所受苦難而對「黨和人民」不滿，尤其不會怪毛主席與「光榮、正確、偉大」的共產黨，因為黨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則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親，被毛主席和黨整肅，就等於父母打子女，子女豈可記恨之理。所以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愛黨，而且更聽黨的話，黨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在此之前，季羨林把他在文革期間所受的苦難，寫了一本謂《牛棚雜憶》的書，在海內外暢銷，賺了不少稿費，但「黨和人民」似乎不大滿意，因此季羨林立即在海內外的雜誌上撰文解釋，甚至在去臺灣訪問時，對臺灣的文人暢述他對臺灣獨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說：「假如不是美國帝國主義當年作梗，臺灣早就回到祖國懷抱，達成統一，那麼臺灣獨立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季羨林的種種表現，當然贏得「黨和人民」對他欣賞，讓他在北京大學做研究所所長，為他出版專書，又委他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學」那些忠於黨的年輕精英更是對他的愛國心表示贊許，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繼續傳道授業，給他高職厚薪，花園洋房，享盡「祖國母親」的寵遇與厚愛。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季羨林的表現有異議，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學者周質平教授，看到季羨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他的「父母打錯子女論」有所批判，並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恥辱，怎麼可以這樣討好史無前例的殘暴政權？豈可把那些男女共幹當作父母熱愛？這是什麼道理？

周質平教授批評季羨林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副刊，立即引來廣泛反應。有人著文回應，有人寫信去北京大學給季羨林，痛斥他無恥，其實罵他的人不知道季羨林的表

現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不論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是常態，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帝制延續下來的傳統。尤其是，當海外知識分子生活得逍遙自在之際，季羨林正遭到人類難以忍受的迫害與羞辱，尊嚴掃地，生命不保。因此，當他歷劫不死，焉得不對「黨和人民」感恩戴德，這是人類正常的反應，實在不應對季羨林苛責。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季羨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羨林真正感覺到浩劫災難將來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國大陸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季羨林經過「人人過關」，「人人洗澡」的整肅後，與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東郊外的南上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學參加「革命」。

季羨林當時是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見到貼在校園內批判他的「大字報」，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散文「春滿校園」，內容是熱情的歌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也把他對北京大學的感情傾注在這篇文章裏，沒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認為他歌頌「春天」，而「春天」則象徵著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

季羨林看見校園內到處有掛著木牌、被押到臺上受學生群眾批判的同事、朋友。對於這些牛鬼蛇神，季羨林為了自保，只好遠遠避開；沒有想到，最後還是被紅衛兵上門抄家、批鬥。明明他愛黨愛毛，卻說他對毛愛得不夠，掛毛像不熱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舊書、舊信、舊文件，這些東西在「破四舊」的活動中，應該被毀掉、掃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羨林還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之間的中立逍遙派，可以暫時避開激烈批鬥打擊的待遇。但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捲入風暴中了。他開始每天被批鬥、毆打、羞辱。為了生存，他向紅小將低頭屈膝，站在毛主席像前叩頭問安，檢討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殘忍，既沒有尊嚴，也沒有廉恥。古人所說「士可以殺不可辱」，到了共產時代變成既可辱又可殺。季羨林與大多數知識分子既在六〇年挨餓，到了六七年後整整十年間又挨打又挨殺，一個個都生不如死。

臺灣癡瘋文人李敖歌頌中共政權，說：自從共產黨政權成立，中國人不再挨餓，也不再挨打。這種「幸福」，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資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國大陸，相信也必在劫難逃，說不定早就向馬克斯報到。

神通廣大的紅衛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羨林的罪證：（一）在一個竹籃子裏有一堆還沒有燒盡的信；（二）他老孀母的枕頭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張石印的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照片。這三條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

正法，亂棍打死；小到必須被拳打腳踢，耳光相向，凌辱漫罵，背曲腰彎。

在「罪證」確鑿之下，季羨林覺得只有死路一條，於是他想自殺。他親眼看到歷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總支書程某及其他許多教職員工自殺求死成功。他們有的吃安眠藥、有的吃敵敵畏、有的跳樓、有的臥火車軌道。雖然，死後仍被「黨和人民」視為「畏罪自殺」；但人死之後什麼都不知道了，豈不痛快？

在鬥爭季羨林的紅小將中，有兩個是「貧下中農」及「烈屬」（類似李鵬的身世）出身的學生，他是因為政治身份極紅進入北大求學，其實是根基淺、智商低。季羨林為了貫徹黨的政策，特別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結果他們在批鬥季羨林時反說季對他們的關心與幫助完全是「階級報復」，在打季羨林耳光與動手動腳毆辱季羨林時還揚言「不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金童玉女」。

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開始，季羨林幾乎天天被打被批鬥。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毀，在紅小將打砸搶下，家中已無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於是季羨林決定服安眠藥自殺。

季羨林終於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沒有活的自由，也沒有死的自由，想自殺談何容易。

就在季羨林決定求死之際，紅衛兵突然上門把他雙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鬥。他們把季羨林帶到北大最大的聚會場所，命他面壁站立，與其他牛鬼蛇神一樣低頭認罪。在認罪的行列中，不斷聽到紅小將的喝罵聲及打耳光的聲音。終於季羨林也重重挨了幾個耳光，打得他滿嘴是血，接著背後又挨了一記重拳，然後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幾腳，他想轉頭看看打他的是誰，一口濃痰吐在他臉上。有人高聲喝叫：「不許亂說亂動」，季羨林立即低頭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臉上的濃痰。

季羨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紅小將的歡心，接著下來便押他站上批鬥台，要他彎腰、低頭，並再命他「往下彎，再往下彎」。他支持不住，以雙手扶膝，卻又招來一頓拳打腳踢，紅小將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張望。但從批判的聲音聽去，他只是陪鬥，被批鬥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動學術權威」。

季羨林在被批鬥時，最害怕的就是遊鬥示眾。解放軍、工人階級與紅衛兵聯合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遊街示眾時，把他押上一輛敞棚的車上，車子進行中，群眾夾道觀看，興高采烈，但臉上充滿對季羨林的刻骨仇恨。他們向季羨林揮拳，往他臉上吐痰，用石塊向他投砸，把季鬥得昏頭轉向，不辨東西。他不明白大家為什麼會這樣仇恨他。好不容易挨

完遊鬥，車子還不知在何處停下，他睜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處，突然被身邊一名大漢，飛腿踢中他的後腰，把他從車上踹了下來，跌爬在地上。沒有想到，他剛想爬，一名工人階級的漢子衝上來對著他的臉猛擊一掌，當場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時突然聽到有人喝叫：「滾蛋」，季羨林如聞綸音，立即連爬帶走離開革命群眾，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鬥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羨林自殺的念頭，他想：這樣重大的打擊，他還可活下來，今後還有什麼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會熬過去。

接著下來是一次比一次厲害的批鬥，季羨林嘗夠了「祖國母親」加在他身上的懲罰，爲了應付批鬥，他開始鍛煉身體去對抗侵害。他回到睡覺處，自行練習噴射式——低頭躬身、兩臂後伸、彎膝曲腿。果然身體抵抗力增強，即使被鬥三小時，姿勢不變，暈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鬥半小時就腰酸腿痛，渾身汗水，身體搖動，腦袋發脹，兩眼發黑，耳朵轟鳴，最後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來踢打，罵他裝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羨林已完全可以應付，真是得感謝毛主席給他的鍛煉。

被鬥挨打兩年之後，季羨林被送去勞改。他以為勞改雖苦，總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沒有想到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時鞭打他，看他不順眼，隨時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羨林在勞改期間不敢走大路，只敢貼著牆邊走陰暗潮濕的小路。儘管這樣小心，還是逃不過毆辱。

某次，季羨林走小路，被一枚釘在木板上的釘子插入腳底中間，釘尖深入，拔出來後血流如注，造反派見了，不但不同情，還勃然大怒罵他，並要他滾蛋，然後又把他調去煤炭廠勞改，由當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頸上掛一個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後再押到臺上批鬥，所有被送去煤廠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形容煤廠是閻王殿，十分可怕。季羨林每次從批鬥台下來，變成了一塊沒有知覺的走肉，被工人大眾像死狗一樣拖來拖去，沒有知覺，也不知人間還有榮辱。他實在不明白以整人爲樂的工人還有沒有人性！

在嚴重迫害折磨下，季羨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輕，舉丸腫得像小皮球，兩腿不能並攏，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醫院求診。醫護人員因爲他是黑幫，拒絕爲他治病。沒有想到，後來慢慢就痊愈了。

過了不久，季羨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內也是地獄。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語錄，如果背錯或背漏，就會遭到毒打，並被誣爲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錯語錄，被打得鼻青眼腫，還有一名學者因背錯語錄，被當眾打耳光，並命跪地向毛主席磕頭求恕。

有一位西語系歸國華僑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後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內有不少人自殺、有不少人發瘋。而這些人都是留學歐美名校的碩士、博士。當年都以爲中共令「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向中共靠攏，投入中共懷抱，結果均死於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種福氣，因爲活罪更難受。所有在牛棚內的教授、學者，走路不可抬頭、不許翹二郎腿，更不准笑。長期管制下，他們一個個低頭、並膝，甚至完全不會笑，因爲一笑就會被打被辱。笑變成一種罪過，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長期下來，這些飽學之士，即使活著，也生不如死。

共產黨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學者專家，一個個仗著自己滿腹經綸、學富五車、自命不凡。他們看不起勞動人民、解放軍和莘莘學子。因此，當農民翻身、工人當家，當然應該受到監管控制。在饑餓與暴力之下，這些學者專家，尊嚴蕩然，顏面掃地，爲了吃一頓飯，他們向共幹奴顏婢膝。爲了怕挨打，他們會向當年的學生、現在的造反派屈膝叩頭。爲了避免受辱，他們可以向那些農工獻媚討好，低聲下氣有如哈巴狗。

季羨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發瘋的教授，半夜跑到叢林中佇立哭泣，白天看見造反派就跪地叩頭求饒，最後還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殺，自絕於人民！

最令人難堪的是造反派戲弄牛棚裏的男女學者，強迫他們喝尿吃屎、飽痰罐水。如有不從，就拳打腳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季羨林就經常碰到這種事。

某次，季羨林在牛棚中準備睡覺，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腳跑出去報到，發現是一個姓張的學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學生鞠躬，沒有想到張姓學生喝叫：「喊你爲什麼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

季羨林回答說：「我不是出來了嗎？」季羨林還沒有說完，就感到臉上和頭上一陣熱痛，原來這名學生以膠皮包裹的自行車鏈條迎頭打了下來，接著全身挨了十幾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頭部，把季羨林打得腦袋嗡嗡響，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閃，直打到混身鈍痛、火辣、麻木，將暈倒之際，耳邊聽到了一聲「滾蛋」，他就連滾帶爬逃回牛棚內，後面惹來一片嘻笑哈叫之聲。季羨林驚魂未定，檢視身體，發現眼腫了，五官流血，手腳打木了，好在骨骼未斷，只是外傷。

最叫季羨林難忘的是「解放軍之怒」。某次，一名「解放軍」訊問他，他的反應慢了一點，便被視爲頑固抗拒，「解放軍」擰住他的胳膊把他押進一座樓內，樓內全部是工農大眾、小將學生、「解放軍」頭，他們叫口號、念語錄，震耳欲聾，接著拳頭如雨打在他的身上。這些自稱不要人民

一針一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此刻卻差一點要了季羨林的命。

這種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〇年代，毛死江囚之後才得到平反、寬赦。季羨林這才體會到「母親錯打子女」的滋味，對於「祖國母親」，他無怨無悔；對美國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分子、台獨分裂主義卻仇大苦深、恨之入骨。這就是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 並非一個人的遭遇（續）

王友琴

### 「右派份子」在文革中遭到更重的迫害

顧文選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書中說的「永不能回到社會」，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後，他不能回到社會上和別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須留在勞改農場。這種情況，當時的專門說法叫作「留場就業」。也就是說，雖然已經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來的地方，不得離開。其他方面，也和普通人不一樣。

文革開始的時候，「反右派」運動已經過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 1957 年「反右派運動」中的領導者。1966 年，所有大學的中共黨委負責人都被「打倒」，就是在 1957 年把一大批教授和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也都變成了「敵人」。他們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飽受折磨後自殺身死。但是，他們被「打倒」，絲毫不意味著 9 年前被他們「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當時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辯護的行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當作「反革命」行為。

在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是「運動」打擊的「牛鬼蛇神」的主要類別之一，連那些已經「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則被叫做「漏網右派」，都遭到各種殘酷打擊。「地富反壞右」成爲一個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漢語詞語。

在 1957 年被送到「勞改農場」去的「右派分子」，文革開始後受到的懲罰也往往升級。復旦大學物理系的李梧齡老師，1956 年畢業留校任教，1957 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被送到安徽省南部的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1965 年底解除了「勞動教養」，留在農場。1966 年文革開始，他又遭到「鬥爭」，並在 1969 年被作爲「反

革命犯」判刑 12 年。直到 1978 年底，他才恢復了自由。他寫有《泣血年華》一書（香港博思出版社，2002 年），這是現在仍然非常少見的一本「右派分子」出版的關於所受迫害的自傳。這本書真實記錄了他從 1957 年開始的 22 年苦難生活，其中包括文革時期。文革前他所受到的虐待就非常嚴重，文革時期所遭受的，又超過了文革之前。

在一篇題爲「勞改紀實」的文章裏（收入《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66—141 頁），作者夢波，1957 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學生，「戴上右派帽子」後，被送到清河農場勞改。他和顧文選的情況類似。他的文章裏，描述了在 1966 年夏天，紅衛兵到勞改農場「造反」，毒打了在那裏被「勞改」的人。緊接著，勞改農場內部也組織了對那裏的「右派份子」的大規模的殘酷毆打。那個夏天在北京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勞改農場中的暴行和北京城裏不但時間上同步，殘酷程度也類似。

1957 年被劃的「右派份子」，如果幸運未被送去勞改農場而留在了城裏的單位，文革中至少都進了本單位的「勞改隊」和「牛棚」，受到長期的關押和「鬥爭」。而且，在體力虐待的殘酷方面，遠遠超過了 1957 年。章乃器是前糧食部長，1957 年被劃成「右派份子」。1966 年 8 月 24 日被紅衛兵抓進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側的「吉祥戲院」。那個戲院裏，當時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屍體運出。章乃器在那裏被打成重傷。他沒有被打死，因爲他是名人，有民警到那裏把他要了出來。國務院行政機關把他一家從原來的大房子裏趕了出來，另外分配了小的住房。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被抄家和毆打後，到北京頤和園附近青龍橋投河自殺，因水淺未死。後來他失蹤。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殺了。

顧文選逃離勞改農場，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上。如果他偷越國境，也許不至於被槍斃；但是毫無疑問，他一定會被「鬥爭」，被折磨、毆打、關押和侮辱。他也可能像很多人一樣，在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

### 橫斷面 III：顧文選被劃成「右派份子」

劃成「右派分子」是憑什麼？

顧文選在 1957 年被劃成「右派分子」。

1998 年，爲紀念北京大學建校 100 週年，北京大學編輯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書籍，其中篇幅最長也最爲正式的，是兩卷本的《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其中有一段關於顧文選的記載，現照錄如下（見該書 517 頁）：

（1957 年）5 月 25 日

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系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系學生顧文選

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

這就是顧文選被劃成「右派分子」的根據。

這段文字中的「三害」是指「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之害」。1957年，毛澤東號召「整風」，要人們批評這「三害」。但是聽從這一指令提出批評者，如顧文選，很快就被說成是「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對「三害」的批評反而成爲一種罪過，批評者並且因此受到嚴厲懲罰。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質問校團委關於出席共青團「三大」的代表是怎麼產生的，然後學生開始貼大字報批評別的事情，並且出現了幾個學生社團，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學社」。

這個階段非常短促。一個月之後，6月21日，《人民日報》就宣佈北京大學的「百花學社」是「反動組織」。參加貼大字報的學生遭到全校大會的「批判」，組織也解散。

顧文選的講話出現在這一短促的階段中。北京大學的學生的活動只延續了很短一段時間。除了這個講話，顧文選在那一時期沒有別的更重大的活動。但是由於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定爲「右派份子」，並且爲之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 預定人數比例劃取「右派份子」

顧文選在會上「控訴」，發生在1957年5月25日。

但是，實際上，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當時在共產黨高級幹部中間傳閱，普通老百姓和中下層幹部卻對此一無所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裏，已經明確提出了要抓「右派」，比例可以達百分之十。

顯然，這個比例將造成數字巨大的受害者。

這篇文章在20年後，1977年才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公開發表。公佈的時候，不但是「右派分子」，連那些在1957年積極參與迫害「右派分子」的一部分共產黨幹部，也已經在文革中間被整得死去活來，成了按比例整人模式的新一輪受害者。

北京大學學生貼大字報鳴放開始於1957年5月19日，顧文選發言「控訴」更在6天之後。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北京大學學生響應號召起來「幫助黨整風」的時候，陷阱已經爲他們準備好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和要劃取的比例及人數，就已經制定好了。

如果顧文選不出來「控訴」，那麼別的人，即使說的話沒有顧文選激烈，也會被戴上同樣的「右派分子帽子」，以

湊夠人數。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記載，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初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把589個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劃成了「右派份子」。在同書的1982年部分（那時「右派分子」回到學校辦理「改正」即恢復名譽）說，北京大學反右派時劃了716個右派份子（890頁）。716個和699個是兩個不同的數位。這顯然是因爲前一次統計數少了。

應該注意到，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數位大，而且比例高。

關於制定比例抓「右派分子」，除了上引毛澤東5月15日的文章以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毛澤東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右派只有極少數，像剛才講的北京大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作爲印證，還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反右派鬥爭情況的報告》說，「到1957年8月7日止，全市已經發現高校教授右派份子192人，佔教授總數1390人的13.8%。」（轉引自《大逆轉》一書，365頁）

這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作7月9日講話一個月後，8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劃取的學生和教授中右派分子人數已經超過了這個比例。這可能是毛增加了比例，也可能是下面的幹部積極奉迎上級意圖的結果。

文革後，官方公佈在1957年劃爲「右派份子」的人數是50萬，而1957年時毛澤東講話中說的「知識份子」人數是500萬。有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認爲實際上「右派份子」人數超過50萬，但是僅僅這個數字，就說明毛澤東把百分之十的「知識份子」劃成了「右派分子」。（這樣計算，是因爲工人中間有「右派言論」的人被劃成「反社會主義份子」，有不同的名稱。）

毛澤東後來很得意地將此稱爲「陽謀」，也就是說，一種公然玩弄的詭計。在強權壓迫之下，甚至直到文革後，也仍然沒有人能夠發表文章公開質疑這種把上百萬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並且加以嚴厲懲罰的作法，沒有質疑這種「陽謀」策略，沒有質疑根據比例制定打擊迫害的做法。

這種制定比例和數位來殺人以及進行迫害的做法，並不是毛澤東從1957年才開始的。這種做法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經執行。

## 害人者也成為受害者

這段記載中說到的那天譴責和警告了學生的江隆基，是當時的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副校長。北京大學 716 人成爲「右派份子」，應該是江隆基主持決定的。當時各個單位的「右派份子」，都是由各單位的中共黨委或者總支決定，然後報上一級黨委批准。這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裏寫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這種「一元化」就已經如此嚴重，不是通過司法系統（那個司法系統也是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審理，而是共產黨的各級基層組織有權直接懲罰普通人民，也無須以法律爲量刑準則。

1957 年 11 月 1 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陸平比江隆基更爲嚴厲地抓「右派分子」。相比之下，江隆基倒顯得溫和了。1958 年 2 月 1 日，新的第一書記陸平向全校師生員工作關於「處理右派份子」的報告。1959 年 1 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

1966 年 6 月 1 日晚，由毛澤東命令廣播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攻擊陸平是「黑幫份子」。這張大字報的廣播開始了全國攻擊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陸平也因此在全國變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陸平遭到了長時期的殘酷的「鬥爭」。除了在「鬥爭會」被「鬥爭」之外，他被長期關押，還曾經被用繩子捆住雙手吊起來進行審訊、逼供。

江隆基在蘭州大學，也被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確定爲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從 1966 年 6 月 2 日開始，江隆基遭到學生大字報的攻擊，他被說成有「詆毀毛澤東思想」等等「罪行」。1966 年 6 月 17 日，江隆基被一些學生從家中揪出，拖到操場。學生用桌子板凳層層相疊，強迫江隆基跪在上面，頭上套了一個十多斤重的鐵籠子。這一天「揪鬥」了 70 多人，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第二天又繼續「揪鬥」了 100 多人。6 月 23 日，中共甘肅省委作出決定說江隆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同日，在蘭州大學開大會「鬥爭」江隆基，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6 月 25 日上午，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在蘭州大學，從 1966 年 6 月到 8 月，還有 6 個人被「批鬥」自殺身亡，14 人自殺未死，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1905 年生，陝西人，1924 年考入北京大學，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 年代初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沒有材料顯示他反對共產黨中央或者反對毛澤東。事實上，他代表共產黨統治大學十多年。因爲毛澤東要進一步改變大學，就「打倒」當時所有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學共產黨黨委負責

人的共同命運。他在死前遭到那麼殘暴的對待，則部分是當年他也參與過的反對「溫情主義」的結果。他的死，是共產黨人被共產黨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說：「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這顯然是當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學當局的說法。這本《北京大學紀事》沒有記載顧文選講話的具體內容。但是，儘管江隆基和北京大學當局說顧文選「捏造」事實，他們自己顯然都沒有調查過顧文選所說是否真實，因爲顧文選和周鐸下午在會上說話，當晚江隆基就提出譴責和警告。當江隆基這樣說的時候，當然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對顧文選所說的事情作過任何調查。也就是說，江隆基知道，顧文選所說的是不是事實，根本不是他需要考慮的。

文革中江隆基遭到攻擊並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時候，他很快就自殺了。這不但是因爲他遭受的「鬥爭」太野蠻太殘酷，也因爲他不抱希望，不會指望上級最後會調查清楚他的「問題」——他確實並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他早就清楚地知道「運動」是不講道理不講邏輯不講事實的，他自己在北京大學就對 700 多個「右派分子」這樣做過了。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 1957 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這樣的年輕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當時只是由於智力不夠而沒有意識到也不能預測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他人的無情攻擊作爲他的人生戰鬥理想和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爲作了這場殘酷「革命」中的失敗者和失意者才絕望，還否定了他自己也曾經參與的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

文革後，在非正式的談話中，有人把江隆基這類人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看作他們在早年以同樣方式對待別人的行爲的「報應」。這只能當作受害者無處表達冤屈也不能指責害人者時採用的一種說法，而不能當作事實，因爲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負責幹部，並沒有遭到類似懲罰。

江隆基在文革開始後遭到粗暴攻擊，也根本不意味著他曾經害過的人得到了伸冤的機會，更不意味著他對別人的迫害被否定，而是在被稱之爲「繼續革命」的文革中，被迫害的圈子大大擴大了，於是原來的害人者，很可能轉化爲受害者。

江隆基的悲劇，是與顧文選的悲劇相關聯的另一類悲劇。革命的車輪用人血來潤滑。一度在車上領導革命的人，也會被拋下車去碾死。江隆基在這方面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文革中，這樣的人爲數甚多。

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顧文選的死之間，仍然有邏輯上的強烈聯繫。是從 1957 年的迫害出發，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 1957 年把「一絲絲」的「溫情」都痛加批判之後，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的。也是在那些迫害的人在 1957 年後得到提升，才有更多的人充當迫害人的先鋒。在 1957 年的大學，就為文革準備好了迫害人的思想以及進行迫害的一類人。正因為如此，1966 年 6 月，文革的一切都好像水到渠成那樣開始了。儘管文革如此反文明反傳統，但是文革啟動的時候並沒有遇到阻力和反抗。

### 周鐸的悲慘遭遇

周鐸是在 1957 年 5 月 25 日和顧文選一起在「控訴會」上講話的人。筆者雖然沒有能找到認識顧文選的人，但是採訪到多位知道周鐸的人。周鐸的故事也十分悲慘。

周鐸出身於南方鄉村，1949 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英語。1951 年，周鐸還沒有畢業，就被調到公安部門當翻譯。因為當時公安部門抓了一批外僑，指控他們是「外國特務」，審訊這些人需要英文翻譯。從清華大學外文系調去了兩個學生，周鐸是其中之一。在公安部門工作的時候，他看到了審訊中打罵和用刑等黑暗現象。

周鐸不喜歡在公安部門作這樣的工作，要求復學以學完大學的課程。但是，清華大學的文理法專業已經在 1952 年「院系調整」的時候被取消了。他當然不可能回到清華大學外文系，於是在 1954 或 1955 年，到了北京大學西語系繼續讀書。

周鐸曾經私下告訴他的同學和老師，他看不慣公安部門打罵僑民和對他們用刑的做法，所以離開了公安部門。上面提到的西語系的黃繼忠老師聽說了以後，認為國家機關這樣無法無天，是嚴重的問題，請當時的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先生往上反映。馮至先生是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當時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據說馮至先生讓周寫成書面材料。他寫了，後來又在會上講了這些。

5 月 25 日的會是在北大辦公樓的禮堂開的。聽的人很多。顧文選和周鐸的講話內容在聽眾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沒有去參加會的人，也聽說了這個會議。

因為和顧文選一起講話，周鐸被劃成「右派分子」中的「極右分子」。對他的處罰是「監督勞動」。他被「監督勞動」四年後，在 1961 年恢復學籍，回到北京大學西語系，和 1957 年入學的學生一起繼續學完功課。1962 年畢業後沒有分配到工作，在北京大學的工廠勞動。

文革開始後，北京大學在北京最先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他一直在那裏「勞改」。他被強迫縫了一個黑袖套戴在衣服袖子上，上面寫有白字「右派周鐸」。

1968 年，周鐸被關進了北京大學的「監改大院」，也叫「黑幫大院」。那是北京大學文革當局建立的校園監獄，位於現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館的位置上。這個監獄關押過 200 多人，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所謂「牛棚」之一。在那裏發生了大量殘酷而醜惡的事情。

曾經被關在那裏的一位教授告訴筆者，在「監改大院」裏，周鐸挨打最多。他的褲子上總是沾滿鮮血，非常可憐。看守的紅衛兵經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是疼的。

在「黑幫大院」裏，看守的紅衛兵學生還常常把周鐸當作尋開心的對象。空閒的時候，就大叫「周鐸，過來。」周鐸走過來後，站著，他們用棍子打他的兩隻腳。他們打一棍，周鐸的腳縮一下，他們又打一下，周又縮一下。他們從中取樂。有一次，騾車拉東西。飲騾子的時候，看守的紅衛兵叫周鐸和一個法律系的教授，像騾子一樣套上車拉著車在院子裏來回跑，他們則把這當熱鬧看。

另一位一起被關的教授說，周鐸可能裝瘋賣傻，也可能是真的。那時候通常只給「牛鬼蛇神」吃窩頭，不給吃饅頭，但是有一次有饅頭的時候，周鐸也只吃窩頭。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有罪，只吃窩頭。早上很冷的時候，他起床後拿著一本毛語錄，站在門外一個鐘頭，一頁都不翻，發呆。他從地上揀柿子皮吃，揀土塊吃。這個人的故事可以寫一本叫《狂人》的書。他也可能有一點裝。被迫害得沒法子了，不能反抗，只好這樣。

在「監改大院」裏有「監規」：不准互相談話，走路不准抬頭。所以這兩位教授都不能和周鐸談話。他們不能確定周鐸是裝傻，還是長期的折磨已經造成了他嚴重的精神問題。但是周的健康問題是十分明顯的，他失去了幾乎全部牙齒和頭髮，瘦弱不堪，面無血色。

在全校性的「監改大院」被關了 1 1 個月以後，周鐸和西語系的其他「牛鬼蛇神」被從那裏轉押到西語系的「牛棚」中。當時西語系在 4 1 樓關押了一批人，其中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教授，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還有兩個很年輕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他們睡上下床。周鐸睡在進門後右手邊的上鋪。睡在他下邊的，是老教授朱光潛。

當時有一個監管這些「牛鬼蛇神」的西語系學生，非常兇暴。這個人進門，從來不用手推門，而是一腳踢開。他進門後，全部被關的人都要站起來。這個人開門用腳踢，每次進門以後就轉向門的右邊，甩開膀子狠打周鐸幾個耳光。

「牛棚」裏的人看到周鐸天天被打，毫無辦法，只是後來按照這個打人者的姓名的諧音，起了個外號叫「暴徒」。很多年後說起這件事情，北大西語系的兩位老師氣憤難平，說，周鐸被折磨死了，「暴徒」現在卻活得很好，他半夜的時候不覺得有愧嗎？

北京大學物理系的李淑嫻老師在1957年也被劃成右派，她因此被送到北京郊區門頭溝區的農村勞動。她說，她在西語系「右派分子」勞動的馬蘭村看到過周鐸。周鐸臉虛腫，走路腿癱，一拐一拐的，頭髮也快掉完了。那時候正是「大躍進」，農村搞「大深翻」，把土地深翻到有兩三鐵鍬深，不但把生土翻上來蓋住了熟土，對莊稼只有壞處沒有好處，而且把人累得要死。「右派分子」要想「摘帽」，就要拼命「表現好」，既要勞動表現好，又要政治表現好。因此，甚至在「右派分子」中，也沒有人理睬周鐸，因為覺得他「問題大」，「控訴」了共產黨，對共產黨「沒有感情」，和自己「不一樣」。

文革給被「鬥爭」的人「定性處理」的時候，周鐸從關押中被釋放，居然還被稱為「寬大處理」。掌管北京大學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召開全校的「寬嚴大會」，以體現他們執行「黨的給出路的政策」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沒有被戴上手銬抓走的人，定上不同的罪名，允許回家，就算是「從寬處理」的。周鐸也列在其中。自從被劃成「右派分子」，他受盡了各種各樣的迫害，他的生活都被「革命」榨取了，最後還不得不扮演一個甘心認罪、感謝被「寬大處理」的可憐角色。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徹底的殘忍。

周鐸當時身體已經非常壞，他在被「從寬處理」後離開了北大，不久後就死去了。他沒有結婚，沒有家庭。現在無人能提供他死在何時何地。

#### 橫斷面 IV 顧文選在「肅反」中的遭遇

在1957年5月25日的「控訴會」上，顧文選說了什麼？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未作記載。

筆者查到，1957年7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文章題為「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作者署名是「閔剛侯」。這篇文章裏提到的事情，和顧文選及周鐸有關。

這篇文章是在「揭發」6月6日章伯鈞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談話。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鈞說了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後，費孝通首先說現在大學的學生都動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運動揭露出來多次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二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內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現在學生到處找領頭的，如果老師加上去，事情可以鬧大。當然

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說，今天的問題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造成的。

這篇文章裏說的北大二個學生，當是顧文選與周鐸。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強化了費孝通的批評口氣以作為費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顯的不符合事實的報導。我們難以判斷是否費孝通在其講話裏真的用了「黑暗」這樣的詞。從後來實際發生的事實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們的眼睛，而且剝奪了人們的生命。但是在當時，誇大人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批評的激烈程度，然後以此為理由給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別是因為不允許自我辯護，所以各種誇大性的「揭發」相當容易發生。不過，我們可以判斷費孝通在講話中，是確實提到過顧文選的。我們也從中知道，顧文選和周鐸在1957年5月25日所說的，是關於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被「錯鬥」，像費孝通這樣一個年齡大閱歷深的人也深受感動，可見顧文選和周鐸的演講相當動人。

費孝通和顧文選一樣，都被劃成「右派份子」。對於「右派份子」的處罰，權力當局的做法是，對原來地位高名氣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氣小的人實行的處罰較輕。費孝通是從有名的教授成為有名的「大右派」的。對這些教授的處分一般是降薪降級，還留在學校裏。比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向達教授，原來是一級教授，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降了一級，成為二級教授。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教授是從一級降成了三級。而大批成為右派份子的大學生，他們常常被輕蔑地稱為「小右派」，由於他們的一次發言或者一張大字報，被送到勞改農場，精神上物質上都被踩到最底層。

1956年以後，大學教師的工資就幾乎沒有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時候，那些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遭到降薪降職的教授的收入，相對來說仍然不算低。這甚至成為他們在文革中受到打擊的一個原因，因為在學校裏工作的比他們年輕的人，工資大大低於他們，對他們心存嫉妒和怨恨。

費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華研究院，1938年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40年代任教於西南聯大，1957年時是中央民族學院教授。1957年，費孝通因為發表「知識份子的早春氣候」，是當時報紙上受攻擊最多的「右派份子」之一。他成為「右派份子」後，仍然在中央民族學院。在文革中，費孝通也被「鬥爭」，進過校園「勞改隊」，住過「牛棚」。文革後，「右派份子」被「改正」，他擔任很高的職務，也常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各種文

章。但是始終未見他寫到他所經歷的「反右派運動」，當然也沒有再提到他當年講話中說到的顧文選和周鐸。1957年，聽顧文選說在「肅反」中被「錯鬥」，費感到震動，說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頗動感情的話，也在道義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顧文選被槍斃。可是，文革後，費孝通可以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卻不再為顧文選的遭遇說任何話了。雖然言論環境變了，但是費孝通也變了。即使壓力撤去，被壓抑的心態不能像彈簧那樣恢復原狀。

顧文選已經被槍殺，再也沒有可能來說出他後來的更悲慘的遭遇。活著的人如費孝通，有親身經歷，對當時的事件發展，從「右派份子」的角度有清楚的瞭解，同時又有寫作的的能力，是應該寫出他的見證的。他沒有寫，可能有各種原因。但是他是應該寫的。2002年春天，筆者兩次給他寫信，告訴他筆者正在撰寫關於顧文選的文章，向他詢問有關顧文選的情況以及他對當年的事件是否還持有原來的看法還是有新的看法。非常遺憾，至今沒有收到費先生的回信。

#### 片斷 V： 顧文選在「肅反運動」

##### 中找不到的《廣場》雜誌

據北京大學的一名和顧文選在同一時期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學生陳奉孝說：

顧原來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搞了一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那時顧在公安局裏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五六年共產黨也覺察到了肅反有點擴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顧被放出來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語系。他在控訴會上以個人的遭遇，對「三害」進行了控訴，與會的老同學聽了以後都哭了。後來他的這次發言，百花學社為他出了專文，取名就叫《一個人的遭遇》。（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印入《沒有情節的故事》，497—498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北京，2001。）

陳奉孝1957年時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劃為「右派份子」後，被判刑15年。筆者多方輾轉找到了他。他說，顧文選的文章印在百花學社辦的雜誌《廣場》上。這個雜誌僅僅出過一期。他現在沒有這份雜誌。

筆者開始尋找這一本載有顧文選文章的《廣場》雜誌。尋找過程的難度超出了筆者的預想。筆者曾經和其他像顧文選、陳奉孝一樣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北大學生聯絡，他們都沒有這份雜誌。筆者向北京的兩所大學圖書館尋找，未找到。筆者曾經給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寫信求助，沒有結果。

這一本《廣場》雜誌，曾經是北京大學一批學生被劃成「右派份子」遭到嚴重懲罰的「罪證」。在當時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被判刑15年的判決書上，支持《廣場》被列為她的罪行之一。然而，這份雜誌本身卻再也找不到了。現在我們卻無從知道這本雜誌在哪兒，裏面有什麼，儘管很多人因這本雜誌受苦甚至死亡。這甚至帶給人一種荒誕感，像卡夫卡的小說。然而，這是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最後，終於從住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那裏得到了顧文選的這篇文章。1957年，林希翎女士是北京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學生。上文已經引用過她成為「右派分子」後再被判處15年徒刑的判決書。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批評「肅反」中對人的迫害。兩天以後，顧文選在會上講了他在「肅反運動」受迫害的親身經歷。但是，實際上林希翎並不認識顧文選，甚至也一直不知道顧文選的名字。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的這些大學生，其實是一些散在的個人，他們之間並無聯絡。甚至直到21年後他們得到機會恢復名譽之後，「右派分子」們也沒有為他們的共同命運和歷史作過多少書寫和記載。但是另一方面，掌握無比權力的強有力的政權，把他們作為一個敵人群體而加以無情打擊。

《廣場》上的顧文選的文章有14頁，標題是「我的遭遇」。雜誌是近50年以前用手刻寫在蠟紙上以後油印的，現在已經字跡模糊，但是勉強可讀。

顧文選的講話以一首詩開始，說明他的心跡，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只是反對共產黨裏的錯誤。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我以為時間，這浩蕩長流回把它沖洗乾淨，  
那時我將和過去沒有創傷時一樣，  
在生活中享受著愉快和平靜，  
可是我沒有力量擺脫那慘痛的記憶，  
市場在寂靜的黑夜中被噩夢驚醒，  
受了創傷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寧，  
腦海裏不時纏著鏽鏽的聲音。  
我們的時代是個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著片片黑雲，  
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  
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  
我不能再沈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  
請人們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乾淨。

顧文選自述，1949年時他15歲，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他參加了共青團，以後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裏的領導人就佈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

顧文選認為他的悲劇在於「過分心直口快」，「太單純，太忠厚」，所以被領導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

至於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只是他練習寫作，寫了兩篇小說，其中一篇寫了農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進城後遺棄原妻。僅僅為他的「反動文藝思想」，就鬥爭了他一整天。

顧文選被連續鬥爭幾天以後，因為他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打電話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一個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他被關了四個月。

顧文選說，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約。

顧文選還說，監獄裏的飯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

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裏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實情，不會一分造假，可以調查。

從法律的角度看，即使顧文選的描述有不合乎事實的地方，也不是犯罪。另外，這些描述看起來是相當真實的。這也是當時連費孝通也受了感動的原因。儘管北京大學當局說他捏造事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57年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牛鬼蛇神」所遭受的，比顧文選所說的還要壞得多。監獄的伙食還要差，對在押犯人的虐待還要嚴重，逮捕和判決的程式破壞得更多。從1955年到1970年代，迫害人的制度越來越嚴酷。

顧文選僅僅講了他一個人的遭遇。我們卻可以從別的材料來瞭解「肅反」是怎麼對千萬人進行的。

肅反的指導性文件之一，題為「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這個「規定」上署明的發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這個「規定」中，在分條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為「反革命份子」的類別以外，有一條說：

「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的份子。這種人可以不計算在5%左右的壞人以內，列入審幹範圍去處理。」

這條規定，很清楚了從側面證實了每個單位是有5%的打擊對象的定額的。

一些參加了「肅反」的人們向筆者描述說，當時各單位都成立了「五人小組」領導「肅反」，都是要湊夠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嚇，要抓出足夠的「反革命」數字來。這裏有來自上面的領導機構的壓力，也因為本單位裏有的人要趁機積極立功。

要注意到，在1955年進行的這一場「肅反」運動之前，已經有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官方公佈的資料：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關押各種反革命份子27萬，管制23萬，處以極刑（殺）71萬。」（《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馬宇平，黃裕沖編寫，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37頁）。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說的則是殺了100萬。

「鎮反」殺人，也是定好了比例來做的。毛澤東有「關於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的說法。此話引自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頁，文章題目是「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書中說明寫於1950年5月。

《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北京，華齡出版社，1993，277頁）中有這樣一段話：

1951年5月10日至16日，「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根據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報告及毛主席的指示，於15日通過《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並經中共中央批准發至中央局及省市、區黨委。

這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說：

各地殺反革命的數位，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為宜；對黨政軍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內部清理出來的應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處決十分之一二為原則。（上引書同頁）

這段文字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同一段文字，只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少了關於殺人比例的句子。農村可殺1%，城市可殺0.5%，不太可能是公安部長羅瑞卿這樣的人在毛澤東的原文中加進去的，而只可能是在26年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因其殺氣太凶、邪氣太外露而刪掉了這些殺人的百分比。

制定比例來殺人，意味著不必有罪證也不需要經過審判。而且，1%和0.5%是巨大的殺人數字。在殺了這麼多「反革命」和關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後，還要進行一次全民性的「肅清反革命」。為此，全國竟然有75萬專職肅

反幹部，作了 328 萬人次的外出調查（同上書，740 頁）。

「肅反」動員的人力，除了任用 75 萬專職幹部，還要加上所有以開會等等形式參加的普通工作人員。「肅反」人力消費非常龐大，用掉的經費也一定極其可觀。

這些數字的來源，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報告，題為《我國肅反鬥爭的成就和今後的任務》。他顯然是「肅反」以及在更早時候進行的「鎮反」的指揮官。

爲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壞人」，「審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一書中，關於 1955 年到 1956 年的「肅反運動」，作者朱正指出，當時每個單位都按照統一部署，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在本單位選定運動對象。爲了「造聲勢」，還選出一些人來逮捕，造成運動所需的緊張空氣。他根據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在「肅反」中被整肅；當時全國的各種機關團體學校企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共計約 670 萬人，在這些人員中，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肅反對象。「鬥爭面」就是這樣寬泛。（256—261 頁）

在上面引用的顧文選的《我的遭遇》一文中，他自己以爲他沒有「問題」，不會成爲「肅反」的對象，但是他卻在「肅反」一開始就遭到「鬥爭」，顯然是因爲要湊夠 5% 的比例，必須找出新的「鬥爭」對象。顧文選也是由「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命令逮捕卻不需要有逮捕證的。

「肅反」打擊了太多的像顧文選那樣的人，因此，在 1957 年，批評「肅反」成爲所謂「右派言論」中比較多見的內容之一，後來也成爲劃定「右派分子」的罪行之一。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中專門規定了一項：「攻擊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鬥爭」的，應劃爲「右派份子」。這樣，顧文選就被牢牢框住了。

應當指出的一點是，控訴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實從根本上懷疑否定這個「肅反運動」，是有所不同的。從現有材料來看，顧文選並沒有從整體上否定「肅反運動」，而僅僅是揭露了「肅反」中的「問題」。但是，當時這就成了嚴重的「罪行」。這當然是因爲最高當局不允許對「肅反」提出批評。同時，我們也可以由此知道，當時沒有人從整體上反對「肅反」，沒有人作深層的否定，於是大學生顧文選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鋒人物，也就最先被擊中。

把社會中的一個很大數字的人群，劃出來進行「審查」，隔離審訊，再從中又劃出一部分作爲受到永久性處罰的「敵人」，這樣的做法，幾十年來不斷實行，以致有的中國人已經把這樣的做法視爲像颶風下雨一樣的常態，不從根本上去質疑和反對。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古今中外，這樣一個由當權者制定比例和數字來打擊殺戮人民的做法，只有史達林作過。

## 羅瑞卿文革被「鬥爭」

主持「肅反」的羅瑞卿，1906 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學時代參加共產黨，「鎮反」「肅反」「反右」運動時期任公安部長，並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中央軍委秘書長，成爲軍隊的最高權力圈中僅次於林彪的人物。後來被毛澤東確定爲文革的頭一批打擊對象，所謂「彭羅陸楊」中的一名。1966 年 3 月在高層被清洗後，立即被關押。他在 1966 年 3 月 18 日跳樓自殺，沒有死，但是摔斷了腿，後來截肢。

大規模的學生群眾運動興起以後，羅瑞卿從秘密關押變成了由群眾「鬥爭」。1966 年 12 月，羅瑞卿脖子上掛著大牌子，被裝在一隻籬筐裏，拖到北京的體育場裏，和其他「反黨份子」一起遭到紅衛兵的「鬥爭」。他被裝在筐子裏，是因爲他的腿在自殺時摔斷，不能走路。

這種所謂「大會鬥爭」，除了咒罵以外，還包括體罰和毆打。在十萬觀眾揮舞紅色塑膠封面的《毛主席語錄》高喊「打倒」之聲中，拖出一個裝在籬筐裏的斷腿人來作「鬥爭」，實在是文革最無人道最爲野蠻的場景之一。而且，文革時代的攝影作品還將此作爲正面的畫面來記錄，這是在醜惡之上又加了一層醜惡。

使人吃驚的是，被裝在籬筐裏遭到「鬥爭」的人，對於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認，但是對他自己曾經發動的對幾百萬人進行過的與此類似的「鬥爭」，至死也並未覺得不安。在 1990 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兒寫的關於他的書裏（《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羅點點，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 年），細膩深情地寫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麼不公平，卻一字沒有提到他曾多麼殘酷地對待千千萬萬別的人。這本書並且熱情讚美羅瑞卿在「鎮反」「肅反」中的作用，而這兩個「運動」害死了無數人，傷害了無數人。

對羅瑞卿的個人歷史的這種描述，顯然表明這本書的作者只認爲：她的父親是不該受到那種野蠻的「鬥爭」的，但是他對別人所作的類似的事情，則是完全不必質疑的。這是從個人利害關係爲中心對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斷，沒有道德和邏輯的基礎。這樣的描述中隱含的原則是非常有害的。

毛澤東死後，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中，除了爲文革和「反右派運動」的受害者平凡，也爲一部分「鎮反」「肅反」的受害者平反，卻沒有對作惡者進行道義譴責。

## 最後一個橫斷面：在阿 Q 群體之中

這是跟顧文選有關又不直接有關的一個片斷。

在「公檢法軍管會」的「通知」裏說：「請各級革命委

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

也就是說，當時作這樣的判決的過程，在「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眾」「討論」的部分。至今有人認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許這種由「群眾」來討論，會被當作這種說法的重要根據吧。但是從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這種「群眾討論」的功能是什麼。

首先應該注意到，顧文選的主要罪狀之一是「反動言論」，但是材料中沒有介紹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關於這一點，當時還有一個特別的說法，把這種「反動言論」列作「防擴散材料」，一律不准復述。如果真的是要「群眾」來「討論」對顧文選的處理，那就應該告訴大家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不告訴「革命群眾」顧文選到底說了什麼，卻要群眾「討論」對他的處理，這根本不是真要群眾來參與定罪過程，而是恐嚇群眾，逼迫他們再也不敢講當局不准講的話，不敢說任何可能會被指控成「反動」的言論。為了免於受到顧文選那樣的懲罰，也沒有「群眾」敢對顧文選被重判提出異議。

在歷史上，也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和一個政權，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這樣嚴密的程度。他們不告訴人民這些人的「反革命」活動到底是些什麼，卻要求每一個人「表態」來支持殺死這些人。他們不但殺人，還要造成一個「眾口一詞」的形勢。他們用恐怖來塑造輿論，這輿論又反過來支持恐怖。

筆者採訪過的人中，有的曾經參加過「公檢法軍管會」要求「革命群眾」對這 55 人的「處理」作的「討論」。據他們說，「討論」的時候，一片聲音，都是「槍斃槍斃」。

三十年後，一位被訪者說：你能想像那時候北京人有多壞嗎？他們根本不把別人的命當回事兒。他們喊過「槍斃槍斃」，就趕快回家吃飯去了。

魯迅寫的阿 Q，在他自己被殺之前，曾經很興奮地去看殺別人的頭。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魯迅筆下的阿 Q，會興高采烈地參加「公判大會」，把別人被槍斃當作好戲看。

和顧文選同列於一份「反革命」名單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張郎郎，他當時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他最初也是「內定」要判死刑的。他告訴筆者，他曾經被戴上腳鐐手銬押到他的學校去，讓學校的人一一對他的「處理」表態；他的父親和 16 歲的弟弟也被揪來，站在台下，聽著會場上一片「要求」槍斃他的聲音。

讓張郎郎永遠不忘的是，黃永玉和劉迅兩位老師，聽說是要「討論」關於他的「處理」時，沒有出席這樣的會。據

說他們兩人裝病，以此為由不來學校。

黃永玉和劉迅，都是畫家。筆者在黃永玉三十年後寫的書裏找到如下一段：

郎郎在「文革」期間腳鐐手銬押到美術學院來「批鬥」，大會幾天之後分組討論槍斃不槍斃他。我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進門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時也要槍斃。我們默默地點了頭，說聲「保重」，擦身而過。那天雪下得很大，登臨到白塔山上，俯覽塵寰，天哪！真是訴不完的孤寂啊。（黃永玉，《這些憂鬱的碎屑》，三聯書店，北京，1998）

黃永玉的這段描寫，夾在介紹他的有趣的鄰里生活的描寫中，對於不瞭解當時的情況的人來說，可能會晃一眼就讀過去了，所以需要對當時的背景作一說明。

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顧文選一起被列於 55 個人的名單上的一個人，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外國語學校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顧文選在名單上名列第一，張郎郎和周七月兩人則被列為第二十九。他們的「罪名」如下：

張、周二犯思想反動，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仇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張、周二犯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並多次策劃叛國投敵。一九六六年二月，張、周二犯與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取得了聯繫，出賣了我國大量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

張郎郎和周七月後來被判刑十年。據張郎郎說，他們兩個沒有如預期的那樣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們二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級別很高，所以對他們比較「寬大」。

那個年代如此殘酷，所以不槍斃就可以被當作「寬大」。張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為他們曾經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派」學生，因為嚮往「革命」而來中國留學。法國學生回法國去了，和他們來往過的中國學生卻成為「特務」「反革命」被捉了起來並且判以重刑。

在「革命群眾」被命令討論他們是否該槍斃的時候，最有同情心的人如黃永玉，也只能是找藉口回避。這是當時最勇敢的反抗行爲了。而且，當時想要回避並且真的回避了的人，罕見得如鳳毛麟角。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恐怖的環境啊。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暗暗保持沈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義直言」「挺身而出」這樣的漢語成語在當時是無處可用的。

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殺害了無數無辜的人，而且還在強迫普通人如果不要做受害者，就要參與為害人者幫兇。

結語

透過以上六個片斷，對顧文選的一生作一個順時間的跟蹤，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1955年被粗暴地整肅了一次。他在1957年說出了他的不滿，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懲罰。他在1966年不能忍受而決定逃走。結果在1970年他遭到第三次懲罰，這次懲罰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什麼不滿與違抗，因為這是死刑。

在這三次被懲罰之間，是一種什麼邏輯？只有一種把人送上死地的邏輯。

1949年，顧文選是個僅僅15歲的少年，以後，他逢上了從「肅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他受到一次比一次嚴厲的迫害，最後被槍殺。他開始受迫害於「肅反」，他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關進監獄於「反右派運動」，他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槍殺於文革。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生遭遇？明明是一個毀滅人的過程。

而且，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孤立的命運。

顧文選經歷過的「肅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數字極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殘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擊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擊中垮了，顧文選經歷了第三次打擊後還不願倒下，於是被殺害。

在1955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有一百多萬人被整肅。其中有一大批人被關押判刑。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有50到100萬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在文革的各個「運動」中，每次通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打擊那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累計起來的數字，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文革使迫害的規模和程度達到了最高潮。像顧文選一樣被劃成「右派份子」又入了監獄繼而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槍殺的，僅僅在北京大學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589個學生中，還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學系的張錫琨，哲學系的黃中奇。

在文革中，連1957年迫害過「右派份子」的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江隆基，連領導了全國「肅反運動」的羅瑞卿，也都遭到殘酷迫害。前者在被殘酷「鬥爭」後自殺身亡，後者在跳樓斷了腿後又遭到殘酷的「鬥爭」。

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把人類的一部分宣佈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通過一系列預先設計的所謂「政治運動」，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群體，不是一個兩個人，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而是一個極其巨大的人數——人口中的一個百分比，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

這一系列的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是毛澤東的「革命」實體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嚴厲殘酷的行爲也保證了無人能夠反抗他的革命。文革延續了十年以上直到毛澤東死後一年才宣告結束。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上，可以與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迫害與殺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殺害猶太人，史達林殺害「古拉格群島」上的政治犯，以及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殺戮。他們的反人類罪行，都已經得到了相當詳細的記載和較為廣泛的瞭解。

在史達林、希特勒和波爾布特製造的這些殺戮中，都有巨大的人數死亡。被害者死去。而殺戮的指揮者，不把人當人，而只把他們當作可以碾死的一些螞蟻，只把他們當成一些統計上的數字。毛澤東特有的說法 and 做法，則是用百分比來制定打擊迫害的對象。仔細檢索了歷史，還不能發現這樣的統治者。

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非常遺憾，關於顧文選，筆者能夠收集到的只是一些這樣的片斷記錄。因此，對他個人瞭解極少，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也不知道他的性情脾氣。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方面資料不夠充分的情況對本文來說有可以原諒的一面，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個人的體質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實沒有對他的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命運是和一連三個所謂「政治運動」纏卷在一起的。是這三個「運動」，即「肅反」「反右」和「文革」，把他，還有千千萬萬的普通的中國人，推向苦難和死亡。

這裏考察的是顧文選一個人的遭遇。他作為一個人被無情地迫害死了。我們從他的故事感到震撼，因為我們也是普通人。

共 軍 飛 船 闖 虛 空

貝里斯 田 夫

共軍飛船闖虛空，月裏嫦娥躲深宮。  
目無長城億萬眾，不見兩岸各一中。  
不聞嚎哭江河湧，不問鐵幕禍無窮。  
靠槍欺壓何足用，得勢一時何威風。

# 貳 臣 傳 (下)

## 香港名報人卜少夫記實

### 生前編誅 欺世盜名

民六十六年七月，中共空軍駕駛員范園焱駕米格十九機投奔台灣，八月七日卜少夫撰文《凜然佇待破滅黑潮》說：「我們毋寧歡迎中共盲目瘋狂冒險來發動這場戰爭……這樣做正給大陸人民，特別是所謂人民解放軍一個表示自由意願、掙脫枷鎖的機會」。民六十七年九月一日，向百多位朋友發出徵稿函，要求撰文直率無顧忌地無保留地寫出他們印象中的卜少夫，不論捧或罵，好讓他在以後歲月中多一點自知之明，文章將結集出書定名為《卜少夫這個人》，藉作古稀紀念。對此，居正哲嗣居浩然評曰：「《卜少夫這個人》的徵稿以至出版，我從頭就不贊成，強迫友人說好話，把卜少夫說成聖人，有什麼意思？（註四十五）」

民五十八年，卜少夫因多次失職被迫辭去聯合報香港特派員職務，社方調資深記者李勇（名作家李猷生之子）赴港接替，「原因是過去多年香港發生許多重大新聞，臺北聯合報完全無法掌握，臺北的採訪工作者打電話去香港，找不到卜少夫，即使找到他也不問三不知……社方派我去香港，因我是廣東人，有香港居留權，與香港新聞界的關係良好，過去多年來聯合報的香港新聞都是我以長途電話與港方新聞界朋友聯絡得來的……卜少夫對我突然在香港出現十分不快，一再向我表示，他在聯合報掌權的兩個學生——劉昌平、馬克任故意刁難他，切斷聯合報供給的財路。我告訴他，劉馬兩人一向尊重他。為了表示我對卜少夫有助無害，我自動請纓為卜少夫審閱新聞天地與旅行雜誌的文稿，不收任何報酬，寫稿也不收稿費。某次聯合報大老闆王惕吾到香港，發現我在新聞天地辦公，他很不高興，便帶我去星島日報見胡仙小姐，讓我轉去星島日報掛單。王惕吾在一次晚宴上告訴我：卜少夫的新聞操守不好，臺北的人對他甚為不滿，原因是他

需索無度，私生活糜爛，並囑我不要與他走得太近，不要受他影響，因為胡仙小姐也對此人印象不好……有了星島日報及其附屬《快報》的關係，聯合報的香港新聞十分出色，然卜少夫對我的離去很不滿意，又質問我是不是他的學生劉昌平、馬克任搞鬼……卜少夫是新聞工作者墮落的典型，這就是王惕吾要我別與他來往的原因（註四十六）」。

民六十九年三月，高雄美麗島事件軍法審訊期間，卜少夫專程前往旁聽，並在新天上作出全力支持政府的姿態。同年五月發表〈大陸意外的三封來信〉一文（註四十七），聲言自己曾在與左派友人敘會時講過：「我是國民黨員，有五十年黨齡，國民黨並未對我特別優厚，公平說來，一生工作行事，我無負於國民黨，而國民黨有負於我……我堅守立場反共到底，燒成灰也反共，並不是為國民黨，而是為了自己的良知、人性、中華民族，也是求心之所安……漢奸變節者永遠心情上不甯靜，傅作義、錢昌照、杜聿明、鄭洞國以及喬震、繆雲台，他們的日子過得心安理泰而不內疚神明嗎？我有四十七年反共鬥爭的歷史，我能違背我的良知與人性嗎？……立誓與中華民國同生死、共命運，凡有利於共產黨的事絕對不做。」還誓言「我將永遠使中共芒刺在背、利箭穿心的（註四十八）」。又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上：「他媽的！老子一輩子都是國民黨，要命一條，老子不在乎！（註四十九）」。

### 僑選立委 鑽營失格

六十九年六月，《卜少夫這個人》第一輯出版，內收卜乃夫、徐天白等文章一〇六篇。同月，運動香港區增額僑選立法委員一職成功，老友陸鏗認為：「競選立法委員，自己出面去求，就未免失格了（註五十）」。

民七十年二月一日，至立法院（院長倪文亞）辦理報到手續，任內參加外交委員會，唯對僑政委員會甚為關注。有人問他是否會訪問大陸，答曰：「你卜大哥是刀槍不入的（註五十一）」。七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滯留大陸卅三年的四弟乃夫由於「全國人大常委、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從中斡旋得以持雙程證來港探親，卜少夫與妻天白至九龍紅磡火車站迎接。同月，《卜少夫這個人》續集由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推出，內收卜乃夫、卜幼夫等文章九十八篇。自新天第一八一一期開始連載日記〈我心皎如明月〉（止於停刊前一期，即第二四四一期（七十一年十月卅日），共十八年，五百一十三期），自言公佈日記是為了保持用筆不疏與留個記錄作檢討之用（註五十二）」，然而名記者李勇卻認為「把他起居、飲宴事全刊登在專欄，是讓外界知道他與港臺兩地各方的關係良好，甚至兩岸國共的權貴都爭相對他巴結，把他視為長者、尊者，對於一個這樣有影響力的人與雜誌，國府朝野豈可切斷他的

財源，豈可漠視他的存在？故有人認為此欄應改名為『我心狡如狐狸』（註五十三）」。

但從他人的賀壽文章與他自己的日記可知，卜少夫是個老奸巨猾、心術不正、心地狹窄、睚眦必報的小人。例如文壇前輩陳紀澄直指卜少夫「一派江湖作風，張牙舞爪，從來沒見過他沉思、靜默與深入想過問題（註五十四）」；十大傑出青年獎、中山文藝獎得主商岳衡直指，卜少夫為其個人利益，會「使用卑鄙無恥的手段（註五十五）」，明顯一例是因屢次需索新天廣告訂單未果而運用香港僑選立委身份在七十三年立法院七十四次會期施政總質詢對俞國華院長「嚴厲抨擊香港邵氏、嘉禾兩電影公司，一方面以台灣為其電影發行賺錢的市場，另一方面卻不肯把戲院租給我忠貞僑胞作為慶祝國慶的場地，使敵人譏笑我們無能、窩囊，使香港反共愛國同胞懷疑我們懦弱、挺不起腰桿，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府？說到激動處，聲淚俱下（註五十六）」。至於在生前自編誄辭集《卜少夫這個人》，是為自己身後品評定下基調，意欲修補自己污跡斑斑的人格，以酒肉來堵住史家的悠悠之口（註五十七）。卜少夫的摯友劉紹唐一針見血道出了讓劉紹唐掛名「編者」出刊《卜少夫這個人》書的目的乃是「拿『少夫謹註』來修理他的朋友（註五十八）」。對於在徵文中對卜少夫稍有微詞者，他一定以牙還牙，加倍報復，諸如老作家司馬璐只因為在徵文中說了一句卜「在文化圈內是一位山頭主義者、派性主義者，對於異己（自由主義者）總保持一定的戒嚴狀態」，便即刻在同頁「少夫謹註」中辱罵對方「曾在延安棗園受過中共特務訓練」，反誣對方「是冒充假貨，是打著自由主義招牌的兇手暴徒（註五十九）」。中央日報在台灣編印報史時漏列三十年前卜少夫在南京做過兩個月總編輯，他就以「少夫謹註」欄抨擊今日央報的有關負責人員「是否能個個忠於以『馬老師』星野所擬定的新聞記者信條（註六十）」。特別將曾執教新聞學的馬老師三字加上引號以示醜詆，老師學生一齊罵，其沽名釣譽一至於此。曾做過福州市長的老友嚴靈峰在徵文中說他牌品和技術都差勁，他即在「少夫謹註」（見註卅二：）反唇相譏曰：「靈峰的麻將技術也不高明，怕老婆卻很出名」，甚至一竹篙打一船人曰「人們都說福建人，尤其是福州人很可怕，很難結交」。他與高陽極少約會，但卻念念不忘「在來來大飯店樓下吃宵夜是他介紹的，然而付帳的不是他而是我（註六十一）」，其吝嗇可見於此。連他的老鄉馬鶴年都指摘他「像一輛無軌列車，到處橫衝直撞，隨時為其本身作秀（註六十二）」。

民七十二年三月廿二日，買了中航機票卻又虛幌一招乘華航班機陪同四弟乃夫飛往臺北，以人事關係疏通當道，破例（乃夫在港僅居住不滿三個月）辦妥定居台灣手續。七十三年二月，連任僑選立委，九月廿一日在立法院質詢時對政府

建言「應採取樂觀態度、積極的做法，使中共即使能取得香港，亦要使香港成為共產制度、共產主義的虧累、包袱、禍害，甚至為其攻心致命之患（註六十三）。同年發生港人梁偉強劫持英航客機降落臺北中正機場案件，卜少夫到處奔走呼籲，聲援營救，旨在樹立一個為港人排難解紛的形象。」

民七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旅美政論作家江南在紐約寓所車房被暗殺，迄疑兇陳啓禮等人被捕後，卜少夫猶在新天發表〈小人物狂想曲的悲劇〉一文，曰：「命案尚且未破，然而先咬定是國民黨幹的，越來越不會有人相信。仔細研究趙浩生、傅朝樞，何嘗不是劉宜良一票貨色，利用夾縫、投機取巧、出出鋒頭，幻想海峽兩岸都吃得開（可惜他們的條件不如李政道、楊振甯、丁肇中，連陳香梅那一套也沒有）。結果不僅未邀得紅朝特別恩寵，另一岸也可望不可及，上不了岸。一個人沒有氣節、倒戈、漢奸、背叛，經常會生活在良知交戰中，他們的日子過得泰順嗎？夜夜睡得安寧嗎？」「一個人說不到什麼學養，更談不上知識份子良心，而一心好高騖遠，不擇手段地獵名，企圖滿足個人虛榮，當然有利可圖，亦不放棄。這樣的一個腳色，遇到偶然的不幸，而將他扮成政治思想上的一個『鬥士』、『烈士』，實在是一種很滑稽的事（註六十四）」。對此，卜少夫的旅美營商友人孫錦昌斥之為「臺北出政治宣傳上的需要，必須有卜少夫這樣名氣的人，才能減少海外知識份子眾口同聲對臺北政府指責的壓力。海外許多人對卜少夫這篇文章頗不諒解（註六十五）」。

#### 五十萬元 出賣靈魂

民七十四年一月，在臺北國軍英雄館主持「新聞天地創刊四十週年紀念酒會」，六月宣佈新聞天地四十年合訂本，十六開精裝一百冊將分四批出書，並向海內外徵訂。七月十五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對香港十一個論政專業團體的八名代表說，他歡迎同台灣有關係的人參加「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以開提出卜少夫、曾恩波、陳克輝的名字。當天下午，卜少夫對東方日報記者說，此事他要「考慮考慮，研究研究」，又對英文南華早報記者說「我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邀請，此事也不需要經過台灣方面的許可」，七月廿日，中立的信報評論曰：「許家屯果然是政治高手……這番急攻，使被攻者一時間反應失準，由此亦反應出右派人士在原則與策略上都很搖擺，心裏許多時還七上八下」，星島日報則說：「除了為其造就一時的見報率外，別無任何作用」。八月十四日，卜少夫在華僑日報發表萬言長文，表示婉拒出任諮委，卻又稱新華社方面「並非蓄意栽贓，施展圈套牢套」，文章還說：「我嚴肅地認為中國統一、中華民族未來命運都寄託於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還稱讚「許家屯

對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作了有益的貢獻」。八月十八日，萬人日報發表社論〈多此一舉的「反應」〉認為卜文「字裏行間流露了對中共的十足信任，乃表露意識形態上的認同」，社論特別強調，同被許家屯提名的香港時報董事長曾恩波對此挑戰嗤之以鼻不欲置評，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委陳志輝則正言厲色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表示今後決不再答覆這類無聊的問題(註六十六)。八月十九日，萬人日報又發表社論〈終身守節確非易事〉，指斥「那些沉不住氣的人，那些『趕搭巴士』的人，自然要被民眾所唾棄，落個晚節不終的惡名(註六十七)」。著名政論家、明報主筆徐東濱在八月十九日星島日報專欄中指出「其實卜少夫對記者說考慮之時，大概早已心裏有數，知道臺北當局無意讓香港國民黨人參加諮委會，而他自己也顯然無意退黨並辭去立委職，所以他說考慮乃是作打太極拳狀，並且作有自決權狀。可是他這作狀，姿態雖然美，後果未必妙，因為右派人士會笑他立場不穩，左派人士會笑他頭腦不清」。此時，耗用相當一筆投資影印的新天四十年合訂本出現乏人問津的窘局，蓋因大環境改變了，那批冷戰年代的國共鬥爭資料乏人問津，中華民國駐港機構僅新聞局的《自由中國評論》買了一套。長袖善舞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雪中送炭，以五十萬元預訂五十套分發大陸各省級圖書館，而出面開具支票的是某左派大型書店，卜少夫在感激涕零之下，作出了如上恭維許家屯與中共的言論。

然當時新天的主要財源仍在台北，故卜少夫表面上還裝出一副忠貞不貳姿態，民七十五年一月四日，他在新天第一九七七期上發表長文《枕頭為我作證》：「首先談中共購買新天四十年合訂本的問題。這個消息傳播最廣，是中共散發的，一些自以為施出這最惡毒的一招可以置我於死地的人在到處播放，意思是中共收買了卜少夫，卜少夫接受了收買」，然他又不諱言「新天印行四十年合訂本，香港有一些出版社來預約，我們也不管它是左或右的，當然一概接受……說預約新天四十年合訂本若干套就可收買了卜少夫，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啻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詭辯。七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他在新天發表長文〈謝謝許家屯先生的好意〉當可理解為他對五十萬元訂單的感謝，唯雙方當事人皆能切實理解其中微妙意念。

民七十五年十二月，卸除僑選立委職務，結束了兩屆六年任期。七十六年一月五日，臺北友人劉紹唐等假亞都飯店舉行「恭祝少老重返自由身」晚宴，此後行動逐漸偏離正道。七十七年六月，由新聞天地社出版《卜少夫這個人》第三集，仍掛名劉紹唐編輯，內收李荊蓀、喻舸居等文章一百零二篇，其中黃天心文章披露卜少夫對李敖的評價是「狂狷之士，非國家之福」，文後「少夫謹註」則強調「李敖的若

干行徑越出我們目前社會的規範，製造社會紛亂，也帶給社會不良的後遺症」(李敖在〈送李敖回大陸〉一文中直指卜少夫是文化特務，所以卜少夫長期耿耿於懷)。

### 逆流而動 秘密北上

民七十八年六月四日，共軍戒嚴部隊五個步兵師和三個裝甲團開入天安門廣場，鮮血染紅了東西長安街。西歐、北美、日本宣佈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制裁，中共面臨空前的危機。卜少夫逆勢而動，確定這是投共的最佳時機，能收一本萬利之效，他把經常掛在口邊的豪言「我卜少夫燒成灰也反共，燒成灰也是國民黨」以及悼念他的舊上司潘公展時所寫的「重要關頭，必須堅持原則與立場。兵荒馬亂，人心惶惶，風聲鶴唳，謠言四起，處身此種危急混亂的境地，冷靜第一，決不輕率衝動、受環境氣氛所眩惑迷亂而失去立身行事的準繩。安樂的日子與危難的日子，正常的日子與非常的日子，正是考驗一個人的意志與智慧的時機，一失足成千古恨，歷史上有太多這類事例了」統統拋到九霄雲外，「秘密從事促進和平統一之長流計劃」(註六十八)北上投共。七十九年十月，他由香港新華社安排，先飛上海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舉行會談，然後前往北京謁見鄧小平。據金堯如回憶：「卜老哥訪京之受北京高層重視和歡迎，在當年的港臺人士中，我以為是第一人(註六十九)」。事後他頻頻在鄉村飯店和金迅小廚的飯局中眉飛色舞地向舊雨新知誇耀「某公厚吾」。此時台灣在民主化路程上已邁開大步，李登輝出任總統後宣佈停止戡亂，隨後取消了黨政機構對海內外報刊的反共抗俄宣傳津貼，事實上僑委會、海工會、新聞局不可能再拂逆民意用巨額公帑資助一份在僑居地零銷量的二三十頁篇幅之微型刊物，卜少夫也確定已無植、滋養他六十年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不可能繼續充當搖錢樹的角色，所以新天的編輯方針從極右急轉極左。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卜少夫在新天發表〈北京道上人擠人〉一文，說「有人將台灣與大陸比喻為『與狼共舞』……現實情況中共不可能再像狼那樣殘虐了」，為自己業已擠入「人頭湧湧」的北上行列自辯，又說：「即使他們為了個人利益，總的來說，對於大陸如何都是有利的，對於大陸總是有貢獻的」，卻不談自己從中攫取多少利益而造成中華民國多少傷害。八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二八三期)新天刊出卜少夫會見中通社記者的專訪；八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第二三〇〇期)，卜在扉頁〈每週評論〉欄中撰文〈鄧大人，你要多活幾年！〉以中華民國法定機構「中華港澳之友協會」理事(會長張希哲)的身份竟向尚未停止戰爭狀態的敵人首領獻媚呼喚「大人」，委實有失國格與人格；三月廿一日在該欄稱「反正政府有錢，有八百億美金外匯存底；不用白不用，不拿白不拿」；同年

十月十日，在中華民國國慶日以社論叫囂「售戰機(指 F 十六 A/B 型機)給台灣——未免多此一舉」，此時他已完全站在中共立場反對參養了他六十年的中華民國政府。爲了取悅中共，自八十一年起，他經常以中共要人的肖像充當封面，諸如第二三〇〇期(八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二三五八期(八十二年十月一日)、二三七四期(八十四年二月一日)、二三九九期(八十六年三月一日)以鄧小平肖像爲封面；二三三三期(八十一年十月卅一日)、二三六〇期(八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二三七六期(八十四年四月一日)、二三八三期(八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二四〇七期(八十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四一八期(八十七年十月號)、二四三三期(八十九年一月號)以江澤民肖像爲封面；第二四一〇期(八十七年二月號)以朱鎔基肖像爲封面；第二四〇一期(八十六年五月一日)以他與周南合影爲封面；第二四一一期(八十七年三月)以他與張愛萍合影爲封面，以此表示他對中共的擁戴。

到民國八十二年時，雖然新天的員工已十年未獲加薪，作者已超過廿年免費供稿，但在競爭激烈的政論刊物市場連打字費都賺不回來，追隨卜少夫近半個世紀的李杞柳斷然離開了新天。李杞柳窮苦出身，十四歲到廬山日報當送報工人、排字工人，一九四四年廿一歲在上海進新天工作，從辦公室助理、發行員、校對，經刻苦自學，成爲資深編輯，以筆名狄夢嬌撰寫每週專欄〈香港屋檐下〉深獲讀者讚賞，以卜少夫付給的微薄薪金將三個女兒陸續送到美國留學成才，幼兒考入港大醫學院。他苦捱苦熬了卅五年，才因陸鏗建議，在版頭上取得「經理」名份。八十二年三月他向卜老闆要求十年內首次加薪，對方反問：「你兒子當醫生你還不夠錢用？」就此逼迫這位七旬老臣離職。四月一日起，新天改出月刊(第二三五二期)。民八十二年爲了搞錢，以八五高齡毛遂自薦要求樹仁學校監胡鴻烈讓他擔任新聞系主任，事爲樹仁校長鍾期榮博士婉拒。

八十一年六月再次北上，入住五星級的北京飯店(註七十)，廿二日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首都賓館會談。在感恩戴德下，於新天二三五六期(八十二年八月一日)撰寫社論〈祝李鵬早日康復〉，對國人皆曰可殺的獨夫民賊搖尾乞憐。同期刊出訪問記〈張學良想回故鄉〉，旨在趁隙給張學良捎口信：中共請張回東北訪問，瀋陽大帥府已經重修，是觀光勝地。可惜碰了軟釘子，趙四代答：四海爲家。

#### 見利忘義 赤膊上陣

自二三六七期(民八十三年七月)編發批判李登輝特輯起，新天對李總統的人身攻擊逐步升級，諸如卜少夫自撰的〈不是中國人〉(八十三年七月)、〈李登輝下臺，共產黨不來〉(八十四年十二月)、〈李登輝不是人嗎〉(八十五年二

月)、以「台灣籌安會」名義刊登〈擁護李登輝競選連任〉(八十五年三月)、〈選出假摩西必降災疫〉〈台灣不能成爲漢奸省〉(八十五年四月)、〈李登輝是袁世凱嗎？〉(八十五年五月)、〈總統府之賊〉(八十五年九月)、〈李登輝四大驚人毀壞〉(八十六年十一月)、〈李登輝既厚且墨〉(八十六年十二月)、〈李登輝的獨(毒)論〉(八十七年二月)、〈李登輝還要赤膊上陣〉(八十七年四月)、〈李登輝還要赤膊上陣〉(八十七年十一月)、〈解決台灣問題的幾個看法〉(八十七年十二月)、〈陳水扁的綠色恐怖〉(八十八年三月)、〈李登輝的搏命演出〉(八十八年六月)、〈李登輝李洪志父子關係〉(八十八年十一月)、〈連戰會成爲光緒皇帝嗎？〉(八十九年二月)、〈李主席的蛔蟲〉(八十九年六月)、〈李登輝放屁〉〈假如阿扁不是中國人〉(八十九年七月)、〈李登輝創國民黨祖墳〉(八十九年八月)、〈李登輝十二年一手遮天〉〈陳水扁是什麼人〉(八十九年十一月)、〈綠色恐怖來了〉(八十九年十二月)，罵國民黨，也罵民進黨，在朝在野統統罵，誰當總統就修理誰，後期陷於潑婦罵街格局。終於被讀者唾棄。

民六十七年長榮集團開闢歐洲航線未果，委託「記而優則仕」的葉建麗撰寫說帖式文章投寄新天，長榮老闆張榮發看了清樣盼能更改部份內容，當時版樣已排好，葉氏連夜致電香港，卜少夫破格見許葉去印刷廠改版。自民國六十九年卜少夫進入立法院後，預估具有日資背景的長榮集團潛力不凡，便在立法院蓄意造勢，逼迫交通部屢次修訂、增訂法規爲長榮暢開綠燈。此後長榮開拓航空事業，卜少夫盡皆全力在立法院爲其抗爭，所以自民國七十年起，長榮集團長期在新天刊登全版廣告，再加上華航、日本僑領李海天的東京重慶飯店廣告與嚴長壽嚴長庚兄弟的臺北亞都飯店廣告，新天即使零銷量也足以維持運營成本外加卜少夫本人的吃喝嫖賭支出，何況稿費零支出、員工薪酬長期凍結。民八十二年新天改出月刊後，長榮一直每期贈予兩個整版的廣告。可惜卜少夫晚年重用獐頭鼠目的李崇威，闖下一場大禍：八十五年八月(二三九二期)，新天刊出署名李申道的長文〈縱橫海空張榮發〉，且連載至十一月(二三九五期)，全文把長榮老闆張榮發的發家史挖掘得纖毫畢露，對張本人的人格品德極盡貶抑醜化之能事(註七十一)，作者李崇威本係華航一名低級地勤藍領，資料取自台灣本地的《財訊》等雜誌，創作意圖是想以打擊長榮與張榮發的聲譽來向華航高層邀功領賞，改變自己二十年不獲升級的窘況。可是張榮發絕不允許受他經濟資助的人吃裏扒外，經第二三九四期警告性暫停廣告後，二三九六期起徹底切斷了廣告訂單，結束了長榮對卜少夫將近二十年的「輸血」，此舉對卜少夫的事業打擊甚巨。然後，他祈求門生故舊、星島日報副刊主任何錦玲女士，安插

在副刊「星辰」版撰寫八百字專欄，自民八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起。何氏知其窮蹙，饗以星島最高稿酬，月付七千，這是卜少夫晚年主要生活來源。八十七年起藉口老病改為每週寫四篇，然仍有精力安排原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副主委查良鏞夫婦赴臺北與病中之蔣緯國見面。八十四年七月，將星島之專欄短文一百九十二篇結集，由何錦玲主掌之集成圖書公司出版，集成為臺北黨營正中書局之香港分支機構。卜少夫死前四十日在律敦滋醫院說：「我一生無錢，從未起過賺錢的念頭」（註七十二），卻絕口不談台北聯合報大老闆王惕吾晚年餽贈五百萬台幣一事，也不談嚴長庚、嚴長壽弟兄每年賜贈上百萬台幣之事。八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王惕吾病逝臺北，卜少夫撰〈悼惕吾〉一文，且至臺北聯合報大樓參加聯合報系主辦之「王故創辦人追思會」。六月廿四日假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新天創刊五十二週年紀念酒會，展出私藏名家書畫百餘幅，其後將十三幅字畫交付大陸官方的「中國嘉德拍賣公司」在北京拍賣，售出十幅，其中郭沫若之中堂、龐薰禛之素描各賣得三萬二千元。同月新聞天地社出版《卜少夫這個人》第四集，仍以劉紹唐掛名「編者」，內收金堯如、潘耀明等人八十一篇文章。此時灣景樓十五坪之居所書滿為患，意欲捐贈香港市政局圖書館，鄰居文友胡志偉電告：「大陸學術水平比香港高，但苦於經費匱乏，資料欠缺，香港次文化泛濫卻是個富裕社會。你贈書給市政局圖書館，他們藏書多得書架上擺不下要積壓於書庫，憑訂閱單復錢兩週後才能從書庫裏運到外借部門，普通書與館藏書重複的，前門送進可能即從後門棄置，到不若送給大陸高校，讀者會比香港多一千倍，更能促進大陸社會進步與學術開放，何樂而不為？」（註七十三）卜少夫聞言同意照辦，先擬贈送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正在籌建之現代文學資料館，後因對方要求卜少夫自付運費才決定贈予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屬下之中國現代文學館，九月廿四日由該館常務副館長舒乙（老舍之子）率資料室主任唐文一、編目組組長李家平三人專程來港接收贈書，打包裝箱，並攜具有司批文，從深圳口岸免檢運入內地。

同年十月五日晚十一時，妻子徐天白因心肌梗塞在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去世，年八十五。十九日，在北角香港殯儀館舉殯。喪禮結束後，作為「杖期夫」的卜少夫在居所旁之金迅小廚設「解穢酒」兩席招待送殯親友。席間，六弟卜幼夫借酒大罵何錦玲故意缺席（註七十四）：「何錦玲這個臭x，什麼東西！她也不想一想這集成書局經理的職位是哪兒來的？連他在星島的職位都是我二哥的面子，不然她能在胡仙小姐手下做到七十多歲？」污言穢語嚇得在場女賓盡皆花容失色，現場秩序大亂，餐館老闆與侍應勸解不成，卜幼夫愈罵愈兇，兩桌客人逃剩半桌，終於不歡而散。自始至終，卜

少夫坐在旁邊莞爾微笑，持老僧入定姿勢。赴席友人咸認為幼夫鬧酒係少夫唆使，亦即商岳衡所說的「卑鄙無恥手段」。

#### 面談共首 恬不知恥

同年四月十六日訪問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高慶璉）。周氏介紹職務分工時說：「我是偏重於聯絡上層人士的，像閣下這種人士就包括在內」，周氏表示中共對台政策比對香港更加寬鬆，連軍隊都可以保留，又何樂而不為呢？卜少夫介面道：「是的，真不知道台灣當局在想什麼？」其口吻全似中共幹部。

卜少夫常說：「士可以不弘毅」，但在三小時的專訪開場白中就諛詞畢露：「據我個人瞭解，周先生是香港新華社社長中任期最長的一位社長」。自稱在「比故鄉更故鄉」的香港居留了五十年的「老報人」居然不曉得梁威林執掌香港新華社二十年（民四十七——民六十七）；那一個被恭維的新華通訊社社長竟也答以「不錯！」（註七十五）這可以列為香港近代新聞史上的一則奇聞。

八十六年六月卅日下午，卜少夫與范止安、張孝權應邀出席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之慶祝香港回歸各項活動，七時酒會，九時晚宴，十一時政權交接儀式。七月一日出版之新聞天地第二四〇三期，已將中華民國年號改為西元，終於撕掉了最後一層偽裝。同年十月，由館長李準、副館長舒乙陪同，主持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卜少夫文庫」開放儀式。廿三日會見六十七年的老同學、退役上將張愛萍；對方贈以《張愛萍詩詞、書法、攝影選集》，旋南下，在上海衡山賓館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作第三次會談。

十一月十五日，在新聞局駐港機構——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持〈陳定炎高宗魯先生新書發布會〉，並致詞曰：「歷史公案永遠糾纏不清，爭議不斷，陳炯明孫中山蔣介石這件民初的恩怨事件，各有各的說法」，接著竭力讚頌陳炯明兒子陳定炎與高宗魯為陳炯明翻案的厚厚一冊《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孫中山蔣介石恩怨真相》，新聞天地十一月號特地刊登該書首發式的預告以及編者李龍鏞歌頌陳炯明的長篇文章，十二月號卜少夫日記又刊出十一月十五日晚陳定炎宴請卜少夫時卜所說的話：「令尊在天之靈從今以後應該得到安息」。「事後，此舉受到中山信徒批評，指卜少夫老而糊塗是非不分，有一些向來反共人士指他晚節不保，懷疑他被大陸統戰而轉禱（註七十六）」。

香港盛傳新華社共幹吝嗇成性，出外應酬從不付錢，但對卜少夫是一個專案例外，從民八十八年十一月廿七日至八十九年八月廿二日的卜少夫日記可悉，共方宴請他的次數多達三十次（註七十七），新華社台灣工作部部長邢魁山甚至有

一日宴請卜少夫兩次的記載。作為回報，卜少夫以退職僑選立委身份，透過混跡官場六十多年的人脈，大量填具大陸黨政幹部的入台擔保書，有求必應(註七十八)。「我未以僑選立委身份進入立法院之前，已和(境管局)馬局長打交道了……與他打交道，也方便了若干朋友急需入出臺灣，我擔保，他都 OK(註七十九)」。

此時，新天出現廣東肇慶製衣廠與左派船務公司的整版廣告。

八十七年七月，出席在香港君悅酒店會議廳舉行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研討會」，會期三天，與梁肅戎、林洋港、許歷農等人任主席團主席；九月下旬應邀北上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慶祝活動(包括國宴，閱兵典禮)，返港後在新天二四三一期發表〈留京七日〉一文，不勝欣喜。八十九年元旦，卜少夫為新天二〇三三號扉頁撰寫《迎千禧年》一文，提醒中共：「擺在面前還有一件大事未完成，那就是台灣在分裂狀態中」，還刊載〈李登輝對黨民主狗屁不通〉〈看不出國民黨是什麼東西！〉等謗文。

一月廿三日，到大會堂擔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分會」成立大會主禮嘉賓，與中共人大副委員長曾憲梓，莊世平，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李東海，中聯辦邢魁山等並排坐。

### 為虎作倀 恐嚇台灣

一月廿八日到香港會議中心出席中聯辦台灣事務部主辦的「香港各界紀念江澤民主席八項主張發表五週年座談會」。中聯辦主任姜恩柱先作引言，卜少夫輪到第五名發言，題為〈兩岸關係春暖花開〉，次日左派文匯、大公報刊出發言全文。卜少夫在日記中自述「鼓掌聲較多」，事後頗獲好評。二月十七日，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覲見中聯辦主任姜恩柱以及宣傳部長孫南生、台灣事務部長邢魁山。姜稱讚道：「少老在(廿八日)座談會上講話很精采」，卜少夫日記曰：「他還記得很清楚，來恭維我一次」。

新天二四三六期(八十九年四月號)刊出李崇威文：「李登輝狼子野心……李登輝並不希望中華民國千秋萬世」。

四月廿五——廿七日與中聯辦處長李逸舟同去深圳出席蛇口南海酒店出席全國政協、台聯、海協會、和統會合辦的「反台獨、促和平研討會」，發言稱「陳水扁就職演說是一套花言巧語，絕不會有真正的誠意、善意」，還和用這本行銷台灣的刊物嚇唬台灣人民「三顆導彈統一台灣：一顆攻臺北總統府，一顆攻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一顆攻高雄左營海軍基地，台灣軍力解體，台灣立即解放」。

八月，在新天二四四〇期上撰文〈北京道上有絡繹不絕之人〉，為自己解嘲：「密使是何等人物？密使有指派的，有自動請纓的」。同時刊登李崇威文章〈禁止台商為台獨作

俚〉，強調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何志明在中華總商會午餐會上演講，引述國務院台辦主任李炳才四月初的北京講話，指台灣一些工商界頭面人物「一方面在島內公開支持台獨，另一方面又在與大陸的經濟活動中撈取好處，這是絕對不允許的」，何志明又訓斥香港商人「應該知道怎樣去選擇合作夥伴」。翌日香港傳媒紛紛指摘何志明言論不當，有違自由貿易精神，特區政府行政司長陳方安生也表了態。李崇威文章反擊了香港主流輿論，指「台灣某一家後起的航空公司(指長榮)，完全由李登輝護航成立，亦是李之好友，一直是台獨運動的金主，更是陳水扁奉為上賓之人，現在更染指瓜分(港臺間)『黃金航線』，難道就可以由這一些人左右逢源嗎？為什麼何志明一句話就加上大帽子呢？我更希望全球華人共同抵制支持台獨的數典忘祖商人！」

同一期新天還刊登了李龍鏞給孔令儀的一封信(給孔大小姐一信)，稱「要從老院長的一生言行和政績去證明他對國家民族的種種貢獻，推翻以往那些不顧史實的講法」，作者寄去十八萬字頌揚孔祥熙的文章，乞求「面聆教益，刪除補正」，與新天五十多年前揭藥的反孔宋反豪門主旨明顯背道而馳(註八十)。

早在民八十五年春，卜少夫意欲放盤套現，曾讓擊龍劉紹唐放出空氣。傳記文學的作者、台灣名記者袁睽九聞訊躍躍欲試，擬集資三百萬收購新天，然卜少夫意猶未足，以致錯失良機，此後再也無人問津(註八十一)。於是於同年六月宣佈「凡是有人願意接辦新天，無條件讓出(註八十二)」。八十九年八月卜少夫病重時委託老友陸鏗作伐，「日前陸鏗電話中向我商量，說卜少夫想把一手創辦半個世紀的新聞天地送給李敖，由李敖接手辦下去。卜少夫說全世界只有李敖最信得過。我說《新聞天地》是卜少夫個人特色的雜誌，理應與卜少夫『及身而絕』，但他活得太久了，結果該絕而不絕，弄得只居餘氣。他的厚愛，我謝了(註八十三)」。

卜少夫夫人在新天二四四二期(停刊號八十九年十月)〈告別讀者〉一文中慨嘆新天「未能建立它的經濟上鞏固地位，人存政在，人亡政息……它既沒有出讓的條件，但有贈送的價值，我祇有一個選擇，我願意無條件的讓李敖來接辦，曾請陸鏗徵詢過，李敖無意，新天也祇好就此淡出了」。

### 吃盡當光 遺留債務

在新天二四四一期(八十九年九月出版)封二，卜少夫親撰特別預告：「下期為本刊告別讀者紀念特大號，亦為公開十年前秘密從事促進和平統一之長流計劃全部經過之密使特刊，請讀者注意」，八月十七日日記有：「與李崇威、卜凡決定十月號公開揭露十年前，我與何景賢博士二人共同從事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運動之長流計劃全部經過」。但二四四二

期的告別辭卻說「長流計劃由於好友們勸告，我也認為時不適宜，可留待將來寫回憶錄時再為發表」，卜少夫常說「事無不可對人言」，此事反復復，欲開口又噤聲，可見偷偷摸摸的事不可見於光天化日之下，乃大言不慚道：「當我決定公開長流計劃時，我即有譚嗣同當年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的慷慨情緒，有那種氣勢，主要在無愧無悔，可以對天大笑」。前文所指老友係新亞洲出版社老闆范止安(註八十四)。新天最後三年由李崇威擔任執行編輯，白字錯字甚多，令人不忍卒讀。停刊後李崇威企圖遊說金主投資，接辦新天，終未成事。

八十九年二月十日，老友劉紹唐病逝臺北，十三日在治喪委員會議上反對在劉紹唐遺體覆蓋國旗與黨旗(註八十五)。夏，因性肺炎先後入住臺北榮民總醫院、宏恩醫院。九月入住香港聖保祿醫院，旋轉律敦治醫院。

十一月四日凌晨四時許，預知天年將盡，趁護士不備，突然自行拔去喉管，且不肯進食飲水。上午十時卅分去世，終年九十二。十九日在香港殯儀館舉殯，移靈哥連臣角火葬場火化。

十一月十二日香港公正報、台中市台灣日報同時以整版篇幅刊出陳復中文章〈卜少夫富爭議性的一生〉，民九十年一月六日，美國新澤西時報與華報同時刊出此文，標題易為〈卜少夫左右逢源共通吃花天酒地的一生〉。

趙敏夫是卜幼夫少時的戰友，一九八七年入新天，跟卜少夫工作近十四年，編輯、總務無所不幹，「與我親如兄弟，新天大小齊事均由他一手料理(註八十六)」，然卜少夫撒手塵世時，欠下這個「親如兄弟」近一年工資以及遺散金。卜少夫臨死前兩年將臺北房產抵押給銀行，他留給未婚獨子卜凡的是一身債務，單是銀行抵押利息就是每月五位數。

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卜少夫的八十年老友張天心在美國因殺人被捕，八十九年四月三日被美國瑪利蘭州蒙郡法院宣判終身監禁。

卜少夫剛閤上眼不久，臺北就傳出，卜少夫投共之「長流計劃」的合夥人何錦賢妻(中央廣播電台前董事長)朱婉清，因涉嫌侵佔公款千多萬元被查辦，檢調人員傳訊她之後不到一個小時，她居然棄保潛逃，倉惶夜奔美國，現正被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

結語：靦顏事敵，晚節不終

據卜少夫的隔代誼女王虹透露，卜少夫曾告誡她：「世人都喜歡佔便宜的，只要你能吃虧，朋友便愈來愈多(註八十七)」。這就是卜少夫「相識滿天下」，死後猶能世盜名、假譽馳聲(註八十八)的根本原因。他以作者、編輯的血汗錢以

及販賣入台擔保書、勒索昏官奸商所得的黑錢頻頻宴請傳媒編記、議員、政客乃至黑道人物，從而製造口碑修補自己污跡斑斑的人格，以酒肉來堵住筆桿子們的悠悠之口，是因為他老於世故，看透了人性的普遍弱點：愛佔便宜。他常常吹噓新天是中國最長壽的雜誌，這祇能哄騙文化沙漠的年輕一代。老一代的人都知道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東方》雜誌早在上世紀初的一九〇四年就創刊了，比新聞天地年長四十一歲，至今仍在臺北營銷。然而赴過他酒宴的編輯記者，都不會追究這一豪語的真相，也不會深究「雜誌」一詞的定義，究竟一本二十多頁不公開出售的小冊子算不算雜誌？

他一生名利薰心，見利忘義。五十年前的中央日報泄密案就是基於這種圖利國家的心態——為了追求獨家報導獎金，不惜出賣國家外交機密，不惜牽連長官撤職、同事受審。他標榜反共六十年，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參養了他六十年，委實無負於他。到上世紀末，一見中華民國國勢挫弱便見風轉舵，轉投敵對陣營，靦顏事仇，賣主求榮，販賣入台擔保書，幫助中共輸送諜報人員入台，更利用新天這本罕有的香港輸台刊物，協助中共恐嚇台灣人民「三顆導彈解放台灣！」洎其晚年，出賣靈魂，認賊作父，奸同鬼蜮，狗彘不若。讀聖賢書，所習何事？

他晚年孜孜不倦於所謂「長流計劃」欲「促進中國統一」，不是著眼於中共政權改變專制獨裁政制、走向民主均富縮小兩岸民生、人權差距，而是在金錢驅策下單方面地為中共出謀劃策妄圖將台灣納入版圖，是為喪心病狂。他吃裏扒外，晚節不保，唯一自辯詞是：「今日的共產黨已不是過去的共產黨，今日的國民黨也不是過去的國民黨(註八十八)」，但誰也不能否定今日的中華民國在民主、法制的建設上遠遠勝於七十年前的中華民國，今日的國民黨人素質也遠遠甚於軍閥混戰的年代，他當年在國民黨內飛黃騰達時，何嘗不知國民黨的毛病——孔宋豪門醜聞就是由他與陸鏗爆出，而那時的共產黨還在「小米加步槍」階段，絕無貪汙賄賂醜聞，然他選擇了國民黨；如今國共兩黨打個顛倒，他反而選擇共產黨，這祇能表明他利令智昏、如蟻附膻、如蠅逐臭了。

## 來自湖南三青年

貝里斯 田夫

天安門前三壯士，霸王嘴臉亂塗脂。  
扭送公安無情義，反共民主眾人志。

編者按語：陳家驊先生是文藝界的一位前輩，也是中共法西斯文藝統治下，一位備受欺凌和迫害的老編輯和老作家。他的回憶就象是滲透了血淚，讀之足以顫抖人心；他的回憶也拖帶著時代的痕跡，甚至透著些許被污辱和被損害者才有的善良與荏弱之心……他在回憶那些為中共所迫害的共產黨自己人時，他的善良和荏弱，就不免要為那些在後來也曾遭遇赤禍的災難製造者們，仍然留下一掬同情之淚……而這，恰是我們今天在反思中，猶要予以注意的。因為，事實和明天，才是我們反思的真正目標所在。

## 從唐弢不完成

似乎刮起了有關魯迅逝世的一些掌故，聞之無法平靜，引起我的一想法和回憶。

一九九二年，唐弢先生在北京逝世時，我已於年前到了美國。友人傳來消息，他沒有寫出[魯迅傳]。我一個格愣，手中的紫茶杯震翻在地。長夜冥想，我的心彷彿百爪抓撓，痛苦萬分。

唐弢先生以研究魯迅為素志，苦苦經營了六十來年，陸續寫下了幾部有關魯迅方方面面的論述。他精通魯迅的著作，瞭解魯迅的歷史，熟悉魯迅的門徒和追隨者；他參加了[魯迅全集]初版的編校工作，是幾巨卷[魯迅全集·補遺]的收集者和編輯人，是魯迅研究會的副會長，數度出國作魯迅研究的專題學術演講。他不僅和魯迅有過文字因緣，且多有交往，是公認的魯迅傳人。唐先生既是魯迅研究專家，又是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像他這樣一個多面手的才子，化了十年之久，居然寫不出魯迅傳，豈不令人深思？

唐弢孜孜不倦，才氣橫溢，博通古今，近百年的文化文學史，都儲存在他的腦海之中；六十年來的文學鬥爭史，他更一清二楚，成竹在胸，如數家珍。以寫魯迅傳而論，任人都沒像他這樣的優越條件，他是公認的不二人選。可是竟沒有寫成，他繳了白卷。

一九五〇年的冬天，雪峰和唐弢擔任上海一個文藝雜誌的正副主編，我在他們的治下。當時在籌備階段，人員少得可憐，忙不過來時，有些事唐先生也不得不插手過問。雜誌決定明年創刊，發出徵稿信不久，稿件從四面八方源源而來，有位作者寄來稿件時，附筆要求編輯部介紹一部魯迅傳記供他參考。我向唐弢提到這一問題。先生說：舊的未及再

版，新的還未寫成。我知道當時流傳的[魯迅傳記]，創意不多，羅列了一些資料而已。橫豎隨便談談，斯時編輯部僅我們二人，人員還在物色之中，還沒落實。我趁機要求唐弢寫一部[魯迅傳]救急。唐先生毫不猶豫地爽直說：“看情況，看情況”！可見五十年代初，他已有這個打算。實在除了他之外，更無合適的人選。寫作[魯迅傳]非他莫屬。由他寫來，得心應手，將是部極有文學價值的皇皇巨著，魯迅的形象會

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而[魯迅傳]將金光閃閃鶴立於世界名著之林，不消說魯迅將永遠與世長存。但是不幾年，政治運動改變了一些人的美好幻夢，形勢大變。混淆了是非，顛到了黑白，一切亂了套。原來封之為偉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岌岌可危了；實在甚麼也不是；甚麼家，甚麼家，不過出於政治需要的一種手法，當然當不得真。對這一點，我想，唐弢心中雪亮，看得最清楚不過了。不必扯得太遠，只要想想當年和魯迅並肩戰鬥的那些闖將，他們在推動魯迅向左方面不遺餘力，“功不可沒”。可是僅僅幾年，他們統統被革命革得體無完膚。尤為可悲的，他們

沒有“破帽遮顏過鬧市”的幸運，他們有的被關在監獄裏，有的羈押在農場中，那有行動的自由？特別怪誕的，就是那些過去曾被魯迅口誅筆伐的作家群，當年遠走他鄉，反而成了文學界重量級的人物。僅此一端，就成了唐弢寫作魯迅傳的攔路虎，很難說得清楚，更難恰到好處。觸及這些人物，魯迅的光輝在哪裡？不觸及這些人，還有什麼魯迅的戰鬥精神！如此這般，魯迅實在是個不禁推敲的悲劇型人物！他的一些所謂戰鬥光芒，已給現實砸個粉碎，已經在批判他的門徒之時，蕩然無存，消失淨盡！才子唐弢聰明的地方，就在這裡，就在於他的頭腦十分清醒。他別無選擇，也無法選擇；他寧願繳白卷，也不願為了完成任務而寫作[魯迅傳]。那不僅僅抹煞了良心，且要為人詬罵。明明是被革命革得毫無光澤的一個可憐的人物，怎能把他寫作聖者？寫成文學的教宗？及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在現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還有一個模糊的“偉大魯迅”。唐弢先生不願從這些人的心底，把模糊魯迅的影子，連根拔去。他既無法把魯迅寫成萬世師表，也不願把魯迅寫成個倒楣人物。於是他繳了白卷，沒有寫出[魯迅傳]，如此而已。

## 《魯迅傳》

### 說起

陳家驊

唐弢沒有寫出[魯迅傳]，他繳了白卷，震驚了大陸，是文學界的大事件，也使世界文壇目瞪口呆無法理解；我覺得，這樣做，在唐弢出於保護魯迅，這應該是唐弢一生中下的最巧妙也是最完美的一著好棋。也是他妙想天開、最痛快的一著高棋。魯迅作為文學界的神祇教宗，是他的一大批追隨者所塑造的，所謂偉大的甚麼家，那是毛所欽定的。在政治一言堂的昏天黑地下，魯迅已經面目全非。唐先生那裡甘心把魯迅形象毀在他手裡！我想這就是唐弢抵抗了萬千壓力，不寫[魯迅傳]的根本。這正是才子之為才子，比他人聰明高超的地方。也就是他三四十年來，沒有倒下去而頑強地生活著的主要原因。日昨有人和我談到唐弢的政治面目。這不是三言二語可以講明白的。總之唐弢有苦衷，他身不由己。如果他一邊倒，我想，早已在一九八三、四年，就把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傳]問世了。唐弢接受了任務，按兵不動，不露聲色，直到逝世，才發現沒有完成[魯迅傳]。太妙了，實在妙不可言！任人都不可能如此穩紮穩打。如此這般該有多大的智慧，唐先生是值得欽佩的！

前些時，有人寫文章說：唐弢之寫不成[魯迅傳]，那是因為字斟句酌，追求文字的完美而耽誤了。我看這話當不得真，值得商榷。請問：誰寫文章不字斟句酌？誰寫文章不追求完美？況且唐先生下筆千言，字字瓊珠，文字美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絕技，他是不必斟酌甚麼的。所斟酌的，不過在於把魯迅放在甚麼角度？放在甚麼地位？把雪峰、黃源、丁玲、蕭軍、胡風等等放在甚麼地位？把所謂“乏走狗”等等的那些大家，又放在甚麼地位？如比等等，他左右為難，在迷魂陣、八卦陣中再也走不出來！

寫[魯迅傳]作為一個任務，公主拋繡球，落在唐弢頭上，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當年先生已經七十高齡，又有病魔纏身；可是以十年的歲月來計算，還有甚麼時間不時間的問題？所謂耽誤云云，只是打打太極拳的沒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我倒慶幸唐弢沒有寫出[魯迅傳]，否則不僅勞而無功，且抓一把疥瘡在身上，真是不得安靜了。如果隨著“偉大”的路子，即使削足適履，硬加枝葉、畫蛇添足，改頭換面，文章是做出來了，那會帶來多少反彈！禁得起推敲？如果淡化那些桂冠，著力寫一個文學家的魯迅，能符合要求？實際上以魯迅有些政治替代文學的複雜歷史，絕不可能光光寫成一個文學家的魯迅的。

唐弢和魯迅是種亦師亦友良師益友、忘年交和門徒的親密關係，是盡人皆知的。為了保護魯迅的尊嚴，他豁出去了。不過這個豁出去，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而是甘願少寫一部作品，犧牲一部佳作巨著。他不寫這部[魯迅傳]，他默默地罷寫了。丟掉了這個燙山芋。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秘密到過上海。在原名中蘇友好大廈，召開了一次不多人參加的座談會。我們雜誌的編委、五四時代的著名作家魏金枝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魏先生得到毛澤東的讚許。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有關胡風集資創辦出版社未成，出不了書的一段經歷，此時此際準備批判胡風。這次座談會上，有一位老翻譯家提出：假如魯迅在世，他的處境如何？當時政治氣候還比較正常，大倒其楣的人士不多，一般還沒感受到緊張和壓力，所以有人敢於在毛澤東主持的小型座談會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毛回答很直率。據說，毫不拖泥帶水，似乎正候著有人提問似的。他說：可能仍在寫作，可能已進了監獄。當時聽到秘密傳言，吃驚自不待言；但以爲聽錯了，沒有進一步去探究深思。可是接著魯迅身邊的大將，一一被揪出來了，可說一網打盡，才恍然大悟。毛那次發言，胸有成竹，無異是有意宣佈和吹風一般。就是說，任人都逃不了階級鬥爭的篩子。即使魯迅亦然。這時我的心頭冒出了“好冤枉”三字，忍不住暗暗為他們叫屈！

唐弢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也是文學界的知名之士，上下三等人士都有交往，接觸面甚廣，一切知之甚詳，可說無所不曉。歷來被約寫稿，往往一揮而就，倚馬可待，從不耽誤約定的時刻。而這部[魯迅傳]怎麼寫？實在難極了。他迷茫了。即使咬碎金筆桿，也難以創造出一個偉大的魯迅形象。這裡也反應了唐弢的良知。當他無法還魯迅一個真面目，又不願為定下的調子依樣畫葫蘆，於是乾脆擱筆罷寫，繳了白卷。在大陸這是不得了的事端，他勇敢的默默吞下了苦果。當然政治大氣候的變化，也給他助力和選擇，巴金揚棄假大空，提倡說真話（編者按：巴金雖然在“允許他提倡說真話”的時候，開始說真話了，但他還是假話多，真話少，五本《真話集》，至少有四本講的仍是假話。），也是對他的直接衝擊。為他的罷寫助了有力的一臂。是巴金先生強有力的一臂。他是很尊重刊物主編巴金先生的。唐弢在文學界耕耘了一輩子，寫作六十年之久，居然沒留下一部傑出代表作。不是他不為。而是不能為。譬如馮雪峰，好容易擠出了一部長篇小說，看過原稿者，無不給以很高的評價。由於處境如此，這位老中共、長征戰士、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他洩氣了，不願付印，含著淚把原稿憤怒地付之一炬。可見文學界多麼艱難。生不逢辰，聽聽也讓人痛心欲絕，酸淚滾滾。老舍、徐轉篷投河，以群、梁文若跳樓，傅雷夫婦用了煤氣，等等，他們都是屈原式的人物，到現在還沒尊重他們，這既是他們的不幸，也是文化智識界的悲哀（編者按語：把他們比做屈原式的人物，委實太過。他們都會說過假話，寫過假文，對國家、民族和人民，造過孽，作過昧心的事。有的更是馬列子孫，非我中華兒女。雖為自殺之輩，應予同情；但他們也曾逼人自殺，參與毀滅中國的新文學，制

造中共的假文學，怎能與深懷愛國主義精神、擁有偉大文學作品的屈原相比？）。

徐轉篷是寫鄉土文學的高手，公認的農民作家。三十年代，日本出版了一部[中國鄉土文學選]，把徐轉篷的作品放在首位，其次才是魯迅、王魯彥和魏金枝諸家，可見受崇敬和愛戴的一斑。他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在階級鬥爭的年代，潦倒一生，最後爬進了池塘。丁玲從北大荒回來，查問到這位農民作家，他已橫死多年。我們月刊編委、翻譯高爾基[給青年作家]的著名文學理論家以群；和人稱超級大刊[收穫]雜誌的資深編輯梁文若，他倆都以跳樓自殺來抗議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和無法承受的壓迫。文學工作者的冤屈太多了，這祇是上千成萬不幸者中的幾個例子！除了橫死，大多不是在監獄便是在農場，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過著非人生活。當年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文學編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和我同命運的更不知凡幾。我前妻只是發表了一些揭露不正之風的小說，這就搗了馬蜂窩，受到圍攻再也無法安靜，直到死去。上海某出版社有個姓張的人事員，乘人之危，落井投石，硬逼她和我劃清界線，逼她和我離婚，要她嫁給頂頭上司某副局長。他們一手拿了改造的緊箍咒，一手又以工作、待遇、政治地位引誘她。既把她當作賤民，趕出編輯部去勞動改造做農民；一面又捧她為才女、天使，把她看成天鵝肉，讓她去做官太太。此時此際，她已患了嚴重的憂鬱狂躁精神病。不由讓我懷疑身處人間？還是地獄的哀嘆！

爲了紀念魯迅逝世十五週年，一九五一年九月，雜誌決定推出[紀念魯迅專號]。唐弢叮囑我，向和魯迅有過接觸、交往的老一輩作家約稿；唐先生想要周作人寫稿。不過周作人是著名的文化漢奸，有點猶豫，於是他給北京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寫了信，請她徵求有關方面的看法，同時探探她的意思。

許先生很快回了信，她希望廣泛約些和魯迅同時代且有過交往的人寫稿，三言二語都行。她信中說：這些人不多，也老了。她同意向周作人約稿。這就是以後周作人化名遐壽，寫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等書的原由。周作人之突然重出江湖，是許廣平促成的。外人很難知道好運怎地會落在沉淪中的周作人頭上的箇中內幕。當時文學界對周作人很顧忌，而許先生倒大度；我想如果去徵求魯迅的意見，以他的脾性和風格，斷斷不會贊成的。一定會吃閉門羹。唐弢常常給許廣平先生寫信，乘之知道一些都城的動向。她的直率和寬厚，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幾年後的一九五六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原來許廣平先生也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安逸，受人尊敬；實在有些自作多情。她過得十分艱難，可以說有點窩囊；小有小難，大有大

難吧；因爲事情發生以後，她默然了，眼睜睜看著一些人接受批鬥，戴上帽子，送去改造。我一點也不想責怪許先生。從以後的情況發展，即使不發生這件事，我們也難逃一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但在這件事上弄到如此悲慘，有口難言。

那年，孔令境教授從山東教育崗位，轉到上海一文藝出版社做副總編輯。他心血來潮，要去北京看望他的姊夫茅盾。內人當時在出版社任編輯。於是那個晚上，孔令境來向我們道別，也作爲大家認識的一個契機吧！孔令境到達北京時，正巧毛澤東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當口。要求大鳴大放，向中共提意見，改進工作。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巧得無可再巧，茅盾也參加了宣傳工作會議。看到孔令境，他十分興奮，大喊太巧太巧了。要孔令境回上海後，好好參加整風，參加鳴放，向黨提意見。作爲作家，孔令境作品不多。而在文學界頗有影響。他既是茅盾的小舅子，又在三十年代編輯過一本[作家書信集]，魯迅替他寫了序。所以孔令境各方面的人緣不壞。他主動找上門來看我，正反映了他老成成熟的一面。不怕見笑，我沒有這樣的認識水平。

孔令境在北京時，去拜訪魯迅夫人。許廣平也參加了中共宣傳會議。她對孔令境開門見山：聽說了吧，毛主席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回上海後好好在出版界推動一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嚮應毛主席的號召。這時許廣平正擔任著所謂民主黨派抓新聞出版的[民進]的主席，要出版界鳴放，正是她幫助中共整風的權力範圍。

茅盾和許廣平不約而同地要孔令境參加鳴放，且當了件重要的大事。孔令境這位新官，正愁上任沒有新的點子，現在有機會可爲整風效犬馬之勞，就把鳴放放在工作日程上，真有不虛此行之感。

孔令境要回上海的前兩天，許廣平約他再談一次。許廣平告訴孔令境：好好在出版界發動一下，把毛主席的聲音傳達下面，並指定“某某”鳴放。許先生指名道姓的“某某”，竟是內人。孔令境似乎做了欽差大臣，又似乎奉了上方寶劍。回滬後，要求各出版社的朋友鳴放，並來我家傳送口信。許廣平爲甚提名我妻子鳴放？我好疑慮，我們並不認識。我忽地覺察到，可能是唐弢向她推薦的。我找到唐先生。我想證實一下。還未開口，還未提出疑問，不料答案已經送過來了。先生說：你一向沉悶，政治不開展，這次要好好參加鳴放，積極幫助整風。他和茅盾、許廣平一樣的口吻，盡在不言中，無疑給我猜中了。我的她，正是唐弢向許先生推薦的。因爲她從寫一般性的小說散文，轉變觸及生活型的小說，頗獲好評，正出於唐先生的鼓勵和關心。他向許先生推薦她，是很自然的，已無疑議。怪不得幾天前，北京

的[中國婦女]雜誌社，特派陳姓記者來採訪我們家庭生活的謎底，也豁然開朗。

一九五四年，唐弢從蘇聯講學回滬，對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文學的變化，很感興趣。曾和我談過二次。我的她，對蘇聯干預生活的幽默諷刺作品覺得新鮮。她就寫了幾篇觸及生活的小說，不想竟受到歡迎。我想唐先生是從這一點出發的吧。我知道唐先生對她頗為好感。我心中有了底。是唐先生向許先生推薦的！我沒有再問，何必多此一舉，明人何必細說。

她有兩篇小說逼著要交稿，我正忙於發稿，我們都抽不出時間鳴放，也沒有精力。而我們又和政治無緣。可是許廣平先生當了一件大事。當了重頭戲。既給孔令境電話，又托人直接送信給孔令境，催促他好好動員一番，這是毛主席自己號召的。並且每次提醒孔令境，不要忘了請“某某”發言。可是我的她毫無興趣。她和我說：我們和政治沾不上邊，與其參加大會鳴放，不如爭取寫篇東西。何況也沒甚麼想說。

一天夜半，孔令境突地來敲門。他的額角汗流如雨，只求一杯冷水潤潤喉，降降溫。他說：奉命而來，許先生來電話，她決定來上海參加鳴放大會，聽取意見。他要求我內人決定下來，千萬發一次言。孔令境加重語氣，不為他老總，也得顧全許先生的面子。孔令境可憐巴巴的模樣，她不忍了，動搖了。孔才急急離去，她對我說：沒辦法了。我原想說：情面難卻！想想實在毫無興趣。只好不著邊際地啊啊的了，她沉思了一下，構思了以一個青年作者的苦悶為題，說說沒時間寫作的心裡話。她說：不涉及政治，不接觸具體的人和事。雖然我說，好吧，心裡不無疙瘩，我並不贊成，勉勉強強，勉為其難吧了。實在逼不得已，毫無辦法，無可奈何。次日孔令境來了電話，告訴我：許先生馬上要到上海，她要親自掌握會議，傾聽發言，並向中央匯報。孔令境說：許先生難得到上海來，屆時和她好好敘敘。

孔令境興奮地告訴我：聽說魯迅夫人來主持出版界的鳴放大會，到會人士特別踴躍，走廊裡都擠滿了人，不僅一椅難求，簡直到了無法插一腳的地步。開會時間到了，沒見許先生的影子。為了爭取時間，沒等候她，大會如期進行了。我女人在熱烈歡迎聲中，第一個發了言。她言簡意賅，受到讚佩。北京趕來參加大會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代表，當場把她的發言稿要去了，據說，以後登在鳴放的專刊上。可是傳來霹靂驚雷，許先生之所以不來主持大會，因為有關領導人阻止了她。不讓她南下。不過孔令境弄不清為了甚麼，還是把有關材料向許先生輸送，意想不到是，以後一一作了罪證。孔先生目瞪口呆，只想跳黃浦江的了。不幾天，反擊所謂右派的社論出來了，一棍子把參加鳴放、幫助中共整風改進工作的人士，一一打入十八層地獄。孔令境成了上竄下跳

煽陰風點鬼火唯恐天下不亂的兇惡敵人。自然他想不通，特別連累了好些友人，他不服氣，他說上了當，受了騙。但是他抵抗不了泰山塌陷般的重壓，心一橫，教授離家出走了。他有口難言，在逃離家庭之前，一再表示了沒有是非，只有陰謀詭計的他的看法。途中他兩次來信，向我們大吐苦水。

上海新聞出版界“揪出了”一些右派份子後，在批判我的她時。把她獲得一致好評的幾篇小說，歸結為污蔑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責問她：你們既非黨員又非團員，允許你們寫作，你們的條件多麼優越，你們還有甚麼“苦悶”可言？！

還捏造她的作品是丈夫寫的。陰險的為處理我做了伏筆。沒多久，把她趕出編輯部，送農村開河築壩種田養豬洗腦去了。當然也沒放過我，不過四五個月，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七日，送我去農場勞動教養。我倆一個去農村，一個去農場，叫八歲六歲三歲的三個苦難的孩子怎麼辦？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腸斷了，心碎了；於是憂鬱狂躁精神病也找到了她。

我不想活了，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氣；但是為了在煎熬中的孩子，我咬牙切齒地活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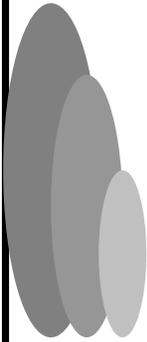
許廣平先生的一片熱忱，碰在鐵刺上，可見作為魯迅夫人，日子並不好過，想幫一下忙，累及好些人，這不僅是許廣平的悲哀，也是魯迅的悲哀。就在全國範圍內的狂批濫鬥中，和魯迅一起戰鬥，當年怒目向國民黨猛烈開火的那些戰友，一一倒下去了。可以說一網打盡（編者按：他們當年可以向給了他們自由的“國民黨反動派”開火，如今他們卻為絕對不給他們以任何自由的“共產黨進步派”一網打盡，勞改的勞改，勞教的勞教，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飛蛾撲火，還是咎由自取？難道當真說不明白嗎？）。

難忘魯迅，也難忘許廣平。眼前飛過一個幻象：他倆在九泉相見時，受了不少冤屈的許先生，責怪丈夫魯迅：你怎麼搞的，你可有眼睛？心裡老大不舒暢的魯迅，反問說：我是上了當，受了騙，但是妳呢？許先生怎麼回答呢！真的，難怪魯迅，他是盲目的。而自己恰恰在雙眼目睹之下，腦袋清醒之際。她祇能痛心疾首地責怪自己，連累了多少人！這對夫妻九泉相會的鏡頭，是我聽到許先生遽然逝世之際做的一個夢，十分清楚毫不含糊。不過是否合情合理？只有請高明者評論的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做類似的夢，是我感情脆弱的敏感者的老黃曆了（編者按：無論如何，這裏還是有一個為什麼要上當受騙的理由。這個理由難道不值得二十世紀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沉痛反思嗎？）。

在塵世中，我是個最苦最苦最苦的人：青年針刺、牛馬中年、老年嗚咽，幾次想離開不人道的人世。仔細想想，我為甚要走絕路？於是滯留在美國了。每每沉思回顛中，一當

（下接第 30 頁左下）

華僑人物	周祥自傳 之四	紀念周祥先生
------	------------	--------



到台北以後，遇中正大學校長林一民。他住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撫順街汽車駕駛學校一間房子裏，當時分出一間浴室給我一家四口居住。學校三周均是稻田，只有正門前是大操場，可以練習汽車駕駛。一周後，陳主席、台灣省政府主席誠，發表我為台灣省三十八年度大專畢業生就業訓練班第二分班主任。學生計一千八百人，班址設在台北市和平東路省立師範學校。學科分黨政首長及各科，軍事幹部由軍中挑選，體育由台北工專體育組主任負責。牛炳鎰曾于我任台北工專訓導主任時，為體育組主任，又有機會同事。這是後話，暫且打住。

就業訓練班主任是省府主席陳誠兼任，副主任是教育廳長陳雪屏兼任，教育長崔垂言，教務處長張公甫，訓導處長汪道淵，第一分班主任鄧傳楷，班本部設在和平東路師範學院，第一分班學生計八百人。一個月緊張生活，匆匆過去。結訓時，我親手轉發一千八百張工作派令，每一張年輕人的臉孔泛出一片喜悅，感人場面，畢生難忘。這證明陳辭公在黨國最困難的關鍵時刻，表現了驚人的魄力，掌握了全體台灣青年的人心。

班務結束以後，教育廳長陳雪屏派我為教育廳專門委員，在青輔會辦公。僅四個月，教育廳直接派我為省立台北工專教授訓導主任，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到差。校長是顧柏岩先生。我從台北商職請來程京震任講師兼生活管理組主任，魏運約任講師兼課外活動組主任，牛炳鎰任教授兼體育組主任。訓導處人事健全，朝氣蓬勃。工專還附設工職日校和夜

校，處內人員全兼三職，雖兼職不兼薪，全無怨言。這完全是經國先生在江西支團所培養的革命工作精神的表現，因為程、魏和我，都是江西支團的幹部出身。

蔣總裁在草山設辦公室，谷正綱、張其聽、蔣經國、陶希聖、唐縱、鄭介民等都在。一個星期天，經國先生約我到草山見面，並親自引我參觀總裁辦公室，都是日式榻榻米木屋，一棟連一棟。那時，經國先生是調查室組長。因我在贛南是他下鄉時的隨從秘書，經過大陸撤退，來台後未經他的照顧，我就當了班主任，繼而教育廳專門委員。繼而教授兼訓導主任，他知道了表示很高興。一日，金門前線緊張，經國先生約幹校同學在中山堂集會，我和羅才榮陪他二樓走廊站著聊天。他詢問我聽到社會上有什麼消息。我說，台北市有二位候鳥人物洪軌、蔡孟堅。台灣安穩，他們定居；不安穩時，他們就走了。現在兩家到香港去了，說我們將是「囊中之鼈」。他講演時特別運用了「囊中之鼈」這句話，引得全場大笑。因他擅長講演，尤其講詞中常穿插故事笑話，引人入勝，非常幽默而有趣。

民國三十九年，台灣只有一所大學，就是台灣大學三所學院：師範、工學、農學。台北工專，算是一所有名的專科學校。

蔣總裁決心改造黨。首先在中央成立改造委員會，各高等學校中設立知識青年黨部，台北工專成立第五知識青年黨部，這自然是台大、師範、工學、農學三學院為一、二、三、四。我被命為委員兼書記。中央組主任是谷正綱，總幹事李煥。李氏殷勤努力，常到工專來和我聯繫。偶爾隨便吃吃便飯，每見親如手足。

一日總統府參軍長劉士毅約我到圓山飯店午餐，無他客，只有我們主客二人。飯後，隨他步行下坡。他告訴我，即將發表我任總統府戰略委員會辦公室秘書。我問現任訓導主任是否要辭職，他說無須，可兼職。所以三十九年這一年，兩個實職每日要兼顧，還有許多工作，真是夠忙的了。

暑假中文課程舉辦三十九年度大專畢業生就業訓練班。比去年的規模要小些，陳廳長雪屏兼班主任，顧校長兼副主任，我兼任訓導處長，省黨部組訓處長黎元譽，台北商職訓導主任劉兆田，都參加為訓導員。是否如去年一般結訓時每人發工作派令？因非我經手，記憶不清。

一日奉總政部通知到陽明山參加講習會三日。原來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要我參加加工人員考核工作。會畢後，我被派為小組長，負責考核八十七軍全體政工。軍長徐汝誠，對我的工作，盡力配合，一切順利。全部考核表格，均經個別面談，謹慎妥為填報，側聞某些弊端，亦忠實報聞。顧校長知道總政治部派車派人要我赴各部隊工作，也從未向我查問。

一日黃昏，我在校花園散步，到校門口遇總政治部副組長江國棟。他邀我到他家稍坐。他臨時住處是工專房子，我幫忙由工專給他借住。他秘密告訴我，蔣主任有意調我到總政治部工作，職務大概是某組副組長。頗久無音訊，他又告訴我，有人破壞了，破壞者誰呢，百思不解。但我也不在乎。相信凡人都有他應走的道路，東邊不成西邊就，天無絕人之路。未久中央黨部通知，十一日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十期受訓，同期受訓有李煥、楚崧秋、瞿韶花、楊有壬、秦孝儀、夏功權、陳仙舟、郝柏村、歐震等一百二十人。每人有學號，我的學號是一〇一〇一，數十年來從未忘記。一期至八期所調訓人員，都是現役高級軍官。自九期開始，調訓黨政教育人員。院長是總裁兼任，主任是萬耀煌，秦孝儀和我連坐。那時，他是中央秘書處總幹事。受訓時，總統侍從室通知，每周院長訓話時，他要記錄。第一周訓話記錄，院長親改後示我，幾乎改了三分之二；第二周示我，改者不及一半；第三周改者僅十分之一。孝儀國學根基深厚，為人聰明精細，總統蔣公對他賞識，其來有因了。

一個月的訓練，一會兒過去，返校未數日，工專左方寬馬路隔鄰一招待所住的省黨部主委倪文亞先生約我到他家吃便飯。倪夫人做得一手江浙好菜，倪先生常誇他不願進館子，證明館子的菜飯不如夫人手藝高強。餐後倪主委告訴我，要調我去縣級任改造主委。我不願去縣級工作，再三推辭，最後他說總裁將徵調，不得拒絕。越數日，總裁召見決定：勉以大陸失敗的黨，必須從頭改造。那時，陳雪屏先生是中央第一組主任，瞿韶花是總幹事。當我被發表為桃園縣改造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李總幹事煥，瞿總幹事韶花都向我推薦人事。李所推薦的雷君，瞿所推薦的董君。我任董為二組長，雷為四組長。二組管學運，四組管調查。雷、董自恃中央有背景，暗中表現不十分合作。雷與調查站、保密、特高、保安等情報單位，常常制肘，頗令頭痛，但又不便向李煥說明。雷和李是小時同學同鄉，我不便說他。他已向李進了讒言，也說不定。

那時經國先生秘密籌組青年救國團，常常晚上開會，我從桃園趕來台北參加，李煥負責籌備，後來我被隔離。救國團成立，一概沒有我的份。救國團建立桃園縣組織，由駐軍政治部主任王致增兼任，事先我全不知情。一日，王致增自侍幹校研究部出身，向我提出要求：主委特支費，全部交給救國團。這簡直荒謬，被拒後王視我如寇仇。因不斷主持地方選舉，難免恩怨，王從中搬弄，也許陰險過度，聞吐血而死。

省主委倪文亞調職，上官業佑接任。又值省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省調查站郭站長密令桃園分站董瑞芝，要爭取省代表團。董某自恃有力量，小組開會時，他親自到我辦公室來

表示他一定當選。他問我的看法，我也很直率地說，恐怕你的票不夠。開票結果他落選了。他憤憤而退。這叫驕傲必敗。董某從此與黨部作對，向上密報我任用匪諜，包庇匪諜。中央一組派專門委員陳建中來縣調查，調閱用人案卷，證明我無責任而消案。但觀音鄉小組長邱桶，被董瑞芝誣為匪諜，被捕於警總。邱桶是黨的農民幹部，平日熱心黨務，對黨國忠愛。那時民國四十一年，才光復八個年頭。他在日據時代曾參加過農民協會。僅憑這一點，董某硬冤他為匪諜。據傳曾用酷刑逼他誣攀我為包庇，邱寧死不誣，又誑誘邱即將釋放，但要他求我擔保。一日，桶親弟來我家中跪地不起，求我擔保。我說三天以後，你再來聽我消息。於是我去台北警總找熟人打探，根本是死刑待決。我乃委婉向桶弟解說，不數日邱桶即被槍斃。這明明是董某草菅人命，不過上級決策也失之過嚴。桶之死，我總覺得我有伯仁之疚。

桃園縣黨部改選，上官主委派周世光委員來縣督導。四情報單位結合作梗，警局蕭復權局長暗中派三部汽車跟蹤我的車，凡我所到之處，剛走即受其威脅，加上上級督導周世光與他們暗通訊息，故意報告上官急令停止選舉。上官急派他同班同學劉清源接任，我被調台灣省黨部視導。上官故意令我與內調站起衝突，又故意派周民光與情治人裏應外合，逼我離職，以便安插他的私人。想來實不甘心，逼不得已，只好採取反制。未幾，上官下台，由郭澄接任。郭主委特別重視我，凡選舉困難地區，都派我去督導，如嘉義市議長選舉糾紛。主委丁幼泉，雖自恃而個性強，我所提處理意見，他都配合尊重。

一日，李德廉自金門前線回來，到我辦公室看望，相約去日本進修。我內心已準備了數月去美國，曾找過經濟部次長徐鼎未果，因此對李之邀約，當即同意，由他和蕭昌樂聯絡。未幾，日本入學證已寄到，報請郭主委准予補助二萬台幣，再向中央副秘書長周宏濤請幫忙，特准結匯美金五百元。與德廉同到救國團見經國先生，准許了我赴日本，德廉未准。又辦出國護照是一大難題，找了中央五組上官主任。他當面交了楊志羣總幹事，由一民俗團體給了名義，派赴日本考察。日本使館准許了以半年為期。記得是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的日子，乘了C A T的飛機，由松山機場起飛，王升，潘振球很多友人到機場送行。第一次出國，經過重重難關，進入機場，雖已松了一口氣，但新的恐懼，又從心中滋生。下午抵達日本羽田機場。蕭昌樂來接機，本來很順利，昌樂問我帶了美金沒有，引起海關人員注意。隨即，海關人員將我引入一室搜身檢查，在皮包中發現中央軍校畢業證書，日人看見校長蔣中正，肅然起敬，對我的檢查也停止。不過對我五百元美金支票，也予以登記，所以這支票不能賣黑市，只能在銀行兌換。官價是三百六十對一美

元，黑市則是四百日元對一美元，對於窮人來說，因一語不當，吃虧二千日元，確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昌樂兄準備一輛汽車，事後才知道是蔡孟堅先生私人用車。車子從羽田機場直開到世田谷蔡公館，蔡先生也不在家。午餐時間已過，用人準備了便餐讓我用過。也許是昌樂電話安排，車子將我從蔡公館送到六本木留學生同學會館。李同學接待我，他將床鋪給我，他每晚在檯球桌上，鋪臨時床鋪睡覺。全會館住了三十來人，當過縣長處長主任委員的人，一旦落魄如此，百感交集。次日即設法與僑領汪少庭聯絡。他請我到日比穀中國餐館用餐，我請他幫忙找住處，他即答允通知我三日後搬到廣尾橋東京支部空了一間四疊半大小的房間，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左邊大房間是支部女幹事羅琦單住，右邊是支部秘書杜萬齡，他的房和我住的一般大小。他原住留學會館，搬來不久。原來東京支部秘書不久前與留學生衝突，大使館文化參事張伯謹幕後主使留學生鬧場，將何秘書逐回台北了。張伯謹支持杜來支部代理秘書。杜是警察出身，在日本警官學校留學。一日晚上，他特要和我談話，問我這支部秘書工作應該怎樣做法，他承認他不懂黨務工作。實際上黨部中央文件，由羅琦收，黨部經費由汪少庭掌管，由海工會汪仲讓總幹事操縱。

一天，昌樂找我說黨部是非多，勸我不要住黨部，又說德廉已得經國先生准許，馬上要來東京，邀我同去租房子。他帶工作讀書，不瞭解我的困難。住黨部，我不須付租。但昌樂看好霞關町水上日式樓上八疊房子，強求我和德廉合租，月租八千，他替德廉代墊，我住了將近一月，德廉始來。

本來，昌樂托蔡先生轉請大東大學吳主惠教授為德廉和我取得入學證。李與我相商結果，決意向明大研究院申請。昌樂、秋泉陪我們到明大申請。他們要李申請政治科，勸我申請經濟科，二人都獲准並繳費。手續辦畢，由秋泉領我們到日本麵館吃日本面，十五日元一盤，僅點點心，都未吃飽。德廉對秋泉的不近人情，非常介意。很多年後，大家同在日本工作，常常提及此事。而我對此小事則從未介意。入學後，秋泉漸漸流露，德廉邀昌樂和秋泉密商，如何阻止我習政治，要秋泉勸我經濟；始發現我對李一片至誠，他對我卻是虛假利用。經稍稍注意，他的虛假給我看出，漸漸影響彼此的感情。我遇機會與秋泉二人在一起時便詢問說：「為什麼德廉反對我選政治科呢？」「他怕你各科將站在他前面」，他回答。我明白了，他根本在嫉妒我。從此心底有點寒意。研究院經濟專攻科主任三神博士，是德國留學博士，他的夫人是德籍人。經過兩年的努力，他給我畢業，並授了我碩士學位。有一位教授是共產黨，我選了兩個學分，他不給我成績。三神主任以主任身分要求，他不買賬。好在我在

二年中多修了四個學分，少兩個學分，並不影響畢業和得學位。畢業後，三神主任推薦我到東京大學他的好友處進修博士，因工作太忙而終止。

德廉忽患腎結石病，入東大附屬醫院割治。我是監護人，我穿了醫護服入手術室，站在凳子上看醫師動手術。醫師是很有名手術專家，年齡接近六十。事先我陪德廉到過他的家裏，送了八萬日幣私房錢。手術很成功，德廉回病室，我每日去探視，病號牌上登記血型為A B型。我每次去看他，他雖臥床不能起身，總想方設法穩藏名牌，不讓我知道他是A B型。其實醫師動手術時，曾詢問我的血型，順便告訴我：他是A B型，如需要輸血，問我可不可以捐血。德廉對我這樣的親密友人，于危難中盡心盡力救護他的人，仍不忘對我做假。我認破之後，心中真不是滋味。後來退院，他的太太高倩宜來了，我只好搬家讓房子給他住。我搬到歐陽正宅處暫時借住。

中央第三組派了總幹事汪仲讓來東京整理黨務。汪是我同期受訓的同學。因我當過改選主任委員，對黨務熟悉，鄭主任授意汪仲讓要我負責整理東京黨務，並要我拉德廉幫忙。東京支部因鬧糾紛，全部解散，重新成立整理委員會，我拉了德廉任常委，中央派我任整理委員兼秘書，負責實際責任。重新舉辦黨員登記，組織學生分部，成立分區、分校小組，定期召集小組長會議，整理委員會，從左傾勢力方面搶回東京中華學校，改選寧波同鄉會、理事工作人員，會長全部由支持本黨人士當選。經過二年整理，黨員由一百餘人增至八百人，所有東京學校僑團，均由黨員或親本黨人士擔任。經召開代表大會，選舉委員十七人，候補五人，由委員選舉常委五人。

我和德廉本約定同時返國。忽然，他要先返，我因黨務移交，一時無法提前。後來知道，李從昌樂處知道中央有意作組織新部署，所以不顧約定，提前早回一月。當我返國後，一切已作決定。我兩年的辛苦，卻做了他的階台。我有被出賣的感覺。他參加工作，是我一手拖他進，他又沒有出錢出力，今建立了一點成果，全部給他奪功。我認他為好友，他卻當我踏腳石。我決心不再去東京，擬留國內工作。可是德廉再三再四來我家，好勸歹勸要我去東京共事。他一再拍胸表明東京工作全由我決定，他決不插手。

鄭主任說，你們二人待遇一樣，而我是負責實際工作，李只管督導聯絡。我滿心不悅再來東京，未攜家眷，僅我一人，李則帶了太太。約莫半年光景，忽接長途電話，妻戴琦在中央婦工會工作，代表婦工會參加東部昆陽演習，軍車出車禍。次日回國，妻躺在家中床上，不能動彈。門牙由鼻左旁穿出，臉部破相，左臉鼻窩結成肉疤。到東京後，在醫院多次動手術，三年後始復原，但費醫藥手術費很多。因公受

傷，中央黨部卻未付分文，全由我自費。連我接妻去東京時，在婦工會所借數千元，亦於我由海外返中央任職時，在我生活費中扣回。黨對黨工沒有表示半點同志愛，令人寒心。

妻躺在床上，我一面籌路費購機票，一面在家裏整理結束台北的家，真是忙得暈頭轉向。戴琦在立法院裏的同學請了一部公車，曾任都昌縣長的吳秘書，也來家送行。一家二大二小四口人，匆匆搭機去東京，台北家具都送了謝樹楠，所有日記書籍盜器一大網籃，存在謝家。後據謝說，全部漏濕腐朽，僅還了一本濕損日記。樹楠平日討好人，實對朋友不忠。到台灣他在南部僅謀得一小學代用教員，我一下提拔他為我改委會書記，後任詹純鏗主任機要秘書，此人A B型，太過自私，二年前八十二去世。

到了東京，一時無法租房子，暫在我辦公室日卷夜鋪，二樓地板，沒有潮濕顧慮。嗣在天現寺靠河岸獨一所一樓房子，租金是八千或一萬，現已忘記。住不一年，一位女地產士向我遊說，搬到離辦公室很近廣尾商店街口叫五十嵐的一房一廳，雖小一點，但便宜一半租金。後來又加了中間的六疊米房間，算是不小了。約莫住了二年，房東要收回，乃搬到同尾華僑丁老闆樓下餐館，樓上一大間，以布隔成三間。住了近三年，才在富士見町商店街購了一間餐館，樓上自住，還分了二間租人；樓下開面店，雇了廚師、助手、小姐三人，由琦管理，我下班回家幫忙。面店開了一年多，大廚跑了，就關了門。

黨所是一所舊的木板房子，幾經會議，終於決定重建，發動黨員捐獻，建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兩層出租，兩層自用。東京黨務，奠定鞏固基礎。

全日有六個支部，東京、橫濱、大阪、神戶、長崎、仙台，都有黨所。東京橫濱長崎都有餘房出租，以補助黨務費用。六支部半年集會一次，首由我舉辦，會後並招待到溫地旅遊，以後成為範例，六支部輪流舉行。既可交換工作經驗，又可加強聯誼，對黨務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每暑期舉辦華僑青年暑期訓練，每期二百餘人。多年下來，同期受訓男女青年，很多獲得男婚女嫁機會。暑期訓練，青年參加踴躍，各地僑領都鼎力支持、熱心捐助。所以推行黨務，掌握群眾的需要，極為重要。

成立各種中日親善協會，如日華橫濱、千葉、山形、秋田、青森、仙台、長崎、福岡、鹿兒島、大阪、神戶、名古屋、靜岡、東京青年等親善協會。東京青年親善協會每年分別組團赴台灣救國團考察。每團出發前集會講習，每次請我講話。小淵惠三會長是最年輕眾議員。國防部長蔣經國訪日時，我特別介紹與經國先生見面。蔣部長看到小淵年輕，特

現身說法，當年他任中央改造委員是最年輕。時間一瞬即逝，年輕最怕驕傲，要好好把握時間，否則將一事無成。

德廉回國任五組詹純鏗主任的副手。他與楊志鞏一同橫過馬路去開會，給機車撞倒後，起來以為無事仍去開會。會後已近黃昏，覺得首暈而去醫院檢查，不久去世，真是死的冤枉。蔣廉儒問我何以至此，我說這是掩蔽自身缺點太過的結果。

民國四十六年秋天，鄭彥葉主任為了改進日本黨務，特新設二位專人，由海外直接派德廉和我，二人分工同酬；他負責督導，我負責全東京工作。未久他得目疾，幾停工作二年。他的工作，全由我兼負。忽一日，我知道他夫婦憂心數日，甚至哭泣；最後，宣佈目疾好了，開始出來工作。原來一目失明，決定嚴格保密。他和楊志鞏同橫過馬路，楊不知他一目失明，一目視度不良。當機車直沖而來，楊能急避；李因視力不良，給車撞個正著，當時腦微血管破裂不覺。數小時後，已來不及挽救，因而誤死，真是人生一大慘事。

我在東京聞訊，特請大使陳之邁在中華學校大禮堂為其追悼，化行兄訪美過東京，特邀他參加。所有追悼過程化行親眼目睹。在追會時，高倩宜從台灣來電話，找周祥庚道謝。明明是我主辦的追悼會，她找周祥庚道謝，她的無知，我本可原諒。但後來探知，她的丈夫撞車而死，她恨我。這就不可以原諒了。所以，德廉死後，他的遺孀高倩宜和我家等於絕交了。其實，德廉和倩宜結婚，完全是我夫婦為他倆促成。本來德廉和一位北方女子論及婚嫁。一日，德廉自金門前線回台，到桃園縣來看我，那是民國四十年的夏天。他將他與北方女子論及婚嫁的事告訴我。我問北方女子喜歡談政治否，他說不喜歡，請我夫婦另為他介紹。剛好桃園縣府職員高為政女士來我家，順便介紹，他倆一拍即合，迅速親密。後來，桃園內調站董某向情報機關報告說高為政有匪諜嫌疑，因而李高斷交。琦又介紹高倩宜，我夫婦為其約會請客，費時費金，終成眷屬，最後反而成仇，真是令人難以想像。

十全大會回國，蔣廉儒、楚崧秋，特別設計和我接觸。因為日本共有十來位代表，我是特派員總負責人。蔣楚在龍芳的遺孀家裏安排了一席宴會。柯正雄、張美瑤等男女大紅明星作陪，又楚崧秋以中央日報社長身份設宴一席，王惕吾、余紀忠作陪。他們成功了，過了海，橋就拆了，這就叫做「政治」，說來也可笑。回日本工作時，多了一個「十屆中央候補中央委員」頭銜。後來訪大陸時，家鄉和中共的檔案，都登錄了這個頭銜。看來我把中央候補委員不當一回事，我們的敵人倒是真把它當一回事了。

（下接第30頁右下）

梟鳴天下之三五六：

### 打倒花瓶黨

數十年來，在公共場合和公開媒體上，對共產黨的吹捧歌贊聲與共產黨的自稱自贊聲勾結在一起，甚囂塵上，蔚為奇觀。而在私人場合，凡有人談及共產黨，包括黨員官人和既得利益者，無不極盡嘲罵、鄙棄、厭惡、憎恨之能事。老梟出身農村浪迹江湖，文過武過仕過商過，大半輩子來，廣交海內三千客，從來沒聽到有人私下裏說過一句共產黨好話。才統治中國五十幾年，就弄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共產黨也算混得夠慘的了。

打倒欺世盜名害人奪命殃民禍國的一黨專制，乃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體制內者的心願，只是很少有人敢公開表達出來。這句話說出來就是禍，以前叫「反革命罪」，必死無疑，現在叫「煽動罪」，也要冒很大風險。吉林網民羅永忠，寫了一篇《打倒共產黨》的網文，就被判了三年刑。老梟儘管膽大包天，儘管內心裏與大多數民衆一樣恨不得將這個代表專制代表腐敗代表落後的制度一腳踢進歷史垃圾堆，卻也敢怒不敢言，絕不敢喊出打倒專制這句偉大光榮正確的口號來。

不許喊不敢喊打倒專制黨，借網絡一角輕輕喊一聲打倒八大民主黨，應該不會有即時而重大的危險吧。在抗日戰爭、在與國民黨專制作鬥爭中，八大民主黨派曾經立下了豐功偉績，湧現過大量的英雄人物。聞一多、李公僕、儲安平、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這些名字至今依然光芒閃爍。然而，「解放」後，特別是經過毛領袖發動的「反右」運動之後，八大民主黨派的鋒芒被磨平了，英傑被打倒了，逐漸墮落為一黨專制的裝飾品和幫閒派了。

按共產黨的說法，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是親密合作的友黨和參政黨，他們之間是民主協商和互相監督的關係。其實全是欺人之談。他們能監督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嗎？很明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只存在著老爺與奴婢、領導和服從的關係。一個領導，八個服從，一個主子、八個奴才，如此而已。

共產黨在政府、人大、政協、司法機構部門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互相監督，其實是共產黨單方面監督民主黨派。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只許認真學習、領會、貫徹共產黨的文件、指示，與共產黨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不許有自己獨立的政綱和獨立的政治活動，只許在共產黨領導下當表決機器和傳聲筒，不許擁有自己獨立的組織（要由雙重黨籍的中共黨員領導）、甚至不許在地區、基層獨立發展組織（一九八九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統戰部對民主黨派團體組織發展有規定：首都和直轄市，民主黨派團體成員的發展，掌握在該地區共產黨員的百分之七至八；在各省區，是共產黨員的百分之三至五；並建議民主黨派組織發展成員，局限於上層建築領域，在工礦企業農村「暫緩發展」）。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日前就中國政黨制度發表講話，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比喻成一個合唱團，民主黨派是歌手，共產黨是指揮。可是，僅從人數上看，八個民主黨派加起來才六十萬人，共產黨則是六千七百萬。指揮者人數大於合唱歌手一百倍，一百個人指揮一個人。合唱團雲乎哉？親密合作、民主協商和互相監督雲乎哉。

說什麼「這種制度既可以避免一黨專制缺少監督導致的種種弊端，又可以避免多黨競爭互相傾軋所導致的社會動蕩，因而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好大一張牛皮，與以前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自吹自擂一脈相承。我在《請共產黨交帳》一文中已指出，這張牛皮早已千瘡百孔，不僅被「解放」五十多年來的無數事實駁倒，而且早被「解放」前共產黨機關報的許多堂皇尖銳的言論駁倒了。毛澤東在延安民衆討論大會上作講演，駁斥反共頑固派的統一論時說：「這是陰謀，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聽聽陳喜慶們「借社會主義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羊頭，賣自己一黨專制的狗肉」，不是更加「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嗎！

八大民主黨派的存在，不僅給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醜臉上貼金，不僅嚴重違反民主自由原則、敗壞社會道德，而且大大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西方國家的政黨，不管是否執政，都無權動用國家財政。但在中國，八個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的所有「消費」，統統由國家財政買單，這是一大「中國特色」。

中國經濟一枝獨秀，老百姓依然普遍窮困，九年義務教育有名無實，弱勢群體缺乏社會保障，全國人均醫療衛生費用，不及世界七分之一，而廣大農民享有的更少，不足世界平均數的六十分之一！是世界上享受醫療衛生服務最少的一個群體！中國人民造了什麼孽，供養全面腐敗的「三個代表」已是不堪重負，還要供養八個花瓶啊。

綜上所述，八大民主黨派早已背叛建黨立派宗旨，有辱民主二字，有辱各民主黨派自己的先烈先賢，根本就不是現

代意義上的政黨組織，對於國家和人民而言，無益有害，象大惡瘤旁邊的八個小贅瘤，又象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一座大山旁邊的八座小山。不許喊不敢喊打倒老爺黨，那我就先在文章裏把這八個奴才黨、花瓶黨、幫閒黨、小媳婦黨、表決機器黨打倒了吧。哈。

打倒政治花瓶黨、打倒幫閒幫兇黨！民主自由萬歲！

梟鳴天下之三五七：

## 國恥！國恥！！國恥！！！！

在《血恥！血恥！血恥！！》一文中，我把成都市血液中心因使用了無證生產的血袋導致血液污染、導致一批被污染的血漿被秘密倒進了下水道的事件稱為「血恥」，把損失大億萬倍、影響惡劣億萬倍的官場腐敗和黨主專制稱為令憲法蒙羞、國家蒙羞、先烈蒙羞也令老梟蒙羞的國家民族的「血恥」！我說我獨坐漫漫黑夜，隱隱聽見了炸雷般雪恥的怒吼。其實這個錯覺未免高估了我的同胞們，我發現中國人的羞恥感已普遍喪失。

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量出現公德敗壞、誠信崩潰、見利棄義、唯利是圖、巧取豪奪、唯權是附、只見眼前、不求長遠、欺詐成性、坑蒙拐騙、笑貧不笑娼、有奶便是娘等種種醜陋卑下的現象。人們一面痛恨咒罵著腐敗，一面巴結著特權仰慕著腐敗，國人紛紛在庸俗化野蠻化流氓化禽獸化的小路上飛奔。此乃民衆的無恥。

經過文革空前的摧殘和八九暴力的踐踏，知識分子的精神水準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全面實現了四化：商賈化政客化妾婦化流氓化。沒有自我，沒有脊骨、沒有精神，沒有擔當，沒有思想鋒芒，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由意志，只有利益話語、權力意志，特權崇拜，只有臣妾心態、奴才主義、妾婦人格。他們或鮮廉寡恥唯利是圖苟同苟異黨同伐異，或揣摩聖意請功邀寵與狼共舞為虎作倀，或以不正當手段圖謀不正當利益。無緣「政治腐敗」，就大搞「學術腐敗」，不能親當兇手，就爭當幫兇幫閒並以此為榮，成了魯迅筆下「無論什麼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的「無恥群」。此乃知識分子的無恥。

城管執法暴力化、公安警察土匪化、執法機關流氓化已成爲普遍現象，此乃執法人員和執法機構的無恥：「見錢就收，不給就借；見位就搶，見國就出；見機就投，見色就好！」在「爲人民服務」、「三個代表」的招牌下大幹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勾當。此乃官員的無恥；官場上高層次的無恥行爲則是強姦政治強姦民意，掛羊頭賣狗肉拉大旗作虎

皮，「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大搞權貴資本主義和權力經濟，此乃政治的無恥。

群衆無恥，領導更無恥，貧弱群體無恥，權貴集團最無恥。上上下下不以奴隸奴才幫閒幫兇爲恥，不以貪污腐化假冒偽劣爲恥，不以裝神弄鬼虛偽狡詐爲恥，不以自輕自賤諂上欺下爲恥，不以依賴無賴專橫殘暴爲恥，不以枉法違法無法無天爲恥。民衆被剝奪了經濟文化尤其是政治方面許多現代人理應享有、西方人早已享有的權力和自由，被當作賊一樣嚴密防範著、傻瓜一樣騙著詐著、奴隸一樣嚴苛使喚著，不以爲恥；黨和政府則把黨權政權無限放大，把民權人權無限縮小，把成績功勞無限放大，把錯誤罪惡無限縮小，甚至把錯誤罪惡當作成績功勞吹噓炫耀，不以爲恥…。

曾經有人比較中西文化，認爲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西方的基督教傳統強調原罪，因此有向上帝懺悔一說。恥感文化則強調外在的約束力。所以中國人比較注重他人、社會的評價。其實恥感文化之說並未觸及中國文化實質。儒家「有恥且格」的人格要求並未得到貫徹落實，官場中實行的實爲法家無恥無格的權力主義人格。

歷代無恥之徒層出不窮。如三國時有個楊松，「一人而三反」，出賣主子張魯，爲曹操打敗張魯作出了重大貢獻。又如爲巴結討好魏元忠而親嘗其小便的郭弘霸：李贄《初潭集》記載，「郭弘霸爲右台御史，時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也。』」然而，他們的下場或結果往往不妙，曹操「斬楊松於市曹」，罪名是「賣主求榮」；魏元忠對郭弘霸「惡其媚，暴語於朝。」給他曝光顯醜。顧炎武曰：「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清朝時文人寫錯一字、說錯一詞都會遭來滅門之禍滅族之災。中國士大夫從此變得特別無恥起來，所以魯迅說「滿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

而今無恥之尤特別多。不僅士大夫無恥，官場無恥，而且全社會的恥感都喪盡了。愈是無恥，愈是在官場上受到重視、重用，愈是在社會上佔盡好處、上風。我在《戲子中國》一文中曾指出：中國官場如戲臺和妓院。生活中的婊子戲子，還能給部分人帶來肉欲的滿足和審美的愉悅，政治上的戲子婊子，卻一無可取，無利有害，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只能是持續的落後、愚昧和災難！

在偉光正的領導、慫恿、鼓勵之下，中國人原有的劣根性進一步發揚光大起來。英雄消失了，狗熊奸人當道逞威；人性血性衰微了，奴性獸性迎風招展；正人、雅人、信人、賢人、真人、佳人、高人不見了，中國成了小人、渾人、偽人、醜人、賤人、匪人、啞人、閹人、妖人、惡人的天下；

正氣、大氣、和氣、義氣、豪氣、銳氣、骨鯁之氣、浩然正氣統統消散了，社會上到處充斥著臭氣、邪氣、毒氣、癘氣、濁氣、小家子氣、沈沈死氣、蠻蠻殺氣！中國成了無恥之徒的狗窩銀窩金窩，中華民族已墮落成一個令人厭惡彼此厭惡的民族！

民格不存，國格何在？人民沒有尊嚴，國家尊嚴何在？民衆、官員，知識分子、黨和政府皆喪失了羞恥之心！比起使館被炸、飛機被撞、珠海賣淫女被日本鬼子買春等恥辱來，這才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災難，這才是最深重最難以洗刷的國恥啊。

梟鳴天下之三六〇：

## “豬狗”中國？

每當聽見「龍的傳人」、「我是一個中國人」之類高歌大曲，每當聽見「十億人民」、「中國人民」如何如何之類官腔豪言，每當欣賞到政府發文要求黨內互稱同志、學者建議改「老百姓」稱謂為「公民」之類莊嚴的幽默，我就忍不住苦笑，忍不住想問：中國有人嗎？官不稱「老闆」稱同志、民不稱「老百姓」稱公民，它們就成「人」了嗎？

不，中國即使有人，也是寥寥無幾，多的是豬狗！豬，代表平庸、散漫、懶惰、愚蠢；狗，象徵馴順、忍從、下賤、奴性。它們共同的追求是只要溫飽不要尊嚴、只要肉欲不要情感；它們共同的特點只有身體沒有靈魂、只有自賤沒有自愛。猥猥瑣瑣萎萎縮縮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地活著，這種人那有絲毫現代文明人自由人的人味？只要自己富貴榮華，那管別人水深火熱；只要生時榮華富貴，那管死去洪水滔天；爲了金錢，爲了權力，爲了一時享受一己私利，什麼親情友誼、什麼良知正氣、什麼誠信道義、什麼精神靈魂，卻可以棄如敝屣、可以出血大甩賣，這不是豬狗的生活態度和人生（應稱豬生、狗生）哲學麼？

我在《窩囊中國》中說過，大多數中國人活在外在「不許」的套子和內在「不敢」的囚籠裏。「不許」是政治強加的，「不敢」是內心自發的，不敢說真話不敢發異議不敢批評政府不敢議論時事抨擊時弊不敢不與領導保持一致，明文規定暗中指示無言暗示「不許」的，當然不敢觸犯，明裏暗裏都未曾「不許」的，也不敢貿然去幹。稱之爲豬狗，不亦宜乎。

中國人爲豬爲狗，有自願的有被迫的，有半自願半被迫的，有開始被迫後來自願的。但不論是否甘願，我黨一向以民爲豬以官爲狗，從來沒有也沒必要徵求中國人的意見。

以民爲豬，所以一再強調生存權，一再吹噓是偉光正的領導才讓十多億人有了飯吃；以民爲豬，所以用生存權爲藉口剝奪了人民的選舉、思想、言論等基本政治權利——豬們懂得什麼民主自由、要那麼多權利幹什麼？以民爲豬，所以敢顛倒黑白欺世盜名強姦歷史強姦民意，敢把民衆的大部分公民權利都強行「代表」了去。而民衆面對緊握槍桿子的代表，也只能別無選擇地被代表，並且被警告：不同意被代表，就會犯顛覆罪煽動罪，就是敵對勢力要受到嚴打；不同意被代表，十多億人就無法解決溫飽問題、就會喪失生存權…

寫到這裏老梟又忍不住要問了：那些因無法供養考上大學的子女而自殺的父母生存權在哪裡？那些因親人久病交不起藥費而全家自殺者生存權在哪裡？那些每年因貧窮和絕望而自殺的近 30 萬中國人的生存權在哪裡？天安門前接二連三的自焚者、全國各地前仆後繼爲討工錢而跳樓者，他們的生存權在哪裡？官方承認，目前大陸還有三千萬人沒有根本解決溫飽問題。這數字當然大大縮水了，中國大多數人處於絕對或相對貧困當中，專家估計，如果以每天一美元作爲貧困線標準，今天的貧困人口數達七八億！他們的生存權如何體現？一項調查顯示：1998 年，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病人因爲經濟困難而無法就醫，在經濟落後地區，這一人數更多。廣大農民和大量市民無法享受社會、醫療保障，他們的生存權又怎麼保障？

中國豬正在無望無助地大量地死去，死於自焚自殺、死於貧困絕望、死於食物中毒、死於天災加人禍、死於惡政懶政、死於工傷事故、死於被害被殺、死於執法違法，甚至還有凍餓而死的…。這就是國力大增、神五上天的中國？這就是「GDP 首次突破 10 萬億元大關、國家財政收入已達 1.5 萬億元、近些年來國家每年財政收入增長都在 2000 億元以上」的中國？這就是「有史以來人權最好時期」的「社會主義」中國？古代官僚尚且知道「邑有流亡愧俸錢」，而今全國各地到處都有走投無路的老百姓在流亡、逃亡、病亡、夭亡，我們三代表的黨、人民政府和人民公僕，卻一味空言「爲人民服務」、「三個代表」、「新三民主義」，一味高歌小康時代、太平盛世。多麼「太貧瘠世」的太平盛世啊。

以民爲豬，一再強調的豬的生存權也還停留在口頭上；以官爲狗，狗就幸運、幸福得多了，生存權絕對沒有問題（誰聽過官員哪怕是不入流的基層芝麻官沒錢看病沒錢送孩子上學的嗎），而且還可以通過種種灰色、黑色收入讓這一權力得到超強體現。而且，我黨還實行殺貧濟富政策，一次次爲公務員加薪，令貧豬益貧、富狗益富。《中國財政》2003 年第 8 期刊載的官方的統計資料指出：中國高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 年，城鄉高收入戶佔總戶數的

2%，中低收入戶佔 18%，低收入戶佔 80%。這說明，少數人佔有了社會大量的財富。而這少數中，多數又是權力圈內或圈沿人物。

但狗畢竟是狗，那怕被養在黃金的窩裏。講政治是我黨選拔官吏的最重要標準。在中國當代語境裏，講政治三個字是有特定含義的，指的是與 xx 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中國官是沒有也不許有自己的標準和原則的，眼睛向上，小官看中官、中官看大官；一切「唯上」，以上面的標準為標準，以上面的原則為原則，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而黨其實等於領導，也就是等於一小撮特權分子。當民衆利益與領導利益、國家利益與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當人性與黨性、民權與黨權發生衝突的時候（這種衝突在神州大地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官員們毫無疑問要拋棄人性民權而維護黨性黨權，以領導利益、黨的利益為至高利益。為此，黨官們是以來不惜犧牲民衆利益國家利益不惜違背良知和道義不惜把自己當狗的：領導指向哪裡就衝向哪裡，黨叫咬誰就咬誰。

豬比較善良，狗則有兇惡暴虐的一面，舔屁股時無比乖巧，咬起人來無比兇狠。大多數中國人非豬即狗、亦豬亦狗、狗中有豬、豬中有狗。民衆中也有不少狗，豬多些，官場上也有許多豬，狗更多。因為特權作為一種異化的權力，具有無規則非程序的特性，與牛皮馬屁陰謀詭計血腥仇恨有著天生的不解之緣。它會敗壞人的良知、泯滅人的人性，令權力擁有者異化成對上奴性對下兇惡的狗。官小奴性大，官大凶性多。

民是豬民，官是狗官，官場上是沒有主人的，都是狗，只有大小之分沒有人狗之別，小官的主子在更大或最大的官面前，也不過一條狗，而已而已。豬被狗咬，狗也被狗咬，小狗被中狗、中狗被大狗咬，更大或最大的官一方面享受著身邊和下面狗奴才的吹捧奉承，一方面又要嚴密防範著奴才狗的背叛和出賣，一不小心，就會被其它狗咬死、吃掉。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哪。領導領袖也是受害者，大夥兒窩囊成一團豬狗成一窩，卑下醜惡的遊戲沒有最後的勝利者。

需要說明的是，說官是狗官，侮辱了狗，狗若有知，還請原諒。因為狗除馴順忍從及兇惡暴虐的兩面之外，還有忠誠的一面，這方面恰恰是官最缺乏的。現實中傳說中都有熱心助人的仁狗和仗義救主的義狗，官場上的狗則一切唯利唯權，絕對與仁義無涉。主子有了危難，原先歌功頌德乖巧馴順誓死效忠的狗如果不反咬一口，算他八輩子積德。衆叛親離被手下絞死的齊奧塞斯庫、躲進狗洞被二奶出賣的薩達姆都是殷鑑啊。

特權制度不滅，國不國黨不黨官不官民不民的現象就消滅不了，中國人民就難以從豬民狗官升級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什麼時候，我們具備了仁愛、誠信、人權、民主、自由

等公民意識，擁有了寬容、合作、科學、環保、信仰等現代精神，我們才能把豬圈狗窩改造成人的世界，才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人、中國人！

梟鳴天下之三六八：

## 怒向人間問不平

當今中國社會是世界上最為不平等、最多不平事的社會。官與民不平等、富人與窮人不平等，各社會階層的權利和義務極端不平等。權貴階級稱王稱霸專橫殘暴無法無天，弱勢民衆忍氣吞聲依賴馴服受苦受難，賣官賣國者步步高升，憂民憂國者個個蒙冤，優者汰劣者勝，能者下庸者上，作惡者獎為善者罰，宣傳自由民主理念者有罪，欺騙恐嚇打壓人民者有功，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這種種不平等可以源於出身、性別、貧富、智能、地域、學歷、階層等的不同，更多的是源於制度性的歧視（如戶口制度）。最大的不平等是法律和制度層面上的。在中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句最經不起考驗的欺世大謊，一張從來沒有兌現過的空頭支票。

司法機關和執法人員有法不依，以權壓法，執法犯法已成普遍現象。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一般都是羞羞搭搭通過黑箱操作「體現」出來的，如程維高貪污收賄，罪證確鑿，又有鉅額存款來源不能說明，又為其子程慕陽和他人任在工程上謀利而使國家工程損失巨大，事後又下令塗改賬目，構成串通、包庇用不正當手段侵吞國家財產資金罪，還濫用職權，對如實舉報的同志打擊迫害並造成了傷害性後果，而中央對程維高只予以黨籍、行政處理而不追究法律責任；如江西省會昌縣西江鎮派出所原所長梁林持槍殺人案，一審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梁林有期徒刑 3 年、緩刑 4 年。歷經 6 年之後，才在江西省人民檢察院的抗訴下，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 6 年（派出所所長執法犯法故意殺人，經被害人家屬不斷上訪申訴，經省檢察院的抗訴，才判六年？）；又如最近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的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兒媳婦狗仗人勢惡意碾死農婦一案，本屬故意殺人，卻被黑箱操作成了交通肇事罪，僅刑二緩三。這都是明顯重罪輕判、縱容包庇。

法律面前的不平等，近幾年來也有冤冤堂堂地「表現」到桌面上來的。《南方周末》就登過一份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正式向外界公佈的《關於為解放思想、幹事創業、加快發展服務的意見》及「一位憂國憂民的離休老幹部」對這份法院《意見》的批註，《意見》從頭到尾充滿了對「特殊利益集

團的關懷」，以法律形式明目張膽地充當貪官污吏們的保護神。例如，《意見》規定：

對在招商引資活動中支付的各種必要費用，只要沒有中飽私囊，不作犯罪處理（暗示：可以行賄）；國家工作人員在工作、生活或人際交往過程中不是基於權錢交易而接受禮品、紀念品的，不作犯罪處理（暗示：可以受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在改革過程中大膽興業辦事，盡到了注意義務，但由於缺乏經驗，致使國家利益、公共財產受到損失的，不作犯罪處理（怎樣才算「盡到了注意義務」？還不是憑「紅包」的多少來定嗎？）？無中生有，捏造他人犯罪事實，向有關部門告發，意圖陷害他人情節嚴重的，依法懲處。不是有意誣陷而是錯告或者檢舉失實的，不作犯罪處理；（暗示大家不能舉報腐敗行為，否則將依法懲處。「不是有意」是一句謊言）；對有突出貢獻的幹事創業者、企業家、科技骨幹人員等，確實構成犯罪，主觀惡性不大，認罪態度好的，酌情從輕處罰。符合法定條件的，可以依法判處緩刑或免刑，讓其繼續工作，戴罪立功；（此條嚴重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刑不上大夫」的封建傳統換上了種種新面具重現於世，對權貴階級重罪輕判、有罪不究甚至以罪為功，包庇縱容；對弱勢群體則輕罪重判、無罪也判。法律面對權貴「輕如鴻毛」，軟如泥巴，面對民眾則「重如泰山」，硬如雞巴，成了特權集團對人民進行專政的工具。廣大人民不但憲法賦予的基本公民權利被剝奪，有時連吃飯權、治病權、讀書權、乞討權、自焚自殺跳樓權都喪盡了。人不如豬啊；對於異議分子、人民英雄則以功為罪製造冤獄，「煽動」、「顛覆」、「泄露國家機密」等罪名隨時會從頭頂砸下來。

平等是一種古老的社會理想，歷代農民起義，「均貧富」往往是最重要的思想和最響亮的口號。共產黨的「打土豪，分田地」和社會主義大鍋飯，則把這種傳統小農式的平等思想和經濟平均主義發展到了極致。然而事實證明，而用政治的、革命的、「殺富濟貧」及其他強制性的手段均貧富，用均貧富的方法來改造社會，實現社會平等，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憑藉權力消滅私產，追求事實、結果的平等，伴隨而來的必是更大的、絕對的不平等。現在的黨主專制即不能提供起點、規則的平等，又不再追求事實、結果的平等，表現得尤為惡劣。

世間不存在絕對的平等，那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好在建立法治基礎上的現代民主制度，為我們提供了就目前歷史階段而言相對較好的西式平等觀，即權利的平等、機會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平等精神已成爲現代社會價值理念的核心，是公民社會道德、法律所追求和捍衛的基本準則。

清人張潮曰：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幽夢影》）。劍象徵武力和暴力，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剷除不平的唯一工具、手段和方式。然而，幾千年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歷史包括現代史充分證明，不論是俠客型個體的劍還是造反型群體的劍，都無法永久消滅分配不公機會不公規則不公等等「世間大不平」，都會在消滅舊的不平之後製造出新的更大的不平來。

十年磨劍不曾試，欲向人間問不平！對於一些局部的小不平，從個人的角度而言，不妨以劍「消之」，除暴安良，報仇雪恨，不管後事如何，且圖一時之快。拙文《報復主義殺出一條血路！》說過，「當一個制度不但不限制反而縱容權力爲所欲爲，當一個政府不但不制裁反而包庇鼓勵黑惡勢力，當法律與貪官惡吏串通一氣，當權力與金錢美色惡勢力同流合污，這時候，受盡盤剝、凌辱的貧苦百姓，只能拿起各種原始的武器，保衛尊嚴，伸張正義，爲自己也爲社會討回一點小小的公道了！」

但我的報復主義，是個人和局部行爲並且是針對個人或黑惡腐敗小集團的（這與我不鼓勵暴力革命的思想並不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對於當今中國黨權高於政權、政權高於人權、官權高於民權、權力大於憲法大於一切的社會制度的大不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才是最好的方式，儘管比惡制惡以血還血的個體報復主義艱難得多，但畢竟危害性、後遺症最小，從長遠著眼，它們才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陽光大道和根本大法，並最終讓中國跳出歷史周期律怪圈。

## 申雪文章兩篇

### 走馬觀花看標語

走在神州大地，無論是窮鄉僻壤，還是繁華都市，必有標語點綴其間，構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標語，這個黨文化的標誌，已成爲中國的「國粹」。標語包圍著社會，無處不在；標語詮釋著生活，無所不能。標語是走向、趨勢、依據、座右銘、指路燈、風向標，甚至生死簿；令人聞雞起舞、忍俊不禁，痛定思痛。

本人在此採擷一束，奇文共賞。

在京廣鐵路沿線河南境內一村落的牆上，大字醒目標語：

不許越級上訪

想必當地矛盾激化，有人上訪。是不是可以逐級上訪呢？列車過鄭州，在與鐵路線平行的國道上，赫然寫著：

嚴禁黨員上訪 打擊集體上訪 遣返個人上訪

看了這條標語，我不知道還有甚麼人可以上訪；倒吸一口涼氣，真為那些執拗者揪著一份心。

京廣列車進入湖南境內，鐵道旁一條標語：

臥軌是違法行爲

臥軌違法麼？他要死是他自個兒的事，從文革到改革，臥軌的事多了，也沒見鐵道部起訴哪一個。不遠處又一條標語：

集體臥軌嚴重違法

這回我信了，臥軌的確可能違法。集體臥軌已然影響鐵路交通了，火車總不能一往直前，撂倒一大片吧。

生男或生女 丈夫是關鍵（婦聯）

這是內蒙古赤峰至錦山的公路上所見，有落款。傳統觀念重男輕女農村尤為嚴重。這標語從女人心理說到男人生理，為媳婦們伸冤、正名，言之鑿鑿，可憐當地婦聯一片苦心！

一人結紮 全家光榮 家家結紮 全村光榮

這是內蒙古喀喇沁旗衛生院所見。據說這裏屬貧困地區，農村適齡男子一半打光棍，爲了「全村光榮」，不知他們在不在結紮之列。

結貧窮的紮 上致富的環

這是同一處的標語。把計劃生育工作細緻入微到可操作的程度，從微言講出大義，並昇華到脫貧致富的境界，可歌可泣，你不得不佩服當地父母官的政治覺悟和治國水平。

地處昌平的北京王麻子剪刀廠門前的標語是：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沒工作

這標語頗具預見性。2003年7月31日，北京各大媒體報道：百年老字號北京王麻子剪刀廠宣告破產。那裏的職工今天努力也沒工作了。

去避暑山莊遊玩，路上看到承德水泵廠門前的標語：

下崗工人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我想，下崗工人大概自己都沒意識到，自己居然屬於國家的寶貴財富，儘管他們往往沒有任何財富。

2002年5月，我騎車經過北京騎河樓國家民政部門口，看到有上百人在那裏靜坐示威，大多是中老年人。人人套了件半截袖和尚領的大背心，上面墨寫的貼身標語，

前胸是：李鵬還錢

後背是：還我血汗錢

在大陸，誠信缺失，道德淪喪；銀行壞賬成堆，企業該著三角債，人與人之間借錢不還司空見慣，但時任人大委員長也被追討，倒是新鮮。一打聽，其實不是李鵬欠債，是他兒子搞非法集資坑苦了投資人。子債父償，見怪不怪。也不知日理萬機的委員長是否還得上。

在北京東四鬧市區的燈箱上，有一條標語：

哪裡有新聞哪裡就有北京青年報

這是當街撒了個彌天謊。就在中國境內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這是天大的新聞，北京青年報充耳不聞，不著一字，守口如瓶。當然，也得體諒編輯記者，他們被上級指令一箭封喉，有話說不出，有勁使不上，搓手跺腳乾著急。

還有的標語，雖曾風光一時，而今羞羞答答，街頭不見蹤迹，人們只能從電視新聞裏看到它的影子。中共十六大開幕，一條紅底黃字橫幅標語環繞會場：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標語屢經檢驗，名不符實，物轉星移，今非昔比；連黨都不好意思隨處張揚，丟人現眼，遭人恥笑了，只得關起門來自吹自，活像祭出的招魂幡。

我家院門口，是單位班車的停站點，大轎車車身噴塗著時下最流行的標語：

與時俱進 開拓創新

車子啓動，標語移動，招搖過市。每日「清早起，看標語」，我不得不思索——共產黨何曾與時俱進了？哪回不是牽著不走打著倒退，被逼無奈，才跳河一閉眼。誰聽說美國總統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了，他是民選的，四年到期，敢不與時俱進；他執政要順從民意，敢不開拓創新。可見，極權國家風行的標語在民主國家那裏全成了沒用的廢話。

最短的標語只有三個字，在北京市公安局七處，十分警醒：

後悔遲

它短得有理由，這裏接手的都是刑事重案死刑犯，受教誨的人命也短，只能匆匆一瞥，對鏡自照，趕赴黃泉。

要說最長的標語那就沒譜了，街道居委會老太太們最愛貼的：

五講四美三熱愛

若一條條鋪排開來，能填滿一整篇文章。其實，《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往往就是橫行全國的標語；以史爲鑑：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瞬時，橫掃了多少國人，冤魂遍地，六月飛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所以說，《人民日報》一發社論，全國人民准倒黴。

國人嗜癩成癖，既使那些實用性的安民告示，也要凝煉成傳神的標語，語不驚人死不休。高速公路旁：

橫穿公路 壓死白壓

真是迎頭棒喝，擲地有聲。哪怕你是在超市悠閒地購物，偶一回頭，也會發現貨架上冷不丁冒出一條標語：

偷一罰十

一個社會，標語越多，思想越少；標語越多，行為越偏執；標語越多，越不合邏輯，越荒唐可笑。中國缺的是能夠匯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永恆的、有萬鈞之力堪稱鎮國之寶的標語，譬如：

自由 民主 人權

## 小公共汽車上的「天安門母親」

這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難以忘懷。

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進入「敏感」時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從友誼賓館出來，上了小公共汽車。小公共招手即停，很是方便。停了幾次上人，車上的二十多個座位差不多都坐滿了。忽然，司機大聲問售票員：「喂，我違章了嗎，怎麼後面的桑塔那老跟著咱們，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從後車窗望去，一輛深藍色桑塔那轎車不緊不慢地跟在小公共汽車後面，如影隨行。這時，坐在後排座上的一位婦女告訴售票員說：「別理它，跟我的，買菜它跟著，上醫院它跟著，我去哪它跟到哪。」車上的人聽了都很是吃驚。我看那是位文靜的知識女性，不到六十歲，聲音清亮。售票員疑惑地詢問。她告訴售票員：「我兒子六四時被槍殺了」。車裏一片寂靜，大家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誼賓館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學，人民大學有一位六四難屬丁子霖老師。難道她就是丁老師？我不知道。豪爽的售票員勸慰著：「伯母，腦袋掉了就碗大個疤，過二十年又一條漢子」。

乘客們震驚過後，臉上都充滿了同情；人們或是勸慰，或是憤憤不平地議論著，都對跟蹤的轎車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駛中的小公共正是當今社會的縮影。乘客之間並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壓下閃現。在這個暫時封閉的空間裏，恐懼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沒了。人們的目光和表情都傳達出一種默契和共識，黑白分明，都明瞭正義在哪一邊。其實，在北京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朋友圈子裏，人們都無數遍地議論過六四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專制高壓下，政府剝奪了大眾公開的話語權，卻剝奪不了滲透進每一社會細胞的大眾民間的話語權。政府騙人民，人民騙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桿打狼兩頭怕，但誰更怕誰？政府更怕人民。因為政府同六四鎮壓栓在一起，同罪惡栓在一起，站在歷史的被告席上，沒有前途。

這輛小公共汽車成了一個正義的精靈。儘管車後面緊跟著恐怖，但這輛車「反了」，人們無畏地自由表達。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許多人懷疑自己的認知，願意聽黨的話，把一切罪惡都記在「四人幫」頭上。六四使億萬人

大徹大悟。現在，即使你一個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資源的黨面前，就像車裏那位柔弱的母親，也敢看小了它——黨；因為人一旦為正義武裝，人就是頂天立地大寫的人。

那些賣身投靠的「知識精英」們總會出來打圓場，說：「六四很複雜」。這就跟說「法國大革命很複雜」「辛亥革命很複雜」一樣，純粹是沒用的廢話。那些所謂的「中國通」們，說中國人已經忘記了六四。忘記了嗎？你看專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門母親」的心上，噬齧著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群體。這種喪盡天良，只會強化所有中國人的記憶，並使記憶爆炸。

車在北太平莊停下，「天安門母親」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車。我看到桑塔那像只猙獰的鱷魚掉身又尾隨追去。望著母親的背影，我知道她沒有淚水只有堅強。我在心裏默默地說：「好媽媽，多保重；您雖然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了兒子，我就是您的兒子！」

（本刊曾推薦該文予“紅朝謊言錄”征文）

###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 第八次財務報告

( 10/1/03 - 12/31/03 )

<b>總收入（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b>	<b>\$1668.60</b>
<b>總開支</b>	<b>\$22617.38</b>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總開支	\$8441.32
雜誌社房租	\$2400.00
電話費（含寬頻上網及新舊網站年費費）	\$622.82
辦公室水雜費（補前）	\$277.78
蔣夫人追思會贈花圈費	\$350.00
辦公室添置用品	\$976.57
雜誌出廠運輸費	\$75.00
研究中心“反思現代史”攝製室租金	\$2400.00
研究中心邀請人員接待費（2003夏）	\$1315.49
紐約舊金山四場《走向共和》賞評會開支	\$3739.53
機票	\$442.50
主編稿酬回捐用作公關交通費（4-12月）	1576.27

#### 說明：

- 1、主編第七期稿酬\$620美元已經全部回捐雜誌社專款專用。
- 2、本期財務報告由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718-898-9100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本刊電子信箱：hhgang2001@hotmail.com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美國為 \$ 22.00；加拿大為 \$ 44.00；其它地區為 \$ 55.00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_\_\_\_\_

我的郵寄地址是：

\_\_\_\_\_ (姓名)

\_\_\_\_\_ (中文名字)

支票抬頭請寫：

\_\_\_\_\_ (街名)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_\_\_\_\_ (城市)

\_\_\_\_\_ (州名)

\_\_\_\_\_ (郵編)

(縮寫：MCHS)

\_\_\_\_\_ (電話)

\_\_\_\_\_ (email)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 編 後

本期發稿前，沒有想到，居然拿下了足足十五萬字已經編成和校對過的稿子。本刊校閱人、義工應易中先生就揉著紅紅的眼睛說：“也好，下一期我就要少校對一些稿子了！”然而，他還是對拿下來的稿子充滿感情地說：“要是這一期都能夠發表出來那該多好！”

應先生講的是本刊所有同道的心裏話。可是，黃花崗雜誌自創刊以來，祇有一期沒有做“贈刊”，幾乎沒有一期不是“稿滿為患”，不，是“稿滿為喜”才對。在這裏，我們真是要感謝黃花崗雜誌的作者們，感謝他們不僅用心在寫，而且用心在等，特別是國內那些寧願等上三個月、半年，也願意將稿子投給黃花崗雜誌的朋友們……

誰說祇有我們這些《黃花崗》的義工們在辛勤地耕耘呢？其實，如果沒有作者們正在用他們對祖國、民族和人民的摯愛，與我們一同耕耘在海外這一片叢生的荊棘之中，一份要愛中國、愛中華的雜誌，還能夠撐持得下去嗎？

謝謝所有的作者，謝謝所有的讀者！

因最近有不少讀者來信來電詢問如何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本刊特回復如下：

- 1、《誰是新中國》定價：\$38.00 美元；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八折：\$ 30.40 美元；美國銷售稅為\$ 2.58 美元，其它地區免稅。
- 2、郵資自付：美國為 2.81 美元；歐洲空運為 \$9.00 美元，海運為\$ 3.31 美元；亞洲空運為\$9.00 美元，海運為\$4.46 美元。
- 3、美國藍天出版社（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英文縮寫：BSPH 信箱：P.O.BOX 2468 NEW YORK, NY 10163
- 4、郵購者請寫明地址、電話和要求，支票抬頭請寫明 BSPH.

黃花崗雜誌免費代購 可聯係

誰  
是  
新  
中  
國  
  
訂  
閱



辛瀨年在哈佛演講

想進步：變了。良先當過以於全

# 美中新聞

## 誰是新中國?

### 辛瀨年芝城演說熱情澎湃反應熱烈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 三民主義才是新中國的希望

## 大陸學者辛瀨年論歷史反思獲激賞

星期一

#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88週年

## 舉辦「誰是新中國」研討會

### 著名史學家辛瀨年教授主題演講

「研究」誰是新中國「列中共黑名單 不得返鄉」

一名高層官員辛瀨年：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 辛瀨年為「新中國」說實話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 辛瀨年說「新中國」

一位在中國大陸著名的學者辛瀨年，十八日(星期六)下午，應邀在洛杉磯僑界慶祝建國八十八週年大會，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 「誰是新中國?」辛瀨年檢驗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誰是新中國》出版之後.....

### 動活日6壇論由自山金

#### 「國中誰是新」講主授教年瀨辛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April 14, 2000 (Friday) Chinese American News 日四十月

### 一統兩岸成完 文孫承繼籲呼者學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 「誰是新中國」演講辛瀨年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 「誰是新中國」演講辛瀨年

【本報記者】辛瀨年於五月廿九日(星期六)晚上，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行演講，題目是「誰是新中國?」(Who is the New China?)。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辛瀨年演講內容豐富，引起在場聽眾的熱烈反應。





新唐人電視台 透視中國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

即將聯合推出電視係列節目

# 反思現代史

百年中國 滄桑歷盡  
誰非誰是 假真難明  
學者專家 探身史海  
辨析反思 真相澄清

廣告設計：應祖揚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O.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NEW YORK, NY  
PERMIT NO. 5135